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巴 枯 宁 言 论

（供批判用）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巴 枯 宁 言 论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本书是供批判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请核对原文，并
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国防大学 2 043 8932 1

12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巴 枯 宁 言 论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列 宁 斯 大 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83,000字

1978年5月第1版 197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2·137 定价 1.35元

内 部 发 行

621
02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说 明

为了适应批判修正主义的需要，我们根据已收集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主要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著作，编选了这部丛书，按人或按专题分册出版，每册书都有编者加的前言、按语，并根据需要附有年表或其他参考资料。

材料的选择和编译，如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阴谋家、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在第一国际存在的十年当中，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一半以上时间在同巴枯宁阴谋集团进行斗争。在反对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并制定了同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阴谋家、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斗争的策略。为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同巴枯宁阴谋集团斗争的历史和经验，批判巴枯宁的反革命理论和罪行，我们将巴枯宁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摘要编译出版，为大家提供一些反面教材。

巴枯宁(1814—1876)出身于俄国贵族官僚家庭，1833年在彼得堡炮兵学校毕业后当了沙皇的炮兵军官；1836年到莫斯科，参加当时有名的斯坦凯维奇小组，研究康德、费希特，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反动方面，鼓吹同沙皇俄国的现实调和；1840年到德国学习，同青年黑格尔派卢格等人接近，热中于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1843年到瑞士，同魏特林交往密切，深受魏特林的宗派思想的影响；1844年在巴黎经卢格介绍同马克思认识，同时也结识了蒲鲁东，他一开始就对马克思采取敌视态度，而对蒲鲁东推崇备至，接受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观点。

1848年，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巴枯宁抱着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动目的参加了这次革命。他不是主张欧洲革命力量联

合起来打倒欧洲反动势力，而是力图利用革命形势来建立以沙皇为首的斯拉夫国家，鼓吹根据“种族和血统的神圣关系”，把各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建立联盟统一体。为了这个目的，巴枯宁参加了1848年6月在布拉格举行的斯拉夫代表大会和6月12日布拉格暴动。1849年12月，巴枯宁以斯拉夫代表大会代表的身分发表《告斯拉夫人书》，把斯拉夫的民族利益置于欧洲各国革命利益之上。他不顾当时欧洲革命迫切需要各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而宣扬各斯拉夫民族的“共同的历史和血统关系”，要求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础上，在各斯拉夫民族之间“建立紧密的兄弟同盟，以便建立一个伟大的自立的机体”，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斯拉夫人才同意参加革命。巴枯宁的这种反动观点受到恩格斯的严肃批判。恩格斯说：“**革命是不允许向它提出任何条件的。或者做一个革命者，接受革命的一切后果，不管这种后果是什么，或者投入反革命的怀抱，有朝一日不知不觉地（也许是事与愿违地）发现自己同尼古拉和文迪施格雷茨处在同一阵营中**”^①。

布拉格暴动失败后，巴枯宁逃往德国，参加1849年5月德累斯顿起义。起义失败后，巴枯宁被捕，后来被引渡给俄国政府。在狱中巴枯宁向沙皇写了《忏悔书》，奴颜婢膝地向沙皇低头认罪，伏地求恩，供认自己“罪大恶极”，“是个十恶不赦的大罪犯”，说他参加革命是“由疯狂走向疯狂，由错误走向罪过，由罪过走向犯罪”，从而成为可耻的叛徒。沙皇尼古拉死后，巴枯宁又向亚历山大二世写悔过信，“诅咒自己的错误、迷妄和罪行”，表示要“用行动来补偿自己的过去”，“用汗和血来洗刷”自己的“罪行”，再次暴露了无耻叛徒的丑恶嘴脸。

1857年，巴枯宁被减刑，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41页。

放期间，巴枯宁受到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巴枯宁的亲戚）的百般照顾，享有在整个西伯利亚旅行的特权，因而对其感恩戴德、唯命是从，实际上成为沙皇总督的幕僚。他为穆拉维约夫歌功颂德，称赞沙皇的这个鹰犬是“优秀人物”、“朴实的民主主义者”、“俄国的救星”等等，希望穆拉维约夫担负起解放斯拉夫民族的重任。他无耻吹捧穷凶极恶的扩张主义者、沙皇侵华的得力干将穆拉维约夫侵略中国的罪行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事业”、“阿穆尔〔即黑龙江——编者〕的丰功伟绩”。这充分说明，巴枯宁是老沙皇侵略扩张政策的吹鼓手。

1861年，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到英国后，仍然坚持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动立场，为沙皇游说，吹捧“亚历山大二世终究是统治过俄国的一位最伟大、最受爱戴、最强有力的沙皇”，美化罗曼诺夫王朝，希望沙皇“成为整个斯拉夫世界的救主和首脑”，领导斯拉夫人进行种族战争，建立大俄罗斯帝国的霸权。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煽动，曾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痛斥：“就是这个从1868年以来一直伪装成国际主义者的人，在1862年为了俄国政府的利益宣扬种族战争。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内阁的发明，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尼古拉的泛斯拉夫主义一直到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实质上他们彼此之间是完全一致的”^①。

1864年，欧美各国先进工人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成立了群众性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第一国际。巴枯宁隐瞒了背叛革命的可耻历史，混入了第一国际。之后，他到意大利进行活动。他口头上接受国际的委托，答应要为国际的事业效力，在意大利为国际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可是他到意大利后就把国际的委托置诸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92页。

后,脱离国际而搞他的宗派活动,后来又在瑞士加入为了同国际对抗而建立的资产阶级组织和平和自由同盟。

1865年,巴枯宁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宗派组织国际革命协会。巴枯宁在为这个宗派团体起草的章程和纲领中,较系统地说明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以后,他在各种著作和小册子中把这个纲领中的观点发展成为一整套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巴枯宁主义。

巴枯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破产的小资产者的绝望情绪,带有疯狂性和破坏性。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巴枯宁主义都直接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

巴枯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个性绝对自由,反对权威,消灭一切国家。巴枯宁认为自由是人性的最纯粹的表现,权威和国家都是对人性的最彻底的否定,因而是绝对的祸害,为了实现个性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必须“无条件地排除权威原则和国家的必要性”。他声称“对我们来说,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的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作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巴枯宁主张各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认为继承权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和国家存在的重要条件,因此他要求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作为解放劳动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巴枯宁看来,国家既然是主要祸害,那末工人阶级就必须放弃一切政治活动,因为在国家中进行政治活动,就等于承认国家和延长国家的寿命,因此他宣布:不是直接和立即消灭国家的任何政治行动都是反动的。巴枯宁否认无产阶级担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而把流氓、游民、强盗看作是实行社会革命的不可战胜的和摧毁一切的力量。他反对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只要有

一百名身有“魔胆”的阴谋家的密谋组织就足以实现欧洲革命。

巴枯宁用来同马克思主义对抗的这些理论，都是不成样子的，是东拼西凑的杂拌。消灭国家的理论主要是从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那里抄袭来的，废除继承权的主张是拾圣西门主义者的余唾，放弃政治活动的观点是蒲鲁东学说的再版。所有这些理论，早在四十年代就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得体无完肤。巴枯宁对工人运动的主要危害是他的阴谋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①。

1868年巴枯宁在日内瓦重新加入国际后，便大搞阴谋分裂活动，暗中策划篡夺国际的领导权。恩格斯指出：“**这位道貌岸然的君子到处把自己打扮成国际的最忠诚的先进战士，暗地里却密谋篡夺整个领导**”^②。

巴枯宁重新加入国际的时候，国际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已经得到充分巩固和迅速发展。他意识到，“**为了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他就必须以另一支军队的领袖的身分出现，这支军队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应当由一个秘密的组织来保证**”^③。为此，巴枯宁在国际内部建立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组织，作为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工具。这个秘密组织在公开场合承认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暗中却自成体系，另搞一套。它的成员打着国际的旗帜，到处骗取工人的信任，窃据领导地位。它把国际的会员分为“亲信者”和“非亲信者”。巴枯宁把被他拉过去的国际会员封为“亲信者”，利用他们对第一国际的基层组织实行分化瓦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页。

在国际的支部内组织秘密支部。各秘密支部服从阴谋集团的统一命令，并通过事先策划好的一致行动来操纵国际的支部。这个阴谋集团利用秘密组织的力量把它的成员送入各个地方联合会、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以便把国际的各层组织抓到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巴枯宁的阴谋组织表面上是国际的一部分，实际上则是“国际中的国际”，“国中之国”，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恩格斯揭露说：“同盟从一开始就企图成为我们协会内部的一个特殊的贵族集团，一个有自己的纲领、享有特权的上等人物的派系”^①。

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目的，是要用巴枯宁的形式上极“左”而实质上极右的纲领和路线，来代替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和路线。

巴枯宁及其拥护者本来是一伙极右派。可是，为了篡夺国际的领导权，巴枯宁和他的门徒用极“左”的革命词句把自己打扮成最激进的革命派，鼓吹要实行“激进的革命”，宣扬要一举消灭一切国家、消灭一切权威、消灭一切权力、消灭一切社会关系，叫喊“我们的事业是可怕地、彻底地、普遍地、无情地破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没有头脑的侏儒谈吐可畏，摆出一副吓人的样子，想在他们自己眼中显示出革命巨人的姿态**”^②。巴枯宁还骂别人不革命以显示自己最革命。他攻击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太资产阶级化了”，吹嘘他那一套思想“无疑是在国际中所提出的一切体系中最先进的体系”、“无疑是对国际纲领的最后的、最正确的、最彻底的和最好的表述和说明”。实际上，巴枯宁派正是要用这种极端革命的叫嚣和自我吹嘘来掩盖他们的纲领和路线的极右实质。他们要消灭一切国家，“**其实，这是胆小如鼠的人乔装为革命者的绝妙手法**”^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3页。

② 同上书，第4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3页。

因为他们攻击的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也不能自卫的抽象的国家，而丝毫不去触动具体的资产阶级国家；不仅如此，他们对于压迫劳动者的沙皇制度国家和波拿巴主义国家非常佩服，而对于巴黎无产阶级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巴黎公社则竭力反对；他们要消灭一切权威，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沙皇和拿破仑第三的反革命权威备加赞扬，称颂亚历山大二世是“庶民的沙皇”、“善良的沙皇”，向拿破仑第三高呼“皇帝万岁！”而对马克思的革命权威则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要消灭一切权力，说什么建立革命政权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新的欺骗和背叛，凡是主张建立革命政权的革命者都是他们的“天然敌人”，但这并不影响巴枯宁派在1873年西班牙起义中同镇压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流合污，帮助资产阶级共和派取得政权，并出席资产阶级的政府委员会，从而断送了这次工人起义；他们要消灭一切社会关系，叫喊要“毫不犹豫地消灭这个世界的地位、关系和任何人”，这并不妨碍巴枯宁的信徒去同政府的秘密警察建立特殊的关系，也不妨碍巴枯宁欣赏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关系，把国际的使命歪曲为“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大家庭”，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北美合众国作为他的无政府主义联邦制的典范。可见，巴枯宁的破坏一切的事业，并不是要破坏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制度，而是要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国际工人运动，要用巴枯宁的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极右派的纲领代替国际的阶级斗争纲领，以便把工人运动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是流氓无产者和游民。

巴枯宁把社会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纠集在自己周围，把流氓、文丐、特务、密探、奸细收罗到他的阴谋组织中，利用这些社会败类作打手，不断向国际总委员会发动进攻。马

克思恩格斯说：同盟是一个由“奸细密探组成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匪帮”、“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的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①。

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政治纲领是反对权威。

反对权威，鼓吹绝对自治，宣传无政府状态，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核心，也是巴枯宁在国际中进行阴谋活动的核心。巴枯宁在国际中到处鼓吹反对权威，绝不单纯是进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宣传，而是把反对权威作为政治武器，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打击以马克思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巴枯宁先给权威定罪，把它说成是“奴役和精神堕落与道德败坏的源泉”，然后要反对什么，就说它是“权威主义的”，要打倒谁，就给谁扣上“权威主义者”的帽子。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夺取政权，建立革命的专政，巴枯宁就宣布马克思主义是“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必须抛弃，代之以巴枯宁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坚决维护革命的权威并在国际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巴枯宁就攻击马克思“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从脚跟到头顶都是个权威主义者”，要加以打倒，代之以实行绝对自治的所谓的集体革命力量，并叫嚷“我们不需要领袖，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容忍有领袖”；马克思领导的国际总委员会具有很大的革命权威，是领导国际会员同内外敌人战斗的司令部，是巴枯宁篡夺国际领导权的主要障碍，巴枯宁就宣布总委员会是个权威组织，要铲除它的“权威主义的倾向”，把它变为一个没有任何纪律、没有任何权威的通讯统计局。总之，在国际中，“巴枯宁派对什么一不如意，他们就说，这是权威的，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作出了永远的判决”^②。实际上，巴枯宁并不是不要权威，不是不要领袖，而是以反对权威为借口来树他自己的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85、5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9页。

威，用打倒领袖的口号来掩盖他想充当领袖和指挥国际工人运动的野心。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巴枯宁的“头脑里是一片无政府状态，那里只容得下一个明确的思想，即巴枯宁应当第一提琴手”，“在宣扬无政府状态和自治的背后，隐藏着一些阴谋家独断专行地指挥整个工人运动的野心”^①。

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策略原则是：耍两面派；“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②。

一切阴谋家、野心家都是反革命两面派。巴枯宁就是个玩弄两面派手法的能手。

巴枯宁和他的阴谋集团成员把耍两面派作为他们欺世盗名的手段。为了骗取马克思的信任，巴枯宁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向马克思掏心表示忠诚，用最美好的词句赞扬马克思，颂扬马克思是“巨人”，是“很有智慧的人”，是“国际的元老”、“对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说马克思是“防止任何资产阶级派别和思想侵入协会的最有力的障碍之一”，并煞有介事地声明，“我将永远承认这种功绩”，“只有怀有可恶的诽谤成见的人才敢否认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爱”等等，与此同时却对马克思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诬蔑马克思是“教皇”、“独裁者”、“不可救药的幻想家”、“书斋里的革命者”、“共产主义的国家主义者”，杀气腾腾地宣布，“不仅要消灭国家，而且要消灭书斋里的革命者——国家的拥护者”等等；他口头上大叫大嚷，要“反对一切专政”，认为“对于社会革命来说，没有比专政更令人可恶的东西了”，暗中却指使他的党徒建立“看不见的专政”、“没有权力的外观”的“唯一专政”；他在国际中煽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60页，第19卷第1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1页。

反对一切权威、一切纪律，背地里他却指令他的阴谋集团建立“铁的、无条件的纪律”，要求阴谋组织的成员都“自愿地服从它的权威”；他要求国际的组织实行绝对的自治，贯彻“自下而上”的原则，反对总委员会实行任何“自上而下”的集中，在阴谋组织中他却实行“自上而下”的集中原则，要求它的成员“个个都无条件地服从一个无所不知但无人知道的唯一的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他口头上把团结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亮，说什么“国际建立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的基础”，对工人“团结的最小背叛都是最大的罪行”，事实上巴枯宁正是一切分裂的制造者，是煽动分裂国际的罪魁祸首，当他在讲关于团结的漂亮话时，暗中就在于分裂国际的阴谋勾当。巴枯宁的两面派行为数不胜数，仅举以上数端，已足以说明巴枯宁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特点。

至于造谣、诬蔑、撒谎、诽谤，那更是巴枯宁的惯伎。

巴枯宁在政治上已经成为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为各国反动派效劳的奴才。在马克思主义真理面前，在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的光明正大行动面前，巴枯宁无伎可施。工人不拥护他，广大国际会员不拥护他，他只好靠造谣、诬蔑、撒谎、诽谤来混日子。巴枯宁的秘密同盟“规定自己的拥护者把造谣、伪装和欺骗当做首要的义务，指使他们欺骗国际的非亲信的会员，向他们隐瞒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实目的”^①。巴枯宁是同盟这项规定的积极贯彻者。他自己明明是个大阴谋家，背着国际组织阴谋集团，策划推翻总委员会的阴谋，可是他却大造谣言，诬蔑马克思“具有搞阴谋闹分裂的天才”，胡说总委员会是“阴谋的策源地”，总委员会领导下的各级地方联合会都是“受阴谋家和反动分子派别领导的”；巴枯宁明明是个野心家，为了篡夺国际的领导权，在国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8页。

中制造纠纷和混乱，可是他却厚着脸皮撒谎，说什么“谁要是为了个人的野心而在协会中散播纠纷和瓦解的种子，他就要负可怕的责任，我丝毫不想承担这种责任”，并倒打一耙，诽谤马克思有“追求权力”、“用自己的思想操纵群众”的野心；在欧洲 1848 年革命中，正是巴枯宁到处鼓吹泛斯拉夫主义，为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可是他却反咬一口，诬蔑马克思“要使欧洲泛日耳曼化”，诬蔑马克思的拥护者“在 1848 至 1849 年却都不是革命者，而大多数是反动分子”；巴枯宁在国际中建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个地道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可是他却颠倒黑白，说他的同盟是唯一的革命组织，除它以外整个国际都是个反动的集团。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瞒态度，是软弱的表现”^①。巴枯宁的一切欺骗行为恰好说明了他色厉内荏，不得人心。

巴枯宁为了贯彻他的反革命纲领，在国际中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不赞成他的反革命纲领的人，一律被当作敌人，对其进行恫吓和暗杀。凡是支持他的人，不管是怎样的坏蛋，都被封为革命者，引为“亲信者”。巴枯宁宣布：“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纲领已经具备。它是不可改变的。谁赞成它，谁就应当跟我们走。谁反对我们，谁就是一切人民敌人的朋友、我们的敌人”。根据这个反革命原则，巴枯宁要对一切不赞成他的反革命纲领的人“进行战争”，要“用死亡来威胁一切不拥护它的革命者”，加以“无情的消灭”。他狂妄地声称，谁要想革命而又“不参加我们的队伍，那他遭到灭亡就不是我们的过错了”，谁要是参加了他们的集团而又要退出，那就被认为是“不相信他们的革命原理的真实性和有意识地背离团体”，那就要进行“报复”，就要“被从活人的名单中

^① 《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150 页。

除名”。巴枯宁匪帮为了对付不拥护他们的革命者，甚至拟好了“公敌名单”，准备用匕首、毒药、绞索、枪弹来对付他们要加害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曾愤慨地说，巴枯宁匪帮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行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那里，无政府状态已经成了普遍的破坏一切的行为，革命已经成了一系列起初是对单个人的然后是大规模的暗杀活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巴枯宁匪帮为了篡夺国际的领导权，搞垮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恩格斯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揭露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罪行时指出：“**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①。

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的阴谋活动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得到世界各国反动派的赞赏。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必须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必须一举永远地结束由于协会内存在着这个寄生组织而一再发生的内部纠纷。这些纠纷只是浪费本来应该用来反对现存资产阶级制度的力量。同盟既然阻挠国际反对工人阶级敌人的活动，因此它就是在最好地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效劳**”^②。

1872年举行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粉碎了巴枯宁阴谋集团，把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巴枯宁开除出国际。通过这场长期、激烈、复杂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出一条十分宝贵的经验：“**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③。根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8页。

② 同上书，第133页。

③ 同上书，第372页。

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马克思恩格斯于1873年发表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系统地揭露了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罪恶活动，公布了关于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材料，把巴枯宁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得巴枯宁再也不能在工人运动中招摇撞骗和进行任何实际活动了。巴枯宁只得以年老多病为借口虚伪地声明退出政治舞台，直到1876年在瑞士死去。

巴枯宁虽然死去一百多年了，但是他的反动思想仍然散发着毒素。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把巴枯宁主义作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库。苏修叛徒集团在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破坏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所使用的阴谋策略，同巴枯宁的阴谋策略一脉相承。不仅如此，多年来苏修叛徒集团不遗余力地替革命的可耻叛徒和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巴枯宁翻案，把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叛徒吹捧为“革命者，专制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苏修不顾一切地为巴枯宁翻案，是要用历史上的背叛行为来为他们今天的背叛行为辩护，是要借用泛斯拉夫主义者巴枯宁的幽灵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和称霸世界的野心服务。林彪一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也都是些巴枯宁式的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他们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制造分裂、搞阴谋诡计时所玩弄的手法，同巴枯宁的手法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了解巴枯宁的反革命理论和实践，对于掌握一切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的活动规律，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会有所帮助。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

1977年12月

目 录

《黑格尔中学讲演录》译者序言(摘录)(1838年4月11日)	1
德国的反动(摘录)(1842年10月17—21日)	2
论共产主义(摘录)(1843年6月13日)	4
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础(1848年6月初)	8
致格·海尔维格(摘录)(1848年8月上半月、12月8日)	14
告斯拉夫人书(摘录)(1848年12月)	17
忏悔书(摘录)(1851年7—8月初)	21
向亚历山大二世请求减刑书(1857年2月14日)	32
致亚·伊·赫尔岑(摘录)(1860年11月7日)	36
答《钟声》(摘录)(1860年12月1日)	61
致亚·伊·赫尔岑(摘录)(1860年12月8日)	63
罗曼诺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节里。人民事业(摘录)	
(1862年)	64
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摘录)(1866年)	72
国际革命协会的纲领(摘录)	81
在和平和自由同盟1867年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摘录)	89
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主义(给和平和自由同盟	
中央委员会的说明理由的建议)(摘录)	
(1867—1868年)	92

在和平和自由同盟 1868 年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摘录)	128
致《民主报》(摘录)(1868 年 4 月)	133
国际兄弟同盟的章程和纲领(1868 年 9 月)	135
致卡·马克思(摘录)(1868 年 12 月 22 日)	153
国际的政策(摘录)(1869 年 8 月)	155
革命问答(1869 年夏)	163
致阿·里沙尔(摘录)(1869 年 7 月 29 日)	169
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1869 年 9 月 10 日)	171
附录：巴塞尔代表大会废除继承权问题小组委员会 的报告	174
致亚·伊·赫尔岑(摘录)(1869 年 10 月 28 日)	176
告俄国军官书(摘录)(1870 年 1 月)	180
致阿·里沙尔(摘录)(1870 年 4 月 1 日)	186
致一个法国人(摘录)(1870 年 8 月 30 日)	193
法兰西共和国。公社革命联邦(1870 年 9 月)	195
致尼·普·奥格辽夫(摘录)(1871 年 4 月 9 日)	197
巴黎公社和国家概念(摘录)(1871 年 6 月)	199
附录：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给国际工人协会各联合会 的通告(1871 年 11 月 12 日)	206
上帝与国家(摘录)(1870—1871 年)	211
我和马克思的私人关系(摘录)(1871 年底)	230
国际的组织(1872 年)	239
国际苏黎世斯拉夫支部的纲领(1872 年)	248
秘密信件	251—288
致路·纳布鲁齐(1872 年 1 月 3 日)	253
致卢比康及其余所有朋友(摘录)(1872 年 1 月 23 日)	259

致弗·莫拉(1872年4月5日)	277
致莫拉哥(摘录)(1872年5月21日)	280
致《汝拉联合会简报》编辑(1872年6月12日)	289
附录：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关于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的 决议(1872年9月15日)	294
致《自由报》编辑部(摘录)(1872年10月5日)	296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国际工人协会内的两派斗争) (摘录)(1873年)	303
致《日内瓦》杂志编辑(1873年9月)	344
致汝拉联合会(1873年10月)	349
致巴枯宁娜(摘录)(1874年7月)	353
 米哈伊尔·巴枯宁年表	 356

《黑格尔中学讲演录》译者序言(摘录)

· 编者按语 ·

这是巴枯宁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时他是个右派黑格尔主义者，完全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的和反动的方面。他把沙皇制度的反动统治称作“美好的俄国现实”，鼓吹“在各方面和在生活的一切领域内同现实调和，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任务”。

.....

幸福并不是在幻想中，不是在抽象的梦中，而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反抗现实也就是毁灭生活的任何有生源泉。在各方面和在生活的一切领域内同现实调和，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任务，黑格尔和歌德都是这种调和、这种起死回生的转化的首领。我们希望，我们的新一代也将丢掉幻想，放弃空洞的和无意义的废话，意识到真正的知识同智慧的混乱和信口胡说是完全对立的，在知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严格的纪律，没有这种纪律就没有知识。我们希望，新一代最终将同我们美好的俄国现实亲近起来，抛弃标新立异的一切妄求，最终将感觉到做真正的俄国人是自己的合法需要。

.....

写于1838年4月11日。发表于《莫斯科观察家》杂志1838年第4期。译自《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莫斯科1934年俄文版第2卷第177—178页。

德国的反动(摘录)

· 编者按语 ·

1840年巴枯宁去德国,在那里同卢格等青年黑格尔派接触,接受了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观点。1842年10月他在卢格主编的《德国年鉴》上发表了《德国的反动》一文,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巴枯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已经萌芽,他提出了“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这一主张以后发展成为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

谁会否认,“自由,实现自由”这个口号现在已摆在历史日程的首要地位了? 不管朋友或敌人都承认这点,而且应当承认这点;此外,谁也不敢大胆地和公开地宣布自己是自由的敌人。但是,正如福音书上早就说过的那样,仅仅承认是一文不值的,因为,很遗憾,迄今为止仍有不少人实际上在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自由。为了事业本身的利益值得了解一下这些人,因为他们按其本性来说是各种各样的。

.....

……难道你们没有在革命建立起来的自由庙宇的山墙上看到“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神秘的和可怕的字眼吗? 难道你们不知道和没有感觉到,这些字眼意味着现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彻底消灭吗? 难道你们一点也没有听到革命的风暴,难道你们不知道,民主主义的所谓保护者、名副其实的革命之子拿破仑用胜利的手把消

灭差异的革命原则传遍全欧洲吗？也许，你们没有听说过什么关于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事情吗，难道你们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在精神世界中提出了消灭差异的革命原则和精神自治原则的哲学吗？难道你们不了解，这个原则是同一切现存的天启宗教、同一切现代教会极端矛盾的吗？

.....

让我们相信永恒精神吧，这种精神之所以在进行破坏和消灭，仅仅因为它是一切生活的无穷无尽的和永远创造的源泉。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

写于1842年10月17—21日。发表于《德国年鉴》1842年第247—251号。译自《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莫斯科1935年俄文版第3卷第126、145—146、148页。

论共产主义(摘录)

·编者按语·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魏特林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学说在欧洲传播很广，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惧。瑞士资产阶级保守派杂志《观察家》竭力攻击魏特林的学说。巴枯宁于1843年6月写了《论共产主义》一文，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立场同《观察家》进行辩论。他首先断然声明，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并恶毒攻击魏特林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被强迫麇集在一起的一群牲畜”。他企图把共产主义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用人性论来解释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说成是“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产物。

.....

……我们和《观察家》杂志都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非常重要和极其危险的现象。为避免误会起见，我们一劳永逸地声明，我们本人不是共产主义者，象《观察家》杂志的先生们一样，我们不愿意在按照魏特林的计划建立的社会中生活。这不是自由的社会，不是自由的人们的真正有生命的联合，而是一种不堪忍受的强制，是被强迫麇集在一起的一群牲畜，它们追求纯粹的物质目的，对于精神生活和精神生活所能提供的高级享受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认为这样的联合体有朝一日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坚信人人都或多或少自觉地具有的神圣的真理的力量，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高枕无忧。

.....

因此现代哲学必然会同共产主义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因为它们两者都是从我们时代的精神中产生的，都代表着这种精神的最重要的启示。……

直到现在，哲学仍然在进行一场顽强的生死斗争，来反对一切成见，反对一切妨碍人们达到他们的崇高的和神圣的目的——实现自由的和博爱的社会，实现地上的神的王国——的东西。哲学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要进行许多斗争，以便撕破保守的人民之友为了利己主义的利益向人民撒下的谎言之幕。但是哲学有真理的勇气，它会而且必然会取得胜利，因为真理、对真理的认识，是它的唯一武器。它在光明照耀下进行战斗，而它的敌人却在夜一般的黑暗笼罩下进行战斗。它的敌人在人民当中唤起种种粗鲁的、阴暗的欲望和阴险的东西，相反地，它只依靠人类本性的类似神的光明面，它诉诸对自由、爱和认识的崇高的欲望。而神、真理终归会战胜黑暗。

哲学和共产主义的结合点就在于：两者都追求人的解放。但是，在这里也开始出现了二者的重大分歧。哲学按实质来讲，只能是理论的，它仅仅在认识的范围内运动和发展；而相反地，共产主义在它目前的形式下仅仅是实践的。这就表明了这两者相互比较之下各自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诚然，思想和行动，真理和道德，理论和实践，归根到底是一种东西，构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实质。诚然，现代哲学的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它承认并且认识了这种统一性，但是取得这种认识之后它就达到它作为哲学所无法逾越的界限了，因为在这个界限的那边开始了一个比它更崇高的实质——现实的、受到爱的鼓舞的、从原始平等的神的实质中产生出来的自由人的共同体，即构成基督教的上帝的实质的东西在此岸的实现，即真正的共产主义。

.....

相反地，决不能责备共产主义缺乏热情和火。共产主义不是幻象，不是影子。它蕴藏着向光明猛冲的温暖和热，这种光明的火焰已经是扑灭不了的，这种光明的迸发可能成为危险的，甚至是可怕的，如果有教养的特权阶级不以爱、牺牲和对它的世界历史使命的完全承认来促进这种向光明的过渡的话。共产主义不是没有生气的影子。它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而从人民中间是永远不会产生一个影子的。我所理解的人民是指大多数，是极其广大的群众，是穷人和被压迫者，我认为，人民始终是唯一的有创造力的土壤，一切伟大的历史事业、一切解放革命都是从这个土壤中产生的。谁与人民格格不入，则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只有真正同人民紧密接触才能进行创造，进行真正的创造。耶稣和路德就是从普通人民中间来的，而法国革命的英雄们所以能够用自己强有力的手为未来的自由和平等的庙宇奠定最初的基础，仅仅因为他们是在汹涌澎湃的人民生活的海洋中获得新生的。

因此，共产主义对民族原则的抗议，比上世纪的有教养的世界主义者对民族原则的抗议要重要得多。共产主义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实际的本能、从人民的本能出发，而后者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它的抗议是人类的强有力的裁决，人类的神圣的、唯一使之能够得到拯救的统一迄今为止仍然受到民族的狭隘利己主义的破坏。

.....

自从基督教不再是联结和鼓舞欧洲国家的水泥以来，是什么东西还在把它们联结起来呢？是什么东西使得在它们之中继续保存着基督教向它们宣扬的神圣的协调和爱呢？是人们在法国革命时期的雷鸣闪电中发现的自由和平等的神圣精神，纯粹人性的精

神，这种精神就象新生活的种子一样，被革命战争传播到四方。法国革命是新生活的开始。许多人象瞎子一样，他们认为，这个革命的强有力的精神已被打倒、被制服了。可怜的人们，这种精神的觉醒将是多么可怕！不，革命的戏还没有唱完。我们在革命的星光下诞生，我们在它的影响下生活，并且将一无例外地在它的影响下死亡。我们正处在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的前夜，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斗争的前夜，这个斗争之所以可怕，尤其是因为它将不仅带有政治性质，而且带有原则的、宗教的性质。不要陷于空想：这不亚于一种新的宗教，即民主的宗教，它必将在写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旧旗帜下开始新的斗争，殊死的斗争。

正是这种精神产生了共产主义。这种精神现在无形地把所有人民不分民族地联合在一起。现在同这种精神、基督教的光辉继承者相对抗的，是那些所谓的基督教的政府和所有的君主国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虚伪的基督教和他们的自私自利的行径逃不出这种精神的犀利目光。为了阻碍这种精神取得胜利，他们怎么办呢？他们采取什么手段呢？他们牺牲人性和爱，竭力在人民中间培养民族感情，他们称自己是基督教政府，可是为了民族性而鼓吹仇恨和杀戮！

魏特林和共产主义者反对他们，那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基督教本身的原则，凡是和爱的精神矛盾的东西都应当被消灭。

.....

写于 1843 年 6 月 13 日。发表于《瑞士观察家》杂志 1843 年 6 月号。译自《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莫斯科 1935 年俄文版第 3 卷第 223、225、226—227、228—229、230—231 页。

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础

· 编者按语 ·

1848年革命期间，巴枯宁是个泛斯拉夫主义者。《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础》一文反映了巴枯宁关于斯拉夫问题的基本观点。

他完全否认斯拉夫民族内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区别，主张依靠“种族和血统的神圣关系”把各斯拉夫民族“联合在一起”，鼓吹各斯拉夫民族“应当完全放弃自己的国家权力”，为沙皇俄国吞并欧洲各斯拉夫族国家鸣锣开道。他抹杀斯拉夫民族，首先是沙皇俄国内部的阶级对立，鼓吹“一切人平等，一切人自由和兄弟的爱。在自由的斯拉夫民族的天空下没有任何一个不自由的人”，为沙俄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粉饰太平，取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是直接为沙皇俄国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内阁的发明，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进。”泛斯拉夫主义固然具有不同色彩，从沙皇尼古拉的泛斯拉夫主义到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但是，它们“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实质上它们彼此之间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92页）。

斯拉夫人经历了奴役、艰苦的斗争和怨诉——这些都是他们

分散的可悲后果——的时期以后，现在他们第一次在共同的代表大会上联合起来了。他们互相握手以示兄弟的统一，他们在上帝和人民面前声明，下述基本原理是他们新的政治生活的基础。

一、他们是欧洲教化发展中的后来者，他们有经验有能力，同时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是实现欧洲其他民族通过自己的发展已经做好准备的事情，即实现现在被看作是人类的最终目标的东西，特别是实现一切参加了神圣兄弟联合的个人和民族的伟大、自由和幸福。

二、他们自己很长时期以来曾是异族压迫的牺牲者，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压迫所产生的悲惨后果，即民族风尚的衰落和社会中的不协调，压迫不仅给被压迫者，而且同样和特别给压迫者带来这种不协调；此外，由于他们非常仇视异族压迫，所以绝不想去压迫别的民族。在他们看来，尊重和热爱其他民族的自由是他们自己获得自由的首要条件。

三、此外，他们长期以来是奸计和暴力的牺牲品，所以他们只能在纯洁和神圣的真理中，在纯洁的自由中，在纯洁的正义中，开始建立新的生活和吸取新的力量，而不要任何限制，不要任何暗计；因此，他们从自己的内外政策中排除权术和权术考虑，排除一切人为的东西和可能不自觉地损害个人或民族的自由来建立任何中央权力的企图。各斯拉夫部族的新的政策，将不是国家的政策，而是人民的政策，自由独立的人们的政策。

四、他们在构成斯拉夫种族的一切民族的密切兄弟联盟中，建立自己新的强大威力，除了从所有斯拉夫人的联合中产生的集中外，他们不寻求任何别的集中。他们的一切不幸在于他们的分散。他们联合起来就会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他们陷于四分五裂，而且狂热地坚持这种状态，忘记了无疑应当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来完成共同使命的种族和血统的神圣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引诱去进行

阅墙之争；相反地，另一些人糊涂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为异族和反斯拉夫政策效劳，消灭自己的兄弟。但是上帝对此进行了惩罚，他听任斯拉夫部族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德国人的奴役，连那些保存了民族生活和独立生活的幻影，或者既成了自己兄弟的导师同时也成了德国计谋的执行者的部族也不例外。

但是，斯拉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已经过去，解放的时刻已经来临。他们一越过对峙的国境来到布拉格，就发现他们都是兄弟，他们不仅在心里承认和感觉到他们彼此是兄弟，而且根据他们的语言他们可以互相了解，因为他们的语言仅仅是同一种优美悦耳的语言（从亚得里亚海和黑海海岸到白海和西伯利亚都讲这种语言）的不同的方言和色彩。自己状况的共同性把他们联合起来，他们聚会在一起，看到准备着未来的伟大使命更强有力地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感谢上帝消除了他们长期遭受的苦难，使他们保存了完全纯洁的兄弟感情；他们互相原谅自己的过去，保证再也不破坏自己的命运，他们在自己面前只看到现在和未来。

斯拉夫联邦的基础

一、承认构成斯拉夫种族的所有民族的独立性。

二、但是，所有这些民族联结成联盟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应当这样紧密，以至于一个民族的幸福和不幸应当同时也是另一个民族的幸福和不幸，如果其余的人是不自由的，那末谁也不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谁也不会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受压迫也就是另一个民族受压迫。

三、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共同联盟是这种联合的表现和实现。它代表所有的斯拉夫民族，称为斯拉夫委员会。

四、斯拉夫委员会作为首要政权和最高法庭，领导所有斯拉夫民族；所有斯拉夫民族必须服从它的命令和执行它的决定。

五、任何一个斯拉夫民族，如果采取任何不义行动，力图在被共同联系结合起来的斯拉夫民族内部建立特别联盟，或者依靠外交或暴力手段来使别的斯拉夫部族屈服于自己，以便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从而可能消灭或限制整个斯拉夫联盟的权力；为了一个民族或联合起来的几个民族谋利益而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追求建立对联合起来的各斯拉夫民族的领导权的任何行为，——都将被看作是犯罪行为或对整个斯拉夫民族的背叛。想成为联邦组成部分的各斯拉夫民族，应当完全放弃自己的国家权力，并把它直接交到委员会手中，今后不得在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的发展中寻求自己独特的伟大。

六、只有委员会有权向外国宣战。任何一个单独的民族，没有得到所有民族的同意，不能宣战，因为由于联合的结果，所有的民族都应当参加每一个民族的战争，任何一个民族在兄弟部族遇到灾难时不能袖手旁观。

七、斯拉夫部族间的内战是可耻行为，是兄弟残杀，应当禁止。如果两个斯拉夫部族间产生分歧，应当由委员会来消除，它的决定应当作为神圣的决定加以执行。

八、从最后三条中明显地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斯拉夫民族受到另一个处于失常状态的斯拉夫民族的进攻，在委员会还没有来得及作出某种决定或采取各种调解措施之前，所有毗邻的部族都有责任帮助它获得解放。任何一个斯拉夫民族，如果用武器进攻另一个斯拉夫民族，或者在异族侵犯时不赶快帮助受侵犯的兄弟，就将被看作是叛徒。保卫自己的兄弟是首要义务。

九、任何一个斯拉夫部族都不能同别的民族订立同盟；这个权利完全属于委员会；任何一个斯拉夫部族都不能把斯拉夫的武装

力量交给别的民族或异己的政策支配。

斯拉夫民族的内部结构

各斯拉夫民族是独立的，因此它们之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采取符合自己的习惯、要求和状况的管理形式。但是，它的基本原则应符合斯拉夫性格，因此斯拉夫性格应该是联合起来的斯拉夫民族的新生活的基础，不神圣地保护这些基础，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参加共同的联盟。

一、构成这些基础的原则是：一切人平等，一切人自由和兄弟的爱。在自由的斯拉夫民族的天空下没有任何一个不自由的人（不管按权利来讲，还是在实际上）。永远废除任何形式的农奴依附关系。所有的斯拉夫人一律自由，都是兄弟。他们之间除了天赋的不平等现象外，没有任何不平等现象。没有任何阶层（等级）。在仍然是特权贵族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如果这些贵族还想做斯拉夫人，今后他们就应当在自己的丰富的爱和伟大的牺牲中去为自己寻求优越性和特权。学者和艺术家贵族这些人民中的护理者应当溶化在人民群众中，以便从群众中汲取新的生命，并且把群众引向时代已经达到的教化。

二、在斯拉夫部族占有的宽广美丽的土地上，有足够的地方供所有的人使用，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当在人民的土地上得到一块土地，并为所有的人谋利益。

三、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属于某个斯拉夫民族的人，都有权在任何一个别的斯拉夫民族中间居住。把各个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的团结，应当被看作是兄弟的团结，它也应当在斯拉夫人的关系中占支配地位。

四、委员会有权利和有责任实行监督,使这三项基本原则在参加了共同联盟的所有民族的内部机构中得到神圣的遵守和准确的执行。如果这些原则有被某个机构或决定消灭的危险,委员会有权利和有责任进行干涉,每一个斯拉夫人有权利请求委员会反对自己政府的不义行动。

写于 1848 年 6 月初。译自《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莫斯科 1935 年俄文版第 3 卷第 300—305 页。

致格·海尔维格(摘录)

·编者按语·

这里摘录的两封信写于1848年8月和12月。1848年革命时期,巴枯宁的主导思想是泛斯拉夫主义,但是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一方面吹捧蒲鲁东是“巴黎和政治著作界唯一还有点见识的人”,同时也宣扬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点,鼓吹“激起所谓的‘恶欲’”,叫喊“恶欲将引起农民战争,这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不害怕无政府状态,而衷心希望无政府状态”。他的这种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绝望心理的反映。列宁指出:**“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8页)

[1848年8月上半月]

.....

格奥尔格^①,现在你总应当承认,你一贯敌视的蒲鲁东如今是巴黎和政治著作界唯一还有点见识的人。他表现了很大的勇气,他的演说在这个卑鄙的和虚伪的时代是真正崇高的事情。如果他掌

①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Georg Herwegh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曾组织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参加了1848年4月德国巴登起义;后来同拉萨尔接近。——编者注

握了政权,他的学理从否定的东西变成了肯定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同他进行斗争,因为归根到底他本来也抱有自己的小体系。但是,现在他同我们站在一起,不管怎样,你会同意,他表现了很大的、令人惊异的勇气。不过,我对议会辩论很不感兴趣;议会生活、立宪会议、国民议会等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向自己直接提出一个问题,那末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实质上他已对这些旧形式毫无兴趣,或者只具有被迫的、想象的兴趣。我不相信宪法和法律;最好的宪法也不能使我满意。我们需要另一种东西:激情和生活,以及新的、没有法律的,因而是自由的世界。不过维也纳的辩论毕竟使我感兴趣,因为通过辩论可以弄清楚我们长期以来一无所知的关于那个国家的情况。奥地利的崩溃,对于我们斯拉夫人和整个革命党来说,是极关重要的问题。法国会不会干涉意大利?恐怕不会。资产者预感到意大利的战争可能变成一场会引起伟大革命的全面战争。

.....

译自《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莫斯科1935年
俄文版第3卷第317—318页。

1848年12月8日

.....

寄上我的《告斯拉夫人书》。你从中可以看出,我一点也没有灰心丧气。在这十个月中我已习惯于忍耐、等待和坚持。“等着瞧,陛下!”——这就是我对凯歌行进的反动势力的回答,无政府状态,破坏国家的时刻总归很快就会来临。而当我更深刻地研究了德国的关系和事件时,我便常常想到你并且认为你是正确的。我记起了革命前你在巴黎常常对我讲的话:“德国的第一次革命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值得安慰的东西,因为它将是资产阶级卑鄙行为的胜利。”而德国庸人的行为是多么卑鄙,我现在才完全看清了。

.....

只有一方面发生无政府主义的农民战争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因破产而得到改造,才能拯救德国。关于后者,形势本身和铁的必然性会去关心的;关于前者,直到现在人们几乎完全没有考虑。我简直找不到言语来给你描绘所谓的德国民主派领袖们的愚蠢、轻浮和抽象地玩弄原则的行为。他们想用抽象的、政治的、宪制的或共和主义的词句来推动农民。他们不愿意在人民中间激起所谓的“恶欲”,他们不去日复一日地激怒和开导人民,而想用骗人的人民会议的手段去偶然地影响人民。他们吵吵嚷嚷,却什么也没有做。现在情况变了。人民现在毕竟已经变成另一个样子了,但这并不是依靠而是违反这些领袖的意愿改变的。人民希望具有一切、获得一切、不满足于任何东西;人民已经走得非常远,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享有权利的,两个政党对人民的阿谀奉承证实了人民的这种信念。恶欲将引起农民战争,这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不害怕无政府状态,而衷心希望无政府状态:只有无政府状态才能把我们不得不得长期在其中苟延残喘的那种可诅咒的中庸状态中拖出来。

.....

译自《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莫斯科1935年
俄文版第3卷第366—367、367—368页。

告斯拉夫人书(摘录)

· 编者按语 ·

1848年6月,巴枯宁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鼓吹泛斯拉夫主义。大会进行期间,布拉格爆发人民起义,巴枯宁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失败后,巴枯宁逃往德国,于同年12月以“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的名义,发表了《告斯拉夫人书》。正当斯拉夫人民需要摆脱各种反动幻想之际,巴枯宁却向斯拉夫人侈谈“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等空洞词句。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一文中揭露了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动实质。恩格斯指出:“**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正义’、‘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5页)

.....

如果全欧洲的反动势力玩弄阴谋,如果它依靠完备的组织团结一致地行动,那末革命也应当采取相应的强有力的行动。我们的神圣义务,一切革命战士、一切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的义务,要求我们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尽力达成协议和紧密团结在一起,以便获得用我们共同的力量战胜我们共同的自由的敌人的可能性。

你们知道，革命生活的第一个特征，就是高呼憎恨旧的压迫政治，高呼同情和热爱一切被压迫民族。被长期套在伪善的和背叛的外交的绳索上的各族人民，终于体验到了旧的外交所带给人类的耻辱，并且已经认识到：只要在欧洲的无论什么地方还有哪怕一个民族继续受压迫，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宁就无法得到保障；各族人民的自由，要在某一个地方扎根，就必须在所有的地方扎根。各族人民第一次一致用行动来为所有的人、为所有的民族要求自由，要求真正的和充分的自由，不附带条件的自由，没有例外、没有限制的自由。响起了一致的呼声：“打倒压迫者！”“被压迫者、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各族人民万岁！打倒侵略战争，但必须把最后一次战争，即争取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光荣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废除各种暴君会议按照所谓历史的、地理的、贸易的和战略的需要强行划定的人为的界线！除了合乎自然的界线，即由各族人民本身的最高意志根据其民族特点、按照民主的精神所公平划定的界线外，在各族人民之间不应有任何其他的界线！”这就是各族人民一致的呼声。

兄弟们，你们听见了这个伟大的、充满预感的呼声吗？你们该记得，你们在维也纳听到过这个呼声，当时你们正在同其他人一起为所有人的幸福而战斗，你们举起我们未来自由的旗帜，在德国人的街垒中间也建立了伟大的斯拉夫人的街垒。

那时，这个席卷了整个欧洲的运动是伟大的和卓越的，那时在革命精神的推动下，在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意大利人、波兰人、斯拉夫人、德意志人、马扎尔人、瓦拉几亚人，总而言之，不管是受自己祖国的内部锁链束缚的人，还是受异族压迫的人，都欢欣鼓舞地发动起来了。最大胆的幻想变成了现实。各族人民看到，几世纪来压在他们的独立的坟墓上的沉重的石头，好象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搬掉了，那个有魔力的印章被砸烂了；那条监视着许多被活活埋葬、痛苦地蜷伏着的民族的龙，在震惊中死去了。各族人民的春天的

鲜艳的红霞升起来了。旧的国家政治不存在了，新的政治，各族人民的政治已经产生。革命以自己的全权宣布消灭专制的国家：宣布破坏普鲁士国家，承认它所占领的波兰边区分离，宣布消灭奥地利这个由许多不同的民族的诡计、暴力和罪行交织而成的怪物，宣布消灭由不到七十万奥斯曼人蹂躏一千二百万斯拉夫人、瓦拉几亚人和希腊人的土耳其帝国，最后宣布消灭各国暴君的最后希望、被粉碎的外交的最后一个虚幻的堡垒——俄罗斯帝国，以便让被奴役的三个民族——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波兰人——自己管理自己，能够向其余斯拉夫兄弟伸出自由的手。这样，欧洲整个东北部就被推翻、破坏和重建，意大利获得解放，而整个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欧洲共和国总联邦。

我们是一切斯拉夫民族的代表，我们作为兄弟曾一起来到布拉格，在长久分离之后，我们又重新见面了，我们热情地互相表示，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应当各走各的路了。我们亲身体验到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和血统关系，我们宣誓，从今以后决不允许别人再把我们的历史命运分开。我们诅咒那个长期使我们成为它的牺牲品的政策，我们自己给自己宣布了完全独立的权利，并庄严地宣誓，一切斯拉夫民族今后都应该获得这种独立。我们承认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独立。我们坚决否定法兰克福议会——这个已成为欧洲笑柄的会议妄想强迫我们德意志化的无耻要求，同时我们向德国人民，向民主的德国伸出友谊之手。我们代表我们那些居住在匈牙利的人，向我们种族的凶恶敌人马扎尔人（他们总共不到四百万人，但是却狂妄地力图压迫八百万斯拉夫人）建议结成兄弟同盟。在我们的解放同盟中，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那些呻吟在土耳其人压迫之下的兄弟。我们庄严地诅咒那个曾经三度瓜分波兰并且还再想再一次撕碎它的可悲的遗骸的罪恶政策，并且热烈希望，这个崇高的、神圣的、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复活，很快会发出把我们所有的

人从旧奴役制下解放出来的信号。最后，我们向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一切斯拉夫民族中唯一能完全保存自己的政治独立和民族独立的民族，发出兄弟的呼吁，提醒它（而且它自己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只要人民还没有在自己内部获得解放，只要它还容忍它的力量成为不幸的波兰的瘟疫和永远威胁欧洲文明的利剑，它的独立和伟大就一文不值。我们说出了这一切，我们同各民族的一切民主主义者一起要求：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象所有民族一样自由的和同所有民族保持兄弟关系的各斯拉夫民族，应当在彼此之间建立紧密的兄弟同盟，以便建立一个伟大的自立的机体。

当时我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如果我们把这个事业坚持到底，那末它的胜利是无疑的，因为正义和人道完全在我们这一边，而在我们敌人那一边的，只是非正义和野蛮。这不是我们所醉心的那种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唯一正确和必要的政策的思想，这种政策就是实行自我解放，进行革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起义协调一致，并同全世界的民主派结成兄弟同盟举行发动。我们否定了向你们建议的相反的政策，虚伪和背叛的政策，外交家和国家要人的政策，那些人向你们灌输一种明智的思想——通过恢复专制的帝国政权和拯救奥地利这个拼凑起来的国家来求得解脱，根据他们所说的理由，如果你们把权力交还给皇帝，那末你们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就能够组成独立的斯拉夫国家并在你们所支持的帝国政权的帮助之下获得解放。在布拉格，唯一的危险是，这种政策可能使我们误入迷途，所以我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要预防这种情况。那时我们摆脱了危险，我们由于所有斯拉夫民族和所有自由民族的共同事业振奋起来了，一帮国家政治家就退却了。

.....

写于 1848 年 12 月。译自《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
莫斯科 1935 年俄文版第 3 卷第 347—351 页。

忏悔书(摘录)

· 编者按语 ·

1849年5月3日，巴枯宁在德国参加德累斯顿起义，起义失败后，于1850年被德国当局逮捕，判处死刑，1851年引渡给俄国政府，先后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和什吕谢尔堡要塞。被囚期间，巴枯宁于1851年7月至8月初给沙皇尼古拉写了长达十万言的《忏悔书》，于1857年2月14日又给亚历山大二世写了《请求减刑书》，2月28日被减刑，改判流放西伯利亚。

叛徒巴枯宁在给沙皇的信里承认自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犯”，说自己参加革命是表现了“唐·吉珂德式的疯狂性”，辱骂革命者是“醉鬼”；他还表示要“用行动来补偿自己的过去”，“用汗和血来洗刷我的罪行”。他恬不知耻地吹捧沙皇是“伟大帝国的伟大皇帝”，向沙皇献策说，如果沙皇“举起斯拉夫的旗帜”，所有讲斯拉夫语的人“都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地投身于俄国雄鹰的宽阔翅膀之下”；他还要求沙皇做斯拉夫人的“救主”，“在东欧竖立起斯拉夫的旗帜”。同时，为了表明他对沙皇的忠心，他供认早在1848年6月布拉格斯拉夫人大会期间，他就想向沙皇忏悔并出卖斯拉夫人民运动。

这两封信是巴枯宁背叛革命的铁证。

1851年7—8月初
于彼得—保罗要塞

仁慈的皇帝陛下！

当我被从奥地利解往俄国的时候，我知道俄国法律的森严，知道您对稍微不顺从您的一切行为都怀有不可抑止的憎恨，更不用说反对皇帝陛下意志的公开暴乱了。我也知道我的罪行的全部严重性，我既不希望，甚至也不打算向法庭隐瞒我的罪行或者哀求赦免。因此，我对自己说，只有一条路——忍·受·到·底，我乞求上帝赐给我力量，使我能够喝下我为自己准备好的一杯苦酒，而不丧失尊严和表现出可耻的软弱。我知道，几年前，我由于枢密院的判决和皇帝陛下的命令而被褫夺了贵族身份，我可能被依法处以体刑；我等待着更坏的情况，只希望求得一死，以便尽速解除一切痛苦和考验。

陛下，我在进入俄国国境时受到的却是高尚、人道和宽大的待遇，我的惊异感激之情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我原是等待另一种待遇的。在从波兰王国到彼得—保罗要塞的整个途中，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和体会到的一切，都和我所担心的相反，这一切都同我过去所听到、想到和我所说、所写的关于俄国政府的残酷行为相矛盾，这使我第一次怀疑先前所了解的情况是否真实，我惊讶地问自己道：我没有进行诽谤吗？在彼得—保罗要塞中渡过的两个月，使我彻底相信，许多旧的成见都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请陛下不要以为，我受到这样仁爱的待遇，就产生了某种错误的或空幻的希望。我非常清楚，法律的严肃并不排斥仁爱，反之，仁爱也并不排斥严格地执行法律。我知道，我罪大恶极，而且在失去了希望的权利之后，我什么也不指望，陛下，我向您说实话，近些年来，我身体衰老，心情沉重，甚至使我什么也不希望。

奥尔洛夫伯爵向我转达了皇帝陛下的圣旨，说陛下让我写一

份关于我自己所有罪行的全面忏悔书。陛下！我不应得到这样的仁慈，我过去一直说皇帝陛下是残酷无情的，当我想起我胆敢这样说陛下的时候，觉得羞愧难当。

我将要怎样写呢？我要向威严的俄国皇帝、法律的严厉维护者说些什么呢？我给陛下的忏悔书可归结为如下不多的几句话：陛下！在皇帝陛下面前，在祖国法律面前，我全错了。您知道我的罪行，您根据所知道的那些就足以按法律对我处以俄国现行的极刑。我公然造反来反对陛下，反对您的政府；敢于象敌人那样和您作对，我竭力到处写文章和发表演说，煽动人心来反对您。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罪行呢？陛下，请您审判和处决我，您的审判和您的处决是合法的，是正义的。我还能向陛下写些什么呢？

但是，奥尔洛夫伯爵代表皇帝陛下对我说：“您写吧，写忏悔书给皇帝陛下吧，就象您同接受忏悔的牧师说话一样。”这句话触动了我的灵魂深处，使我心情激荡，难以平静。

是的，陛下，我将把您看作接受忏悔的牧师，向您忏悔，就如同人们忏悔不是期望在尘世得到宽恕，而是为了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宽恕一样，我乞求上帝赐给我纯朴的、真诚的、出自内心的言词，不花言巧语，不阿谀奉承，使我能一下子就打动皇帝陛下的心。

陛下，我只恳求您两件事！第一，请您不要怀疑我的话的真实性：我向您发誓，在我的笔下决不会出现任何谎言，哪怕是千分之一的谎言。第二，陛下，我恳求您，不要要求我向您忏悔别人的罪过。因为在忏悔的时候，除了自己的罪过之外，谁也不揭示别人的罪过。……陛下，您会亲眼看到，我宁愿当一个应受极刑的罪犯，而不愿当卑劣汉。

我现在就来开始自己的忏悔。

为完整起见，我应当稍微谈一下我的青年时代……

……………

在苏黎世,我认识了海尔维格的熟人和朋友,不过我很不喜欢他们,所以我呆在这个城市的整个期间避免和他们经常见面,仅仅和海尔维格交往密切。……

……………

海尔维格早在阿尔戈维州的时候,就让共产主义者、裁缝魏特林带着介绍信到我这里来过。当时魏特林由洛桑到苏黎世去,为了认识海尔维格,中途去拜访了他;海尔维格知道我当时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于是就把他介绍给我。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从活生生的来源中了解当时已开始引起普遍注意的共产主义。……他常到我这里来,说明他的理论,谈了许多关于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情况,介绍了工人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希望、娱乐,以及德国刚刚开始形成的一些共产主义团体。我同他进行辩论,反对他的理论,但是却以极大的好奇心听他所谈的事实。我和魏特林的关系仅限于此。无论在这个时期或者在以后,我不管同他或者同其他共产主义者都绝没有过其他联系。我自己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

陛下,讲到这里,我要稍微详细谈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在政府面前我不止一次地,首先是被布伦奇里先生,后来大概还被别的人谴责为同共产党人串通一气。我想一劳永逸地澄清这种不公正的责难;我的严重罪过已经够多了,为什么我还要承担那些我绝对没有犯过的罪过呢?

我后来知道许多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读过他们的著作,研究过他们的理论,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参加任何宗派、任何团体,而且同他们的措施、宣传和活动格格不入。我经常密切注意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无论过去或现在至少既是由上面也是由下面产生的。在下面,在人民群众当中,共产主义是作为一种不明确的、但却是强有力的需要,作为一种向上爬的本能发展着和生长着;在上

等阶级里，共产主义是作为腐败堕落、利己主义，作为即将到来的应得的贫困的本能，作为由于衰老和于心有愧的结果而产生的捉摸不定和束手无策的恐惧而发展着和生长着，这种恐惧和反对共产主义的不断叫嚣恐怕比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本身更加促进了共产主义的传播。我认为，这种不确定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无例外地到处存在着的共产主义，比那种确定的、形成体系的、而且只是在很少几个组织起来的、秘密的和公开的共产主义团体内宣传的共产主义要危险千百倍。^① 后者的虚弱性 1848 年在英国、法国、比利时、特别是在德国，已暴露无遗；要找出迄今为止已知的任何一种社会理论的荒谬、矛盾和不可实现性，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所以任何这种理论连三天也存在不了。

陛下，请原谅我发了这些简短的议论；但是，我的罪过和我的罪过的思想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不能只忏悔罪过，而完全不提罪过的思想。我应当指出，为什么我未能参加——而人们却不公正地控告我参加了——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宗派。我了解这些宗派存在的原因，但是我不喜欢它们的理论；既然不同意它们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成为它们宣传的机器；最后，我非常珍视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愿意成为无论哪一个秘密团体的奴隶和盲目的工具，更不用说我不赞同它的意见的团体了。……我同魏特林结识，从我这方面讲，只是出于好奇心，从他那方面讲，是由于他健谈。除了魏特林，我在苏黎世不认识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

谴责我犯了共产主义罪过的一个捕风捉影的理由就是：我认识魏特林；但是这种谴责是毫无根据的^②……

.....

① 沙皇读了这一句话后加批语称赞巴枯宁：“说得对”。——编者注

② 下面巴枯宁叙述他从 1844 年到 1846 年在国外的活动。——编者注

陛下！我的活动的罪恶性和唐·吉诃德式的疯狂性是不言自明的；我这里要讲一下只是为了更明确地确定我当时的处境、经费和联系。我认为必须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离开巴黎成为许多错误的控告和怀疑的对象。

首先，我知道，许多人说我是赖德律-洛兰的间谍。陛下！在这份忏悔书中，我对您什么也不隐瞒，我不隐瞒任何一个罪过，任何一种罪行；我向您掏出自己的全部心灵；您看到了我的迷误，看到了我怎样由疯狂走向疯狂，由错误走向罪过，由罪过走向犯罪……^①但是，陛下，请您相信我，尽管我的思想和活动是十分疯狂的，是罪大恶极的，我终究保留了许多自豪感、独立性、自尊心以及对祖国的爱，绝不会愿意当任何党派或任何人的可鄙的间谍、盲目的和肮脏的工具，来反对祖国！……

……………

其次，人们控告我，或者更正确地说，怀疑我，——因为没有找到控告的真凭实据，——怀疑我离开巴黎时已经同波兰民主主义者建立了秘密联系，是根据他们的委托并按照预订的计划，同他们一起行动的。这种怀疑是很自然的，但是毫无根据。……

……………

总之，陛下，我有充分权利讲，我的生活、活动和行动是不受任何团体制约的，是不受任何别人的唆使和影响的。我的疯狂、罪过和罪行过去和现在都完全由我自己负责。我罪大恶极，但从来没有屈辱到去当别人的间谍，做别人思想的奴隶。

最后，对我还有一个卑鄙的控告。

有人控告我，说我想同两个现在我已忘记了姓名的波兰人狼狈为奸，说我企图谋害皇帝陛下的生命。我不想去谈这种诽谤的

^① 虚点是原有的。——编者注

详情细节；我在关于国外情况的供词中已经详细驳斥了这种诽谤，我耻于过多地谈这个问题。陛下，我只想讲一点：我在您和法律的面前是一个罪人，我知道自己的罪行是严重的，但是，我也知道，我的灵魂永远不允许我去干杀人的勾当和做下流的事情。我的政治上的狂热与其说是发自内心不如说更多地存在于想象之中，而且有确定不移的界线；无论是布鲁土斯，拉瓦里亚克，还是阿里勃^①，从来都不是我所崇拜的英雄。不仅如此，陛下，在我的灵魂里，甚至对您仇恨的影子都从来没有过。当我还是炮兵军官学校的士官生时，我就和所有的同伴一样，非常喜爱您。有时候，您到营房来，只是“皇帝驾到”这句话就使所有的人欣喜若狂，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迎接您。在您的面前我们并不感到害怕，相反地，我们还靠近您，我们寻求您的庇护以摆脱自己长官的欺压；长官不敢跟我们到亚历山大去。我记得那正是霍乱流行的时候。陛下，您当时神情忧郁，我们默默地围绕着您，我们以不安而崇拜的目光望着您，我们每个人在内心里都感到您神情忧郁，虽然不知道原因；只要您对谁说一句话，谁就感到非常幸福！后来，过了许多年，当我在国外成了绝望的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我开始认为自己应当仇恨尼古拉皇帝；但是，我的仇恨只存在于想象中、思想中，而不是发自内心：我仇恨的是抽象的政治人物、俄国专制政权的代表、波兰的压迫者，而不是那个在我初省人事的时候就使我惊倒，并且给我年轻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的活生生的伟大人物。陛下，青年时代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就是在我的政治狂热最炽烈的时候，我的疯狂也有一定的分寸；我对您的攻击，从来没有超出政治范围；我狂妄地称您为残忍的、铁石心肠的、凶狠的暴君，散播对您的仇恨，煽

① 布鲁土斯，古罗马的共和主义者，曾参加刺杀凯撒的密谋；拉瓦里亚克，法国狂热的天主教徒，1610年刺杀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阿里勃，法国共和主义者，1835年谋杀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编者注

动造反来反对您的政权，但是我从来不敢、不愿意、也不能用亵渎神灵的言语来辱骂您本人。陛下，该怎么说呢？我找不到词句来表达这种区别，虽然我深深地感觉到这种区别，——总之，我从来没有象卑贱的奴仆那样，说过或者写过一个字辱骂您本人，这种卑贱的奴仆辱骂、诅咒和诽谤自己的主人，是因为他知道，或者是主人听不见，或者是主人离得太远，皮鞭揍不着他。最后，陛下，甚至在最近时期，我还把一切民主概念置之度外，违背自己的意志，深深地、深深地崇拜您！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许多波兰人和一般欧洲人，都和我一起意识到，在目前在位的所有帝王当中，只有陛下一个人还保存着对自己统治使命的信念。我怀着这样的感情和思想，不管在政治上多么疯狂，是不能成为弑君者的，所以，陛下，请您相信，这种控告纯属卑鄙的诽谤。

.....

陛下，不管我的罪行多么严重，您一定会感到非常可笑，我这样一个既无名又无力的人竟敢反对您，反对伟大帝国的伟大皇帝！现在我看清楚了自己的疯狂行为，连我自己也觉得可笑……。但是，那时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考虑，而只是疯狂地去迎接明显的灭亡。如果说，我的罪行，不，我的愚蠢行为能稍微得到一点宽恕的话，那只是因为我是从纸醉金迷的巴黎出来的，我自己是醉鬼，我周围的一切人也都是醉鬼！

.....

我来谈一下在布拉格第一次同各斯拉夫民族的代表的会见给我留下的印象。当时，我的斯拉夫的心在猛烈跳动，我的新的斯拉夫感情勃然迸发，它们使我几乎忘记了把我同西欧民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全部利益。斯拉夫代表大会被解散后，德国各地，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发出的反对斯拉夫人的无意义的叫嚣，对我的影响特别强烈。这已经不是民主主义的叫嚣，而是德国的民

族利己主义的叫嚣；德国人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要求自由。他们在法兰克福开会时，实际上已经认为他们已成为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世界的命运现在应当由他们来解决！……

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的斯拉夫人，包括波兰人在内，都有同样的感觉。受过法国革命政府欺骗、受过德国人欺骗、受过德国犹太人欺凌的波兰人，开始大声谈论，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诉诸俄国皇帝的庇护，请他开恩，把奥属和普属的所有的波兰省份都合并到俄国来。这是在波兹南公国、加里西亚和克拉科夫发出的普遍呼声。只有侨民们反对，但是，那时侨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人们会以为，波兰人是口是心非，只不过想吓唬德国人而已；但是，他们并不是对德国人这样说，而是只在自己人之间谈论，而且在谈论时所表现出的热情，所使用的词句使我当时不能怀疑他们的真情实意，而且就是现在我仍然相信，如果陛下当时想举起斯拉夫的旗帜，那末他们所有的人都会无条件地、无保留地而且是盲目地服从您的意志，他们和奥地利、普鲁士领地上所有讲斯拉夫语的人，都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地投身于俄国雄鹰的宽阔翅膀之下，同仇敌忾地去不仅反对不共戴天的德国人，而且向整个西欧挺进。^①

当时，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思想，我想马上给陛下写一封信，并且已经开始写了；那封信也是一种忏悔书，^②不过比我现在写的这个忏悔书自尊和高谈阔论多一些（我当时是自由的，而且还没有接受经验教训），但是忏悔是十分真诚的和由衷的；我悔悟自己的罪过；恳求饶恕；然后，我颇为冗长而夸张地描述了各斯拉夫民族当时的状况，恳求陛下帮助所有被压迫的斯拉夫人，把他们置于您

① 沙皇读了这一段话后加了一个批语：“毫无疑问，我会以斯拉夫的马赞尼洛的身份来领导革命的；谢谢！”马赞尼洛是1647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的领袖。——编者注

② 沙皇读了这几句话后加了个批语惋惜地说：“很遗憾，没有寄来！”——编者注

的有力的庇护之下，作他们的救主、他们的父亲，并宣布自己是所有斯拉夫人的皇帝，最后在东欧竖立起斯拉夫的旗帜，让德国人、斯拉夫族的所有其他压迫者和敌人感到恐惧！那封信写得拉杂冗长，幻想有余而考虑不周，但是完全是真心诚意、满腔热情；那封信中虽然有许多可笑的、荒诞的东西，但也有许多真实情况，总之，它是我精神紊乱和当时使我激动不安的无数矛盾的真实描述。我没有写完就把它撕碎了，烧掉了。当时我想到而且考虑到，您会认为我的行为异常可笑和冒昧，我是皇帝陛下的一个臣民，而且还不是一个普通的臣民，是一个国事犯，竟敢给您写信，不只哀求您的宽恕，而且竟敢劝告您，说服您改变您的政策！……^①我向自己说，我的信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只会在民主主义者的眼中损害我的名誉，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不成功的、奇怪的、完全非民主主义的试图。……

……………

陛下，我的忏悔书就要结束了！它使我感到轻松。在这篇忏悔书里，我力求说明一切罪过，不忘记任何重要的事情；如果忘记了什么，那也不是故意的。那些针对我的口供、控告书、告密书中凡属与我在这里所讲的不符的，都是虚假的、错误的或诽谤性的。

现在，我再次恳求陛下，向陛下伏地求恩，哀求您：

陛下！我是个十恶不赦的大罪犯！这我知道，如果判处我死刑，我认为这是罪有应得，而且我几乎会高兴地接受这种惩罚；它会使我摆脱令人厌恶的和难以忍受的囹圄生活。但是奥尔洛夫伯爵以陛下的名义对我说，俄国没有死刑。我哀求您，陛下，如果法律许可的话，如果罪犯的请求能够感动皇帝陛下的心的话，请不要让我受终身要塞监禁的痛苦！不要用德国式的刑罚来惩处我的德国式的罪过。就让最沉重的苦役成为我的命运吧，我将以感激之情接

^① 虚点是原有的。——编者注

受它，把它看作您对我的恩典。劳役越艰苦，我就越容易沉缅于劳动之中！在单人囚室里，总会徒劳无益地记住一切，思想和记忆成为难以形容的痛苦，长久地活着，违反意志地活着，什么时候也没有死去，却又每一天都在无所作为和痛苦当中死去。我觉得，不管是在凯尼格斯坦要塞，还是在奥地利，都没有在彼得—保罗要塞这里好，但愿上帝让每一个自由的人都能找到一个这样善良的、这样仁慈的首长，就象我在这里极其幸运地找到的那样！尽管如此，如果让我选择，我觉得我会宁愿死去，哪怕是受体刑，也不愿意被终身关在要塞里。

陛下，我还有另外一个请求！请允许我同亲人作最后一次见面和告别；如果不是所有的亲人，至少是年老的父亲、母亲和一个亲爱的姐姐——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活在人间。

仁慈的陛下，请您赐给我这两个大恩惠吧，我感谢上帝把我从德国人的手里解救出来，把我交给皇帝陛下慈父般的手里。

我已经丧失了称自己为皇帝陛下的忠实臣民的权利，只好衷心诚挚地这样签署：

正在忏悔的罪人 米哈伊尔·巴枯宁

译自《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莫斯科1935年俄文
版第4卷第99—101、105、106—107、108—
110、124、125、127—129、130、158、159、160—
161、206—207页。

向亚历山大二世请求减刑书

1857年2月14日于什吕谢尔堡要塞

仁慈的皇帝陛下！

令人永远难忘的和宽宏大量的先帝以及陛下都曾赐给我许多恩惠，现在陛下又赐给我新的恩惠——允许我给您写信，我自知不配，但以深深感激的心情接受这种新的恩惠。然而，一个罪犯如果不是乞求开恩，他能向自己的国君写些什么呢？因此，陛下，请允许我乞求您开恩，给我以希望。在法庭面前，从我这方面来说，任何希望都会是狂妄的；但是，陛下，在您的慈悲心面前，希望难道是狂妄吗？我这颗备受折磨的、衰弱的心愿意相信，真正的恩惠就是宽恕的一半；我应当求助于精神的坚强，以便不为诱人的、但为时过早的、而且可能是徒劳的希望所迷惑。

但是，不管我将来的命运如何，我现在只恳求在陛下面前倾诉衷情，使我在陛下面前能够象我在先帝面前那样掏诚陈言，那时先帝听取了我关于自己生活和活动的全部忏悔。奥尔洛夫伯爵曾向我转达了先帝的圣旨，要我向他忏悔，就象忏悔者向接受忏悔的牧师忏悔一样，我已遵命照办，没有一点隐瞒，尽管我记得，我的忏悔书是在对不久之前往事的迷醉下写成的，当然不能博得先帝的嘉许，但是我从来也没有理由后悔自己的真诚，相反地，自从得到陛下亲赐的宽仁厚德之后，我只能靠自己的真诚来求得陛下开恩，减轻对我的刑罚。陛下，现在我除了彻底真诚坦白以外，不能也不愿意把求得宽恕的希望寄托在别的什么上面。

1851年，我被从奥地利解往俄国，我忘记了祖国法律的仁慈，我等待着死亡，而且知道，我完全应当得到这种惩罚。这种等待没

有使我感到多大痛苦，我甚至希望尽快地结束以后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欢乐的生命。我准备用生命来抵偿自己的错误，这种思想使我不计往事，只等待着死亡，而且我几乎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但是，先帝的宽大延长了我的生命，而且改善了我在监禁中的遭遇。这是巨大的恩惠，但是沙皇的恩惠对我来说却变成了最沉重的惩罚。在已经同生活告别之后，我必须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去体会比肉体上的痛苦更难受多少倍的精神上的痛苦。如果对我的监禁是严酷的和极端痛苦的，我也许会较容易地经受住这种监禁；但是，对我的监禁被减轻到最低程度，使我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从而使这种自由变成了对我的折磨。我一直认为永世断绝了同亲属的联系，可是由于陛下的恩许，恢复了同家属的会见，这又引起了我对生活的依恋；冷酷的心在亲属爱的热情感召之下逐渐地软化了；我最初当作沉静看待的冷淡无情也慢慢地让位给对长久不见的亲属的命运的热切同情；我看到我的五个弟兄都成了自己家族的支柱和自己国家的有益的和精干的仆人，我却由于自己的罪过而疯狂地和无可挽回地毁灭了有朝一日这样做的可能性，这使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深切悲痛，同时我也为已经失去和睦的家庭生活的幸福而惋惜。父亲临死的遗嘱（甚至在我完全违背了他的教训的时候，我也没有停止全心全意地爱他和尊重他）、母亲转告我的父亲的最后祝福（条件是：诚恳的悔过），得到了我的早已被感动的并且决意悔过的心共鸣。

陛下！单独监禁是最可怕的刑罚；没有希望的监禁比死更坏；这是虽生犹死，这是意识得到的、缓慢的和每天都感受到的对人的一切肉体的、精神的和理智的力量的破坏；我感觉到每天都在僵化、衰老和愚钝，我每天都把死亡当作超渡来百次地呼唤。但是，这种残酷的孤寂生活也包含有一个不可怀疑的和巨大的好处；它使人面向真理，认识自己。在人世的喧嚣中，在事件的迷醉下，

很容易受到诱惑，很容易被自尊心所纠缠；但是，在监牢中的被迫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在不断的孤独的死一般的寂静当中，长期欺骗自己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身上还有哪怕一星真理的火花，那他就一定会看出自己以往全部生活的真正意义和真相；而当这种生活是空虚的、无益的和有害的时候，就象我过去的生活那样，那他就会成为自己的摧残者；不管自己同自己进行无情的谈话、谈论自己，令人多么痛心，不管这种谈话所产生的思想怎样折磨人——只要一一开始这种谈话，要停止它是不可能的。我根据八年的经验体会到这一点。

陛下！我将要用什么名称来称呼我过去的生活呢？它全被消磨在种种空想的和无效的努力上面，最后以犯罪告终。但是，我没有追求私利，也没有做坏事，我热爱善行和真理，并且愿为它们而牺牲；但是错误的开端，错误的环境和有罪的自尊心，使我走上犯罪的迷途；而一旦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就认为继续走到底是自己的义务和荣誉。这条道路使我陷入了深渊，只有陛下的万能的和救苦救难的手，才能把我从深渊里拯救出来。

我配受到这样的恩惠吗？对此我只能这样说：在八年的监禁之中，特别是在最近以来，我受到了以前根本料想不到的痛苦。使我苦恼的并不是失去了和被剥夺了生活的快乐，而是这样一种意识：我自己注定使自己成为人所不齿的人，我有生以来，除了犯罪之外，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做，甚至没有来得及给亲属带来好处，更不要说对于我胆敢举起叛逆的无力的手来反对的祖国了；因此，我根本不配享受的皇帝的恩惠、我的双亲对我的爱和温存抚养，对我说来都变成了新的痛苦；我羡慕我的弟兄们，他们能够用行动证明自己对母亲的爱，能够为陛下和俄罗斯服务。但是，当整个俄国都遵照皇帝的命令奋起反对联合的敌人的时候，当我的五个弟兄也同其他人一起武装起来，撇下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家人，用自己

的头颅去捍卫祖国的时候，我诅咒自己的错误、迷妄和罪行，它们使我在能够而且应该为皇帝和祖国服务的时候可耻地无所作为，尽管这是被迫的；这种状况当时使我难以忍受，苦恼万分，我只恳求：或者自由，或者死去。

陛下！我还应当说些什么呢？如果我能重新开始生活，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来生活；但是——可惜！往事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我能用行动来补偿自己的过去，那末我恳求给予我这种机会。我的精神是不畏惧使我涤罪的繁重职务的，我会高兴地用汗和血来洗刷我的罪行；但是，我的体力远远不适应于我的感觉和愿望的力量和朝气；疾病使我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虽然我还不算老，只有四十四岁，但是这些年的监禁耗尽了我全部的精神，摧毁了我的最后一点青春和健康。我应当把自己看作一个老头子，并且感觉到活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不愿意过那种没有活动、没有益处的生活；我只有一个愿望：最后一次呼吸一下自由空气，瞧一瞧明朗的天空和新鲜的草地，看一看我父亲的住宅，向他的坟墓鞠一个躬，同为我而悲痛的母亲在一起呆几天，然后准备以应得的方式迎接死亡。

在陛下面前，我不耻于承认软弱，我公开承认，在监狱中孤独地死去的想法甚至比死亡本身还要使我更感到恐惧。我从灵魂和内心的深处恳求陛下拯救我，如果可能的话，使我摆脱这最后的、最严厉的惩罚。

无论将对我做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毫无怨言地、事先把它作为十分正义的判决来服从，我冒昧地希望，允许我最后一次在陛下面前对于令人难忘的先帝和陛下赐给我的恩惠表示衷心的感谢。

恳求宽恕的罪人 米哈伊尔·巴枯宁

译自《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莫斯科1935年
俄文版第4卷第272—276页。

致亚·伊·赫尔岑(摘录)

· 编者按语 ·

这里选录的三封信(1860年11月7日和12月8日致赫尔岑以及1860年12月1日答《钟声》杂志)是巴枯宁为老沙皇扩张主义辩护、替沙皇侵略中国歌功颂德的铁证。

穆拉维约夫是沙俄侵略中国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他在担任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期间,疯狂地对我国进行侵略,强行割占了我国大片土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对穆拉维约夫这个掠夺成性的扩张主义分子、穷凶极恶的侵华头目,巴枯宁百般谄媚讨好,无耻歌颂他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替他开脱辩护。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恭维穆拉维约夫是“优秀人物”、“象骑士那样高尚”、“具有第一流将领的全部才能”、“天才的行政长官”、“俄国的救星”,把另一个侵华凶手伊格纳切夫吹捧为“中国的救星”。把穆拉维约夫侵略中国领土的强盗行径吹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事业”。他为沙俄向外侵略扩张、谋求世界霸权的罪行拍手叫好,说什么“由于获得了阿穆尔地区(即黑龙江地区——编者),斯拉夫俄罗斯王国就在太平洋上站稳了脚跟,和美国结盟以前是幻想,今后则成了现实,……由于获得了阿穆尔地区,我们现在可以在太平

洋上保持一支庞大的、真正的舰队，以代替黑海和波罗的海的玩具”。这充分说明，巴枯宁是老沙皇侵略扩张政策的吹鼓手。

今天，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学着巴枯宁的腔调，狂热地歌颂穆拉维约夫，把这个侵华头目吹捧为“优秀的国务活动家”、“天才的外交家”，无耻颂扬穆拉维约夫的“历史功绩”，这正好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面目。

1860年11月7日于伊尔库茨克

.....

俄国确实有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俄国官场唯一的一个不靠琐碎小事、不靠卑鄙行为，而靠伟大的爱国主义事业使自己飞黄腾达和享有盛名的人。他热爱俄罗斯，象彼得大帝一样忠诚于俄罗斯。同时，他不是迂腐的爱国主义者，不是满腮胡须、习惯素食的斯拉夫主义者。这是一个极有时代精神并且很有教养的人。他希望俄国在自由中获得尊严和荣誉。他象我们自己一样，完全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无论从各种本能、从明确而坚定的信念，从头脑、内心和生活的整个方向来看，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象骑士那样高尚，在俄国象他那样纯洁的人寥寥无几；在尼古拉时期，他当了将军、总督，他平生从来没有做过违背自己信念的事情。你们能猜得到，我讲的是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就是你们现在站在敌对立场上来反对的那个人。请问，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承担着监护俄国这一崇高而艰巨的责任，怎么能不注意、不知道我们祖国的唯一的爱国主义者和国务活动家呢？这个人物我们无疑可以称为我们的人，俄国现在可望得到他的真正的效劳，甚至可能是

得到他的拯救。我对你们讲的这个人是我的好友，两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同他见面。

现在谈谈他的政治纲领。他希望使农奴连同土地得到无条件的、彻底的解放，实行有陪审人员参加的公开的诉讼程序，私人 and 公职人员不论地位高低都得无例外地服从这样的法庭，出版言论绝对不受限制，废除等级，实行人民自治和拨给国民教育充裕的经费。在最高行政机关方面，他希望进行如下的改革：第一，取消各部（他是官僚制度的死敌，是生活和事业的朋友），在最初一段时期既不要宪法，也不要空话连篇的贵族议院，而是要一个不拘叫作什么名称的临时的铁的专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把尼古拉也许还有亚历山大手下那帮获得了自由的彼得堡的仆役们完全清除掉。他不仅不信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王公大臣，而且也不信任整个贵族等级，他称他们是俄国的浪子。总之，他对一切特权阶层或者一切被他称为不受鞭笞的阶层抱有同样的、完全应有的蔑视，他不信任公众，而只信任受鞭笞的人民，热爱人民，认为只有人民才是俄国的未来。他不指望官僚贵族对于解决农民问题会做什么好事，而是希望农民的斧子能开导彼得堡，使那里得以实行明智的专政，他确信，只有这种专政才能拯救今天的俄国，使它免于在卑鄙龌龊、盗窃成风、互相倾轧、废话连篇和卑劣丑行中陷于毁灭。他认为专政是必要的，目的还在于恢复俄国在欧洲的力量，他希望把这股力量首先指向奥地利和土耳其，以便解放斯拉夫人，并建立一个虽然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但却是自由的斯拉夫联邦，而不是统一的泛斯拉夫主义君主国。他是匈牙利人的朋友、波兰人的朋友，他确信，俄国明智的对外政策的第一步应该是复兴和解放波兰。

你们喜欢这个纲领吗？请记住，这并不是书斋里的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的纲领，在那种人看来，一切都是轻而易举的，都是可

能的，因为他们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不是的，这是一个有经验的、老练的国务活动家、总督公之于众的思想，他不容许说空话，他一生言出必行，他有钢铁般的意志，他的智慧几乎是天才般的。

我见过很多人，但还没见过一个人象他这样在自己身上集中了这么多互为补充的天赋和才能：勇敢的、广博的、炽热的、坚毅的智慧，天生的、富有吸引力的、激励人心的口才，以及在理解和叙述方面的令人惊讶的质朴。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一经与他的思想接触，就变得明确而简单了；他的思想风格完全是俄国式的、讲求实际的。他无论对事对人的记忆力都是罕见的。如果同他谈起关于他治理东西伯利亚十二年的任何事情或问题的话，在任何时候，他无论正在做什么事情，都会向你们极其详细地说个明白，使你们永远也忘不了。他的头脑经常忙于许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却总是那样清新而明朗，好象能保存和容纳一切哪怕只是处理过一次的事情。向他报告工作的人，自己对工作的了解从来也不如听取报告的他那样清楚。他的脑子转个不停，他不睡觉时就工作，而一昼夜也不过睡五、六个小时，同时您从来也不会觉得他工作忙乱。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交谈者，总是那么活跃、机智和令人可亲。他令人可亲到了这种程度，不仅女人喜欢他，而且男人也喜欢他。你没法不爱他，因为他本身就有这样强烈的爱和憎，他充满了激情，他的整个身心都是激情。你没法对他无动于衷，一定会要么爱他，要么恨他。他是这样忠实的、和蔼可亲的朋友，他在一切方面都这样彬彬有礼而又优雅高贵。他直率坦白，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感情。他以真情，以广泛的、直率的、知心的真情取胜。他发起怒来一定令人害怕，他的蔑视会使人无地自容。请看他就是这样一个有道德的人物。此外他还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对个人利益极端藐视，他象王子那样慷慨大方。他不富裕，不富裕

到了这种程度,当他现在离开西伯利亚的时候,如果他很可能由于政治原因而离职的话,那末他将几乎无以为生;可是近三年来在去阿穆尔河^①、中国和日本的时间内,单是由于走这几趟,他在股票方面就损失了八万零一百银卢布,而且我只是约略地听他谈过这笔损失。他无私心到了这种程度,竟然拒绝接受由于开拓阿穆尔的事业而打算发给他的终身恤金,而且这一切处理得是那样朴实,没有一点虚荣心,就象别人喝一杯水那样自然。在这个优秀人物身上没有一点利己主义或虚荣心;他虽然珍视阿穆尔斯基这一称号,但并不在乎自己的将军、总督的职位和伯爵爵位。他要的是实权,而不是形式,这又是和彼得大帝相似的地方,我常常觉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的独特的朴实同彼得大帝非常相象。所有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去见他,他记得每个人,他心里想着每个人。这是一个真正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真正有经验的国家要人;任何一个生活上的教训,任何一件他亲身经历的国家事务,都不会从他的头脑里白白过去。

首先他具有俄罗斯的智慧,不容易受骗;他能看透您的内心,而当他不愿公开说明的时候,却能对您不露声色。他的智慧既灵活精明,又直截了当,在外交上谁也没有他高明。看来他是全能的,不过搞文学和当教授除外,虽然他也受过教育和勤奋好学(他至今还在阅读和学习),但他对这些方面却抱有本能的厌恶;他喜欢行动,憎恨空谈。他擅长外交,犹如擅长内政管理或军事一样。他了解人们,善于同人们相处,善于说服、开导、引导人们,无形中使人们服从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他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发号施令的。至于说到军事方面,所有过去在高加索了解他的人(他在那里作为一个独当一面的长官初次崭露头角),所有现在同他接近的人都确

① 即黑龙江。——编者注

信,他具有第一流将领的全部才能:思考迅速而明确,沉着冷静,在紧要关头能够随机应变,熟悉军事,不屈不挠,而主要的是抱有难能可贵的真正英勇果敢的决心,一切胜利的保证都在他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如果现在还有什么能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的话,那就只有设想指挥军队去攻打他和我同样痛恨的奥地利人了。他是真正天才的行政长官,他使自己所管辖的一切方面都卓著成效、合情合理、条理分明和简单易行,他在困难的时刻能够从谁也注意不到的地方找出办法来。他工作进行得飞快,他出其不意地作出决断并且一往直前地迅速付诸实施,从而使人感到震惊,这些行动几乎总是正确的、中肯的和颇有成效的,因为它们是先深思熟虑的结果。至于谈到事业,他既奋不顾身,也不吝惜自己的公职人员;他在十二年的治理期间,骑马、坐四轮马车、坐大车、步行和乘船一共走了二十多万俄里。他于1854年首次乘小船顺阿穆尔河而下,如果详细叙述他的阿穆尔的丰功伟绩,叙述这些英勇无畏、忘我牺牲、热情机智的丰功伟绩,那真能写成一部英雄史诗。而这个人物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现在还在充分发挥作用,他的全副心灵属于俄罗斯,属于俄罗斯的解放事业,属于斯拉夫人的事业。他的信念和事业,尤其是他想为俄国做的一切表明,他完全是我们的人;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也不知道俄国还能期望别的什么人给它带来这么大的好处。我记得,你们曾经怎样哀悼帕谢克将军的逝世,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是又一个帕谢克,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帕谢克更优秀、更能干、更聪明、更有力,而且也许更忠诚,因为在穆拉维约夫身上有一种对信念和事业的极端忠诚。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现成的俄国的救星,然而你们却是他的政敌。这意味着什么呢?你们对俄国和对自己担负的责任何等伟大!由于轻率和轻信,由于无知或缺乏批评,你们竟成了反对俄国的优秀人物的诽谤者。要知道,这是反常的和犯罪的。

彼得堡、所有最高政界人士都憎恨他；在第三厅^①中（你们的通讯员、你们的英雄、你们的宠儿扎瓦里申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几乎每天都给第三厅写信），他是作为最红色的人被登记下来的，那里一般称他为红色将军，这一切是很自然的。在一帮行尸走肉之中，只有他一个人生气勃勃，在一帮卑鄙浅薄、自私自利的阴谋家和利己主义者中间，只有他一个人献身于事业，他不拿恤金，——这怎么不令人反感呢！他单靠西伯利亚的经费把一个幅员广大的边区并入版图，他几乎不用经费而完成伟大的事业，他爱惜国家的钱财，他接二连三提出方案，主张精简行政机关，取消不必要的职位，解放农奴，减轻受少数奸诈之徒压迫的千百万人的困苦。他不让人睡大觉，总是要人考虑事业，他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而且对彼得堡的原则和人员公然表示愤慨和蔑视，甚至对皇室的好汉们也不容情。因此，彼得堡痛恨他，这也是自然的。同样自然的是，大多数胆大妄为的俄国贵族都不喜欢他。他如此深悉俄国王公大臣们贵族式的下流淫乱，并对他们如此痛下针砭，——他们当然不喜欢他。他热爱人民，因此人民也信任他，穆拉维约夫的名字在西伯利亚将万世留芳。同样，文学家们也不喜欢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学家是一些敏感的、虚荣心重的人们，他们昨天吓得发抖，今天嘲笑武力，他们光说不做。他们是贫瘠的俄国教育的垄断者，是穿着燕尾服的思想垄断者，他们喜欢别人向他们鞠躬致敬。穆拉维约夫蔑视他们，不向他们致敬。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他是朴实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和他之间毫无共同之点。总之，一切享有特权的、讲空话的和当权的人不能容忍穆拉维约夫，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们这些人民之友怎么能成为他的政敌，怎么能这样轻率地相信扎瓦里申和彼得拉舍夫斯基这种人（关于他们在下面再谈）说的话，这一点则是我绝对无法理解的。这真是自己人不认自己人了。

^① 沙俄政府的秘密警察机关。——编者注

你们会问，穆拉维约夫用什么证明了他的才能、他的忠贞不渝而有效的方针呢？他对东西伯利亚的十二年的治理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回答。我的一个好心肠的熟人、波兰革命者维贝尔很详细地了解西伯利亚，因为他是早在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之前就流放到这里来的，因此他能够把西伯利亚在穆拉维约夫来到之前的情况同今天进行比较，他在不久前讲过，如果把穆拉维约夫在这十二年期间所写的东西，尤其是送往彼得堡给皇帝和各位大臣的公文刊印出来的话，那末单是这些公文就可以编成一部出色的传记；从这些公文的往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想的是什么，他努力追求的是什么。每一份文件都流露出仁爱、崇高的正义感、英明的智慧以及为国家和边区谋福利的精神。他的所有各项建议和行动的主要的和一贯的目的，就在于使俄国一切被压迫的人即主要是人民提高地位，减轻困难，能够得到解放。

我不记得是谁，好象是勒奈·德·塔扬迪埃，在谈到斯伯兰斯基时说，其他国家的国务活动家从舆论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但俄国的国务活动家只能仰仗一个人的仁慈和信任，因此，他们必须用四分之三的时间去保住自己的职位，而仅仅用剩下的四分之一时间去进行他们的事业。这在穆拉维约夫身上完全得到了证实。他必须进行战斗，才能获得一点极小的做好事的机会。他花了多少力量和寿命去同彼得堡斗争，而每一次胜利又花了多么高的代价啊！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大臣们、我们的彼得堡的国务活动家们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是一些生活在豪华环境里的卑鄙庸俗的人物，虚有深思熟虑其表的傻瓜，是一些口说爱国主义空话而不学无术、有始无终、微不足道的利己主义者和沽名钓誉之徒，是一些靠阴谋活动和卑鄙行径爬上高位和保持官爵的人，是一些机械的形式主义者，是一些对生气勃勃的、实际的事业连预感也没有的墨守陈规者。这些腐化的、机械地生活和活动着的木乃伊，除了自己以外，对任何

人和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任何一个具有生动的、有成效的思想的忠诚的人，当他还无能为力的时候，在他们眼里都是可笑的，如果他能强迫他们听从自己的话，那就成为他们的敌人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把穆拉维约夫当作敌人对待。在大臣委员会中，他只找到一个真正的忠实的同盟者：基谢廖夫，现任驻法国公使。所有其余的大臣都反对他，十二年来时而以阴谋诡计，时而以惯常的愚钝的漫不经心来竭力使他的开创活动陷于瘫痪。

穆拉维约夫只得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活动。他做了哪些事情呢？他所做的主要的事情无疑就是把阿穆尔并入了俄国版图。我不打算谈得太长；要详细地谈论这个题目，现在即使不说要写整部的书，也需要写一些厚厚的小册子。这里我只谈几点看法。阿穆尔的事业，无论就其实质、就其肯定有益的结果，或者就其所使用的经费为数有限和微不足道来说，都是伟大的事业，但它在俄国的遭遇却是奇怪的。最初，所有公众都兴高采烈，极热烈地对穆拉维约夫讲了天晓得有多少响亮动听甚至往往到了荒谬地步的好话；说他补偿了过去那次战争的全部损失和一切耻辱。

过不多久，冒牌的十二月党人扎瓦里申在《海洋文集》上接二连三发表文章，他怀着对穆拉维约夫的复仇心理和不可调和的憎恨，有意识地撒谎、诽谤、歪曲、捏造事实，用自由主义的论据和词句来掩盖恶狠狠的诽谤，最后竟至否定阿穆尔的好处，否定通航的可能性，甚至几乎否定阿穆尔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并且把它称为“俄国的祸害”。这些文章充满着极狭隘、极强烈的自尊心，字里行间显露出扎瓦里申先生的可悲的受侮辱的自我，不过这是故意在俄国公众面前以污蔑的形式写出来的，这些充满矛盾的文章，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能蒙蔽和愚弄那些轻率的读者，经不起认真的批评。结果如何呢？俄国所有的公众都跟着扎瓦里申斥骂阿穆尔和所有开拓阿穆尔的活动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人们煞有介事地断

言，阿穆尔是瞎说的事，河上连小船也走不了，布拉戈维申斯克^①和尼古拉也夫斯克^②以及阿穆尔地区所有的乡村和市镇仅仅存在于穆拉维约夫的想象和报告之中；阿穆尔使俄国破产；它断送了千百万卢布和成千上万的人；总之，阿穆尔成了俄国的祸害。

俄国的公众是些古怪而愚蠢的人！在他们之中流行着一种奴才的习惯，这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骂一通，他们对他们所骂的对象没有激情和漠不关心，只是一味地乱骂和乱发脾气。你们可以去问问今天十分之九、百分之九十九的骂阿穆尔的人：阿穆尔在什么地方？我相信，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过地图，其实他们对阿穆尔、对西伯利亚、甚至对俄国都毫不关心。而他们之所以骂，是因为俄罗斯人张嘴就骂，什么事都骂，什么人都骂，因为这是时髦，这才象自由主义。俄国的这些公众缺乏理智和强烈的感情，而对一切事情都喋喋不休地讲空话，他们是些庸俗之徒，简直是一群放荡的畜生，只配用斧子来对付。

阿穆尔河能通航吗？根据在这方面很内行的美国人以及我国优秀的航海者的看法，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方便的河流之一。何必问他们呢？1854年约有三百八十名哥萨克和正规军士兵在穆拉维约夫率领下，携带全部口粮，乘三十四艘驳船第一次顺阿穆尔河进行了航行。1855年仍然是在他的率领下，浮运了约五千名哥萨克和士兵，同样携带全部口粮，并装载了一些二十八至三十八俄磅的大炮；从那时起，每年都从赤塔沿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把三十万普特到五十万普特的各种物资运到尼古拉也夫斯克。从1855年起，从尼古拉也夫斯克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始通航轮船。1859年航行的国有轮船有六艘，而美国人德弗里斯的私人轮船第一次出现在石勒喀河上。今年冬天在尼古拉也夫斯克征集了四艘新的国

① 即海兰泡。——编者注

② 即庙街。——编者注

有浅水轮船，其中一艘专门用于乌苏里江航行，其余三艘逆水而上，两艘开到斯列田斯克，一艘只开到石勒喀扎沃德，而美国人德弗里斯则溯石勒喀河和涅尔查河而上一直开到涅尔琴斯克^①。我曾同外国轮机人员交谈，他们都说没有见过比这更便于航行的河道了。还有，从明年起将开辟定期邮船航运：斯列田斯克（位于石勒喀河岸，离涅尔琴斯克七十五俄里，离赤塔三百六十俄里）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几乎位于阿穆尔河正中段河岸，水路离尼古拉也夫斯克二千俄里，离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的会合处乌斯特-斯特烈耳卡一千二百俄里，从斯列田斯克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二百六十俄里）之间每两周一次，斯列田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每周一次，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尼古拉也夫斯克之间每周一次，也就是说，在尼古拉也夫斯克和斯列田斯克之间一个月往返一次，这样，一个夏季之内从斯列田斯克沿阿穆尔河可以往返航行三次。看来，阿穆尔河可以通航是有充分的令人满意的证明的，而扎瓦里申硬要反过来说，这岂不是无耻地撒谎吗？你们到底还要什么呢？去年从尼古拉也夫斯克到石勒喀扎沃德每普特的运费是二卢布五十戈比，今年到斯列田斯克是二卢布五十戈比，而明年将为二卢布。从斯列田斯克到赤塔运费是二十五到三十戈比，从赤塔到伊尔库茨克是八十戈比到一卢布二十戈比，就算是一卢布。这就是说，从尼古拉也夫斯克到伊尔库茨克的运费明年约为三卢布五十戈比，就算是四卢布（而美国公司环球航行每普特收费定价为一银卢布），而从下新城到伊尔库茨克每普特运费是六到七卢布，即几乎贵一倍。请看这就是阿穆尔在贸易上对西伯利亚有好处的证明，现在我们这里每普特糖要付十六到十八卢布，而在赤塔甚至要付二十卢布，按照扎瓦里申本人的计算，在尼古拉也夫斯克应该

① 即尼布楚。——编者注

卖五卢布左右，事实上在那里卖七卢布，将来在赤塔则不会超过九卢布，而在伊尔库茨克不会超过十一卢布。

我说的是“将来”的售价，而不是现在的售价。为什么呢？非常自然，因为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贸易从1857年才刚刚开始，还掌握在少数美国的和俄国的冒险家手中，他们享有完全的专卖权，因此可以对各种商品完全随心所欲地规定难以想象的价格。阿穆尔公司从开始起就是不可靠的和愚蠢的，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营业就已经完全破产了。此外还必须看到，西伯利亚的商人同俄罗斯的商人一样，都是一些不可救药的顽固保守分子，不相信新开辟的航道；他们只知道完全是人为地维持着的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尽管他们本身也意识到，这种贸易每年都在下降，而且很快就会停止。

据说，明年将不是一艘，而是三艘美国轮船运送外国商品到斯列田斯克来，毫无疑问，美国人今天已摆脱了各种限制和禁令，很快就会掌握阿穆尔河的航运和贸易。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此。无论在阿穆尔河上的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西伯利亚今天已经同大洋连上了，不再是没有出路的、荒凉的西伯利亚了。我们已经感觉到这种影响，例如，我们在伊尔库茨克比在托木斯克更接近欧洲，阿穆尔使西伯利亚第一次被人认识了。这难道不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吗？谁能计算得出这项事业的一切后果呢？毫无疑问，阿穆尔将来会使西伯利亚脱离俄国，使它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彼得堡的人们非常害怕这一点，有人甚至非常担心穆拉维约夫会宣布西伯利亚独立。然而，这种独立现在是不可能的，在不远的将来则可能是必要的，而这难道是坏事吗？难道俄国还能在长时间内仍然是一种强制地、畸形地结合在一起的、笨拙的君主制吗？难道君主制的集权不应该消失在斯拉夫联邦之中吗？

溯阿穆尔河进口外国商品的贸易，已经由事实证明是可能的、必要的，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我们将来卖什么东西给美国人，用

什么东西去交换他们的商品呢？这个问题把许多人难住了，虽然答案非常简单。第一，我们应该进行粮食、牲畜、油脂、肉类、大麻、皮革的贸易，阿穆尔边区十分富饶但人口稀少，它将能充分生产这些产品供进行贸易之用。第二，西伯利亚富有贵重矿藏，而黄金是和粮食同样的商品，同样是西伯利亚的劳动产品。叶尼塞省发现许多金矿，外贝加尔省每年也发现更多的金矿，外贝加尔省富有牲畜、油脂、皮革、腌肉以及粮食和绳缆，并且现在就已经在用这些东西进行贸易，虽然规模还小。但是，那里的主要财富是丰富的铁矿，而铁矿迄今仅属皇家管理局所有，它象爬在干草堆上的狗一样守着这些铁矿，多亏激烈反对任何官营生产的穆拉维约夫，这些铁矿不久前才向私营工业开放。现在最普通的铁贵得让人买不起，而且几乎完全脱销，质量最次的生铁在此地每普特需付六卢布，毋庸置疑，尽管俄罗斯人毫无进取精神，尽管采金业吸引着西伯利亚的大多数资本，但是，还是会很快找到聪明能干的资本家在伊尔库茨克省和外贝加尔省开设铁工厂的，这是十分有利可图而且坚实可靠的企业，不会长期无人问津。那时单是生铁一项就足以充实我们顺阿穆尔河而下的出口贸易。

新归并的阿穆尔边区本身十分富饶，而和阿穆尔边区相连的乌苏里边区（西临注入阿穆尔河的乌苏里江，东濒太平洋，南和朝鲜接壤）尤其富饶，既有肥沃的土壤，又有极好的、简直是南方的气候，总而言之，合乎心意的东西应有尽有，这两个边区不出一二十年就将成为太平洋的谷仓。那里粮食的收成现在往往达到种籽的三十倍；到处都有含量丰富的金砂的踪迹，假如中国人按照璦琿条约的条款，准许在松花江沿岸自由通商的话，那末松花江流域的牲畜和粮食现在就足以不仅供应整个阿穆尔地区的食用，而且可以用于对外贸易。现在貂皮、褐狐皮及其他皮货是主要的通商物品，这是在阿穆尔河中南沿岸地区和太平洋沿岸从尼古拉也夫斯克到

彼得大帝湾^①整个这一片地区猎获的。但是从明年起，包括柞木和落叶松在内的制桅杆用的、建筑用的和作劈柴用的各种木材，一定会成为更加重要的物品；上海、香港以及向欧洲人开放的其他中国口岸都大量需要这些木材。此外，阿穆尔河口对面六十俄里远的萨哈林岛^②遍布优质煤层。

上面简略地向你们谈了阿穆尔地区在贸易上的意义。如果美国人把这个富饶地区弄到手的话，他们会在那里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啊！可是俄罗斯人而尤其是西伯利亚人，尽管倍受因循守旧的爱国者的热烈赞扬，却象婴儿似地无能为力。看来，警察的全面干预、农奴制和公社的宗法式专制扼杀了他们身上的任何进取精神和主动精神；他们自己不能行走，非要别人拉着走不可。新获得的广大地区气候宜人，土壤肥沃，由两条可以通航的大河环绕而且濒临太平洋，要不要给你们谈谈这个地区在政治上的意义呢？这是新西伯利亚，不过却是富饶的、开化的、滨海的西伯利亚。由于获得了阿穆尔地区，斯拉夫俄罗斯王国就在太平洋上站稳了脚跟，和美国结盟以前是幻想，今后则成了现实，这一点在当前同中国的关系和谈判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获得了阿穆尔地区，我们现在可以在太平洋上保持一支庞大的、真正的舰队，以代替黑海和波罗的海的玩具。实际上英国人今年春天又在力图从我们手中夺走彼得大帝湾。现在问题全在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和从尼古拉也夫斯克到朝鲜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居民。这些居民行动缓慢，无疑比美国人缓慢，因为我们既没有他们的勇气，又没有他们的聪明和审慎而又大胆的进取精神，也没有他们的行动自由，不过这些居民终究在行动，而且将一年一年地迅速前进。

但是在谈到这个内容之前，我要简略地叙述一下取得阿穆尔

① 即大彼得湾。——编者注

② 即库页岛。——编者注

地区的经过。穆拉维约夫抱着这种想法来到了西伯利亚，而且早在从彼得堡启程以前，他就说服了尼古拉皇帝同意装备一支环球海洋考察队去寻找阿穆尔河口。这支考察队在船长、现任海军少将涅维尔斯基的率领下，于1849年5月找到了阿穆尔河口。1852年，涅维尔斯基按穆拉维约夫的指示为尼古拉也夫斯克奠基。1849年，穆拉维约夫赴堪察加了解边区情况，特别是了解太平洋沿岸情况。同年，他产生了设立外贝加尔省作为征服阿穆尔地区的出发点和据点的想法。1850年，他开始同除基谢廖夫和彼罗夫斯基以外的整个内阁发生冲突。他的主要对手是涅谢尔罗迭、车尔尼晓夫和布卢多夫，而所有其他的人都追随这几个人。他被公开称作疯子官，有关阿穆尔的整个设想被称作毁灭性的事业。尤其是当他要求皇家管理局作出一些贡献，即贡献出管理局的四万名农奴的时候，设立外贝加尔省一事更是遭到了强烈的、狂热的反对。穆拉维约夫从同各大臣的冲突中看出我国财政的拮据，知道不会给他拨款，于是决心在外贝加尔边区的帮助下，用东西伯利亚管理处的余款来完成巨大的事业。

哥萨克阶层并不是他带到这个边区来的，他们早就在中国边界上，主要是在鄂嫩河和额尔古纳河沿岸地区生活，当他来到西伯利亚的时候，他们已经扩大到男女共六万人了。但是为了进行顺阿穆尔河而下的航行，他需要音果达河和石勒喀河沿岸的人手。在那里居住的主要是为数四万名的矿厂农民。你们知道什么是矿厂农民吗？这是一些比最穷苦的地主农奴还要更贫困、更受压制和更倒霉十倍的农奴。多亏穆拉维约夫，如今在涅尔琴斯克区再也没有这样的农奴了，我是从托木斯克省了解到他们的状况的，那里有十三万多名这样的农奴被编在阿尔泰的各采矿厂中。他们和别的农民一样纳税和承担其他各种钱粮贡赋；他们作为新兵被招募来，但不是去当兵，而且去银矿从事二十五年苦役。作为皇家管理局

(所有矿厂都归皇家管理局管辖)的农奴，他们负担劳役而且是多么沉重的劳役！开工季节也好，道路泥泞时期也好，任何时候他们都得按照矿务长官纯粹专横的命令把木材、劈柴、煤炭、矿石运往一百、二百、有时是三百俄里以外的地方去。此外，他们必须把自己的粮食仅仅卖给矿厂，而且按照 1832 年发布的切夫金指令，每普特黑麦面粉绝对不许超过二十八戈比。作为农奴，他们被人剥夺了自由，受人支配。什么人呢？地方矿务部门。你们知道矿务部门的情况吗？你们知道，俄罗斯的工程师是多么丧尽天良、贪得无厌、老奸巨猾，你们只要设想俄罗斯祖传的工程师是一个和僧侣等级类似的等级，就会知道矿务部门是什么样子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矿务军官都是矿务军官的子弟，因为把自己的子弟送到矿务中等武备学校去受训，几乎是矿务军官享有的特权，因此，他们的子弟从小受到中等武备学校训练的影响，养成奸诈狡猾的劣根性，来到矿厂时已经是成型的窃贼了。他们的妻子和母亲也是矿务军官的女儿和姊妹。所以，整个矿务部门就象是以惯偷为基础紧密联系起来的和睦家庭。支配矿厂农民的就是这样的矿务部门。难道我还应该对你们说，这些贫苦农民在世上生活得怎么好吗？其实，你们从我附上的安东诺夫(波兰政治犯维贝尔)在《伊尔库茨克消息报》上面发表的文章中，就可以找到有关他们过去在涅尔琴斯克区的生活的详情细节。正是穆拉维约夫把他们编入哥萨克，使他们摆脱了这种处境。这种措施主要地不是在最初激怒了扎瓦里申，因为正如下面我要谈到的，当他和穆拉维约夫和睦相处的时候，他不仅热心拥护穆拉维约夫的一切行动，而且甚至不邀而至、不请自来，自己用一种不光明磊落的笨拙方式插手执行穆拉维约夫的决定。后来他对穆拉维约夫生气了，于是就进行污蔑，而实行哥萨克化和强迫哥萨克住满阿穆尔地区的一整套措施——一整套殖民措施，就成了他笔伐的首要对象；诚然，这一整套殖民措施

从纯粹经济学的原则去考虑并不合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必要的。由于缺少经费，由于人民毫无主动精神，由于变得懒散的、垂头丧气的、被束缚了手脚的人民不可能有主动精神，所以必须要么是采取这种措施，要么就是放弃阿穆尔。那末，人们会说，四万名矿厂农民、整个外贝加尔边区不是做了阿穆尔事业的牺牲品吗？即使如此，和所获得的巨大成果相比，这种暂时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而如果我们能证明，无论外贝加尔边区或者矿厂农民，都不仅没有遭受损失，而且得了极大的好处，这种方式牺牲是为了伟大的事业，那末扎瓦里申的全部论据中还能剩下什么呢？

为了替自己装模作样的愤慨作辩护，为了使他的读者们想起来觉得可怕，他什么花招没有想出来呢！又和阿拉克切也夫制度相比，又说整个外贝加尔边区会破产，又说迁往阿穆尔地区的不幸的移民会饿死，又说整个阿穆尔事业会毁灭。“阿穆尔成了西伯利亚的祸害”，——他郑重其事地这样叫喊，愚蠢的人们就相信了他的话。然而，扎瓦里申在外贝加尔边区住了这样长的时间，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穆拉维约夫把四万名矿厂农民变成哥萨克阶层，就使他们摆脱了俄罗斯人所能想象的最恶劣、最不幸的处境，和前不久的状况相比，他们现在的状况可以称得上是天堂。他知道，除了在矿厂遭受各种压制和破产以外，他们过去还被矿务长官交给某些店铺去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这种店铺象白俄罗斯的犹太人一样，使他们债务缠身，使他们对店铺处于农奴的依从地位，而穆拉维约夫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象格拉古那样把他们从这种无法偿还的债务和骗人的商人债主手里解放出来。他知道，在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当中根本没有实行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没有人干涉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在家里是完全自由的，他们现在免除了一切贡赋，过去他们被招募到银矿去从事矿井下的苦役，现在则改为每个十八岁至四十岁的成年哥萨克有义务每三年中有一年入伍在当

地服役，矿厂的劳役改为砍伐建造驳船的木材，建造音果达河和石勒喀河上的驳船和流送这些驳船到阿穆尔河下游去，而且他们每天还可得到二十戈比，这种报酬虽然为数很少，但是在他们当矿厂农民，从事无比繁重的劳动时，连这点钱也得不到。此外，他们当矿厂农民时，他们和他们的孩子都注定要受毫无希望的、没有出路的奴役，而自从他们变为哥萨克的时候起，他们总共只要从事十年或者至多十五年的强制劳动，而现在剩下的无论如何不超过五年了（现已干脆取消），此后，除了服兵役以外，他们就将不再负担任何义务，并且将对自己同皇家农民相对而言的真正优越的地位心满意足，所以可以考虑取消现在还需要，但是很快就根本不需要的哥萨克制度。

穆拉维约夫无疑更乐于一开始就由自由的移民移居阿穆尔地区，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些自由的移民呢？很早以前，剽悍的哥萨克未经请示，甚至未经长官同意，便自己发现了和占领了阿穆尔地区，在阿穆尔河岸建立了阿尔巴津城。从那时以来，在许多世纪中受到束缚的俄罗斯人民，丧失了一切主动精神，丧失了一切行动能力；废除现在的农奴制和警察制度，无疑会使俄罗斯人民恢复失去的生气，但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不能等待，人民缺乏主动精神，就要代之以政府的主动精神。为了占据阿穆尔，为了在阿穆尔河上开辟经常的航运，为了彻底地把阿穆尔据为己有，就得实行强制哥萨克进行殖民的一整套办法。根据穆拉维约夫的要求，尼古拉皇帝拨出了自己的四万名农民并批准了成立外贝加尔边区。从1851年至1854年，全部时间都用来收集有关阿穆尔的情况，建立新边区，为考察阿穆尔作准备，这项考察尽管遭到整个彼得堡的反对，但由于和英国的关系破裂（我们当时还害怕我们在阿穆尔出现会激怒英国），终于在1854年获得了许可。

于是，1854年5月9日，三百八十名士兵和哥萨克在穆拉维约

夫亲自率领下，顺阿穆尔河进行了第一次考察。中国人在现在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下游不远的中国省长驻地瑗琿，集结了占有很大优势的兵力，想要阻截穆拉维约夫，但他还是穿越过去了，经尼古拉也夫斯克、鞑靼海峡和鄂霍次克海把这三百八十人相当及时地带到了堪察加，以便坚守堪察加防范英国人的进犯，他本人则在9月前往阿扬，又在那里一半路乘狗橇，一半路骑马经雅库茨克省往伊尔库茨克。1855年4月底，他率领一支已经是为数五千人的部队顺阿穆尔河进行了第二次考察，耀武扬威地通过了瑗琿，当英国人到达迭卡斯特里湾时，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说，他们发现这里“布满了人和炮”。同年，顺阿穆尔河运来了第一批自由居民，他们占据了尼古拉也夫斯克附近的阿穆尔河两岸地区。1856年发生了一起一千三百人的部队从尼古拉也夫斯克行军返回外贝加尔的不幸事件，其中实际上饿死、冻死和病死的约有三百人。我知道，这件事在《钟声》上遭到了尖锐的抨击，可是，亲爱的朋友们，这难道公平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曾有多少英国人死在阿富汗，又曾有多少北美人死在西部平原和落基山脉的军事考察中？至于对这次惨剧的罪魁祸首奥布列乌霍夫少校给予不恰当的奖赏一说，纯属污蔑，因为他现在仍然很不得意，还在伤心地抱怨自己在伊尔库茨克的境况。

从1857年起，开始让哥萨克去阿穆尔实行正常殖民。最初几批移民无疑不是自愿的，这是为阿穆尔事业而作的必要的牺牲，而这种牺牲实际上比想象的小得多。第一，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措施，使移民及其全部财产平安无恙地到达目的地，而且迄今进行的各次移民，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成功的。在俄罗斯的执行人员一般说来缺乏训练、能力不足和不够认真的情况下，向一个新的、完全荒无人烟的边区移民这样困难的事情，自然免不了行政上的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的痛苦；但是这种错误，即使和在俄罗斯

内部从一个省向另一个省移民时所发生的情况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这种痛苦也决不能和北美移民迁往密西西比河和阿肯色河沿岸沼泽地带所遭受的痛苦相提并论。阿穆尔的哥萨克是移居到辽阔的、有益健康的、极其富饶的地方。为了证明气候是宜人的，我只举一个情况，即阿穆尔地区相对的死亡率比外贝加尔本身低，也比伊尔库茨克省低。诚然，在实行移民的头一年，有些地方对于牲畜不很有利，有些地方马死了，有些地方羊瞎了眼，有些地方牛犊生下来没有毛，对于这些怪事的发生，西伯利亚人、尤其是外贝加尔人的人所共知的懒散放荡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谢天谢地，所有这些怪事第一年以后就不再出现了。牲畜很快习惯了阿穆尔地区，人在这里生活得快快活活；而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他们有够用两年的生活用品，有面粉、肉类、食盐、米粮和酒类，甚至有西伯利亚人生活上离不开的茶砖，还有种地和盖房需用的各种工具，所有这些都是由公家免费发放的，他们根本不必为当年冬天甚至第二年操心，他们可以在一个夏天内盖起房子来并准备好耕地，因此到了来年，虽然他们还是完全由政府给予生活保障，如果不是由于西伯利亚人的懒散和哥萨克的漫不经心，他们甚至能够自己做到粮食自给。尽管这样懒散，这样漫不经心，但是大部分哥萨克移民现在生产的粮食已经多到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进行贸易了。此外，阿穆尔地区所有的哥萨克都永远免除各种赋税捐款，在移民后的两年内免除一切劳务。哥萨克移居阿穆尔用抽签决定；不过他们有权用志愿者来代替自己，这就使花在他们身上的费用逐年减少，因为志愿去阿穆尔地区的人数逐年增加，这再一次证明，在阿穆尔地区生活并不坏。所以，从1857年到1861年哥萨克移居阿穆尔地区的将达六十个移民点，移居到乌苏里江地区的将达三十三个移民点，共计三千二百户哥萨克，男女共约一万五千人。1861年，包括六百户共三千人的最后一批哥萨克移民将要出发。外贝加尔

地区的哥萨克在人力上所作的牺牲将到此为止，这种牺牲到第二年就会成为新移民的幸福。

讲到这里，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穆拉维约夫从1854年第一次到阿穆尔河进行考察到1859年做了哪些事情。他亲自进行了两次考察，从而使他能保卫住堪察加和迭卡斯特里湾不受英国人的侵犯。我还忘了告诉你们，1855年，当普提雅廷伯爵的分舰队摆脱封锁阿穆尔河口和整个鞑靼海湾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追击，躲进阿穆尔河口的时候，正要返回伊尔库茨克的穆拉维约夫，乘一艘租来的美国船，利用大雾和依靠自己真正的英勇精神，象在自己的活动中常有的情况那样，幸运地穿过了整个英国舰队到达阿扬，从那里又和头一次一样骑马、乘狗橇、乘鹿橇，只是最后一千五百俄里才乘轿式雪车经雅库茨克省回到伊尔库茨克。从那时起，他几乎每年都去一趟阿穆尔。1857年他送普提雅廷伯爵顺阿穆尔河而下，1858年他签订了瑗珲条约，按照这项条约，中国把整个阿穆尔河左岸地区割让给我国，把至乌苏里江注入阿穆尔河处为止的右岸地区留归自己，而把从乌苏里江至太平洋的阿穆尔河右岸地区在今后划界以前作为未定界地区，我们把这一点解释为事实上占领了北起阿穆尔河南迄朝鲜的整个乌苏里边区——整整一个王国而且是一个富饶的王国。1859年穆拉维约夫从尼古拉也夫斯克到彼切里斯克湾，再从那里到日本，同日本进行关于萨哈林岛的谈判，该岛的南半部被普提雅廷伯爵在1857年同日本人签订条约时，毫无必要地、甚至在日本人并未提出任何要求的情况下让给日本人了。这次谈判又是以造成既成事实而告终，即用两三个连占领了整个萨哈林岛。

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就是有关阿穆尔事业的最可靠的详细情况。想一想，在1854年到1859年的六年时间内占有了一个幅员广大的边区，初次移民到大约四千俄里远的地方，移民到可能极其

富饶、但实际上还是荒无人烟的草原和森林，对新获得的边区进行管理，供应粮食，支出各项外交费用和特别开支，建造驳船，建造和维修轮船，多次流送，进行军事考察，甚至包括保卫我国的太平洋沿岸不受英国人和法国人侵犯，——到 1859 年年底为止，为了所有这一切而支出的费用总共不超过五十四万银卢布，而且就连这笔钱也不是来自财政大臣，而是从东西伯利亚管理处的财政总收入中支出的，当你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朋友们，难道不会情不自禁地说，这至少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我并不是要贬低高加索的征服者巴里亚亨斯基的荣誉，但是你们是否知道，他从 1856 年被任命时起到 1859 年年底为止，花费了多少直接来自国库的钱？花费了大约二千八百万银卢布。你们比较一下，自己作出判断吧。

但是，扎瓦里申说，“为阿穆尔付出代价的并不是国库，而是外贝加尔边区，它破产了，它在毁灭”。不过，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令人吃惊地不符合所有到过外贝加尔地区的人都知道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生产的粮食、牲畜和运往外贝加尔地区的消费品大量增加。以前粮食无处可用，现在国家为阿穆尔地区大量收购；以前人手空闲无工可做，现在在夏忙季节，工作较差的人每天也可挣得一个或一个多银卢布。以前在外贝加尔地区产品充足，但是毫无现款，现在这里每年流通大量现款，每个村子都有现金。除了阿穆尔所需要的粮食以外，太平洋上一切船舰所需要的给养每年也在外贝加尔地区采购。以前外贝加尔的妇女穿的是粗麻布，现在则往往象德国人一样穿的是印花布和绸缎。以前外贝加尔在包税方面算是最穷的地区，现在则超过伊尔库茨克省，这是表明人民富有的一个可靠标志，因为在整个俄罗斯王国，凡是实行包税制的地方，人民的一切余款、甚至并非余下的钱不幸都进了酒馆。无疑，外贝加尔为阿穆尔作出了牺牲，但是这种牺牲并没有把外贝加尔弄得精疲力尽，却使它振作起来了，并将在最短期间使它绰绰有余

地得到补偿。现在,由于同阿穆尔地区的来往日渐增多,外贝加尔地区每年的夏季变得热闹起来,每年都新出现一些过去连想也没想到过的腌肉厂、肥皂厂、蜡烛厂、制革厂、玻璃厂,不久以后,当外贝加尔边区遇到每隔几年由于干旱而周期性地出现的灾年时,将从阿穆尔地区获得充足的粮食。

现在我来谈谈穆拉维约夫关于最后完成向阿穆尔地区移民的设想。八千到一万名哥萨克并不能把阿穆尔地区住满,建立哥萨克村镇的目的无非是要为今后大规模移民进行必要的开辟地盘和扫清道路的工作。1858年穆拉维约夫提出了以下列原则为基础的阿穆尔移民方案:第一,所有各阶层的人们,主要是皇室农民、封地农民或地主农民均可自愿前往阿穆尔地区,只要他们当中有人表示愿意移居阿穆尔地区,便可立即免除一切义务和贡赋而成为完全自由的人。迁移费用自理(途中费用从专门拨款和粮栈借贷);在阿穆尔地区得到土地,二十年内完全归其占用,在此期间免除一切捐税、劳役和贡赋。整个公社可永久占用土地,但土地不归其所有,土地所有权仅仅属于国家。当穆拉维约夫写自己的方案时,他仍是财产的坚决反对者,他说:“我还不相信财产不是盗窃”。这一年他迫于明显的必要,很勉强地同意在阿穆尔地区承认财产权,允许每人按每俄亩十银卢布的价格随意购买土地;对于想按占用权使用土地的个人或公社,则提供土地给他们使用二十年,期满后他们保留首先购买土地的权利,此外,移民在头二十年内免除一切贡赋。

不知这个方案今后的命运如何,但是头一个方案在西伯利亚问题委员会里被否决了,第一个反对这个方案的就是主管国家农民和封地农民的大臣“绞刑执行人”穆拉维约夫^①。他同财政大

^①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穆拉维约夫(1796—1866),俄国农奴主和地主利益的狂热捍卫者,由于残酷地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而获得“绞吏”的外号。

——编者注

臣达成妥协,提出下列主张来代替这个方案:国家每年拨款十万卢布,用这笔款项每年可使大约三百户国有农民移居阿穆尔地区,不是按自愿的原则,而是由大臣指定。各省的许多农民公社表示愿意迁移,但都遭到大臣的拒绝,萨拉托夫省的一千户门诺派农民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在1859年就已经派代表去阿穆尔地区察看和挑选土地了。仅仅西伯利亚的农民才有权自由迁移,但是他们在西伯利亚也自由自在。由大臣指定的国家农民的所谓自由迁移,今年刚刚开始;他们在夏天迁了二百三十户约一千六百人。此外,由皇上钦定移居东西伯利亚的有一万二千名携带家属或单身的受惩戒的士兵,他们现在到达东西伯利亚的有八千人;移居贝加尔省以替换外迁的哥萨克的有六千人,移居阿穆尔地区的有两千人。再加上穆拉维约夫从各个官办工厂解放出来的服苦役者约九百人,就可以得出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流域现在移民的大致确切的数字:不算正规军约……人,包括正规军在内约……人。^①

很奇妙的是,受惩戒的人员在阿穆尔地区行为端正,在分配他们去的村镇中既没有大偷窃案,也没有抢劫的事情发生,这证明他们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压制,他们的生活是自由自在的和美满的;他们的品行良好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归因于在阿穆尔地区根本没有酒馆,根据皇上批准的穆拉维约夫的建议,当地永久取消包税。诚然,阿穆尔地区的即和满洲农村毗邻的居民往往喝满洲烧酒,但是问题主要不在烧酒,而在于不断造成人们酗酒酒馆。为了更好地向你们说明穆拉维约夫的方针,就此机会给你们寄上1859年《俄罗斯通报》转载的《伊尔库茨克报》关于包税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政治犯斯彼什涅夫根据穆拉维约夫的指令写成的,针对的是这一情况:把持整个东西伯利亚包税的伯纳尔达基企图把包税扩大

① 原文空缺。——编者注

到阿穆尔地区,但是被穆拉维约夫在刊物上发表的言论顶回去了,并象听见晴天霹雳似地大吃了一惊。我要告诉你们,很少有人能把文章写得象他那么优美、明确、扼要和有力。他的文体是亲历其事的人的文体,而不是文学家的文体。

穆拉维约夫的建议中使阿穆尔能够吸引人心的主要之点是自由,特别是宗教自由。穆拉维约夫具有革命的性格,作为专制者,他有时可以为了共同的幸福和共同的自由而牺牲个别人的幸福乃至个别人的意志。但是他无论出自本能或者由于信仰都极端反对任何压迫;他信奉人类的宗教、人民历史活动的宗教,一种被你们象抛弃其他一切宗教一样已经抛弃的宗教,但是他并不信奉别的宗教,他与其说是基督教徒,不如说是无神论者,在有关宗教和见解的方面他坚持和要求采取绝对的宽容态度。因此,他是分裂派教徒的头号朋友和庇护者,他反对各种僧侣的和世俗的压迫,他指望阿穆尔地区完全的信仰自由会把许多分裂派教徒吸引来,而分裂派教徒是西伯利亚最有用、最活动和最富有的人们。

关于阿穆尔就罗罗嗦嗦谈到这里。附上安东诺夫(波兰政治犯维贝尔)在《伊尔库茨克报》上发表的文章以供参考,这篇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是相当详细,情况熟悉;还有卡尔波夫(发表在《阿穆尔报》上)的文章,语气过于粗鲁,然而对于评价扎瓦里申还是有意思的;最后,还有一些关于阿穆尔河今年航运和贸易情况的铅印资料,同时我要指出,穆拉维约夫是绝对维护贸易自由以及其他一切自由的,他极力鼓励美国人以及所有外国人在阿穆尔的创举,这很不受西伯利亚商界的欢迎。一并送上一份新获得的边区的地图。

.....

译自《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莫斯科1935年俄文版第4卷第304—327页。

答 《钟 声》 (摘录)

1860年 12月 1日

.....

俄国的优秀人士之一，满怀真正民主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精神，为了尽可能地教化、开拓、改善和振兴托付给他的边区，不辞辛劳地干了十三年。他创造了奇迹，对习惯于用空话和幻想代替行动的、死气沉沉的俄国来说尤其是奇迹；他靠微不足道的经费，在得不到任何帮助和支持，几乎是和彼得堡顶撞的情况下，把一个巨大富饶的边区并入俄罗斯王国，使西伯利亚延伸到了太平洋，因而他是第一个认识西伯利亚的意义的人；他不辞劳苦，不顾健康，亲自到处奔走，总是亲自象苦工一样工作，他把全副身心献给了伟大而崇高的事业。他在十三年的时间内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最彻底的自我牺牲的榜样；他的全部意向、筹划和活动都以真正处置得当和朴实见称，都充满着高尚的公正精神和谋求公共福利的愿望。他为西伯利亚人民的权利奋斗了十三年，而且不无成效，他又是在大家知道的政治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力图使他们摆脱官僚行政、商人、矿厂和金矿的压迫，以及散发着恶臭的东正教的压迫。他在教化托付给他的边区方面取得了成功，他缓和并改善了各种关系，因此，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在俄国的任何一个省份里都不能象在东西伯利亚这样自由地活动和生活，在任何一个省城里都不能象在伊尔库茨克这样过着自由自在、轻松和有人性的生活。这一切都是穆拉维约夫-西伯利亚斯基的业绩。那末，难道自命为他的崇拜者竟是可耻的吗？在俄国这样一个好说空话和无所事事的国家里，

不崇拜事业,那又应当崇拜什么呢?在英国、法国,在西方各国,象穆拉维约夫这样的活动家早就会得到赞誉了,但是,我们,俄国的公众,是一些奴才,忌妒地仇视别人的长处,而以擅于辱骂一切作为自己的长处。俄国公众所以会这样,这是毫不足怪的,我们全都知道俄国公众的底细。但是,你们作为新俄国的福音传布者,作为俄罗斯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对于俄罗斯人的最优秀和最无私的朋友,怎么能不给予赞誉而横加诽谤呢?不了解情况不能作为给你们辩护的理由;既然你们说话如此响亮,如此激烈,在俄国如此有力量,你们就应该多多了解情况和准确地了解情况,否则你们的声音就将是卑鄙的和有害的。只有说明真相才能拯救俄国,而散布谎言,尤其是用如此响亮的声音散布谎言,则成为一种犯罪行为。

.....

译自《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莫斯科1935年俄文版第4卷第348—349页。

致亚·伊·赫尔岑（摘录）

1860年12月8日

.....

除了穆拉维约夫之外，我在这里还知道一个人，这就是青年将军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纳切夫。他是圣彼得堡总督的儿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赫尔岑，这位总督还是你的熟人。他刚从中国回来，他在那里创造了奇迹。在拥有军队的英法使节额尔金爵士和格罗男爵的心目中，他带着十九名哥萨克竟扮演了最辉煌的、第一流的角色，并为俄国赢得了最大的利益，赢得了比法国人和英国人本身所得的大得无法相比的利益。关于他所签订的条约^①你们会在报纸上看到，可是，有些东西你们是听不到的，这就是英国军队，特别是法国军队在中国的空前的残暴行为。前者大都满足于抢劫，他们主要是由印度雇佣兵组成的，后者则是清一色的法国人，他们在进入北京之前，沿途强奸妇女，强奸后就摧残她们，杀死她们，把她们的脚砍下来。俄罗斯的机敏和俄罗斯的纪律利用了这种情况，伊格纳切夫率领十九名哥萨克作为中国的救星出现，于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太平洋十分牢固地站稳了脚跟。……

.....

译自《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莫斯科1935年俄文版第4卷第364—365页。

① 指《中俄续增条约》又名《中俄北京条约》。——编者注

罗曼诺夫、普加乔夫 还是彼斯节里。人民事业^①（摘录）

· 编者按语 ·

1861年巴枯宁从西伯利亚脱逃，到达伦敦，在那里同赫尔岑建立了联系。他隐瞒了自己背叛革命的丑恶历史，以“革命英雄”自居。正当俄国革命派受到沙皇政府残酷迫害的时候，巴枯宁于1862年在《钟声》上发表了《罗曼诺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节里。人民事业》一文，无耻地吹捧沙皇，散布对沙皇的幻想，美化罗曼诺夫王朝。他吹捧亚历山大二世是“俄国的第一个农民的沙皇”，“整个斯拉夫世界的救主和首脑”，沙皇“可以不流一滴血就在俄国进行一次最伟大、最有益的革命”，“如果沙皇坚决而大胆地把人民运动领导起来，那他为俄罗斯造福和增光的威力就会不可限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把农民沙皇的封号赠与亚历山大二世是巴枯宁和《钟声》的一项发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94页）

为了巩固沙皇的反动统治，巴枯宁还为沙皇出谋划策，建议沙皇利用议会来欺骗人民，预防革命的爆发，说什么“如果沙皇现在（在1862年2月）召开国民议会”，“他就能够把自己的宝座竖立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更稳固”，并号召革命者团结在沙皇式的人民事业的旗帜

① 罗曼诺夫是沙皇的姓；普加乔夫是十八世纪一次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彼斯节里是十二月党人的领袖之一。——编者注

下。他向沙皇献媚说：“如果在决定整个俄国是生是死，是和平还是流血的问题的那个危急关头，在国民议会面前出现一个庶民的沙皇、善良的沙皇、正义的沙皇，他热爱俄国甚于自己，广泛信任人民的热爱，决心按照人民的意志来安排人民的生活，那末他对这样的人民就可以为所欲为！谁敢起来反对他？”这篇文章充分说明巴枯宁是沙皇的忠实奴才。但是，巴枯宁阿谀奉承的无耻行径，并没有得到沙皇的赏识，“**于是他没有其他出路，只好冒冒失失地投身到破坏一切的无政府状态中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0页）。

.....

许多人还在议论，俄国会不会发生革命，他们没有注意到，革命现在已经在俄国进行。它已经有条不紊地开始，广泛地渗入老朽垂死的国家和正在复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它支配着所有的人、一切地方和一切东西，它依靠政府的手来进行甚至比依靠革命信徒的努力来进行还要顺利。它在没有使俄罗斯世界得到新生以前，在没有建立和创造出一个新的斯拉夫世界以前，不会平静，不会停息。

王朝显然是在毁灭自己。它认为它想得救就要窒息而不是激发觉醒了的人民生活。这种生活如果被理解了的话，它会把沙皇王朝提高到前所未见的强大和光荣的高度……真遗憾！

这样庄严而美好的角色却很少落在沙皇王朝的身上。亚历山大二世可以很容易地成为受人民膜拜的偶像，成为俄国的第一个农民的沙皇，他的强大并不在于他使人惧怕他和使用卑鄙的暴力，而在于本国人民爱戴他，人民享有自由和过幸福的生活。依靠这种人民，他可能成为整个斯拉夫世界的救主和首脑。……为此只

需要有一个在宽容精神和坚持真理方面开阔而坚强的俄罗斯的心胸。整个俄罗斯的、而且整个斯拉夫族的生气勃勃的活动都要求他来驾驭，决心做他的历史威名的柱脚。……

……

他在俄国开头做得十分出色。他宣布给人民以自由，在经受了千年奴役以后给人民以自由和新生活。看来他是想建立庶民的俄罗斯，因为在彼得的国家中自由的人民是不可思议的。1861年2月19日，尽管关于解放农民的命令有一切失策之处、不足之处、荒谬的矛盾和同样妄诞的狭隘性，亚历山大二世终究是曾经统治过俄国的一位最伟大、最受爱戴、最强有力的沙皇。……

……

然而他，并且只有他一个人，本来可以不流一滴血就在俄国进行一次最伟大、最有益的革命。就是现在他还是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现在对和平的办法感到绝望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为时已晚，而是因为我们终于对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认识他能够挽救自己和俄国的唯一道路的能力感到绝望了。经过千年沉睡以后觉醒起来了的人民的运动是无法阻挡的。但是，如果沙皇坚决而大胆地把人民运动领导起来，那他为俄罗斯造福和增光的威力就会不可限量。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任何危险，肯定能够成功。

……也不要害怕由于实行区域的自治，各个省份之间的联系就会断绝，俄罗斯大地上的统一就会遭到破坏；要知道各省的自治将只是行政方面、内部立法方面、司法方面的自治，而不是政治方面的自治。没有一个国家，也许除法国以外，能够有俄国这样的人民当中的制度的统一、国家的完整和人民的尊严。……迄今只体现于沙皇一身的俄国的统一，现在还要求有另一个代表机关：国民议会。

……问题并不在于会不会发生革命，而在于革命的办法究竟

是和平的还是流血的？如果沙皇把人民的运动领导起来，同国民议会一起广泛而坚决地根据自由和地方自治的精神来着手改造俄国的话，革命的办法就将是和平的、美满的。但是，如果盲目的沙皇想要倒退或者只是采取不彻底的措施，……那末革命的办法就将是可怕的。那时，由于爆发全民起义，革命就将具有无情杀戮的性质……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现在承担着可怕的责任。他还能够挽救俄国免于彻底破产，免于流血。……

没有国民议会他将一事无成。只有国民议会能安抚俄国，恢复公共的和私人的信用，安排和保证分发土地，并使动荡的社会恢复平静和信心。……

可是，如果国民议会要和沙皇作对呢？——这难道可能吗？要知道，是人民将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国民议会，而人民直到现在都无限信仰沙皇，期望从沙皇那里得到一切。哪里会有作对的事呢？毫无疑问，如果沙皇现在召开国民议会，他就会第一次看到那些真正忠实于他的人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如果让混乱状态再继续几年，民心就可能改变。我们这个时代是瞬息万变的。但是，现在人民拥护沙皇，反对贵族，反对官僚，反对穿着德国衣服的一切人。对于人民说来，在这个官方俄国阵营中的一切人都是敌人，一切人都是，只有沙皇除外。谁敢叫人民反对沙皇呢？即使有人敢，难道人民会相信他吗？不是沙皇不顾贵族的意志，不顾官僚们的共同愿望，解放了农民吗？

……俄国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第一次将要直接会见自己的沙皇。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极关紧要的时刻！他们彼此将怎样感到满意呢？这次会见将关系着沙皇和俄国的整个未来。

……

……人民使者们对沙皇的信任和忠诚是无限的，——而如果沙皇依靠他们，对他们表示同样的信任和热爱并下决心自愿地让

人民得到目前已不再能阻止他们得到的东西，他就能把自己的宝座竖立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更稳固。但是，如果人民使者们见到的不是救命恩人沙皇、庶民的沙皇，而是一个穿着普鲁士制服的彼得堡皇帝、一个心胸狭窄的德国人，处在一大群同样的德国人的包围之中，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沙皇不是给人民以他们所期望的自由，而是什么也不给或者几乎什么也不给，只想用空话和不彻底的措施敷衍人民，那会怎么样呢？如果那样，沙皇制度就要遭殃。至少彼得堡的帝位，即德国人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帝位将要完蛋。……

如果在决定整个俄国是生是死、是和平还是流血的问题的那个危急关头，在国民议会面前出现一个庶民的沙皇、善良的沙皇、正义的沙皇，他热爱俄国甚于自己，广泛信任人民的热爱，决心按照人民的意志来安排人民的生活，那末他对这样的人民就可以为所欲为！谁敢起来反对他？和平、信仰，都将奇迹般地得到恢复，款项也有办法筹措，一切事情安排起来都会简单、自然，谁都不感到吃亏，谁都不感到拘束……这样的沙皇所领导的国民议会将会根据自由和广泛的原则，不引起动荡，不带来牺牲，甚至也不会加剧斗争和产生喧嚣，而建立一个新的俄罗斯；因为人民的意志和需要是清楚的，因为人民已形成了坚定而健康的智慧和未来组织的萌芽；因为任何恶毒的图谋和任何敌对的力量都无力反对沙皇和人民联合起来的威力。

……………

……俄国人民不是根据抽象原则来进行活动的；他们既不读外国的书也不读俄国的书，西方的理想对他们说来是格格不入的，保守派的、自由派的、甚至革命派的学理主义想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方针的一切企图都将是徒劳无功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想……他们将为历史提出新的原则，建立另一种文明，就是说要建立

立新的信仰、新的权利、新的生活。

在这个伟大、严肃、甚至严峻的人民面前，是不能轻率行事的。青年们将抛弃自荐的小学教师这个可笑的、令人讨厌的角色……我们能教些什么呢？要知道，如果把自然科学和数学撇在一边，我们的全部聪明睿智的最高成就就是对西方学说中的那些所谓确定不移的真理的否定、对西方的彻底否定。……

……………

《年轻的俄罗斯》的编辑们的传单不能看作是严肃地表达了先进青年的思想。几个勇敢的青年开了会，印了传单……这只能把我国可怜的统治者吓得死去活来。诚然，青年人在谈论“全国会议”和“秘密革命协会各省的委员会”。然而，这都是空口说白话，都是为了显得很神气，都是为了对过分敏感政府施加进一步的影响。我国青年绝大多数属于人民派，属于把人民事业的胜利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的那一派。这一派没有成见、既不拥护沙皇，也不反对沙皇，如果沙皇本人开始了伟大的事业，以后又不背叛人民，这一派就永远不会离开沙皇。

现在还不晚，只要他自己去领导人民，这批青年会很高兴地跟着他走。任何西方革命的成见都阻挡不了这批青年……

……………

如果沙皇认识到他今后不应该成为暴力集中制的首脑，而应该成为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邦的首脑，那末，依靠坚实的、复兴的力量，与波兰和乌克兰结成同盟，断绝一切可恨的德国人的同盟，大胆地举起全斯拉夫族的旗帜，他就会成为斯拉夫世界的救主！

……………

……实在说，讨伐德国人是一件很好的、而主要是必要的斯拉夫族事业，无论如何总比为了讨好德国人而扼杀波兰人要好。积极行动起来，把斯拉夫人从土耳其和德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将是

一件需要的、必要的事情，是解放了的俄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

我们的要求和希望如下：

……

第二条 我们希望人民的——即公社的、乡的、县的、区域的以及国家的自治，有沙皇还是没有沙皇，反正一样，看人民希望怎么样。但是，在俄国不要有官僚，要以自由的区域联邦来代替官僚主义的集中制。

……

第七条 我们将同一切斯拉夫部族一起，力求实现斯拉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立伟大的、自由的全斯拉夫族的联邦……以便有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全斯拉夫族的力量。

这就是斯拉夫族事业的广泛的纲领，这就是人民俄罗斯事业的最高成就。就是为这个事业，我们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现在我们将同谁在一起走，走到哪里去，跟着谁走呢？走到哪里去？——这我们已经谈过了。同谁在一起走呢？——这我们也谈过了：显然，不是同别人而是同人民在一起走。但是，跟着谁走呢？跟着罗曼诺夫走，跟着普加乔夫走，还是跟着彼斯节里走，如果发现了新的彼斯节里的话？

说实话：如果罗曼诺夫能够并且想从彼得堡的皇帝变成庶民的沙皇，我们最乐意跟着罗曼诺夫走。我们乐意站到他的旗帜下面，因为俄国人民还承认他，因为他的力量已经建立，可以立即用于事业，只要他对它进行人民的洗礼，它就能够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乐意跟着他走，还因为只有他能够进行并完成一场伟大的和平革命，而不流一滴俄罗斯人或斯拉夫人的血。由于人们的愚蠢，流血革命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它仍然是一种祸害、大祸害和很大的不幸，不仅对于革命的牺牲者说来是这样，而且对于干

净而彻底地达到革命所追求的目的说来也是这样。在法国革命中，我们看到了这种例子。

可见，我们对罗曼诺夫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是他的敌人，但也不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人民俄罗斯的、斯拉夫的事业的朋友。如果沙皇领导这个事业，我们就拥护他。但是，当他要反对这个事业的时候，我们就将是他的敌人。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他是想做俄国的沙皇、庶民的沙皇罗曼诺夫呢，还是想做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彼得堡皇帝？他是想为俄国、为斯拉夫人服务呢还是想为德国人服务？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那时我们将知道我们该做什么。……

.....

写于1862年。发表于1862年《钟声》。译自《巴枯宁选集》彼得堡—莫斯科1920年俄文版第3卷第76—77、77、78、79、80、81—82、84、86、86—87、87—88、88—90页。

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摘录)

· 编者按语 ·

1864年,第一国际宣告成立。巴枯宁在前往意大利进行活动时,口头上向马克思保证,愿在意大利为宣传国际的思想效力,实际上他到意大利后根本没有为国际工作,而是为自己罗致信徒,建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秘密组织《国际革命协会》。《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就是他为这个组织起草的纲领。

在这个文件中,巴枯宁第一次较系统地说明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他宣布这个协会的目的是“彻底消灭一切现存的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和机构”,“建立以自由、理智、正义和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胡说“人的理性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的良心是正义的基础,个人的自由和集体的自由是人类秩序的唯一创建者”。根据这种观点,他还提出了“无条件地排除任何权威原则和国家的必要性”、“彻底废除任何官方的宗教”、“废除阶级、等级、特权和任何差别”、“废除和消灭起监护统治作用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取消一切国立大学”、“废除国家法庭”等一系列荒谬论点。这个文件标志着巴枯宁主义的最终形成。

(一) 协会的目的

一、协会的目的，是要在世界上促使革命原则获得胜利，就是说，要彻底消灭一切现存的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和机构，并且首先在欧洲，然后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建立以自由、理智、正义和劳动为基础的社会。

这个事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所以，协会存在的时期是不确定的，只有在它赖以建立的原则在世界上获得胜利，从而取消了它存在的权利的时候，它才不再存在。

(二) 革命问答

一、否定现实的、存在于世界之外的人格化的神的存在，也否定任何启示和神对世界和人类事务的任何干预。消灭对神的信仰和迷信。

二、用对人的尊敬和爱去代替对神的迷信，我们宣布：

人的理性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的良心是正义的基础，

个人的自由和集体的自由是人类秩序的唯一创建者。

三、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无须求得任何人批准而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他们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决定，他们的行动只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也就是说，只直接对它们负责，然后是对他们所属的社会负责，而这仅仅是由于他们自由决定他们要属于那个社会。

四、认为一个公民的自由要以所有其余公民的自由为限度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一个人，只有他的自由得到所有其他人的自由良心的自由承认，在他身上得到确切反映和映现，在其他人的自由中得到批准并能无止境地扩大的时候，他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只有在同样自由的人中间才是真正自由的，并且因为他只有在自己的人的本质中才是自由的，所以世界上哪怕还有唯一的一个人在受奴役，都是对人性原则本身的破坏，都是对一切人的自由的否定。

五、因此，每一个人的自由只有在一切人平等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在法律和实际平等中的实现就是正义。

六、对于人们来说，只存在一个唯一的教条，一项唯一的法律，一个唯一的道德基础——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是一种义务；爱他，为他服务是一种美德。

七、无条件地排除任何权威原则和国家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在自己诞生的时候是一种自然的事实，它早于自由、早于人的思想的苏醒，只是在后来才成为一种按神的和人的权威原则组织起来的宗教的事实，今天人类社会应当在自由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形象，从今以后，自由应当成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唯一建立原则。社会秩序应当是得到了最高度发展的地方的、集体的和个人的自由的合力。

八、因此，社会生活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不应当象直到现在所做的那样，自上而下地、从中央到地方，按照统一和强迫集中化的原则来建立，而应当自下而上地、从地方到中央，按照自由协作社和联邦的原则来建立。

九、政治组织。为各民族的内部发展和政治组织确定一个具体的、普遍的和必须执行的规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个别民族的存在，都服从于许多不同的历史、地理和经济条件，而这些条件不允许确定一个同样适合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民族同样可以接受

的典范。采取这种完全丧失了任何实际益处的作法，会是对生活的丰富性和自然性的侵犯(生活是喜欢无限多样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同自由原则本身相冲突。但是，重大的、绝对的条件终究是存在的，没有这些条件，自由的实际实现和自由的组织会永远是不可能的。

这些条件如下：

1. 彻底废除任何官方的宗教和享受特权的、甚至仅仅是受国家保护、资助和支持的任何教会。每个人具有无条件的信仰自由和宣传自由，每个人可以为自己的神(不管它是什么神)建筑随便多少庙宇，养活自己宗教的牧师，不受任何限制。

2. 被看作是宗教团体的教会，不得享受授予生产合作社的任何一种权利。除了它们的房舍或祷告所以外，它们不能继承，不能具有属于公社的任何财产。它们绝对不能从事儿童教育，因为它们的唯一生活目的，就是不断否定道德和自由，玩弄诈财谋利的魔法。

3. 废除君主国。共和国。

4. 废除阶级、等级、特权和任何差别。男女在政治权利方面无条件平等。普选权。

5. 废除和消灭起监护统治作用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使它在政治、司法、官僚机构和财政方面破产；国家同教会是一对双生子，是教会的另一个“我”，从而是人民的贫困、钝化和受奴役的永久的源泉。作为一种自然后果，取消一切国立大学，完全由公社和自由合作社来关心社会教育；废除国家法庭，一切法官完全由人民选举；废除至今在欧洲实行的民法和刑法，因为它们都同样受到对上帝和国家的崇拜、对被宗教或政治神圣化了的家庭和财产的崇拜的支持，它们都是同全人类的权利相矛盾的，而自由的法典只能由自由本身来创造。取消银行和其他一切国家信贷机构。取消一切中

央管理机关、官僚机关、常备军和国家警察。

6. 由人民无媒介地和直接地选举一切社会、司法和民政职员以及一切民族的、省的和公社的代表或咨议员，也就是说，通过授予一切成年男女以选举权的办法来选举他们。

7. 对每个国家实行内部改组，给予个人、生产协作社和公社以无条件的自由，把这作为起点和基础。

8. 个人权利……(3) 每个成年人(男人或女人)的自由应当是充分的和无条件的；来往自由，大声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懒惰或勤劳的自由，做没有道德的人或有道德的人的自由，总而言之，可以自行支配自己和自己的财产，无须向任何人报告；依靠自己的劳动正直地生活或可耻地依靠别人的善心和个人信任而生活的自由，只要后者是自愿的和成年的；(4) 通过演说、报刊、在公共集会或私人集会上进行任何宣传的无限制的自由，这种自由，除了社会舆论的崇高的自然力量以外，不受别的任何约束；结社和协议的无条件的自由，其中包括那些按目的来讲将是不道德的或似乎不道德的社团和协议，甚至包括那些目的在于败坏和破坏个人和社会自由的社团和协议。……

9. 协作社的权利。工人合作社是历史上的一种新现象；我们现在处在它们正在产生的时候，我们现在仅仅可以预感到它们无疑将要获得的巨大发展和将从它们中间产生的新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但是我们不能更切近地确定它们。

可能，而且非常可能，有朝一日，它们要越过公社、省、甚至现代国家的界限，赐予整个人类社会一种新的制度，那时人类社会就将不再分为民族，而分为按照生产需要而不是按政治需要建立的各种不同的工业团体。这是未来的事情。至于我们，那末我们现在仅仅可以提出以下绝对的原则：所有的协作社，不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象所有的个人一样，应当享有无条件的自由。无论是社会，

无论是它的哪一部分：公社、省或者民族，都无权妨碍自由的人成立合作社，不管他为了什么目的——宗教目的、政治目的、科学目的、工业目的、艺术目的——，或者甚至为了互相腐蚀，为了剥削没有思想的人和愚蠢的人，但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即这些人必须是成年人。同骗子手和有危害性的合作社进行斗争，纯粹是社会舆论的事情。……

……………

14. 国际联邦将包括所有民族……设有国际议会、法院和领导委员会的各革命民族的国际联邦，自然将建立在革命自身的原则的基础上。这些原则在国际政策方面的运用如下：（1）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强弱）、每一个区、省或公社，都具有支配自己的命运、决定自己的存在、为自己选择愿意缔结的联盟、根据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联合和分离的绝对权利，而不必考虑所谓的历史权利和国家的政治、商业和战略要求。……（2）彻底废除所谓的历史权利和掠夺的可怕权利，因为它们是同自由的原则相矛盾的。（3）绝对否认扩大国家、使国家光荣和强大的政策……。（4）人民的光荣和伟大仅仅在于它的人性的发展；只有它的自由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它的强大、统一和内部生命力的比重的尺度。……（5）……消灭边界，废除护照和海关。……（6）……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是国际联邦的神圣原则。（7）参加联邦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有常备军，不应当有把兵士和公民分开的组织。常备军和征兵是国内破产、腐化、钝化和暴政的源泉，此外它们是对其他一切国家的福利和独立的威胁。每一个健康的公民，在需要时都应当成为保卫自己家园或自由的兵士。每一个国家的国防应当按照公社和省来组织，大致象美国和瑞士那样。……

十、社会组织。没有政治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自由，但是政治平等只有在经济和社会平等确立了的时候才是可能的。

.....

十一、这个问答的主要思想概述

1. 否认神。

2. 应当用对人类的尊敬来代替对神的迷信。人的理智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的良心是正义的基础,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是人类秩序的源泉和唯一基础。

3. 个人自由只能在一切人的平等中才能得到实现。自由在平等中的实现就是正义。

4. 无条件地排除权威原则和国家的必要性。自由应当是一切社会组织(不管是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的唯一建立原则。社会秩序应当是一切地方的、集体的和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综合结果。因此,一切政治和经济组织,整个说来,都不应象现在那样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按照统一的原则来组织,而应当自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按照自由联合和联邦的原则来组织。

5. 政治组织。取消受到国家保护和资助的任何官方教会。信仰和迷信绝对自由,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的神建造庙宇和为教会捐款的无限制的权利。宗教团体绝对自由,不过它们不应当享受任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能教育儿童。取消集中制的和起监护作用的国家并使它破产。每个人绝对自由,只承认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人享有政治权利,条件是他們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实行普选权,出版、宣传、言论和集会(不管是私人集会还是公共集会)无限制的自由。结社绝对自由,但是,只给那些目的和内部组织同社会的基本原则不矛盾的社团以法律承认。公社绝对自治,它享有自己管理和甚至颁布自己法律的权利,但是,既然这一公社愿意作为省的成员并享有省给予的保障,那末,它的法律就要符合作为省的制度基础的原则。省仅仅应当是公社的联邦。……民族仅仅应当是自愿属于民族的各个省的联邦;民族应当尊重每

一个省的自治，同时民族有权要求，一个省，如果它想属于联邦和愿意享受民族给予的保障，那末它的制度和单独立法，就应当在实质性的方面符合民族的制度和立法，以便在涉及各省的相互关系和民族的共同利益的事务上，每个省执行民族议会通过的和民族政府所通知给它的法令；同时，每个省应服从民族法院的决定，但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它有权向国际法院（如果它建立起来的话）上诉。如果拒绝服从上述法令或决定，省就被置于法律和民族团结之外，参加联邦的省中，如果有一个省遭到这个省的进攻，民族军队就给它以应有的制裁。

废除所谓的历史权利、掠夺权利，废除旨在整化和扩大国家版图、为国家争取荣誉和使它对外强大的任何政治。各民族的福利和自由是一致的，而每个民族应当在自由中寻找自己的力量。民族的独立是民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象每个人的独立是他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样；它之所以是神圣的，正是以这个事实为根据的，而不是以历史权利为根据的。某一个国家即使出于自愿同另外一个国家在许多世纪中联合在一起，也不应从这一事实得出结论：今后它即使不愿意联合了，也应当忍受；因为先辈没有权利剥夺这一代和后代的自由。因此，每一个民族、省和公社都将具有支配自己、结成联盟、断绝过去的和现在的联盟和加入新的联盟的绝对权利，别的任何方面都无权对此进行干涉。在这方面，任何暴力行动都应当受到整个民族联邦的一致反击，因为对一个国家的自由的侵犯，就是对一切民族的侮辱、威胁和间接侵犯。最后，各自由民族的国际联邦和革命团结，反对还受奴役的国家的反动联盟。

6. 社会组织。没有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不可思议的。在每个出生的人的起点的完全平等（完全平等之中包括抚养和教育手段的平等）以及以后在利用自然界赋予每个人的不同才能和力量方面的完全平等没有在社会中确立起来以前，经济平等和社会正

义是不可思议的。废除继承权。只有社会教育基金会有继承权，因为它负有抚养、监督、教育儿童(从他们诞生到成年)的责任。……

十二、革命政策。我们的基本信念是：既然所有民族的自由是一致的，那末各个国家的各别革命也应当是一致的；既然从今以后在欧洲和整个文明世界再也没有各别的革命了，而存在的仅仅是普遍革命，就象存在着唯一的欧洲的和世界的反动势力一样，因此，一切特殊利益，一切民族的自尊、贪求、渺小嫉妒心和仇视，现在都应当融解在一个普遍的、总的革命利益之中，这个革命将保证每个民族通过所有民族的团结一致获得自由和独立……

写于 1866 年。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
1928 年俄文版第 3 卷第 39—67 页。

国际革命协会的纲领(摘录)

· 编者按语 ·

这里选录的《国际革命协会的纲领》，是巴枯宁在意大利期间为他的秘密组织写的一个纲领草案，具体写作日期不详。

在这个纲领草案里，巴枯宁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扼要地阐述了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的谬论。巴枯宁不承认人类社会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胡说“社会团结是第一个人类法则，自由是社会的第二个法则。……它们构成人性的整个本质”，而人类历史则是从“动物性”向这种“人性”演变的过程。从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出发，他不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而胡说“国家是教会的小兄弟。国家不能提出任何现实的基础来替自己的存在辩护”，咒骂说“国家——任何国家，不管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是对人性的否定”。因此，他宣称，“工人为了自己的彻底经济解放，应当要求完全和彻底消灭国家及其一切机构。”

此外，他还在这个纲领草案里提出了“一切阶级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平等”的要求。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谬论，指出：“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94页）

第一部分 理论基础

一、否认神，否认人权和神权的原则，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任何监护，不管是对成年的但没有文化的人的监护，还是对无知群众的监护，不管这种监护是为了最高理性，还是为了科学真理，不管这种理性和真理是由一批公认的知识分子和有特权的人代表的，还是由这个或那个阶级代表的，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一种特殊的智慧贵族的形成，这种贵族是最可恶的，对自由是最有害的。

.....

二、否定意志自由，否定社会进行惩罚的权利，因为任何一个人，毫无例外，都无非是他所诞生、成长和生活的那个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人的不道德行为产生的基本原因有四个：（1）缺乏合理的卫生和合理的教育；（2）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不平等；（3）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这是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自然结果；（4）上述条件的必然结果——奴役。必须用根据自由和正义的要求对社会进行的教育和组织来代替惩罚。在社会革命后不可避免的或长或短的整个过渡时期内，社会为了保护自己不_{受那些不可救药的人（不是罪犯，但对社会是危险的人）}的侵害，除了剥夺对这些人的保证和支持之外，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任何惩罚，就是说，只把他们从这个社会中清除和开除出去。

三、否定意志自由绝不等于否定自由。相反地，自由是自然的和社会的必然性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和结果。

.....

四、社会团结是第一个人类法则，自由是社会的第二个法则。

这两个法则是互相补充的，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人性的整个本质。因此，自由不是对团结的否定，相反地，它是团结的发展，而且可以说是团结的人化。

五、自由不是人不受自然界和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的约束。自由——这首先是人依靠科学和合理劳动的帮助从外部自然世界的压迫下逐渐解放出来的能力；最后，自由，这是人支配自己本身和按照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来行动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同另外一个人，或者团体、阶级以至整个社会提出的专制性和统治性的要求相对抗的。

.....

六、每一个人都诞生在自然社会中，离开自然社会人就不能成为理智的和自由的生物；这个社会本身人化的程度，要以构成这个社会的一切人在个人方面和集体方面自由的程度而定。

.....

七、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只有依靠社会（人由于自然的和不可改变的规律而成为社会的一部分）的集体自由才能成为真正的和可能的。

注一：自由（就象人性一样，而且是人性的最纯粹的表现）不是历史的开始，相反地，是历史的完成。我们已经指出，人的社会是从动物性开始的。原始人和野蛮人很少意识到自己的人性和自己的人的自然权利，他们从互相吞食开始；不幸的是，现代的野蛮人直到现在仍然这样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上的第二个时期是奴隶制。我们现在生活在第三个时期，即经济剥削时代或者雇佣劳动制度。第四个时期（我们正在力求进入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我们正在接近这个时期）将是正义的时代，表现在平等和互相团结中的自由的时代。

八、原始人成为自由的人、人化和成为有道德的人、日益意识

到自己的本质程度，仅仅依他们开始承认其他人也有这种人的权利的程度而定。——因此，为了自己个人、自己的道德、自己的自由，每个人应当力求使一切人获得自由、道德和人性。

九、因此，对别人自由的尊重是每一个人的最高义务。爱这种自由和为它服务——这是唯一的美德。这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别的基础是不存在的。

十、因为自由是团结，即互利的结果和最高表现，所以它只有在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完全实现。政治平等只能建立在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平等来实现自由——这就是正义。

十一、由于劳动是一切珍贵的东西、有益的东西和社会财富的源泉，所以主要作为社会生物的人不能脱离劳动而生活。

十二、只有协作劳动能够支持巨大的和稍微文明一点的社会存在。一切作为文明的标志的东西只有通过这种协作劳动才能创造出来。人的劳动的无限生产率的秘密，首先在于利用或多或少在科学方面发达的理智（它本身也是前代和这一代的劳动活动的产品），其次在于劳动分工，但是要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对这种实行了分工的劳动实行联合或协作。

十三、历史上的一切不正义现象，一切战争，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特权，在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主要原因和自己的目的，即掠夺和剥削协作劳动，以利于比较强大的征服者民族、阶级或个人。这就是产生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的真正的历史原因，简要地说，就是产生所谓的私有的和继承的所有权的原因。

.....

我们的社会主义纲领

十八、工人要求和应当要求：

1. 一切阶级和生活在世界上的一切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平等。

2. 消灭继承的所有权。

3. 把土地发给农业合作社使用、把资本和一切生产工具交给工人工业合作社使用。

4. 消灭家庭里的父权，即丈夫和父亲的纯粹以继承的所有权为基础的专制权力，以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实行男女平等。

5. 所有两性儿童，在成年以前由社会供养和教育，并对一切儿童进行平等和义务教育的科学和工业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一切部门在内。

.....

鉴于儿童，尤其是年纪小的儿童，还不能完全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应当从社会中完全消灭的监护和权威的原则，仍将在教育儿童方面得到自然的运用。但是，这种权威和监护应当是真正人道的和理智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法学的残余的。权威和监护应当从这样一种论点出发：任何一个人，一生下来无好坏之分；善，即对自由的爱，对正义和团结的认识，对真理、理智和劳动的崇拜，或正确些说是尊敬和习惯，——这些品质只有通过合理的教育才能在人身上得到发展，而合理的教育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尊重理智、正义和自由为基础的。因此，这种权威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一切儿童爱好自由。权威的这种目的只

能这样来达到，即权威将逐渐使自身“化为乌有”，随着儿童逐渐接近成年，权威将让位于儿童的独立活动。

.....

十九、工人为了自己的彻底经济解放，应当要求完全和彻底消灭国家及其一切机构。

注一、国家是什么？这是神的和人的权力和监护原则的历史组织，这种权力和监护是为了某种宗教或者为了一个或数个所有者阶级的特权而对人民群众实行的，其目的在于损害成千上万的工人，残酷剥削他们的不自由的劳动。因此，以所有权和个人继承权为基础的掠夺是任何国家的基础。由所有者剥削人民群众的劳动，由教会以伪造的神的名义使这种剥削神圣化，而神甫则经常迫使神站在较强者和较狡猾者方面，——这就是权利。特权阶级的福利、舒适、奢侈以及文雅的和蜕化的思想的发展，是以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和无知为必要条件的，——这就是文明。保障所有这些历史的不正义现象的组织就是国家。

因此，工人应当希望破坏国家。

注二、国家必然是以剥削和奴役群众为基础的，它本身也就要压迫和蹂躏人民的任何自由和任何正义，它必然是粗暴的、凶恶的、掠夺的和趋向于征服的。国家——任何国家，不管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是对人性的否定。国家之所以是对人性的否定，是因为它把自己公民的爱国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的和绝对的目的，它根据自己的本质，把自我保护的利益，把自己在内部的强大和对外使用强力的利益放在高于世界上的一切的地位，——国家既否定自己臣民的个人利益和人的权利，也否定异国人民的权利，从而破坏各国人民之间和人们之间的世界团结，把各国人民和人们置于正义和人性之外。

注三、国家是教会的小兄弟。国家不能提出任何现实的基础

来替自己的存在辩护，除了某种神学思想和形而上学思想之外。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违反人类正义的，它不可避免地要以神学或形而上学的虚构为基础。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没有民族或社会的概念，因为社会完全被国家吞没和奴役，而每一个国家都以某一个神或一整批神为名提出自己存在和进行统治的基础和权利，这些神被看作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特定的保护者。在古代世界，人是默默无闻的，人类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有的仅仅是公民。在文明的这一阶段，奴役之所以成为一种自然现象和公民自由的必要基础，其原因就在于此。

当基督教破坏了崇拜偶像的多神制，宣布了一神制的时候，国家便不得不诉诸基督教天堂的圣者，每一个基督教国家都有一个或几个圣者在上帝面前庇护和保护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可能不止一次地陷于极其困难的处境。此外，每一个国家直到现在还认为有必要声明，上帝特别和专门地保护着它。

关于权利的形而上学和关于权利的科学，在理论上是以抽象的普遍观念为基础的，在实践上是以有产者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这种形而上学和科学，也在寻找替国家的存在辩护的唯一理论的基础。——为此目的，它们杜撰普遍默契，或者诉诸社会契约说，或者伪造客观正义和所谓的由国家实现的普遍人民福利。根据民主主义者—雅各宾党人的看法，国家的任务是促进一切公民的普遍的和集体的利益对个别的人、公社和地区的利益的胜利。在他们看来，国家就是用以战胜个别的人的利己主义和局限性的普遍正义和集体理智。因此，国家以自己的存在似乎断定，个人是不理智的，是不能组织社会生活的，是无力超越自己的私人利益的。于是国家便以所谓的一切人的自由（集体的自由和普遍的自由）的名义来进行帮助，而实际上，国家只是一种压迫的抽象，是从对单个人的权利的否定和限制中引伸出来的，是以对每个人的实际奴役为基

础的。但是,任何抽象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取决于实体的人同它的肯定利害关系对它支持的程度;从这方面讲,“国家”这个抽象确实代表着被称作有知识者的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非常肯定的利害关系,因为我们看到,人们为了这个抽象而不断牺牲被奴役的群众的利益和自由,以利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

注四、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和政治的与国家的欲望^①……

写作日期不详。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
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119—133页。

^①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在和平和自由同盟^①

1867年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 编者按语 ·

1867年,巴枯宁从意大利到瑞士,加入同国际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和和平和自由同盟。同年9月被选入该同盟的领导委员会。巴枯宁企图把这个组织变成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工具。他在和平和自由同盟1867年代表大会上竭力鼓吹消灭集权国家、建立“自由的绝对王国”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他否认国家的阶级性,不分皂白地反对一切国家,说什么“任何集权国家”“都必然是人民和工人群众的压迫者、剥削者”,主张瓦解一切国家,在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自由的统一体”。巴枯宁的这种主张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国家,反对建立无产阶级国家。

.....

我们在这里都是和平的朋友,我们召集代表大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讨论和平问题。但是,在我们中间是否能找到很多这样幼稚的人,他认为自己有力量使人类免除正在准备的可怕的世界战争呢?不,我们之中谁也不会这样自欺自慰。我们在这里聚会并不是为了做显然是力所不及的事情,而是为了共同寻找维护国际和

^①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编者注

平的条件。究竟应该把什么原则作为我们事业的基础呢？

正是现在，当缺乏原则的情况使得智力衰退，性格软弱，并且成为一切反动势力和一切专制制度的支柱的时候，一定要宣布这些原则，即正义和自由的真正原则。如果我们真正要求各民族之间的和平，我们就应当要求国际正义。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超越于狭隘的、渺小的爱国主义之上；对于这种爱国主义来说，自己的国家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伟大就在于让邻国恐惧。我们应当把人类的、全世界的正义放在一切民族利益之上。我们应当一劳永逸地抛弃法国、俄国和普鲁士的暴君们最近为了最有效地压倒自由的最高原则而发明的虚伪的民族原则。民族不是原则；它就象个人一样，是法定事实。任何民族，不管大小，无疑都有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的权利。这个权利完全是从自由的普遍原则得出的结论。

任何一个真正希望和平和国际合作的人，都应当永远拒绝祖国的所谓荣誉、雄强和伟大，拒绝爱国主义的一切自私自利的和爱好虚荣的利益。现在是要求建立内部和外部自由的绝对王国的时候了。我们委员会的纲领建议我们讨论欧洲联邦组织的原则。但是，这种组织在存在着现行国家的情况下是否可能？……一般说来，除了瑞士以外，欧洲现在到处存在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和军事国家结成联邦是可以想象的吗？

任何集权的国家，不管它是多么自由主义的，哪怕具有共和主义的形式，都必然是人民和工人群众的压迫者、剥削者，都是为特权阶级谋利益的。它需要军队来压制群众，而这种武装力量的存在必然把它推向战争。我由此得出结论，只要下述原则及其所产生的一切结果不被接受，国际和平就是不可能的，这个原则就是：任何民族、不管是弱的还是强的、人少的还是人多的，任何省、任何公社，都有获得自由和自治的绝对权利，都有按照自己的利益、自

己的局部要求来生活和管理的绝对权利,在这种权利方面,一切公社、一切民族的一致性达到这样程度,以致破坏一个公社、一个民族的这种权利,就必然使其他公社、民族的这种权利受到威胁。

只要现今的集权的国家还存在,普遍和平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当希望它瓦解,以便在这些自上而下地用专制和掠夺组织起来的统一体的废墟上,建立起自由的统一体,这种自由的统一体应当自下而上地组织,由公社自由联合成省,省联合成民族,民族联合成欧洲联邦。

写于1867年。译自《巴枯宁选集》彼得堡—莫斯科1920年俄文版第3卷第101—102页。

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主义(摘录)

(给和平和自由同盟中央委员会
的说明理由的建议)

· 编者按语 ·

巴枯宁为了充当资产阶级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理论家,于1867—1868年间写了《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主义》一书,作为他向和平和自由同盟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这本书集中表现了巴枯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他从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治的理论出发,把联邦主义奉为“救世”的原则,宣称要用“伟大的、救世的联邦主义原则去对抗军事的、官僚的、专制的、君主立宪的,甚至共和的国家的这种怪诞的、压迫性的集中制”,“对一切称为国家的光荣、伟大和强大的东西进行残酷的战争”,鼓吹由各民族联合成为“全世界的合众国的自由联邦”,从而实现“建立在劳动、正义和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全世界幸福生活的理想”。他把北美合众国看作是联邦主义原则的光辉典范,这最清楚地暴露了巴枯宁反对一切国家观点的虚伪性、矛盾性和反动性。“合众国的自由联邦”仍然是一种国家,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的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这种“自由联邦”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6页)巴枯宁看

作典范的北美合众国就是一个地道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此，巴枯宁口头上说要反对一切国家、反对任何集中制，实质上他仅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推崇资产阶级专政。

其次，他用“自由”、“平等”、“正义”等资产阶级观点来冒充社会主义，说什么“社会主义就是正义”，而“正义”的实质就是“平等”；鼓吹建立“以单纯的人的正义为基础，以实证科学和最充分自由为基础”的社会，胡说社会主义者“主张公开的人的利己主义；他坦率地、毫无空话地为他自己本身而活着”。这说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最后，他根本不懂国家产生的阶级根源，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而用宗教意识来说明国家的起源。胡说宗教意识“在自然的社会中创造国家”，“国家是通过神的万能威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建立起来的”，“任何国家都是地上的教会”，认为国家是对“个人自由的否定的总和”，是“对人类的最可恨、最无耻、最彻底的否定”，是“对人性的可恨的否定”，无非是“系统化了的统治和剥削”，这说明巴枯宁是个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者。

先生们！

今天使我们感到关切的事情，就是以上届管理委员会所提出并经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原则为基础，组织和彻底巩固和平和自由同盟。从那时以来，这些原则就是我们的宪章，就是我们以后全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础。我们再也没有权利舍弃这些原则的哪怕是最小的部分；我们可以而且甚至必须发展它们。

.....

先生们，为了拯救欧洲的自由与和平，我们应该用伟大的、救世的联邦主义原则去对抗各种军事的、官僚的、专制的、君主立宪的，甚至共和的国家的这种怪诞的、压迫性的集中制，这不是很明显的吗？联邦主义原则的光辉表现已经由北美合众国的最近事件向我们显示出来了。今后，一切真正希望解放欧洲的人应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在保持自己对法国革命所宣布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全部同情的同时，必须抛弃法国革命的国家政策，并且坚决地接受北美洲人的自由政策。

（一）联邦主义

我们感到幸福的是能够宣布，日内瓦代表大会一致欢迎这个原则。瑞士本身毫无保留地赞成这一原则，并且非常广泛地接受了这一原则和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顺便说说，它正在十分成功地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实践。可惜的是，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这个原则表述得很不好，甚至只在讲到我们应该建立的同盟，接着是讲到我们应该创办一家名为《欧洲合众国》的杂志时，间接地提了一下。可是我们认为，这个原则应该在我们的原则声明中占首要地位。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痛心的缺陷，我们应该赶紧加以弥补。为了适应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一致决定，我们应该宣告：

一、为了使自由、正义与和平在欧洲的国际关系中获得胜利，为了使构成欧洲大家庭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内战不可能发生，只有一个办法：成立欧洲合众国。

二、欧洲的各州永远不能由目前形式的各个国家构成，因为它们的力量相互关系之间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三、寿终正寝的德意志联邦的例子无可争辩地证明，各君主国的联邦是一个笑柄，它无力为居民保证和平与自由。

四、任何一个集中的，官僚的因而也是军事的国家，即使它叫做共和国，都将不可能郑重地、真诚地参加国际联邦。这种国家的宪法永远都将是对国内自由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否定，根据这样的宪法，这种国家就必然要经常号召发动战争，就必然要成为对邻近各国的存在的经常威胁。任何集中制的国家本质上都是建立在上述的暴力行为、征服行为或者私人生活中称为破门入盗的行为——为教会（无论属于哪种宗教）所赞许的、为时间所神圣化了的并且因而变成了历史权利的行为——之上的，它依靠神对胜利的暴力的这种神圣化，就象依靠一种特殊的最高的权利一样，从而它就认为自己是其他一切国家的权利的绝对否定，除非为了政治利益，或者由于软弱，否则在同这些国家签订的条约中就不承认它们。

五、因此，同盟的所有信徒应该尽一切努力去改造自己的祖国，以便在自己的祖国中用新的组织去代替以暴力和权力原则为基础从上面建立起来的旧的组织，而新的组织除了需要的利益和居民的天然爱好以外没有别的基础，除了个人联合成为公社，公社联合成为省，省联合成为民族，最后各民族联合成为起初是欧洲的后来是全世界的合众国的自由联邦以外，没有别的原则。

六、因此，要最彻底地消灭一切称为国家的历史权利的东西；关于自然的、政治的、战略的、贸易的边界的问题，今后应该认为是属于古代史的问题，同盟的所有信徒应该坚决予以抛弃。

七、承认任何民族，大的或小的，任何人民，弱的或强的，任何省分，任何公社都有完全自治的绝对权利，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上面列举的单位之一的内部结构不能成为对邻近土地的自治和自由的威胁和危险。

八、如果某一个地区构成某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即使这个地区是自愿并入这个国家的，这种情况并不构成它必须永远保持同这个国家不可分离的任何义务。任何永恒的义务都是我们唯一能够重视的人的正义所不能容许的，除了以自由为基础的权利和义务以外，我们永远不承认别的权利或者别的义务。自由联合以及自由分离的权利，是一切政治权利中第一的和最重要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联邦永远都只是隐蔽的集中制。

九、从上述可以得出结论，同盟应该公开禁止欧洲民主派的这个或那个民族派别同君主制国家结成任何联盟，即使这种联盟的目的是要使被压迫的地区恢复独立或自由；——因为这种只能导致失望的联盟同时可能会成为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十、相反地，正因为同盟是和平同盟，因为它深信，除非在各族人民的最紧密和完全的团结的基础上，在正义和自由的原则上，否则和平就不可能赢得和建立起来，所以它应该大声地宣布，它同情反对任何外国的和国内的压迫的一切人民起义，只要这种起义是为了我们的原则，为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不是抱着想建立强大国家的爱好权力的意图。

十一、同盟将对一切称为国家的光荣、伟大和强大的东西进行残酷的战争。我们将用表现在科学中的人的理智的光荣和建立在劳动、正义和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全世界幸福生活的理想，来对抗这一切虚伪的、有害的偶像。

十二、同盟承认民族性是具有存在和自由发展的不可争辩的权利的自然事实，但不是原则，——因为任何原则都应该具有普遍性，而民族性却相反，它只是个别的、特殊的事实。法国、俄国和普鲁士的政府，甚至许多德国、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爱国者今天提出的那种所谓民族性原则，只不过是同革命精神相对立的反动的产儿；这在本质上是一个高度贵族性的原则，它竟达到了鄙视

不识字的居民的民间口语的程度，按其本质来说，它否认省的自由和公社的实际自治，在一切国家中支持它的并不是人民群众，因为它为了所谓的公共福利总是牺牲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而所谓的公共福利事实上只不过是各特权阶级的福利；——这个原则除表现了各国的臭名昭著的历史权利和权力欲以外，没有表现任何别的东西。因此，民族性的权利永远被同盟看作只是从最高的自由原则产生的自然结果，而民族权利只要是为了反对自由，甚至只要在自由之外提出来的时候，就不再被认为是这种权利了。

十三、统一是人类不可抗拒地竭力追求的目的。但是，当统一力求离开自由，通过暴力或者通过某种神学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的或者甚至经济的思想的权威来形成的时候，它就变成致命的东西，变成个人和人民的教育、尊严和繁荣的破坏者。离开自由去追求统一的爱国主义是坏的爱国主义。它对于它想提高和造福的那个国度的真正的人民的利益总是十分有害的，而不管意愿如何，却常常对反动派是友好，对革命，即对人民和人的解放是敌视的。同盟能够承认的只有一种统一：通过由各个自治的部分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联邦自由地形成的那种统一，以致这种整体将不再成为对私人的权利和利益的否定，不再成为强制地埋葬一切地方福祉的坟墓，相反地，它将成为这一切自治和福祉的证实和源泉。因此，同盟将强有力地攻击没有整个地渗透着这种伟大的自由原则的任何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组织；没有自由原则就没有文明、正义、幸福生活、人性。

先生们，按照我们的并且毫无疑问也是你们的看法，这就是日内瓦代表大会所大声地宣布的伟大的联邦主义原则的必然后果和发展。这就是和平与自由的必要条件。

.....

自从法国大革命把自己的福音书，不是神秘的而是合理的、不是上苍的而是人世的，不是神的而是人的——把人权的福音书赐予群众以来；自从这个革命宣告了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同样具有自由和人性的天赋以来，——欧洲的、整个文明世界的人民群众就逐渐从基督教用自己的罂粟花使他们入睡以后一直束缚着他们的迷梦中苏醒过来，开始问自己，他们是否也具有平等、自由和做人的权利。

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受自己惊人的健全理智以及自己的本能指导的人民，便到处懂得了，他们的真正解放，或者——如果你们允许我用这个词的话——他们的人化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对他们的经济条件进行根本的改造。对于他们说来，面包问题理所当然地是首要的问题，因为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人为了思想，为了自由地感觉，为了成为人，就应该摆脱物质生活的操劳。——而且，资产者们尽管高喊反对人民的唯物主义并对人民宣传唯心主义的节制，他们对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是用言语来宣扬，而不是用榜样来宣扬。——对于人民说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工作以后的闲暇，这是人性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们要得到面包和闲暇，就必须对现代社会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这就说明，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作为它自己的原则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产生了社会主义。

（二）社会主义

法国大革命在宣布了每一个人都享有成为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后，在自己最后的结论中走向了巴贝夫主义。巴贝夫是为大革命所创造而后来又全部为大革命所扼杀的最后一批有毅力的、纯洁的公民之一，他有幸能把象那纳罗蒂这样的人物也算作自己的

朋友，他在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中把古代世界的政治传统同完全是现代的社会革命思想结合在一起了。他一方面看到，由于缺少根本改造，而且在当时根据社会经济结构来说，大概也不可能进行这种改造，大革命正在衰落；另一方面，他又忠实于这个最后以国家的万能行动代替了任何个人的首倡精神的大革命的精神，因此，他就虚构了一种政治和社会体系，按照这一体系，共和国是公民的集体意志的表现，它应该没收任何个人的财产，用这些财产来为一切人谋利益，平均分配给每个人以教育、学习、生存手段、享乐，强迫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按照每个人的力量和才能的大小参加肌肉的和神经的劳动。巴贝夫的密谋未获成功，他同几个朋友一起被斩首。但是，他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并没有和他一道死亡。他的朋友，本世纪最大的密谋家邦纳罗蒂所接受过来的思想，被后者作为神圣的保证传授给了后代，由于邦纳罗蒂在比利时和法国所建立的那些秘密团体，共产主义的思想在人民的想象中生了芽。——在1830年至1848年间，卡贝和路易·勃朗天才地体现了这些思想，终于创立了革命的社会主义。

.....

我们已经谈到，社会主义是大革命的最后的产儿，但是，在这个最后的产儿诞生以前，革命已经生下了自己的更直接的继承人，自己的长子，罗伯斯比尔们和圣茹斯特们的宠儿：不掺杂社会主义思想，从古代世界中搬来，并为希腊和罗马的伟大公民们的英雄的传统所鼓舞的纯粹的共和主义。这种共和主义比社会主义要合乎人道得多，它几乎不考虑到人，而只承认公民；社会主义力求建立人的共和国，而共和主义只想建立公民的共和国，纵然公民，——象在作为1793年宪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因为1793年宪法在片刻的动摇以后就自觉地对社会问题默不作声了）的那些宪法之下的情况那样，——作为积极公民（我们借用制宪议会的说

法)应该把自己的舒适安逸建立在剥削消极公民的劳动上。可是,政治共和主义者至少在思想上并不是只为个人的利己主义者,但是,他应该成为为了祖国的利己主义者,他在自己自由的心中应该把祖国看得高于自己,高于世界上的一切个人、一切民族,高于人类本身。因此,他永远也不会懂得国际正义;在一切争端中,无论他的祖国对不对,他都将站到祖国一边,他将希望他的祖国能永远占上风,能用自己的威力和光荣去压制其他各族人民。在这个斜坡上滑下去,他就将成为侵略者,——虽然世世代代的经验向他表明,军事上的胜利命定地将导致凯撒主义。共和社会主义者仇恨国家的尊严、威力和军事荣誉,他情愿不要这些东西而要自由和幸福生活。作为对内政策上的联邦主义者,他也力求实现国际联邦,第一是为了正义的胜利,第二是因为只有依靠一切人或者至少是构成文明世界的大多数民族的团结一致的活动,越过人为的、极为有害的国界,经济的和社会的革命才能实现,而且因为所有的人迟早总要在它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纯粹政治共和主义者是斯多噶派;他不承认权利,只承认义务,或者象在马志尼的共和国里一样,只承认一种权利:成为忘我的人并为了祖国而牺牲自己,活着只是为了服务于祖国并高兴地为它而死去的权利,正如亚历山大·仲马硬加在吉伦特党人身上的那首歌曲中所说的:“为祖国而死,这是最壮丽、最令人羡慕的命运”。相反地,社会主义者却依靠自己对生活,对一切精神的、道德的和物质的生活享受的肯定权利。他热爱生活,他希望充分地利用生活。由于他的信念构成他本身的一部分,并且它对社会的义务是同他的权利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所以为了保持对两者的忠实,他将善于象蒲鲁东那样按照正义而活着,而在需要的时候则象巴贝夫那样死去;但是,他永远不会说,人类的生命应该成为牺牲品,死亡是最甜蜜的命运。对于政治共和主义者说来,自由只不过是空洞的声音;这是成为

自愿的奴隶，成为国家的忠实牺牲品的自由；由于政治共和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自由，所以他也很容易就牺牲别人的自由。因此，政治共和主义必然要导致专制主义。对于共和社会主义者说来，同幸福生活相联系的、通过每个人的人性创造普遍的人性的自由，就是一切，而国家只是所有人和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和自由的工具、仆人。社会主义者不同于资产者的是正义，因为他为自己要求的只是自己工作的实际果实；而他不同于政治共和主义者的是他主张公开的人的利己主义；他坦率地、毫无空话地为他自己本身而活着。他知道，他根据正义而这样做，就是为整个社会服务，而为整个社会服务也就是为他自己本身服务。共和主义者是严峻的，并且常常由于爱国主义——正如神甫由于宗教一样——也是残酷的。社会主义者是自然的，具有温和的爱国心，但是因此却永远是很合乎人性的。——一句话，在共和社会主义者和政治共和主义者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一个作为半宗教性的生物，属于过去；另一个作为实证论者或无神论者，未来是属于他的。

.....

在法国以及德国，社会主义通过私人经济协作社默不作声地在前进，它在工人阶级中已经达到了这样大的威力，以致拿破仑第三和俾斯麦伯爵都开始寻求同它结成同盟了……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不久以后，在其他一切政党遭到悲惨的失败以后，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可怕的经济状况，任何其他问题都将在经济和社会问题面前消失。——而在俄国和波兰是否有本质上不同的问题呢？就是这个问题打破了旧的、历史的、贵族的波兰的最后希望；——就是这个问题威胁着并且不久就会消灭这个可怕的全俄罗斯帝国的已经摇摇欲坠的存在。甚至在美国，社会主义不是也充分表现在有名人物、波士顿的参议员查理士·萧姆纳尔先生提出的把土地分

给南部各州已经解放了的黑人的建议中吗？

先生们，你们可以看到，虽然有六月的失败，社会主义还是到处都表现出来。它通过秘密工作逐渐潜入到一切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核心中去了，到处都使人认识到它是时代的隐蔽的力量。再过几年，它就将作为公开的、万能的力量出现。

除了少数例外，欧洲所有各民族人民，尽管其中许多不知道社会主义这个词，现在却充满了社会主义精神，除了向他们宣告的他们的经济解放是首要的旗帜以外，他们不知道其他的旗帜，他们千倍地愿意放弃任何其他问题，但是不愿放弃这个问题。因此，只有用社会主义才能吸引他们参加政治活动，从事好的政治。

先生们，难道以上所说还不足以证明，我们决不可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社会主义，不提社会主义就会给我们的整个事业打上软弱无力的烙印吗？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宣布了自己是共和联邦主义者，从而就充分表现出自己是革命者，足以摆脱大部分资产阶级：一切利用人民的贫困和不幸来进行投机、千方百计地设法甚至要从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厉害地落到人民头上的巨大灾祸中谋取好处的人。如果我们把这一部分积极的、好动的、搞阴谋的、搞投机的资产阶级撇在一边，那末在我们这里还将剩下大多数安静的、爱劳动的资产者，他们有时也做坏事，但与其说是出于自愿和爱好，不如说是由于必要性，他们希望摆脱这种命定的必要性比希望什么都强烈，因为这种必要性使他们处于同劳动人民经常敌对的关系中，同时又使他们自己遭到破产。不能不指出，现在，小资产阶级，小工业、小商业也开始几乎象工人群众一样贫困了，如果情况这样一直发展下去的话，那末资产阶级中相当大的这个多数大概在经济方面就会同无产阶级溶合在一起。大商业、大工业，特别是卑鄙无耻的大投机活动就会压迫他们、吞食他们，把他们推进深渊。可见，小资产阶级的状况正变得愈来愈革命，他们的思想很久

很久以来都是反动的，现在由于可怕的教训，也开始明朗化了，并且必然要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最聪明的人开始认识到，对于保持了诚实品德的资产阶级来说，除了同人民结成同盟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解救的办法，资产阶级对于社会问题关心的程度不下于来自人民那一方面的关心。

在欧洲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中的这种逐渐的变化，是既令人欣慰而又不可辩驳的事实。但是，不要弄糊涂了：新的运动的首倡权将属于人民，而不属于小资产阶级；在西方，是属于工厂和城市的工人；在我们这里，在俄国、波兰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则属于农民。小资产阶级变得太怯懦、不坚决和爱怀疑了，以致不能倡导任何事情；它让别人带着自己走，而自己却不能带着任何人走，因为它既缺乏信心和热情，又缺乏思想。能打破障碍并创造新世界的那种热情，唯有人民才具有。所以，无可辩驳，新的运动的首倡权将属于人民。我们能闭口不谈人民吗？我们能闭口不谈作为人民的新宗教的社会主义吗？

但是，有人会对我们说，社会主义表现了同凯撒主义结成联盟的倾向。首先，这是诬蔑；相反地，正是凯撒主义一看见地平线上出现了社会主义这个可怕的力量，就力图取得它的好感，以便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利。当然，这一联盟的结果将是能够威胁世界自由的最大的不幸，但是，这难道不是我们要加紧努力来防止这个极其可怕的联盟的又一个理由吗？

我们应该表示拥护社会主义，甚至根本不考虑这些实际的理由，因为社会主义就是正义。当我们谈到正义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并不是包含在法典和罗马法中的那种正义，罗马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用强力实行的、被时间和某个基督教或多神教的教会的祝福仪式加以神圣化了的暴力事实为基础的，这些暴力事实本身被认为是绝对的原则，从这些原则中用演绎法便引出了全部的

法^①，——我们谈的正义完全是以人们的良心作为基础的，这种正义你们可以在每个人的意识中，甚至在儿童的意识中找到，它的实质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达：平等。

这种全世界的正义应该成为新世界的基础，但是，由于暴力的侵略和宗教的影响，它无论在政治界、法律界、经济界却还从来没有占居过优势。没有这种正义，就不可能有自由、共和国、幸福生活、和平。这种正义在我们的一切决定中都应该占居首位，以便我们能够积极地促进和平的确立。

这种正义命令我们负责维护迄今为止遭到如此残酷践踏的人民利益，不仅为人民要求政治自由，而且要求经济和社会解放。

先生们，我们并不是向你们提出这种或那种社会主义体系。我们只是要求你们重新宣布法国大革命的这个伟大原则：每个人都应该有发展自己全部人性的物质和精神手段。我们认为，这个原则产生了如下的任务：

要这样组织社会：每一个个人，无论男人或女人，一出世就能找到几乎同样的手段来发展自己各种才能并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利用这些才能。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任何个人，无论他是谁，都不能剥削别人的劳动，他只有直接促进社会财富的生产，才能参加使用社会财富，因为社会财富实质上无非是人的劳动的产品。

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当然是百年大业。但是，历史提出了这个问题，今后我们要是不想使自己注定变得完全软弱无力的话，就不能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

我们要立即补充一句，我们坚决拒绝想建立那种同个人和协

^① 在这方面法学与神学是完全相同的；同样地，这两门科学，一门是以现实的但与正义不相符合的事实——用强力攫为己有，以征服为出发点的；另一门是以虚构的、荒谬的事实——作为最高原则的神的启示为出发点的。由于建立在这种荒谬性和这种非正义性之上，这两门科学就采用了最严格的逻辑，以便建立一方面是法律的，另一方面是神学的体系。——作者注

作社的最充分的自由格格不入的、要求建立无论什么性质的发号施令的权力的组织的任何企图。我们只承认自由是任何经济的和政治的组织的唯一基础，唯一合法的创造性的原则，为了自由，我们将永远对一切哪怕是有一点类似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东西提出抗议。

我们认为，国家所能做并且应该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逐渐改变继承权的形式，以便尽快地达到彻底消灭继承权。由于继承权完全是国家的产物，是强制性的、由神建立的国家存在本身的重要条件之一，它就可能并且应该在国家中为自由所消灭；换句话说，国家应该溶化于在正义原则上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我们认为，继承权一定要加以消灭，因为只要遗产还存在，就将存在世袭的经济上的不平等，不是自然的个人的不平等，而是人为的阶级的不平等，——而后者必然要不断产生在智力的发展和形成方面的世袭的不平等，而且将继续成为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不平等的根源并使这种不平等神圣化。正义的任务就是为每个人确立平等，因为这种平等将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每个人确立生存起点上的平等，使得受自己的本性支配的每个人都成为他自己的事业的儿子。我们认为，死者的唯一继承者应该是用于教育男女儿童的社会基金，其中包括他们从出生到成年的生活费用。作为斯拉夫人和俄罗斯人，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在我们这里，以居民的普遍的和传统的本能为基础的基本社会思想是，土地——全体人民的财产——只能为亲手耕种的人所占有。

先生们，我们坚信，这个原则是合乎正义的，它是任何郑重的社会改革的极其重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条件，因此西欧也一定要承认并接受这个原则，虽然在有些国家要实现这一原则还有困难。例如，在法国大多数农民已经享有地产，但由于现在在法国占优势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是土地被分散成小块，很快这些农民

有很大一部分将几乎不再享有任何东西了。不过，我们不必提出任何关于土地问题的建议，正如我们一般不必提出任何涉及这个或那个科学问题或政治社会问题的建议一样，我们坚信，所有这些问题应该在我们的报纸上进行认真而深入的讨论。——今天我们只是向你们提议作如下的声明：

“同盟坚信，只要绝大多数人在一切福利方面仍然是备受苦难，仍然是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被判定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即使不是法律上也是实际上处于奴隶地位，由于贫困和必要性而不能休息和不能喘一口气地工作，虽然生产着成为现在世界的骄傲的一切财富，但是只能得到这些财富中的很小一部分，几乎不足以保证明天的面包，那末，在世界上认真地实现自由、正义与和平就是不可能的；

同盟坚信，对于在几百年来受着如此可怕的剥削的全体居民说来，面包问题就是智力解放、自由和人性的问题；

同盟坚信，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是特权和非正义，而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就会成为奴隶制；

因此，同盟大声地宣布，必须对社会进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的改造，这种改造将导致把人民的劳动从资本和私有者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它将以最严格的正义，但是不是以法律的、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正义，而是以单纯的人的正义为基础，以实证科学和最充分的自由为基础。

同时，同盟宣布，它的报纸将为一切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郑重的文章广泛地开放自己的篇幅，只要这些文章是真诚地为最广泛的人民解放，即既是物质方面的又是从政治和精神的观点来说的解放的愿望所鼓舞的。”

.....

(三) 反神主义

.....

国家并不是自然界的直接产物；作为社会，它并不先于思想在人身上的觉醒，而我们在后面试图证明，宗教意识怎样在自然的社会中创造国家。自由主义的政论家认为，第一个国家是由人们的自由的和自觉的意志所创造的；专制主义者认为，第一个国家是神创造出来的。在这两种场合，国家都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力图把社会完全吞没掉。

在第二种场合下，这种吞没是不言而喻的：神的机构必然要吞没掉任何自然的组织。耐人寻味的是，个人主义学派及其自由的契约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实际上，这个学派是从否认先于缔结契约的自然社会的存在本身开始的，——因为这种社会是以个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因此是以对个人自由的相互限制为前提的，而这是同绝对自由相矛盾的。根据这一理论，每个人都享有绝对的自由，直到缔结契约为止，并且这不多不少恰好就是作为自然的事实而存在，甚至先于自由契约而存在的这种契约本身。因此，按照这一理论，人类社会只是从缔结契约开始的。那末这个社会是什么东西呢？这是纯粹地、合乎逻辑地实现契约及其一切预先规定和立法的、实际的后果，——就是国家。

现在我们更加仔细地把它考察一下。国家究竟是什么呢？是对它的所有成员的个人自由的否定的总和；或者说是它的所有成员为了共同福利而放弃自己那份自由而做出的牺牲的总和。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个人主义的理论，每个人的自由构成所有其他人的自由的界限或自然的否定。这种绝对的限制，这种为了所有人的

自由或共同的权利而对每个人的自由的否定，——就是国家。所以，哪里开始了国家，那里的个人自由就要结束，反之亦然。

有人会对我回答说，国家是公共福利或普遍利益的代表，它剥夺了每个人的一部分自由，只不过是保证了他能得到其他的东西。但是，这其他的东西，可以说是安全，但是无论如何不是自由。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切除自由的一部分而又不扼杀其整体。你们要切除的那一小部分构成我的自由的本质本身，这一小部分就是一切。由于自然的、必然的和不可遏止的趋向，我的全部自由恰好集中在你们要切除的那一部分，不管这一部分是多么小。……

但是，有人会对我说，国家，建立在一切公民的自由的普选权之上的民主的国家，不可能对公民的自由进行否定。为什么不可能呢？这将完全取决于公民们赋予国家的使命和权力。建立在普选权之上的共和制国家，可能是很专制的，甚至比君主制国家更专制，如果它在它是普遍意志的代表的借口下，用自己集体威力的全部重量去压迫它的每一个成员的意志和自由运动的话。

但是，有人还会说，国家限制自己成员的自由，只是以这种自由是导向非正义、导向恶为限的。国家防止他们彼此残杀、彼此抢劫和彼此侮辱，总之是防止他们作恶，而相反地，国家赋予他们充分的和完全的自由去行善。这又是那个关于青髯公的故事和禁果的故事^①：究竟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呢？

从我们所分析的体系的观点来看，在缔结契约以前并不存在善和恶之间的区别，那时每一个人都单独地享有自己的自由和

^① 青髯公是法国民间故事中的主人公。他杀害了六个妻子后娶了第七个妻子，他外出时把所有的钥匙交给了妻子，但禁止她打开某一个房间，她恰恰打开了那个房间，在其中发现了以前六个妻子的尸体。

禁果指因被禁止而更想得到的东西。典出《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二、三章：上帝禁止亚当和夏娃吃分别善恶之树上的果子，夏娃却听信蛇的话，和亚当一起吃了，结果受到上帝的惩罚。——编者注

自己的绝对的权利，丝毫不注意别人的自由，除非是他的软弱或者有限的力量——换句话说，即他的理智和个人利益要求这样做^①。根据同一个理论，利己主义是最高的法则、唯一的权利：善决定于成功，而恶只决定于失败，正义无非是承认既成事实，——无论这个事实是多么可怕、残酷和可恶，——完全象现在在欧洲占居优势的政治道德的情况一样。

根据这个体系，善和恶之间的区别只是在缔结了社会契约以后才开始出现。于是，凡被认为是构成共同福利的一切东西，都被宣布为善，而违反这种福利的一切东西都被宣布为恶。缔约的成员既成了公民，就用多少是庄严的诺言把自己束缚起来了，从而也就承担了义务，要使自己的私人利益服从于共同福利、一切人的不可分割的利益，他们也把自己个人的权利同社会的权利分割开来了，而社会权利的唯一代表即国家，从而便具有镇压任何个人利己主义的骚乱的权力，但是也具有义务维护自己的每一个成员的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只要这种权利不同共同权利发生矛盾。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样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它和对它相似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以及在对由它管理的居民的关系方面，会是个什么样子。这种研究对我们说来尤其有意义和有益处，因为按照这个理论所下的定义，国家就是现代国家，因为它抛弃了宗教观念；这是现代政论家们所宣布的世俗的或无神论的国家。我们就来看一看，国家的道德是什么？我们已经说过，这是现代国家，

① 但是，这种关系在原始人中间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社会生活是先于人们的个人意识和自觉意志的觉醒而存在的，因为在社会之外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绝对的，甚至也不能享有相对的自由，——这种关系和在现代国家之间现在所存在的关系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个现代国家都认为自己具有排除其他国家的自由的绝对的自由、权力和权利。因此，只有当它自己的利益要求它的时候，它才去注意其他一切国家，——这也造成在一切国家之间进行经常的隐蔽的或公开的战争。——作者注

它摆脱了教会的束缚，因而抛弃了全世界的或世界主义的基督教道德，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它还没有达到人道主义的思想，没有充满人道主义的道德，但是它不消灭自己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国家在自己单独的存在和单独的集中方面，是太狭窄了，以致不能包含和容纳全人类的利益，因此也不能包含和容纳全人类的道德。

现代国家就达到了上述状况。基督教只不过是它们用来欺骗老实人的借口和漂亮话或者手段，因为它们所追求的目的同宗教思想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时代的大国务活动家们：帕麦斯顿们、穆拉维约夫们、卡富尔们、俾斯麦们、拿破仑们会捧腹大笑的，如果谁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当真看待的话。如果有人硬说他们具有人道主义的感情、意愿和意向的话，他们会笑得更加厉害，因为他们从来不放过机会公开骂这些东西是愚蠢之举。他们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形成道德呢？唯一的就是国家的利益。从这个观点（而且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也就是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国务活动家、强有力的人物的观点）出发，凡是有助于保存、颂扬和巩固国家的一切，无论从宗教观点看来是多么亵渎神圣，无论从人类道德观点看来是多么令人愤慨，都是善，而相反地，凡是同国家利益相抵触的一切，尽管在其他方面是最神圣的、最合乎人类正义的东西，都是恶。这就是一切国家的不折不扣的道德和历来的实践。

这就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理论之上的国家的道德。根据这个体系，善和正义只是从缔结契约起才开始存在，并且它们无非是契约的内容和目的，即缔结契约的一切个人的共同福利和社会权利——凡是没参加缔结契约的人都除外。因此，在这个体系中，善被理解为只是最大地满足私人的、有限的协作社的集体利己主义，这种协作社建立在部分地牺牲它的每一个成员的个人利己主义之上，把加入了或没有加入类似协作社的绝大多数人类作为外国人和天然的敌人排除在外。

某一个有限的国家的存在要求并且在必要时会引起其他一些国家的成立,因为处在这个国家之外,并且自己的存在和自由遭到这个国家的威胁的那些个人,自然也要联合起来反对这个国家。于是,人类就分裂成为彼此格格不入的、互相敌视的、互相威胁的无数的国家。在它们之间没有社会契约,没有共同的权利,因为否则它们就不再是彼此绝对独立的国家,而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组成部分了。但是,只要这个伟大国家没有包括整个人类,其他那些伟大的内部联邦制的国家就将反对它,它们将对它采取同样的敌视态度,于是,战争就仍然会成为人类生活中的最高法则和内部必然性。

每一个国家,无论它的内部制度是不是联邦制的,都要竭力变成最强大的国家,否则就有灭亡的危险。为了不被吞并,它就要吞并别国,为了不被征服,它就要征服别国,为了不被奴役,它就要奴役别国,因为两个相同的但同时又是对立的力量,不彼此消灭就不可能存在。

国家——这是对人类的最可恨、最无耻、最彻底的否定。它破坏地球上一切人的全世界性的团结一致,它把一部分人联合起来,只是为了要消灭、征服和奴役其他所有的人。它所保护的只是它自己的公民,它只是在自己的疆界内才承认人的权利、人性和文明;它既然不承认在它之外的任何权利本身,那末它就合乎逻辑地要攫取对所有别的民族采取最残酷的毫无人性的态度的权利,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摧毁、消灭或奴役所有别的民族。如果它对别的民族也表现宽容和人性的话,那末这决不是出于责任感,因为它首先只是对它本身具有义务;其次它只是对它的成员中那些自由地建立了它,并继续自由地构成它,或者象最后所经常发生的那样,变成它的臣民的人具有义务。由于国际权利并不存在,由于不从根本上破坏国家绝对高于一切的原则,国际权利就不可能郑重地、

实际地存在，因此国家不可能对别的民族具有任何义务。所以，如果它对被征服的民族采取人道的态度，如果它只是把被征服的民族抢劫和消灭一半，如果它没有把被征服的民族降低到奴隶状态的最后极限，那末，它这样做是出于政治考虑，也可能是出于谨慎起见，或者是由于纯粹的宽容，但是永远不是出于责任，——因为它享有随心所欲地处置被征服民族的绝对权利。

这种构成国家实质的对人性的可恨的否定，从国家的观点看来是最崇高的责任和最大的美德：它叫做爱国主义，它构成国家的最高道德。我们把这种道德称为最高的超验的道德，因为它一般总是超乎人类的，私人的或社会的道德和正义的水平，从而最经常地变得同人类的道德和正义相矛盾。例如，凌辱、压迫、掠夺等行为，从普通的人类道德的观点看来，认为是一种罪行。相反地，在社会生活中，从爱国主义的观点看来，当这样做是为了国家的更大的光荣，是为了保持或扩大它的威力的时候，这一切便成了责任和美德。而这种美德、这种责任是每一个爱国的公民所必须遵循的；每一个人都被认为必须履行这种美德和责任，不仅去反对外国人，而且甚至去反对他自己的同胞，反对象他一样的国家的成员和臣民，不论任何时候，只要国家的福利要求这样做。

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从历史的一开始起，即从国家的产生起，政治界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进行高级诈骗活动和无比的盗窃活动的舞台，——而且这种盗窃和诈骗活动还获得了高度的评价，因为这些活动是爱国主义、国家的最高道德和最高利益所要求的。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古代和现代国家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令人愤怒的罪行；为什么过去和现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国王和大臣，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官僚和军人，如果从普通的道德和人类正义的观点来评价他们的话，该百次千次地服绞刑或苦役；因为不管什么惨事、残酷行为、亵渎神圣的行为、违背背约的

行为、欺骗行为、下流勾当、恬不知耻的偷窃、无耻的掠夺和肮脏的背叛，都是国家的代表们所干过的，并且每年还在继续干，他们这样做，除了一个可以随便解释的、既方便而又可怕的字眼：国家利益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原谅的理由。

这确实是可怕的字眼！它比基督教本身更多地使社会的官场和统治阶级中的人腐化堕落和名声扫地。只要一讲这个字眼，善心、诚实、正义、权利、怜悯本身就全都销声匿迹，逻辑和健全的理智也随之消失；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变成黑的，丑恶的变成人道的，而最卑鄙的欺骗、最可怕的罪行也变成可尊敬的行为了。

伟大的意大利哲学家和政治家马基雅弗利是第一个讲出这个字眼的人，或者至少是第一个使这个字眼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和巨大的声望的人，直到现在这个字眼在统治界中仍然享有巨大的声望。作为思想家、现实主义者和高度的实证主义者，马基雅弗利第一个认识到，庞大的、强大的国家只有通过罪行、大量的罪行以及对一切称之为正直的东西的最极端的蔑视，才能建立起来，才能维持得住。他以可怕的坦率态度把这一点写出来了，并且做了解释和证明。由于人类的观念当时还完全没有人知道，由于天主教会所宣扬的不是人类的而是宗教的博爱的观念，在当时也象在任何时候一样，无非是教会每时每刻都在用它自己的措施进行揭露的可怕的讽刺；由于在马基雅弗利时代，甚至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人民的权利，——因为人民始终被看作是注定要无限地顺从的怠惰而愚钝的群众，是供国家使用的一堆特殊的肉，是供宰割和掠夺的对象；由于无论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国内和国外，都的确没有任何高于国家之上的东西，——因此，马基雅弗利非常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说，国家是全部人的生存的最高目的，无论如何要为国家服务，而在为国家服务时一个好的爱国主义者应该不惜干出任何罪行，因为国家的利益重于其他一切东西。马基雅弗利劝人犯

罪，他规定一定要犯罪，并且宣布说，犯罪是政治才智和真正爱国主义的必要条件。不管国家叫做君主国还是共和国，犯罪同样是为了国家的胜利和为了保持国家所必需的。当然，罪行会改变自己的方向和目的，但是它的性质仍然不会改变。这始终都将是为了国家的福利而对正义、怜悯和诚实进行强有力的、不断的践踏。

是的，马基雅弗利是对的；有了他的经验，再加上三百五十年的经验以后，我们对这一点不可能有所怀疑了。是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的都是这一点：小的国家有德行只是由于它软弱，强大的国家只是靠犯罪来维持。只不过我们的结论将完全不同于马基雅弗利的结论，而这原因很简单：我们是革命的儿女，我们从革命手中继承了人类的宗教，我们应该在神的宗教的废墟上建立这种宗教；我们相信人的权利，相信人类的尊严和必然解放；我们相信人类的自由和建立在人类正义的基础上的人类的博爱。——一句话，我们相信人类在地球上的胜利。我们热烈地呼求这个胜利，并且我们希望用我们共同的努力使它早日到来，这个胜利按其本质来说是对罪行的否定，因为罪行本身无非是对人类的否定。只有当罪行不再成为它现在在一切地方或多或少都是那样的那种东西，即被国家观念所吞食和奴役的各族人民的政治存在的基础本身的时候，这个胜利才能实现。——由于现在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国家，要是不犯罪，或者（如果它因无能为力而不能在实际上付诸行动的话）至少不幻想犯罪和打算犯罪，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绝对有必要消灭国家，或者也可以说，对国家进行彻底的、根本的改造，使它们不再成为集中的、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以暴力或某一种原则的权威为基础的大国，把它们自下而上地加以改组，其一切部分都有参加或不参加联盟的绝对自由，并且其每一个部分都保留有随时退出这个联盟（即使它是根据自愿参加的）的自由；根据其一切部分的实际利益和自然意愿，由个人和

协作社、公社、地区、省和民族自由地联合成为统一的人类来进行改组。

这就是研究甚至所谓自由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外部关系使我们必然得出的结论。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以神的权利或宗教批准为基础的国家，一定要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国家对它自己的公民和臣民的态度。

我们看到，国家把人类的绝大多数从其内部驱逐出来，把他们置于道德、正义和权利的承诺和相互责任的范围之外，从而便否定了人类，并通过爱国主义这个响亮的字眼使自己的臣民有义务去干非正义和残酷的事情，并把这作为最高的责任。它限制和扼杀他们身上的人性，使他们不再成为人，而只变成公民，或者——从事实的历史一贯性的观点更公正地说——使他们不能提高到公民之上，不能达到人的高度。但是，我们看到，任何国家，在灭亡和被邻国吞并的威胁之下，都要竭力具有无限的威力，而在变得强大以后，就要征服其他国家。谁讲征服，他就是讲被征服的、被压迫的、沦为奴隶的各族人民，不管这样做用的是什么形式或什么名称。可见，奴隶制是国家存在的必然后果。

奴隶制可能会改变形式和名称，但是它的实质仍然不会改变。这个实质可以用如下几句话来表达：做奴隶，就是被迫为别人劳动，——正如当主人，就是享有别人的劳动一样。在古代世界，就象现在在亚洲、非洲，甚至还在美洲的部分地区一样，奴隶干脆叫做奴隶。在中世纪，他们得到了农奴的称呼，在现在他们被称为雇佣工人。这些雇佣工人的状况比起奴隶的状况来，要受尊敬得多并且不那么困难。但是尽管如此，饥饿、以及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强迫他们要做非常沉重的劳动，以便使其他的人有可能完全无所事事地或者比较无所事事地过活。因此，他们是奴隶。而且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古代的或现代的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没有雇佣的、

受奴役的大众的强迫劳动，这是政治阶级——公民——的闲暇、自由和文化发展的主要的和绝对必需的条件。在这方面，甚至北美合众国也不例外。

这就是国家生活的内部条件，它们是从国家的外部状况，即它对所有其他国家的自然的、经常的和不可避免的敌对状态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现在我们再看一看，从公民据以建设国家的自由契约中对公民直接产生出来的条件是怎样的。

国家的使命并不局限于反对一切外来的进攻，保证自己成员的安全，它还要在内部生活中保护他们不受彼此之害，保护每一个人不受自己本身之害。因为国家，——这是它的主要特征——任何国家，也同任何神学一样，都是以人本质上是恶的和坏的这个假设为基础的。在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国家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善只是从缔结社会契约开始的，因此，它只是这种契约的结果，甚至是契约的内容。善不是自由的产物。相反地，只要人们仍然是在自己绝对的个性中离群独处，享有除了可能性的界限而不是权利的界限以外不知道其他界限的自己全部天然的自由，那末在这以前他们就只遵循一个法律——自己的天然的利己主义，他们总是相互欺侮，彼此互相盗窃、掠夺、屠杀和吞食，各人按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计谋、自己的物质力量行事，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国家现在所做的那样。——因此，人的本性产生的不是善，而是恶；人按本性来说是坏的。他怎么样变成这样的呢？说明这一点，是神学的事情。事实是国家在它产生的时候就认为人是坏的，并且就着手使他变成好的，即把自然的人改造成为公民。

对于这一点，可以这样加以反驳，由于国家是人们自由地缔结的契约的产物，而善是国家的产物，所以善是自由的产物！这种结论是完全不对的。即使根据这个理论来看，国家也不是自由的产物，相反地，是牺牲和自愿地放弃自由的产物。自然状态的人们从

权利的观点看来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却遭到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他们生命和安全的一切危险。于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他们就放弃自己自由的较大或较小的一部分，而只要他们为了自己的安全而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自由，只要他们变成了公民，他们就变成了国家的奴隶。因此，我们断言，从国家的观点看来，善并不是从自由中，而且相反地是从对自由的否定中产生的，这是正确的。

神学(教会的科学)和政治(国家的理论)之间的这种相似，是很有意思的东西。这是两种在外表上完全不同的思想和事实在同一信念上相遇：相信为了在人们中培养道德，并把他们加以改造——按照教会的要求是改造成圣徒，按照国家的要求是改造成有德行的公民——就必须牺牲人的自由。至于我们，对此丝毫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们坚信，并且下面还要努力证明，政治和神学是一对亲姐妹，它们有同一个起源，在不同的名义下追求同一个目的；任何国家都是地上的教会，正如任何教会及其天堂——安乐自在、长生不死的神的住所——也无非是天上的国家罢了。

可见，国家和教会都是从一个基本的假定出发的，即认为人们在本质上是坏的，如果让他们享有自己的天然的自由，他们就会互相厮打，表现出最可怕的放荡不羁的景况来，那时最强者将杀死或者剥削最弱者。——这真的是某种同现在我们那些模范国家中所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反的情况吗？其次，国家把如下论点奉为原则，即为了建立社会秩序就必须有最高权力；为了领导人们并压制他们的恶欲，必须有领导人和约束；但是这种权力应该属于自己人民中象摩西、莱喀古士和梭伦那样的天才人物和有德行的立法者，那时这个领袖和这种约束将体现出国家的睿智和惩罚威力。

为了逻辑，我们倒可以争论一下立法者是否适当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现在所探讨的这个体系中，谈的并不是某个权力所发布的

法典，而是国家的自由创建者们自由地缔结的相互间的契约。既然这些创建者根据我们分析的那个体系看来是不折不扣的蒙昧人，他们直到那时为止一直生活在最充分的天然的自由中，因此应该是不知道善和恶之间的差别的，那末请问，他们怎么突然能够区别善恶，并把它们分开呢？的确，有人可能会反驳我们说，蒙昧人起初缔结他们相互间的契约，唯一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因此，他们称为善的东西，无非是列入契约的那很少的几点，例如：不互相凶杀，不互相掠夺财物，在遇到一切外来进攻的情况下相互进行援助。但是后来，已经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中诞生的、并且因此在某些程度上是受这个社会的精神所教育的立法者，天才的和有德行的人物，可能扩大和加深了社会生活的条件，从而创造了第一个道德规范和法典。

但是，现在又产生另一个问题。我们假定，一个具有非凡天才的秉赋并在这个还是非常原始的社会的环境中诞生的人物，借助于他在这个社会中接受的很粗浅的教育，并且由于自己的智慧，能够提高到创造道德规范的程度。但是，他怎么能够设法使这个规范为他的人民所接受呢？只用逻辑的力量吗？——这是不可能的。逻辑最终总是要胜利的，甚至会战胜最顽固的头脑；但是为此需要有比一个人的一生要多得多的时间，而要是同不发达的头脑打交道，大概甚至需要几百年。借助于强力和强制吗？但是，那样的话，这就将不是以自由契约为基础，而是以征服、奴役为基础的社会了。后一个假定将把我们直接引向那些实际的历史的社会，的确，在实际的历史的社会里，一切事物都比在我们自由派政论家的理论中所作的解释要更加自然得多，但是，研究和探讨这些社会不会象这些先生们所如此关心的那样使国家增光，而相反地，象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会使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时间内把国家彻底地、根本地加以消灭。

伟大的立法者还有第三个方法可以迫使自己的同胞接受他的规范：这就是神的权威。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著名的立法者中最伟大的人物，从摩西到穆罕默德，都采取这种办法。这种办法在信仰和宗教感情还具有很大影响的那些民族中间，很有效力，当然在蒙昧人中间也有很大的威力。但是，通过这个途径建立起来的社会，已经不是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社会了。既然它是由于神的意志的直接影响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它必然是神权的、君主的或贵族的社会，但无论如何不会是民主的社会。而由于同神是不能讲价格的，由于神既强大又专制，因此只有盲目地接受他们所强加的一切，无论如何都要服从他们的意志。由此可见，在由神所操纵的立法中，是没有自由的余地的。我们暂时不谈关于国家是通过神的万能威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建立起来的这个十分正确的假定，我们答应以后再研究，现在反过来再考察一下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自由国家。虽然我们坚信，由一个人的天才产生立法，而由蒙昧人的全体人民一致自愿接受，以致立法者不必采取暴力或者某种神的欺骗手段，这样的事实是自相矛盾的，是根本无法解释的，但是，我们姑且同意容忍这种奇迹，现在我们要求解释另一个和第一个奇迹同样难于理解的奇迹：我们假定，新的道德规范和法典被宣布了并被一致通过了，但是它们在实践中、在生活中怎样实现呢？谁来监督它们的执行呢？

能否设想，在这样一致通过以后，构成原始社会的全体或者哪怕是大多数蒙昧人，他们在新的立法宣布以前还沦于最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中，只是由于宣布并自由地通过了新立法，就突然全部改变到这种程度，以致开始根据自己的倡议，除了自己的信念以外没有其他的动因，而认真地遵守并正确地履行在此以前他们不知道的道德所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规定和法律。

如果说这种奇迹是可能的话，那就无异于承认国家是毫无用

处的，承认自然的人依靠自己的自由的唯一推动，就能够理解善、希望善和行善；而这既违反所谓自由国家的理论，也违反宗教的或神的国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基础是，认为人不能提高到善的水平并根据自己的自然的动机行善，因为根据这些理论本身，这种动机会不可遏止地、不断地把人们引向恶。因此，这两种理论都教导我们，为了在无论什么样的人类社会中保证原则的遵守和法律的执行，必须有一个有警惕性的、从事管理的、在需要的时候就从事惩罚的权力来领导国家。

——剩下的就是要弄清楚，谁应该并且谁可能拥有这种权力？

关于通过某个神的参与并以神的权利为基础的国家，回答很容易：权力首先应该属于神甫，其次是属于被神甫神圣化了的世俗当局。谈到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理论，回答就困难得多了。实际上，在自由占统治地位的纯粹民主制中，谁应该是法律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反对每个人的恶念的正义和社会秩序的捍卫者呢？——要知道，每个人都被认为是不能象国家的福利所必需的那样来管理和控制自己的，因为每个人的自由都有作恶的自然的倾向。——那末，由谁来担当国家的职务呢？

有人会说：由公民中最优秀的人、最聪明和最有德行的人，由那些比其他人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人，他们认识到每个人必须、而且有责任使自己的私人利益服从于共同利益。实际上，这些人必须既聪明而又有德行，因为如果他们只聪明而无德行的话，他们就可能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去从事社会事业，而如果他们有德行，但是不聪明，那末，尽管他们非常认真，也不可避免要使社会事业陷于失败。可见，为了使共和国不致于灭亡，就必须使它在一切时代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这种人物；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中，都必须接连不断地出现一系列的有德行而同时又聪明的公民。

但这个条件既不容易又不是常常都能实现的。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上，产生大量卓越人物的时代往往是在许多世代的黑暗中才闪现一下的不平凡的时代。通常在统治阶层中主要是平庸无能，主要是灰色，并且象我们在历史中看到的那样，常常是黑色和红色，即肆虐逞凶的恶行和血腥的暴力。我们由此可以做出结论，如果任何政治社会的保持和存在，都取决于接连不断地出现一系列一个跟着一个的、不仅按智慧而且按德行说来都是优秀的人物，正如从所谓唯理论的或自由主义的国家的理论显然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一样，——如果这是一个真理的话，那末，现在存在的一切社会中没有一个不是早就应该灭亡的。如果我们在这个困难（且不说是不可能性）上再加上从那种由于拥有权力而给予人的十分特别的使人蜕化的影响中产生的困难，如果我们再加上一切享有权力的人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的非常的诱惑，再加上虚荣心、争权夺利、嫉妒心和巨大的贪欲的影响，它们可以说日日夜夜都正在使身居高位的人物本身堕落，无论智慧甚至德行都不能保证能反对它们，因为个别的人的德行是一种脆弱的东西，——那末我们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存在这样多的社会是一种奇迹。但是，这一点暂且不谈。

我们假定，在理想的社会中每个时代都有相当数目的既聪明又有德行的人物，他们能够适当地执行国家的职能。但是谁去发现他们，谁去辨识他们，谁去把权柄托付给他们呢？或者是他们由于意识到自己有智慧、有德行，自己把权柄夺取过来，就象希腊的两个贤者克列奥布尔和伯里安德洛斯（尽管他们可能是有大智大慧，但是希腊人却称之为暴君）所做的那样？但是他们怎样夺取权力呢？是通过说服呢还是通过武力呢？如果是通过说服，那我们就指出，能够说服别人很好地相信的，只是自己已经深信的东西，而正是那些优秀人物常常最不相信他们自己的长处；即使他们

认识到了自己的长处，他们往往也不欢喜对别人说，而那些坏的、平庸无能的、永远自满自足的人却毫不愧赧地自吹自擂。我们且假定，为自己祖国服务的愿望会迫使真正值得尊敬的人物不受这种过分的谦逊支配，使他们到自己同胞的选举会议上去发表演讲。但是，他们能否总是当选，总是被人民认为比那些慕虚荣的、能言善辩的、机灵的阴谋家好呢？相反地，如果他们想用武力取得权力，那末他们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摧毁整个派别的反抗。他们将经过内战而取得权力，在内战以后还会留下一个没有妥协而只是被战败了的、敌对的派别。为了控制这个派别，他们就必须继续使用武力。那样一来，这就已经不是自由的社会，而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专制的国家了，在这种国家中你们也许可以找到许多使你们惊叹叫好的东西，但是永远也找不到自由。

为了保持以社会契约为出发点的自由国家的职能，我们就要假定，大多数公民都总是具有必要的理智、洞察力和正义，以便能够选拔最适当的、最有才能的人来执政。但是，为了使人民不是一次，不是偶然地，而是在任何时候，在他们进行的一切选举中，在他们存在的整个时间内，都能表现出这种洞察力、这种正义、这种理智，就必须使全体人民在道德发达和文化方面都达到很高的程度，但在那个时候，政府和国家就已经完全没有用处了。这样的人民在生活中必定会使自己的一切爱好都有充分的自由。正义和社会秩序就将自然而然地从人民的生活中产生，而国家在不再成为天命、保护者、教育者、社会的管理者之后，在放弃任何惩罚的权力，降到蒲鲁东所指出的那种从属的作用之后，就将成为只不过是普通的委员会，某种为社会服务的中央办事处。

毫无疑问，这种政治组织，或者更正确地说，这样为了社会生活的自由而削弱政治活动，对社会说来将是伟大的善举，但是，它丝毫也不能使主张必须有国家的人感到满意。他们肯定需要作为

天命的国家，作为社会生活管理者的国家，进行审判并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家。换句话说，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不管他们叫做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或者甚至社会主义者，——他们总是需要使受管理的人民或多或少是愚昧无知的、未成年的、无能的，或者用专有名词来说，就是使人民或多或少地成为——“贱民”。这对他们说来当然是必要的，为的是他们在战胜了本身的无私和谦逊之后，仍然能够留在首要位置上，以便随时有可能为了社会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以便他们这些由于具有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特有智慧而成为强者的人，作为乌合之众的人类的享有特权的卫护者，在推动人类走向人类的福利，引导人类走向人类的拯救之路的时候，也能够对人类掠夺一些东西。

任何彻底的和真诚的国家理论，实质上都是以最高的权力的原则为基础，即以这样一种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政治的观念为基础：群众永远不能进行自治，他们应该永远处于睿智和正义的有益的约束之下，必须有人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从上面责成他们服从睿智和正义。但是，以什么名义和由谁责成他们这样服从呢？为群众承认并受群众尊敬的权力只能有三个来源：力量、宗教或智慧的优越性。……

……………

别认为我们是想指出君主国比民主制度优越。我们坚信，最不完善的共和国也要比最开明的君主国好一千倍，因为在共和国中，人民虽然永远受剥削，但至少有一些时刻是不受压迫的，而在君主国中人民是经常受压迫的。此外，民主制度使群众逐渐提高到社会生活的水平，而君主国却永远不会这样做。尽管我们认为共和国比较好，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并且宣布，只要人类社会由于职业、财产、教育和权利的世袭的不平等而仍然划分为各种不同的阶级，不管统治的形式如何，进行统治的将只是少数人，而这

些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就将是不可避免的。

国家无非是这种系统化了的统治和剥削。我们在考察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理想国家中某一些少数人（无论他们多么有知识和多么勇于自我牺牲）统治人民群众的后果时，将试图证明这一点。

既然契约的条件已经确定，剩下的就只是在实践中执行这些条件了。我们假定，人民非常有智慧，能够承认自己的无能，而且还具有必要的洞察力，能够把管理社会事务的责任只委托给最优秀的公民。

这些享有特权的个人，起初并不是从法律的观点，而只是在实际上享有特权。他们被人民选举出来，是因为他们最有知识、最心灵手巧，最有智慧、最勇敢、最肯于自我牺牲。他们是从假定彼此平等的公民群众中被提出来的，暂时还不构成单独的阶级，而仅仅构成只因天赋而享有特权并因而受到人民推选这一奖励的单独的集团。他们的人数必须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具有这样卓越的品质，以致似乎是迫使人民普遍尊敬的人的数目，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是非常少的。因此，由于害怕选得不好，人民就只好总是从这些很少的人中间选举自己的管理者。

社会就这样划分成两类人，且不说两个阶级，其中由绝大多数公民构成的一类人自愿地服从自己的当选人的管理；另一类人是由少数天才人物构成的，他们得到人民的承认并被推选出来，由人民赋予管理人民的全权。由于以人民的选举为转移，这些人起初除了使他们博得自己同胞信任的那些品质以外，同公民群众没有其他任何区别，而他们在全体公民群众中自然也是最有用的、最肯于自我牺牲的人。除了根据人民的意愿完成他们所承担的专门义务的权利以外，他们还没有把任何特权，任何特别的权利攫为己有。在其他一切方面，在生活方式、自己生存的条件和手段方面，他们同人民没有丝毫的区别，因此在一切人之间继续盛行着完

全的平等。

但是，这种平等能够长久继续下去吗？我们可以肯定，不可能，而这一点是很容易证明的。

对于人的个人道德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发号施令的习惯更加危险的了。在这种条件下，就是最优秀的、最有知识的、无私的、胸怀宽广的、纯粹的人，也不可避免地会变坏。权力有两种固有的感情，它们必然会产生这种道德败坏的现象，这两种感情就是：轻视人民群众和夸大自己的优点。

群众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进行自治，于是选举我作为领袖。从而他们便公开地承认了我的优越性和他们自己相对的微不足道。在这一整群人当中，只有两三个人，我可能认为是平等的，我一个人有能力管理社会事务。人民需要我，人民不能没有我的帮助，而我有我自己就心满意足了。因此，人民为了他们自己的福利应该服从我，而我俯允管理人民，我是在创造人民的幸福。

难道这一切不是完全足以使人由于骄傲而丧失理智和忘乎所以吗？——因此，权力和发号施令的习惯，甚至对于最有知识的、有德行的人们说来，也成了智力上和道德上自我陶醉的根源。

任何人类道德，——稍后一点我们将努力证明这个原则是绝对真理，发挥、阐明和最广泛地运用这个原则是本文的重要目的，——任何集体的和个人的道德，实质上都是以对人的尊重为基础的。我们所说的对人的尊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承认每个人身上的人性、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不管他的种族、肤色、智力甚至道德的发展程度如何。但是，如果一个人愚蠢、凶恶、卑鄙，我能够尊重他吗？当然，如果他具有这些品质的话，我不能尊重他身上的卑鄙、笨拙和愚蠢。这些品质使我愤怒，引起我的厌恶；在必要时我将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反对它们，甚至要杀死这个人，如果我没有其他手段来捍卫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权利或者我所珍贵和尊重

的东西的话。但是，在同这个人进行最有力的、残酷的、在必要时是殊死的斗争的时候，我应该尊重他身上的人的本性。——只有用这个代价，我才能保持我自己的人的尊严。可是，如果这个人承认任何人身上的这个尊严，能够承认他身上的尊严吗？如果他是特殊的野兽，或者象有时出现的情况那样，比野兽更坏，能够承认他身上的人的本性吗，如果这样岂不是流于虚伪？不，因为不管他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堕落是多么严重，如果他从机体上说不是一个白痴和疯子，——在这种场合就不应该把他作为罪犯，而应该作为病人来对待，——如果他完全具有自己的感情和天生的智慧，他的人的本性在最骇人听闻的偏离中，仍然会非常现实地在他身上存在，作为只要他活着就对他敞开着、提高到认识自己的人性的水平的可能性，——只要在使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些社会条件中能发生根本的变化。

如果您捉一个最聪明、最有才能的猿猴，把它放在最好的人的条件下，——您还是永远也不可能把它变成人。如果您举一个最顽固的罪犯和一个智力最贫乏的人为例，只要他们之中谁都没有任何使他们患有白痴或不可医治的癫狂症的机体上的缺陷，那末，首先您就应该承认，如果他们中的一个成了罪犯，而另一个还没提高到认识自己的人性和自己的人的义务，那末这并不是他们本身的罪过，而是他们在其中诞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的罪过。

这里我们牵涉到了社会科学关于一般的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们绝对否认在神学、形而上学和关于法律的科学所强加于意志自由这个词的意义上，即在不管任何自然的和社会的影响，人的个人意志任意自决的意义上的那种意志自由。

我们否认灵魂的存在，否认脱离身体而独立并与之割裂的精神实体的存在。相反地，我们断定，正如个人的身体以及他的全部

才能和本能的秉赋；无非是决定他的个人的组织的一切共同的和私人的原因的导数；——被不正确地称作灵魂的那种东西，即一个人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品质，就是这个组织本身即脑子由于各种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原因的凑合而达到的机体发展程度的直接产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然的直接的表现。

.....

写于1867—1868年。译自《巴枯宁选集》彼得堡
—莫斯科1920年俄文版第3卷第121—204页。

在和平和自由同盟 1868年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 编者按语 ·

巴枯宁建议和自由同盟同国际缔结攻守同盟，以便通过同盟来控制国际。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巴枯宁便想退出同盟，钻到国际内部施展阴谋。为此，他向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一个离奇的社会主义纲领，以吓唬资产阶级。纲领遭到同盟拒绝，他在一小撮党徒陪同下退出同盟。马克思揭露说，他提出的“**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用意是要使资产阶级的傻瓜们感到恐怖，而且使巴枯宁先生能够大大嚷地退出和平同盟并加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3页）。

这里摘录的就是他为自己的纲领进行辩护的两次发言。他在发言中叫喊“我憎恨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否认自由”，宣称“我要求阶级和个人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平等”，“希望废除国家，根除权威和国家监护的原则”，“要求取消个人的继承财产”，胡说“一切国家都是坏的”。马克思指出，巴枯宁的这些观点是“**无稽之谈和一大堆唬人的胡言乱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在同盟的这次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扮演了一个他最喜爱的江湖骗子的角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

.....

由于我要求阶级和个人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平等，由于我同布鲁塞尔工人代表大会一起宣布自己是集体所有制的拥护者，有人就指责说我是共产主义者。有人问我：你认为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我实在感到惊异，朔德先生^①竟不了解这一区别，他是蒲鲁东的遗嘱执行人啊！我憎恨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否认自由，而我不能想象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还会有任何属于人类的东西。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把社会的一切力量集中在国家中，国家吞噬社会的一切力量，因为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使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而我则希望废除国家，根除权威和国家监护的原则，这一原则直到现在还在文明和使人日臻完善的借口下，对人进行奴役、压迫、剥削和使人道德沦丧。我力求通过自由联合自下而上地，而不是借助于任何权力自上而下地去组织社会和集体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我要求废除国家，就是要求取消个人的继承财产，个人的继承财产完全是国家的一种制度，是国家的原则本身的结果。先生们，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集体主义者，但绝不是共产主义者。

.....

转译自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
（见《普列汉诺夫全集》莫斯科俄文第2版第4
卷第208—209页）。

① 奥古斯特·朔德(1835—1871)——巴黎律师，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成员。——编者注

二

.....

最后，拥有三千五百万居民的大俄罗斯本身是否仍将作为现在的政治集中化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呢？这既是很不理想的也是未必能做得到的。集中化的三千五百万居民，在内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自由的，对外任何时候都不能是和平的和正义的。大俄罗斯象其他一切斯拉夫人的土地一样，要遵循时代的伟大意向，时代要求一定要破坏一切大的和小的政治集中化组织、一切纯粹政治的机构和组织，要建立以集体劳动为基础并且以世界协作社为目标的新的社会团体；大俄罗斯象其他一切为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触及的国家一样，首先要破坏政治国家，要自下而上地、从地方到中央，根据自己的需要、本能、意向和利益（不管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和地方的），在唯一的基础即在能够赖以确立的真正正义和真正自由的基础上，重新自由地进行改组。

综上所述，我再重复一遍：是的，我们想完全破坏俄罗斯帝国，完全消灭它的强大的实力和它的存在。我们想这样做，是为了人类正义，也是为了爱国主义。

我已经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不会再有任何含混不清和值得怀疑的地方。现在我向给我们提出了上述问题的德国朋友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了热爱正义和自由，他们是否同意放弃德国所占领的波兰各省，不管这些省份的地理位置如何，不管它们对德国有怎样的战略和商业利益……一句话，他们是否同意象他们要求别人的那样，背弃自己的国家，背弃任何政治，是否同意自己和别人一样，都必须承认自由和正义所提出的一切条件和义务？他

们是否同意完全无条件地接受以下原则——国际和平和正义借以建立的唯一原则：

一、消灭叫作历史权利和国家的政治必要性的东西，以便使每一部分居民（不管大小强弱）也同每个人一样都有充分的自由支配自己，而不管国家的需要和要求怎样，这种自由只受别人的平等权利的限制。

二、消灭个人和集体单位（合作社、省、民族）之间的一切永久性的契约，换句话说，如果每一个人也是自由地把自己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话，承认他在履行了契约所包含的暂时的和有限制的条件之后，有权废除契约。这种权利以构成真正自由的必要条件的原则为基础，就是说，过去的东西不应当约束现在的东西，现在的东西不应当约束将来的东西，现在活着的几代人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

三、承认每个人以及每个合作社、公社、省和民族有自由脱离联盟的权利，唯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脱离出去的部分不能同外国和敌对国家签订同盟来危害他与之脱离的整体的自由和独立。这是自由和正义的真正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们即我们的德国朋友们，是否象我们一样真诚地承认这些条件呢？总而言之，他们是否愿意同我们一起消灭国家——消灭一切国家？

先生们，这就是全部问题。国家就是暴力、压制、剥削和不义，就是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体系和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石。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具有道德。它的道德和唯一的正义就是它的自卫和强大的最高利益——整个人类都要服从的利益。国家是对人类的彻底否定，是一种双重的否定：既是对人类自由和正义的对抗，又是对人类普遍团结的暴力破坏。人们一再试图建立世界国家，但始终没有成功。所以，只要国家存在，就会有好多国家；由于每个国家都把损害一切别的国家的利益来维持自己存在作为唯一目的和最

高法律，那末，非常清楚，国家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永恒的战斗——对人类的暴力否定。任何国家都必然要进行征服或被征服。任何国家都把自己的强大建筑在别国的软弱的基础上，在对自己无害的情况下还要建筑在消灭别的国家的基础上。

先生们，如果这次代表大会已经声明要建立国际正义、自由和永久和平，同时却想保存国家，从我们这方面看来，这会是一种奇怪的矛盾和可笑的幼稚行为。要迫使国家改变本质是不可能的，因为正是由于这种本性，国家才是国家，如果国家放弃了这种本性，它就不再存在。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正义的和有道德的国家。一切国家都是坏的，这就是说，国家按其本性即它存在的目的的条件来看，是同人类正义、自由和道德直接对立的。在这一方面，不管怎么说，在野蛮的全俄罗斯帝国和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

由此我得出结论：谁愿意同我们一起建立自由、正义和和平，谁希望人类胜利，谁想彻底和完全解放人民群众，他就应当愿意同我们一起消灭一切国家，并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切国家的自由的生产合作社的世界联邦。

译自《巴枯宁选集》彼得堡—莫斯科1920年俄文版第3卷第114—117页。

致《民主报》(摘录)

· 编者按语 ·

这封信是巴枯宁为参加讨论《民主报》的办报纲领而写的。《民主报》的创办人沙尔·路易·沙散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参加者。巴枯宁供认蒲鲁东是自己的“伟大的和真正的导师”，同时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1868年4月

.....

我们共同的伟大的和真正的导师蒲鲁东在他的《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这本出色的著作中写道：在可能形成的一切结合中最富有毁灭性的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同专制制度的结合，就是人民追求经济解放和物质福利的意向同专政的结合和同国家中一切政治与社会权力的集中的结合。

那末，但愿未来将保护我们摆脱专制制度的恩典，并把我们从权威主义、学理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毁灭性和使人钝化的后果中解救出来。我们要做社会主义者，但是永远不做牲畜一样的人群。我们将仅仅通过自由来寻求正义，寻求充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正义。在自由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富有生气的和人性的东西，把自由排除在外，或者不把它作为基础和唯一的创造原则的社会主义，会使我们倒退，使我们直接退到奴隶制和野蛮状态去。

但是,如果说,我们一方面应当坚决否定没有充满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原则的任何社会主义制度,那末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同样坚决地和所有这样的政党划清界限:它们声明说,它们仍不过问现代世界所关心的一切问题中最重要和最伟大的问题即社会问题。……^①

.....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145—146页。

^① 删节号是作者加的。——编者注

国际兄弟同盟的章程和纲领

· 编者按语 ·

1868年9月，巴枯宁退出和平和自由同盟，在日内瓦加入第一国际罗曼语区分部。加入后，他“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现”，妄图“完成国际中的变革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1868年10月巴枯宁背着总委员会在日内瓦建立国际性的无政府主义阴谋组织国际兄弟同盟，并为这个组织拟定了《章程和纲领》。

这个《章程和纲领》是巴枯宁主义的代表作，是各种混乱思想的大杂烩。马克思说，巴枯宁的这个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1），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的谬论做了无情的揭露，指出他企图以“阶级平等”来代替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以“废除继承权”引诱工人阶级离开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通过宣扬“放弃政治”把工人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从而使无产阶级革命遭到失败。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同盟’的理论纲领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

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这个《章程和纲领》规定国际兄弟同盟分为三级，即国际兄弟会、民族兄弟会和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或称国际社会主义同盟），前两级是秘密的、后一级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半秘密、半公开的。巴枯宁打算使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打入第一国际，在国际内部建立这个团体的秘密分支，从而夺取国际的领导权。恩格斯指出：“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秘密阴谋。这是一个旨在反对无产阶级运动本身的阴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33页）

（一）同盟的秘密规章

国际兄弟同盟组织

国际兄弟同盟组织分三级：

- 一、国际兄弟会；
- 二、民族兄弟会；
- 三、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半秘密、半公开的组织。

（一）国际兄弟会章程

一、国际兄弟除了世界革命以外没有别的祖国，除了反动以外没有别的异邦和别的敌人。

二、他们反对任何妥协和让步的政策，并且认为，不把他们的

原则的胜利当做立即和直接的目的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

三、他们是兄弟，他们永远不互相攻击，既不公开地，也不在法庭上解决自己的争端。由双方从兄弟中推选出来的仲裁法庭，就是他们唯一的裁判机关。

四、每个兄弟对其余一切兄弟来说都应当是神圣的，比同胞兄弟更神圣。每个兄弟都应当从其余一切兄弟那里得到可能范围内的帮助和保护。

五、只有真诚地接受整个纲领以及由这个纲领而产生的一切理论后果和实践后果的人，只有把智慧、毅力、忠诚和沉着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的人，只有身有魔胆的人，才能成为国际兄弟。我们既不把义务，也不把牺牲强加于人。但是，具有这种热情的人一定会成就许多事业，甚至根本不意识到他是在做出牺牲。

六、对兄弟来说，不应当有比为革命服务和为我们的、以为革命服务为己任的秘密组织服务更重大、更神圣的事业、利益或义务。

七、兄弟永远有权拒绝完成中央委员会或他所属的民族委员会对他的委托，但是，如果连续多次拒绝，他就表明自己是敷衍塞责的人或懒惰的人，并且可能被所属的民族委员会暂时开除，而根据民族委员会的提请则可能被中央委员会暂时除名，直到宪法会议做出最后决定为止。

八、任何一个兄弟，未经他所属的委员会同意都不能担任社会职位。他们任何一个人，未向所属的委员会请示都不能进行同该委员会所确定的行为规范相矛盾或者甚至相抵触的公开行动或发表这类的言论。每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兄弟在一起时，他们对一切重大社会事务应当进行磋商。

九、一切国际兄弟都是彼此了解的。他们之间永远不应当有什么政治秘密。他们任何一个人，未经所属委员会的明确同意都不能参加任何秘密团体，而在需要的时候，即所属的委员会要求他

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须经中央委员会同意。而且只有在他向它们公开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使它们感到兴趣的机密的条件下，他才能够参加这种秘密团体。

十、国际兄弟组织分为：1.总委员会或宪法会议。2.中央委员会。3.民族委员会。

1. 总委员会

这是或者按确定的期限定期召集的，或者由中央委员会多数作为非常会议召集的，全体或者至少是三分之二国际兄弟的会议。它是我们整个组织的最高制宪权力机关和最高执行权力机关，它可以修改我们组织的纲领、章程和组织规章。

2. 中央委员会

由(1)中央局和(2)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凡是不担任中央局委员的一切国际兄弟，只要离中央局相当近，可以在两天以内召集起来，——当然还有因过路而在当地的一切兄弟——都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在其他方面，它们在一切相互关系中，都遵循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见第二条至第四条)。

3. 民族委员会

每一个民族委员会都由当时在全国性组织中心或其附近的一切国际兄弟(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组成。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又分为：(1)民族执行局和(2)民族监察委员会。民族监察委员会应当包括当时在当地的、没有参加执行局的一切国际兄弟。其相互关系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执行局和监察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同。

十一、吸收新的兄弟须由民族委员会全体当时在当地的委员

(不得少于三人)做出一致决定，并经中央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中央委员会可以根据自己全体委员的一致决定，直接吸收新的兄弟。

十二、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应当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以便监督和活跃该委员会执行局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行政工作。它是自己的每一个成员在有关他们革命品质或者有关他们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一切方面的行为的当然裁判官。它的决定应当提交中央委员会批准。它指导自己全体成员的活动和公开的言论。它通过自己的执行局或者由它所指派的兄弟同中央局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至少每两星期一次。

十三、民族委员会组织本国的民族兄弟的秘密联盟。

(二)民族兄弟会

十四、民族兄弟在每一个国家内应当这样组织起来：使他们永远不能脱离国际兄弟共同组织的领导，特别是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他们的纲领和章程只有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最后生效。

十五、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如果认为合适的话，都有权规定两类民族兄弟：(1)一类是在全国内彼此了解的民族兄弟；(2)一类是只是在不大的小组范围内彼此了解的兄弟。民族兄弟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应当哪怕是怀疑国际组织的存在。

十六、在全国的一切重要地点建立省中心，省中心由国际兄弟或第一类民族兄弟的全体或其中一部分组成，任务是尽可能深入而且尽可能广泛地发展秘密组织和宣传它的原则，它们不限于在城市中进行活动，而且也要在乡村中和在农民中传播这些原则。

十七、民族委员会应当尽快地筹到不仅是它自己的组织顺利地地进行活动所必需的，而且也是整个协会的共同需要所必需的经

费。因此,它们将把经费的一部分——一半? ——上缴中央局。

十八、民族局应当非常积极地进行活动,记住只有在那些应当实现原则、纲领和章程的人身有魔胆的时候,这些原则、纲领和章程才有价值。

(三)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组织

一、同盟常设中央委员会由各常设民族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日内瓦中央支部的成员组成。

这一切成员召开的全体会议就构成同盟的秘密全体大会,秘密全体大会是同盟的制宪权力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它每年最少在工人代表大会期间召开一次,其参加者以同盟在各个不同国家中的组织的代表的资格出席;大会也可以由中央局或日内瓦中央支部在任何时候召开。

二、日内瓦中央支部是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任代表团。它由中央局全体委员和那些硬性规定必须永远兼任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监察委员会委员组成。中央支部在宪法和行为规范的范围内是同盟的最高执行委员会,但是,宪法和行为规范只有全体大会才能制定和修改。中央支部根据普通多数票决定一切实际问题(但不是宪法问题和一般政治问题);只要中央局的多数委员不愿意向全体大会申诉,这样通过的决议中央局就必须执行,如果申诉,中央局必须在三个星期以内召开全体大会。这样召开的全体大会只有在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参加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三、中央局——执行权力机关——设委员三名至五名或者甚至七名,他们必须同时是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局作为组成秘密中央支部的两个部分之一,是一个秘密组织。作为这种组织,它接受中央支部的指示,向一切民族委员会发出通知(不是秘密命令),并且从各民族委员会那里每月至少得到一次秘密报告。作为

公开同盟的执行权力机关，中央局是一个公开组织。作为这种组织，它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情况，同一切民族局保持或多或少、或秘密或公开的联系，同时每月也从各个民族局得到报告。对外，它的管理机构将同联邦制共和国的总统制相一致。中央局作为同盟的既秘密又公开的执行权力机关，将使本团体的秘密宣传和公开宣传活跃起来，并且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促进同盟在一切国家中发展。它掌管根据公开章程(六)条的规定由一切国家上缴供共同需要用的那一部分经费。它出版报纸和小册子，并且派自己的旅外代办到还没有同盟组织的国家中去建立组织。它在为了同盟的利益而必须实行的一切措施中，都应当服从秘密中央支部多数的决定，中央局全体委员都参加秘密中央支部。中央局是一个同时既公开又秘密的组织，而且它完全由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所以它始终将是这个委员会的直接代表机关。临时中央局将作为创建同盟的全体盟员临时推选出来的机构而提交日内瓦发起小组批准。这些创建同盟的盟员过去大多数是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公民B^①而各自回国去了。临时中央局在第一次公开全体大会召开以前将一直行使其职权。根据公开章程第七条规定，第一次公开全体大会将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在最近这次工人代表大会期间召开。不言而喻，这次大会将任命新中央局委员。但是，由于中央局绝对有必要只由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所以常设中央委员会应当通过自己的各个民族委员会保证这样来组织和领导一切地方组织，使它们只派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者绝对忠实于本国民族委员会领导的人(如果没有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代表出席大会，以便常设中央委员会能够经常控制同盟的整个组织。

四、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局的全部活动实行监督。它由住在中

^① 指巴枯宁。——编者注

中央局所在地或其附近的所有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临时住在或者路过当地或附近的所有委员组成,但是组成中央局的委员除外。根据监察委员会两名委员的要求,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应当在三天以内到齐,同中央局委员一起召集最高执行委员会中央支部大会,其权利在第二条中已经作了规定。

五、民族委员会由所有属于同一民族的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一个民族有了三名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则由中央局或者必要时由中央支部建议他们成立本国的民族委员会。每一个民族委员会都可以任命本国中央委员会的新委员,但是任命必须根据该委员会全体委员的一致决定。民族委员会在任命新委员时应当立即通知中央局,中央局给新委员注册,从而授予他以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一切权利。日内瓦中央支部同样也有权根据支部全体成员的一致决定来任命新委员。

每一个民族委员会都有在本国建立和组织同盟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民族组织的专门任务。它通过应该由它建立的、完全由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的民族局,对民族组织实现最高领导并成为这个组织的首脑。各个民族委员会对相应的民族局的关系、权利和权力将同中央支部对中央局的关系、权利和权力一样。由相应的民族局和监察委员会联合组成的民族委员会,除了中央局以外不承认别的领导机关,民族局无论在宣传和行政方面还是在征收和上缴会费方面,都将是中央局和本国的一切地方组织之间的唯一中间机关。民族委员会通过相应的民族局应当保证这样来组织本国的同盟:使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永远在同盟中占统治地位,并代表同盟出席代表大会。

随着各个民族局建成了地方组织以后,民族局就应当把它们的章程和纲领提交中央局批准,否则地方组织不能参加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国际社会主义同盟纲领

一、国际同盟建立的宗旨，是要在我们纲领所宣布的那些原则的基础上组织和加速世界革命。

二、根据这些原则，革命的目的只能是：（1）在欧洲破坏任何统治和一切权力（宗教的、君主的、贵族的、资产阶级的），从而也就是破坏现存的一切国家及其全部政治、法律、官僚和财政机构。（2）在以集体所有制、平等和正义为起点的，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这个唯一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

三、我们所了解的革命，确切地说是事物的力量现在必不可免地要提出来的革命，实质上带有国际性或者普遍性。面对着拥有谄练的组织所提供的一切威慑手段的欧洲一切特权利益和一切反动力量的带有威胁性的联合，面对着现在在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到处呈现的深刻分裂，任何民族革命，如果它不立即扩展到其他一切民族，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它本身不包含普遍性的一切因素，就是说如果它不是破坏国家并且借助于平等和正义来缔造自由的、公开社会主义的革命，它就永远不能跨越一个国家的国界而具有普遍性；因为除了站在世袭土地占有制和资本方面的一切机构的废墟上彻底解放劳动的口号以外，现在什么也不能把伟大的、唯一真正的时代力量——工人联合、发动和调动起来。

四、由于即将爆发的革命只能是普遍的革命，所以同盟，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应当准备、组织和加速革命到来的阴谋，也应当是这样的。

五、同盟追求双重目的：（1）它致力于在一切国家的人民群众中传播对政治、社会经济和一切哲学问题的正确观点。它将利用报纸、小册子和书籍，并且通过建立公开团体的办法，积极进行宣

传；(2)它将努力把一切人：聪明的、精力充沛的、坚定的、有善良意志的、矢志于我们思想的人，都吸引过来，以便在整个欧洲，并且尽可能也在美洲建立一个正是由于这样联合起来而变得更加有力的忠诚的革命者的无形的网。

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

一、这个组织的原则和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的原则相同。这些原则在俄国社会主义民主派纲领有关妇女问题、从宗教观点看家庭、法律和国家的那一部分中，将要更加明确地加以阐述。

中央局保留有在不久以后对这些原则提出更加详尽的理论阐述和实际阐述的权利。

二、国际兄弟联盟致力于普遍革命——在社会、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同时进行的革命，——以便首先在整个欧洲，然后在世界其他各地彻底铲除以财产、剥削、服从和权威（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资产阶级学理主义的或者甚至是雅各宾式革命的权威）原则为基础的现代秩序；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给劳动者以和平，给一切被压迫者以自由，处死压迫者、剥削者和各种保护者，我们致力于破坏一切国家和一切教会，以及它们的全部机构和法规（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财政的、警察的、大学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以便千百万不幸的人，受欺骗的、受奴役的、受摧残的、受剥削的人，最后摆脱他们的一切官方的和半官方的、集体的和个体的导师和恩人，而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三、我们确信，个人和社会的祸害的根源与其说在单个的个人之中，不如说在事物组织和社会地位之中，所以不管是从正义感出发，还是出于利害的考虑，我们都将是人道的，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摧毁这种地位和事物本身，以便能够在对革命没有任何损害的情

况下宽恕人们，我们否认社会有意志自由和进行惩罚的虚构的权利。正义本身，按照这个词的最合乎人性、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无非是所谓否定的和过渡性的思想；它提出各种社会问题，但是并不去周密地考虑它们，而只是指出一条解放人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和平等使社会人道化；只有在日益合理的社会组织中才可能提供积极的解决办法。这是非常合乎期望的解决办法，是我们的共同理想……这是通过普遍团结所达到的每一个人的自由、道德、理性和福利——人类的博爱。

每一个单个的人都是他在其中诞生、发展并继续受其影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产物。人的全部不道德行为的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作为不平等的自然结果的愚昧无知，以及这两者的必然后果——奴役。

由于社会组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人们所犯的罪行的唯一原因，所以惩罚罪犯是社会方面的伪善行为或者显然的荒谬论调，因为任何惩罚都是以罪行为前提的，而罪犯们永远都是无辜的。犯罪和惩罚的理论是神学的产物，即荒谬论调和宗教伪善行为相结合的产物。

可以承认社会在其目前过渡状态中所具有的唯一权利，就是为了自卫而杀死它自己制造出来的罪犯的自然权利，而不是审判和惩治这些罪犯的权利。这种权利甚至也不是按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来说的；不如说这是令人悲痛的但是必不可免的自然事实，是现实社会的无力和愚钝的标志和结果；社会愈少地使用这种权利，它就愈接近于它本身的真正解放。一切革命者，一切被压迫者，一切受苦受难者，都是现代社会组织的自然满怀憎恨和复仇情绪的牺牲品。他们应当记住，各种各样的国王、压迫者和剥削者同人民群众中出现的罪犯一样，也是有罪的。他们都是恶棍，但不是罪人，因为他们和普通的罪犯一样，都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不以意志为转移

的产物。起义的人民在初期要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杀死是毫不足怪的；这将是一种不幸，也许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也象暴风雨所造成的破坏一样，是无足轻重的。

但是，这个自然事实将既不是道德的，甚至也不是有益的。在这方面，历史上充满了富有教益的例证。例如 1793 年可怕的断头台，虽然不能指责它毫无作为和拖延误事，但是它并没有把法国的贵族阶级消灭。使贵族即使没有被彻底消灭，无论如何也是受到了深深的震惊的，并不是断头台，而是没收和拍卖贵族的土地。而且一般地可以说，政治屠杀从来没有使一个党派遭到过致命的打击，政治屠杀用来反对特权阶级尤其显得无力，因为力量的根源与其说是在人们之中，不如说是在事物的秩序即国家制度和既是它的后果同时又是它的基础的私有制使特权者所处的那种地位之中。

所以，要实现激进的革命，就必须攻击地位和事物，摧毁财产和国家；这样并不需要消灭人们，使自己注定走向真正的和必不可免的反动，而反动在每一个社会中过去和将来永远都只会导致屠杀人们。

但是，要想有权以人道对人而又不损害革命，就必须对地位和事物毫不留情，就必须摧毁一切，而特别是和首先是摧毁财产和它的必不可免的后果——国家。这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

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成为社会主义者与其说是出于信念，不如说是出于必要性，对于他们说来，社会主义是手段，而不是革命的目的，这是不值得奇怪的，因为他们想实行专政，就是说想实行国家中央集权，而国家由于必不可免的和逻辑的必要性，必定会使他们走向恢复财产，因此，我们说，他们不希望实行反对事物的激进革命，而策划反对人们的流血革命，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种以建立高度集中的革命国家为基础的流血革命必不可免地要导致军事专政的出现，导致新统治者的出现，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更加详尽

地论证。所以，雅各宾派或布朗基派的胜利就意味着革命的死亡。

四、我们是那些作为未来的专制者、立法者和革命保护者的革命者的天然敌人，他们在现代的君主国家、贵族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还没有被破坏以前，就已经幻想要建立同现存国家一样集中并且比现存国家更加专制独裁的新的革命国家，他们是如此习惯于由某种权威自上而下地建立的秩序，并且如此害怕在他们看来是无秩序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人民生活的直接的、自然的表现的东西，以致在革命还没有制造出这种光荣的和能拯救一切的无秩序以前，他们就已经幻想要结束革命并且用行动来控制某种权力，在这种权力之下，革命只有名存实亡，而这种权力事实上只能是新的反动，因为它将注定使受法令支配的人民群众重新遭受服从、停滞和死亡的厄运，即遭受新的、假革命的贵族的奴役和剥削。

五、我们心目中的革命，其意思就是放纵现在称为恶欲的那种东西并且破坏在同一种语言中称为“社会秩序”的那种东西。

我们不害怕无政府状态，而且呼吁这种状态，我们坚信，从这种无政府状态即解放了的人民生活的充分表现中，自由、平等、正义、新秩序和反对反动势力的革命力量本身一定会诞生出来。这种新生活——人民革命——无疑将会迅速建立起来，但是它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时将自下而上地、从地方到中央地以自由原则为根据，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从中央到地方地以任何权威为榜样，——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做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

六、我们心目中的革命从第一天起就应当根本、彻底地破坏国家和一切国家机构。这种破坏的自然和必然的后果是：(1)国家的破产；(2)授权每一个债务人自行偿付(如果他希望这样做的话)债务，以停止国家对追索私人债务的干预；(3)停止征缴任何直接或

间接的捐税；(4)解散军队、司法部门、官吏、警察和僧侣；(5)废除官方司法制度，废除一切法律上称为权利的东西，并停止实现这些权利。这样，也就废除和烧毁一切规定了所有权和依法继承权的文书契约(买得的和赠予的)、一切诉讼案件，总而言之，废除和烧毁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废物。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方面都以革命行动代替国家所创立并加以保障的权利；(6)没收一切生产资本和劳动工具，归各工人协作社所有，由它们集体使用；(7)没收一切教会和国家的财产以及属于个人的贵重金属，归组成公社的一切工人协作社的联合同盟所有。公社将给这样被剥夺了财产的人供应最必需的用品以补偿被没收的财产，往后只要他们愿意和有本领，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挣得更多的东西。(8)为了成立公社，要把不断行动的街垒联合起来并通过由每一个街垒选派一名或两名代表，由每一条街道或每一个街区选派一名代表——这些代表都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在一切方面都负责任并随时可以撤换——的办法成立革命公社委员会。这样组成的公社委员会可以从委员会内部选出为公社的革命管理机关的每一个部门所特设的执行委员会。(9)发表组成了公社的起义首都的宣言，声明首都在消灭了权威主义的和执行监护任务的国家(它有权这样做，因为它象其他地方一样被国家所奴役)以后放弃自己的权利，确切地说，放弃管理和强制各个省份的任何野心，(10)号召一切省份、公社和协作社抛弃一切，效法首都的榜样，首先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改组，然后再派自己的代表(同样地一律都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是负责的和可以撤换的)到规定的集合地点去，以便成立为了同样的原则而举行起义的各协作社、公社和省的联邦，并且把能够战胜反动派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派遣不是肩披某种绶带的正式的革命全权代表而是革命的宣传员到一切省份和公社去，特别是到农民中去，因为能够使农民革命化的，既不是什么原则，也不是某

种专政的告示，而只是直接的革命行动，是必不可免地在一切公社中将使国家的正式法律生活完全停止的那些后果。废除民族国家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为了同样的原则而举行起义的任何别的国家、省份、公社、协作社，或者甚至个人，不问各国的现存国界及其属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系统或民族系统，都将被吸收到革命联盟中来；而站在反动派方面的本国的省份、公社、协作社和个人则将不准加入这个联邦。因此，由于为了使起义的各国能够互相卫护而扩展革命和组织革命这一事实本身，以废除国家和破坏国家为基础的革命的普遍性就将获得胜利。

七、如果政治革命不变成社会革命，如果民族革命正是由于它的激进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对国家的破坏不变成普遍的革命，那现在要进行胜利的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八、因为革命在任何地方都应当由人民来进行，并且革命的最高领导权应当经常归于组成了各农业协作社和工业协作社的自由联邦的人民，所以，通过革命代表团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不分旧的国界和民族差异而包括为了同样的原则而举行起义的一切国家的、新的、革命的国家的任务，将是管理各个社会机关，而不是管理各国人民。它将建立一个新的祖国——反对一切反动势力同盟的普遍革命同盟。

九、这个组织排除任何专制和执行监护任务的统治权力的思想。但是，正是为了建立这种革命同盟，为了革命战胜反动，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应当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国际兄弟联盟。

十、这个联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革命永远是既不能由个人也不能由秘密团体来进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变和事实的进程所引起，它好象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

群众本能意识的深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然后才爆发出来的，表面上常常是由于无关紧要的原因所引起。组织得很好的秘密团体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众中传播与群众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帮助革命的诞生，并且组织——不是组织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军队始终应当是人民——革命的总参谋部，由忠诚的、坚毅的、聪明的，主要地是真诚的，而不是沽名钓誉的人，由有能力作为革命思想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组成。

十一、因此，这种人的数目不宜过多。整个欧洲的国际组织有一百名紧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的革命者就足够了。最大的国家的组织有二三百名革命者也就足够了。

（二）公开同盟的纲领和章程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社会主义少数派由于伯尔尼代表大会多数派投票正式表示反对一切工人联合会的基本原则，即反对阶级和个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结果便脱离了同盟，从而也就赞同在日内瓦、洛桑和布鲁塞尔召开的各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些原则。这个少数派中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几个成员建议我们组织一个加入伟大国际工人协会，但其特殊使命是根据地球上一切人普遍和真正平等的伟大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新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我们自己也确信这个倡议是有益的，因为它将给欧洲和美洲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提供一个相互了解和确立自己思想的手段，而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现在必须大加吹捧的假社会主义的任何压力，因此，我们认为和这些朋友们共同倡议建立这个新组织是自己的责任。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组成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现在把中央支部的纲领和章程公布出来。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

一、同盟奉行无神论；致力于废除宗教崇拜，用科学代替信仰，用人的正义代替神的正义。

二、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为此应当从废除继承权开始，以便将来每个人能按照他的生产劳动享受物质福利，以便根据最近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使土地、劳动工具以及任何资本都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并仅仅由从事劳动的人使用，即由农业协作社和工业协作社使用。

三、同盟力求使一切儿童，不分男女，从出生时起，就享有同等的发展条件，得到抚养、教育以及在科学、生产和艺术的一切阶段上学习的同等条件，因为同盟深信，这种起初只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将日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伟大的、自然的平等，将导致各种人为的不平等的消失，这种不平等是既虚伪又不正义的社会组织的历史产物。

四、同盟与一切专制制度为敌，不承认除共和制以外的任何其他政体，无条件反对同反动派结成任何同盟，因此，任何政治行动若不以工人反对资本的事业的胜利为直接和立即的目的，同盟也一概反对。

五、同盟认为，现存的一切政治的和权威主义的国家，正在愈来愈把自己的职能缩小为管理本国公益事业的简单行政机关的职能，这些国家必将在工农业自由协作社的普遍联合体中消失。

六、鉴于社会问题只有在世界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或者普遍

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彻底的和真正的解决，同盟反对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各民族竞争为基础的任何政策。

七、同盟力求实现一切地方协作社在自由的基础上的普遍联合。

章 程

一、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成立起来的，它完全接受协会的共同章程。

二、创建同盟的盟员临时在日内瓦组成中央局。

三、属于一个国家的创建同盟的盟员成立本国的民族局。

四、民族局负有在一切地方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地方组织的任务，各地方组织将通过本国的民族局向同盟的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五、一切地方组织遵照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方支部通过的实际办法，成立自己的局。

六、凡是同盟的盟员都有义务每月缴纳 10 生丁的会费，其中一半留给各民族组织用于自己的需要，另一半上交中央局会计处用于中央局的共同需要。

在那些认为这个数额太高的国家，民族局取得中央局同意后可以降低。

七、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工人协会一个分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写于 1868 年 9 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8 卷第 501—513 页。

致卡·马克思(摘录)

编者按语·

为了使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打入国际，巴枯宁于1868年11月29日把同盟的章程和纲领寄给总委员会请求批准，12月22日又给马克思写了这封“颂扬信”，虚伪地说国际是自己的“祖国”，称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妄图骗取马克思的信任。然而马克思早已看穿他的阴谋，就在他写这封信的同一天，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领导下一致通过决议拒绝接受同盟加入国际，马克思还向国际的所有组织发出内部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揭露了这个自称“学生”的阴谋家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险恶用心。

1868年12月22日

我的老朋友!

谢尔诺把你的信^①中涉及我的那一部分告诉了我。你问他，我是否仍然是你的朋友。是的，亲爱的马克思，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更是你的朋友，因为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好地懂得，你是多么正确；你选择了经济革命的大道，还要我们跟你走，并且嘲笑我们之中那些在民族的或者纯粹政治的活动的小道上迷路的人。我现在

^① 指马克思给谢尔诺的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28页。——编者注

从事的就是你在二十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的事情。自从我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上郑重和公开地宣布脱离资产阶级以来，除了工人世界，我现在不知道有别的社会，别的环境。现在，国际将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的创建人之一。因此，亲爱的朋友，你可以看出，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这就是我认为必需说的一切，以便向你表明我个人对你的态度和感情。

.....

忠实于你的

米·巴枯宁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137—138页。

国际的政策(摘录)

· 编者按语 ·

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拒绝接收同盟的决议，给了野心家巴枯宁以沉重的打击，于是他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同意总委员会的信件，宣布解散同盟，暗地里则保留同盟的组织，继续进行阴谋活动。

巴枯宁就这样靠玩弄阴谋诡计使他的同盟混入了国际。马克思指出：“巴枯宁保留着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秘密团体，为的是用这种手段把国际置于他的领导之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06页）。从此以后，在巴枯宁集团的策划下，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夺取国际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便加紧进行。为了实现篡夺国际领导权和分裂国际的野心，巴枯宁首先着手歪曲和篡改国际的纲领和路线。他在1869年8月7日《平等报》上发表的《国际的政策》这篇文章，就是他大肆歪曲和篡改国际章程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国际的《宣言》和《章程》解释成非政治倾向的文件，把国际说成是一种进行纯粹经济斗争的组织，妄图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清算”和“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来偷换国际的阶级斗争的纲领。

.....

我们认为，国际的创始人最初在协会的纲领中不涉及政治问

题和宗教问题是非常聪明的。毫无疑问，他们自己有清楚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反宗教观点；但是，他们放弃把这些观点写入纲领，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为了共同事业把整个文明世界的工人群众联合起来。他们应当寻找共同的基础，寻找所有工人都能同意的许多一般原则，不管他们在政治和宗教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只要他们是真正的工人，即遭到沉重剥削和受苦受难的工人。

如果他们举起了某一政治派别或反宗教派别的旗帜，他们就决不会把欧洲的工人联合起来，而且还会加深他们的分裂。因为，由于工人的无知，神甫、政府和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最红色的）的自私自利的和极具腐蚀性的宣传，在工人群众当中散布了许多错误的观点，不幸的是，这些被骗的群众往往还迷恋于旨在迫使他们自觉地和愚钝地去损害自己的利益并为特权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一切谎言。

但是，直到现在，各国工人群众在工业、政治、精神和道德发展的程度上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因此现在不可能用一个政治的和反宗教的纲领把他们联合起来。把这样一个纲领作为国际的纲领、作为参加这一协会的必要条件，就意味着建立宗派，而不是建立全世界的协会，就意味着毁灭国际。

此外，最初所以要把一切政治趋向从国际纲领中去掉（起码在表面上，而且仅仅是表面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有史以来直到现在，还没有过人民的政治；根据我们的理解，“人民”这个词指的是以自己的劳动来供养整个世界的“劳动的庶民”。到现在为止，只存在特权阶级的政治。这些阶级利用了人民的臂力来相互把对方赶下王位和取而代之。人民之所以经常赞成某一方反对另一方，那仅仅是因为它模糊地希望某一次这样的政治革命至少可以改善一下他们贫困的和永世受奴役的状况，尽管任何一次这样的革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但没有一次这样的革命

是为了他们而进行的。他们总是受骗。甚至伟大的法国革命也欺骗了他们。这次革命消灭了贵族阶级，但是又把资产阶级扶植起来代替了贵族；人民既不再叫做奴隶，也不再叫做农奴，他们被宣布为自由的、具有一切权利的人，但是他们的奴隶地位和贫困状况实际仍然和从前一样。

只要人民群众仍然充当资产阶级政治的工具，不管这种政治是否叫做保守的、自由的、进步的、激进的政治，或者甚至具有最革命的形态，他们的状况就不会改变。因为任何资产阶级的政治，不论它们的色彩和名称如何，实质上只能有一个目的：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对无产阶级的奴役。

国际应当做些什么呢？它应当首先使工人群众摆脱一切资产阶级政治，应当把所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从自己的纲领中排除出去。但是在国际成立的时候，除了教会、僧侣、贵族或资产阶级的政治以外，全世界没有其他的政治。资产阶级的政治，特别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和其他政治相比，毫无疑问是更加自由和人道的，但是它们同样都是以剥削工人群众为基础的，事实上除了相互争夺对这种剥削的垄断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可见国际应当从清除基地开始，因为从解放劳动的观点来看，任何政治当时都被反动分子所玷污，国际应当从自己内部摒弃以往的一切政治制度，以便在资产阶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真正的工人政治、国际协会的政治。

二

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始人避免把政治的和哲学的原则作为这一协会的基础，而且开始就使它具有劳动和资本的纯粹经济斗争的性质，这一点做得尤其聪明。他们相信，当工人进入这一基地的时

候，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自己人数的力量，开始和他们的同志们共同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的时候，由于事物的自然进程和斗争的发展，他们很快就会承认国际的一切政治的、哲学的和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些原则实质上只是国际的出发点和目的的真正表现。

我们在我们最近几期报纸^①上已阐述了这些原则。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原则的必然后果是消灭阶级，因而也消灭目前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消灭一切领土国家、一切政治祖国并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切民族的和地方的生产团体的伟大的国际联邦。至于哲学观点，它们指的是在地球上实现人的理想、人的幸福、平等、正义和自由，从而它们认为对天堂的任何指望、对彼岸世界美好未来的希望都是无用的，因而它们的必然后果同样是消灭一切迷信和宗教体系。

.....

工人们既不缺乏现实性，也不缺乏社会主义意图的必要性，他们只缺乏社会主义思想；每个工人全力以赴的，是充分的人的生活，这种生活无论就物质福利或智力发展来说，都是以正义即每个人和所有的人在劳动中享受平等和自由为基础的；当然，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人本能表现出来的这种理想，在以非正义和对工人群众进行无耻剥削为基础的现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下，是不能实现的。因此，每一个真正的工人必然是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的解放只能通过推翻现存的一切才能实现。或者是这个非正义的组织以及为了装璜门面而摆出来的一切昧良心的法律应当消灭，或者是工人群众注定永远遭受奴役。

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每个真正工人的本能中都有这种思想的萌芽。这就是说，目的就在于使工人们完全意识到他们所希望

^① 指在日内瓦出版的巴枯宁派报纸《平等报》。——编者注

的东西，就在于在他们当中唤起那种符合于他们本能的思想，因为当工人群众的思想提高到他们本能的水平的时候，他们的意志就坚定了，他们的威力就成为牢不可破的了。

.....

我们共同章程的前言中说：“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协会的主要基础。但是，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知的，他们现在还完全没有掌握理论。因此他们只有一条道路，即实践解放的道路。这种实践可能是和应当是怎样的呢？只存在着一种实践：这就是工人反对企业主的联合斗争。这就是成立工会，进行组织，建立抵抗储金会和这种储金会的联合会。

三

.....

工人们能够据以识别虚伪的社会主义者即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可靠标志是：如果当他向工人们讲革命或社会变革的时候说，政治变革应当先于经济变革；如果他否认这两种革命应当同时完成，或者否认政治革命应当无非是完全的和整个的社会清算的迅速和直接实现，那就让工人们唾弃他，因为他要么是个大傻瓜，要么是个假仁假义的剥削者。

国际工人协会为了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和不脱离能引导它达到目的的唯一道路，就应当主要消除两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内的资产阶级政治的拥护者，以及资产阶级合作社的拥护者，或所谓的实践的人们。现在我们首先来看看前者。

我们在上一期里说过，经济解放是一切其他解放的基础。我们把整个国际的全部政治归结为这一句话。

事实上，章程的前言中有如下的声明：

“劳动受资本的支配是一切奴役；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奴役的源泉，因而工人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当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不言而喻，任何政治运动，如果不把工人的彻底的、完全的经济解放作为直接目的，如果不把意味着资本完全归还给劳动或社会清算的经济平等原则明确写在自己旗帜上，则任何这样的政治运动，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应当把它作为资产阶级的运动排除于国际之外。

因此，应当毫不可惜地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或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排斥出去，因为他们宣称，“政治自由是经济解放的先决条件”，他们可能对这句话只作如下的理解：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应当先于经济改革或经济革命；就是说，工人应当同或多或少激进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同它一起首先完成前者，然后反对它而实现后者。

我们大声反对这一有害的理论，因为它只能引导工人去再次充当反对自己的工具，使他们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

先争取政治自由，这无非是意味着先争取这种自由，至少是在最初的日子里置旧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于不顾，即既保存傲慢地显示自己财富的资本家的所有制，又保存贫困的工人的所有制。

但是，有人说，既然能争取到这种自由，那它就会成为工人在以后争取平等或经济正义的事业中的工具。

的确，自由是一个很好的和强有力的工具；但是问题在于工人能不能真正利用这一工具，它会不会真正掌握在工人手中，或者是象直到今天始终存在的情况那样，他们的政治自由只会是骗人的

表面的东西和虚伪的东西。

.....

忠于自己原则的国际工人协会，决不支持不把工人的完全经济解放即消灭资产阶级这个在经济上脱离群众的阶级作为直接目的的政治鼓动，也不帮助不是从第一天、从第一小时起就把社会清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任何革命。

但是，革命不是临时想出来的。它不是按照一些个别人的意志，甚至不是按照一些最强大的团体的意志进行的。革命不取决于任何意志和任何秘密活动，而始终是由于事物本身的进程而发生的。人们可以预见革命，有时能够预先感到革命的临近，但是决不能加速革命的爆发。

我们坚信这一真理，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都预感到将发生危险的社会革命，在此之前的这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国际应当遵循什么政策呢？

国际根据自己的章程摒弃一切民族的和地方的政治，使各国工人的鼓动具有纯经济的性质。它提出的目标是：减少工时，增加工资；提出的方法是：联合工人群众，建立抵抗储金会。

国际将宣传自己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全世界工人集体利益的最纯正的表现，是国际的灵魂，是协会的全部生命力的所在。它要广泛地进行这种宣传，不怕触痛资产阶级，以便使每一个工人摆脱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停滞状态（有人却力图使他们处于这种状态），使每一个工人了解局势，知道他们应当希望什么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为自己争得人权。

国际之所以应当更加热情地、不屈不挠地进行这种宣传，是因为我们在国际内部常常碰到这样的势力，它们鄙视这些原则，企图把这些原则看作是不需要的理论，竭力使工人回过头去接受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的信条。

它最后会扩大，会牢固地组织起来，超出各国国界，以便在由于事物的自然进程而即将来临的革命一旦爆发的时候，找到这样一种现实力量，这种力量知道它应当做些什么，因而它能够把革命掌握在自己手里并给予它一种拯救人民的方向：即建立全世界工人协会这样严肃的国际组织，来代替这种国家和资产阶级的过时的政治世界。

我们现在把我们共同章程前言中的最后一段话引出来，作为这篇准确阐述国际的政策的文章的结尾：

“欧洲各工业国家的工人运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

写于1869年8月。译自《巴枯宁选集》彼得堡—莫斯科1920年俄文版第4卷第7—9、11—12、13、17—19、21—22页。

革命问答

· 编者按语 ·

巴枯宁的党徒们是一伙流氓和恶棍，他们打着国际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搞阴谋暗杀活动，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危害极大。这里选录的《革命问答》是巴枯宁为他的党徒们起草的行动手册。这个用密码写成的小册子，把“破坏一切”规定为任务，要他的党徒们“仇恨所有的一切”、“摧毁一切”，“只知道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只应该有一个思想，一个目的——无情地破坏”。这充分反映了巴枯宁及其所代表的破产了的城乡小生产者的绝望情绪。关于这个小册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72页）

革命者对自己的态度

第一条 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务、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融汇在唯一仅有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激情——革命之中。

第二条 他从内心深处，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与公民秩序、与整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礼节、惯例和道德断绝任何联系。他是这个文明世界的无情敌人，如果他继续生活在这个文明世界之中，那只是为了更可靠地破坏它。

第三条 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主义，拒绝世俗科学，而让后辈去研究它。他只知道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他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也许还有医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且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为了这个目的日日夜夜地研究一门活的科学——人，现在的社会制度在一切阶层中的性质、状况和全部条件。目的只有一个——最迅速、最可靠地破坏这个丑恶的制度。

第四条 他鄙视社会舆论。他鄙视和憎恨目前社会道德的一切动机和表现。对他说来，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合乎道德的。凡是阻碍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

第五条 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他对国家和整个等级制的文明社会是无情的；他不应该期待对自己有任何宽恕。在他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或秘密或公开的、但是不间断和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他应该学会经得起拷打。

第六条 他对自己是严酷的，对别人也应该严酷。一切亲属、友谊、爱情、感激等温柔脆弱的感情都应该被唯一的革命事业的冷静激情抑制下去。他只有一种柔情，一种安慰，一种褒奖和满足——革命的成功。他日日夜夜只应该有一个思想，一个目的——无情地破坏。他沉着地、不倦地致力于这个目的，因此他应该准备牺牲自己，并且准备亲手摧毁妨碍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东西。

第七条 真正革命者的本性不容许有任何浪漫主义，任何伤感、欢乐和嗜好；甚至也不能容许有私仇和进行个人报复。革命激情应该成为他经常的、每时每刻的内心状态，并且要与冷静的考虑结合起来。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应该受私欲驱使，而应该为共同

革命利益的要求所支配。

革命者对革命同志的态度

第八条 对革命者说来，只有在行动上表明是与这个革命者自己从事同一种革命事业的人，才能够成为朋友和亲爱的人。这种同志在破坏一切的实际革命事业中的有用程度，是确定对他的友谊、忠诚和其他义务的唯一尺度。

第九条 革命者的团结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是革命事业的全部力量所在。在革命认识和革命激情方面处于同等程度的革命同志，应该尽可能共同讨论并且一致决定一切重大事务。因此，在实现既定计划的过程中，每个人应该尽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完成一系列的破坏行动，只有在为事业的成功所必需的时候，才向同志们求教并取得他们的帮助。

第十条 每个同志手下都应该有几个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革命者，即非完全亲信者。他应该把他们看做共同的革命资本中交由他支配的一部分。他应该节省地使用自己这部分资本，经常努力从中取得最大的利益。他应该把自己看做用于使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资本，而且只应该看做是这种资本，未经完全亲信者的整个协会同意，他本人决不能单独加以支配。

第十一条 当同志遭受不幸，要决定是否搭救他的问题时，革命者不应该考虑什么私人感情，而只应该考虑革命事业的利益。因此，他一方面应该估计这位同志所能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应该估计由于搭救这位同志需要损失多少革命力量，权衡一下孰轻孰重，再行决定。

革命者对社会的态度

第十二条 吸收不是言论上而是实际上表现良好的新成员加入协会，应经全体一致通过，方为有效。

第十三条 只有抱着最彻底、最迅速地破坏国家的、等级制的、所谓文明的世界的信念，革命者才进入这个世界并在其中生活。如果他对这个世界还有所怜惜，他就不是革命者。他应该毫不犹豫地消灭这个世界的地位、关系或者任何人。他应该同样地仇恨所有的一切。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中有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和爱情关系，那就更糟糕；如果他的手能被他们拦住，他就不是革命者。

第十四条 为了达到无情地破坏的目的，革命者可以而且常常应该假装成与他的本来面目完全不同的人生活在上。革命者应该潜入一切地方，一切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小店铺、教会、贵族家庭、官僚界、军界、文艺界、第三厅，甚至潜入皇宫。

第十五条 应该把这整个丑恶社会分成几类人：第一类应该立即判处死刑。本协会将以对革命事业成功的危害程度为序拟定罪犯名单，按名单次序进行处决。

第十六条 在拟定这种名单和确定上述次序时，决不应该以一个人的个人恶行，甚至不应该以他在本协会或人民中所激起的公愤为标准。这种恶行和这种公愤甚至可能有部分的好处，它们有利于激起人民的暴动。应该以处死某一个人能够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好处的大小为标准。所以，首先应该消灭对革命组织特别有害的人，以及突然横死会引起政府的最大恐惧的人，使政府失去聪明而有毅力的活动家，从而动摇它的力量。

第十七条 第二类应该包括那些只是暂时让他们活着，以便

让他们用一系列兽行迫使人民必然发起暴动的人。

第十八条 第三类是为数众多的身居高位的畜牲，或者虽然既没有特别智慧又没有毅力，但是由于所处地位而拥有财富、联系、威望和力量的人。必须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剥削他们；把他们制服，把他们弄糊涂，并且掌握他们的龌龊的秘密，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权力、威望、联系、财富和力量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帮助。

第十九条 第四类是国家中的沽名钓誉者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可以按照他们的纲领同他们一起进行秘密活动，表面上假装是盲目地跟着他们走，实际上则要完全支配他们，掌握他们的秘密，使他们的名誉彻底扫地，使他们无法脱身，然后再用他们的手去扰乱国家。

第二十条 第五类是总爱在小团体内和在纸面上大发空论的教条主义者、秘密工作者和革命者。必须不断地推着他们、拉着他们前进，使他们去进行实际的、复杂困难的活动，结果多数人将无声无息地死去，少数人将受到真正的革命锻炼。

第二十一条 第六类，也是重要的一类，是妇女。她们又应该分为主要的三种人：一种是内心空虚、思想愚钝、麻木不仁的人，她们可以象第三类和第四类男子一样加以利用；另一种是热情、忠诚、能干的人，但不是我们的人，因为她们还没有锻炼到具有真正的、毫无空话的、实际的革命认识的程度。她们可以象第五类男人一样加以使用；最后一种妇女是完全是我们的人，即完全亲信者、完全接受了我们纲领的人。我们应该把她们看做是我们的无价之宝，我们没有她们的帮助是不行的。

本协会对人民的态度

第二十二条 除了人民即无知大众的彻底解放和幸福以外，本协会没有其他目的。但是本协会坚信，只有通过摧毁一切的人民革命才可能实现这种解放和达到这种幸福，所以本协会将利用一切力量和手段促进那些最终必然使人民无法容忍并迫使他们实行普遍起义的不幸和灾祸发展和蔓延。

第二十三条 本协会所理解的人民革命不是按照西方典范炮制的运动，这种运动总是不敢触动财产以及所谓文明和道德的社会秩序的传统，它迄今到处都只限于为了推翻一种政治形式而代之以另一种政治形式，并且力求建立所谓的革命国家。拯救人民的革命，只能是根本消灭一切国家并且根除俄国秩序的一切国家传统和阶级的革命。

第二十四条 因此，本协会不打算自上而下地把任何组织强加于人民。毫无疑问，未来的组织一定要从人民运动和生活中产生出来。但是，这是后辈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是可怕地、彻底地、普遍地、无情地破坏。

第二十五条 因此，我们接近人民首先就应该同人民生活中的这样一些分子联合起来，他们从莫斯科公国成立以来不是在言论上而是在行动上不断对直接或间接同该公国有联系的一切，对贵族，对官吏，对神甫，对商界和小商人，人民的剥削者提出抗议。我们要同强悍的强盗界——俄国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联合起来。

第二十六条 把这个强盗界团结成一个不可战胜的、摧毁一切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全部组织、秘密活动和任务。

写于1869年夏。转载于《政府通报》1871年第162号。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72—476页。

致阿·里沙尔^①(摘录)

· 编者按语 ·

在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混入国际后，巴枯宁就积极策划利用即将召开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来实现他夺取国际领导权的罪恶野心，“为了保证自己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取得多数，巴枯宁搞了真正的阴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6页）。他给自己的党徒四处写信，要他们多多派人出席大会。这里选录的这封信，就是巴枯宁进行这种阴谋活动的罪证之一。

1869年7月29日

亲爱的朋友！

我于24日给你写了一封信，25日通过你的朋友朱泽培(?)给你送去了。谅已收到。我的确忙得不可开交，不过还不至于不能给自己的朋友们回信。你向我们要的东西，即二十个样本和一些记事本，以及雪茄烟等，由沙尔给你送去。我们已严厉地训令定期给你寄送通知书，我们还要强有力地肯定一下我们的安排。我已写信给所有的地方，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已决定在9月6日举行代表大会。请你们尽量多来人。因为，德国人在紧张地进行活动，我

① 阿尔伯·里沙尔 (Albert Richard 1846—1925) —— 法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巴枯宁的秘密组织同盟里昂支部的领导人；巴枯宁主义的报纸《平等报》的编辑，1870年9月参加了巴枯宁分子在里昂举行的起义，后来流亡伦敦，在那里反对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以后被揭露是波拿巴的密探。——编者注

担心，他们会把许多学理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东西塞进巴塞尔代表大会。

请回信，而主要的是请通知我，我们寄的东西以及我的上一封信是否已经收到。

你的忠实的

米·巴·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256—257页。

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 编者按语 ·

巴枯宁施展各种卑鄙手段,派了10名代表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巴枯宁也亲自出马,指挥他的喽罗向总委员会进攻。他策划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妄图把他的无政府主义纲领强加给大会,从而改变国际的基本路线,使国际“完全受独裁者巴枯宁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6页)。马克思的拥护者立即给巴枯宁集团以迎头痛击。他们宣读了马克思在大会前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深刻批判了“废除继承权是解放劳动的一个必要条件”的谬论,指出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5页)。1869年9月10日,巴枯宁发言为他废除继承权的主张辩护。为了取得蒲鲁东分子的支持,他故意不提在前一次发言中借批判维护土地私有制的蒲鲁东主义者为名所鼓吹的“社会清算”的主张,反而说,他主张废除继承权是“从实际考虑出发”,即“起码要使小农成为他现在占有的那块土地实际上的终生占有者”。巴枯宁想靠这种阴谋手法争取蒲鲁东主义者的支持,使大会通过废除继承权的决议,从而证明国际放弃了马克思制定的基本路线,接受了他的主张,然后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到巴枯宁集团的巢穴日内瓦去。在总委员会代表的反击下,巴枯宁的罪恶企图没有得逞。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巴枯宁在巴

塞尔代表大会上对总委员会的攻击“成了同盟对国际进行公开不断的战争的信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页）。

巴枯宁说：没有农民〔代表〕出席并不能成为反对代表大会有权通过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决议的根据。……私有制始终无非是某些个别人占有集体的劳动。发言人拥护土地及一切社会财富的集体所有制，他把这叫做社会清算。他所谓的社会清算就是废除批准和保证少数人占有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国家。任何一种生产劳动主要都是社会劳动，只有在把前辈的劳动和现代人的劳动结合起来的情况下，生产才是可能的；我们错误地称为个体劳动的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积极拥护多数人的建议，因为公社的联合是以自下而上地组织社会为前提的，而少数人的建议却仍然谈论国家。他要求消灭一切民族的和领土的国家，并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千百万劳动者的国际性的国家，国际的任务就是建立这样的国家。

巴枯宁说：公有制的拥护者中间是有分歧的。一方不愿意研究继承权，而从土地及其他劳动资料成为集体所有制时将出现的情况这样一种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而发言人从目前存在着和盛行着继承权的这种情况来看这个问题。〔总〕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指出，继承权仅仅是目前状况的结果，在这种状况消灭以后，继承权就会消失。毫无疑问，在历史上，事物的现实状况始终先于法律的权利而存在，后者总是给前者以批准，但同样无可争辩的是，过去曾经是结果的法律的权利，又成了其他结果的原因；为了获得其他结果，就必须把它们变成它们的对立面。这样一来，得到国家保障的继承权就成了劳动资料私有制的基础和主要条件。有人对发言人说，宣布废除继承权是不现实的，因为假使工人有充分的权

力来消灭继承权，那末他们也就有充分的权力来消灭这个权利的原因本身。但是不管是发言人还是他的朋友建议废除继承权，首先正是从实际考虑出发的。他听到有人说对小农和小土地所有者实行剥夺有困难，的确毫无疑问，实行这种剥夺的企图会把小农推到反动党派的怀抱中；这是需要避免的。起码要使小农成为他现在占有的那块土地实际上的终生占有者。如果把继承权保存下来，农民就不仅继续是占有者，而且是所有者，并会把这种称号传给自己的子女。如果这个权利、法律的权利被取消，如果它不再被国家用暴力强加于人，——他们的地段就会不可避免地交还给社会。

译自《巴塞尔代表大会。文献汇编》1934年俄文版第47—48、59—60页。

附录：巴塞尔代表大会废除继承权 问题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 编者按语 ·

废除继承权问题是巴枯宁唆使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为了粉碎巴枯宁的进攻，代表大会前，总委员会对继承权问题进行了讨论，马克思做了精辟的发言，并起草了关于继承权的报告。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讨论继承权问题。巴枯宁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在这个委员会中占多数，巴枯宁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结果该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巴枯宁主义的报告，即决议案。决议案未获多数通过，巴枯宁的阴谋破产。

鉴于：同私有制有密切关系的继承权促使土地和其他社会财富发生有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多数人的异化；因此，继承权是土地和其他社会财富转变为公有财产的障碍；不管对继承权怎样加以限制，它总是一种特权，它的作用的大小并不能消除它的经常威胁公有权利的不正义性；此外，一切形式的继承权是造成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不能使各个人拥有精神和体力发展的同等的手段；

最后，鉴于代表大会已经声明它赞成土地公有制，而且这个声明，如果不继续加以充实，就会成为不合理的，——

代表大会声明,必须彻底废除继承权,继承权的废除是解放劳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写于 1869 年 9 月 10 日。译自《巴塞尔代表大会。文献汇编》1934 年俄文版第 56—57 页。

致亚·伊·赫尔岑(摘录)

·编者按语·

巴枯宁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活动遭到失败,巴枯宁及其死党非常愤恨和懊丧,扬言要对马克思进行“殊死的斗争”。但是老奸巨猾的巴枯宁认为向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公开宣战的“时间还没有到”。于是这个阴谋家便玩弄两面派手法,采取表面上“颂扬”马克思,暗地里则对国际实行“分而治之”的反革命策略来破坏国际。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吐露了这种险恶用心:“如果我现在就公开进行战争来反对马克思,国际中四分之三的人都会反对我,我就会吃亏,会失去我想站稳脚跟的唯一基地”,主张对国际“首先需要拆散它、分割它,以便较容易地击溃它”。根据这种反革命策略,巴枯宁在各国的国际组织中策划了一系列阴谋分裂活动,扩大宗派势力,为他向国际公开宣战,篡夺领导权疯狂进行准备。

1869年10月23日

后天我要到洛迦诺去。你的来信已经收到并仔细阅读过。

一、关于马克思,我的答复如下:我象你一样清楚地知道,马克思完全象反对我们的一切其他人一样,在反对我们这一点上是有罪的,我甚至也知道,他是加于我们的一切丑恶行为的主谋者和教唆者。为什么我宽恕他,甚至还夸奖他,称他为巨人呢?有两个原因,赫尔岑。第一个原因——公平。把反对我们的那些丑恶

行为抛开不谈，那末不能不承认，我起码不能不承认，他对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聪明、坚决和正确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快有二十五年了，从我这方面(?)来看，在社会主义方面他无疑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他是国际协会的元老之一，甚至是主要的创建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功绩，我将永远承认这种功绩，不管他怎样反对我们。

第二个原因——政治和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策略。我知道，你认为我是个糟糕的政治家。如果我告诉你，你错了，请你不要计较自尊心。问题在于，你过去和现在都是根据我在文明社会、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行动来判断我的，而实际上，我在这个世界中是毫无顾忌和毫不客气地公开采取粗暴无礼态度的。

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吗？因为我一点也瞧不起他，不承认他还有任何富有成效的、前进的力量。我非常清楚，物质手段和有组织的死守国家主义的力量在他那里还绰绰有余，比预料的要多得多。但是，必须同这种力量进行斗争，必须摧毁它，同它不可能有任何调和、达成任何协议。因为它实际上不可能做任何让步，它一步也不会前进，而只能由事物的力量把它挤到后面去。同它进行直接的、公开的、毫不客气的斗争，这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是危险的，会给进行斗争的人带来很大的麻烦和烦恼，我在这方面多少有点体会。但是，对于事业、对于人民事业来说，这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是为了让人民从自己的问题中清除掉任何资产阶级杂质，把它清楚地和坚决地提出来。这样做对于进行斗争的人来说也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因为对资产阶级世界采取直言不讳的态度能说明他的地位，证明他的真诚性并把他牢固地安置在人民的土壤上。因此，我同意你的看法，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和在资产阶级问题上，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策略家，而且既不想成为前者，也不想成为后者。但是，如果你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在工人

世界中的行为同样是没有经过考虑,或者更正确些说,带着同样的考虑,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是我在西方唯一信任的世界,就象我相信我们的庄稼汉世界和在俄国既找不到地位又找不到职业的放荡的知识青年世界(这是由四万人构成的一个方阵,他们由于自己的地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属于革命)一样,可是在这方面你直到现在还不能原谅我。在这个平凡世界中,在这个建设未来的唯一基础中,亲爱的赫尔岑,我既承认政治,也承认策略,我仔细地研究它的一切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既研究它的智慧,又研究它的蠢行,并力求同他们一起来思索,以便推动人民的事业,——这当然是主要的和首要的目的,——同时也使我自己的地位在它中间巩固起来。我对马克思的态度(他不能容忍我,而且我想,他除了自己和他的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爱),我对他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就能向你证明这点。

马克思无疑是国际协会中的一个有益的人。他在国际中直到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的最坚定、最聪明和最有影响的支柱之一,是防止任何资产阶级派别和思想侵入协会的最有力的障碍之一。如果我为了满足个人报复,消灭了或者缩小了他的无疑有良好作用的影响,那我永远不会宽恕自己。有可能,而且十分有可能,我很快就不得不同他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委曲,而是涉及到原则问题,涉及到国家共产主义问题,因为他和他领导的英国的和德国的党,是国家共产主义的热烈维护者。好吧,那时将进行殊死的斗争。但是,事有其时,——现在时间还没有到。

我饶恕他和颂扬他是从策略出发的,从个人政策出发的。难道你没有看到,所有这些先生们都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构成了一个方阵,首先需要拆散它、分割它,以便较容易地击溃它。你比我有学问,因而比我更好地知道,是谁首先说分而治之的。如果我现在就公开进行战争来反对马克思,国际中四分之三的人都会反对我,

我就会吃亏，会失去我想站稳脚跟的唯一基地。我先发起战争来攻击他的一帮恶棍，我就将得到多数的拥护，而马克思本人（如你所知，他太喜欢幸灾乐祸了）也将很满意，因为我刺痛并且痛骂了他的朋友。如果我失算了，他出来维护他们，那末就是他第一个开始了公开战争，那时我就后退并将起卓越的作用。……

.....

你的 巴枯宁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154—157页。

告俄国军官书(摘录)

· 编者按语 ·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期间，巴枯宁最初以为他夺取国际领导权的阴谋能够得逞，为了在他夺权成功后把总委员会变成他个人独裁的工具，他最热烈地拥护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威并为此起草了决议。可是，当他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却立即打出了“反权威主义”的旗号来攻击马克思。实际上，巴枯宁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这里摘录的《告俄国军官书》完全暴露了他“反权威主义”口号的虚伪性。呼吁书要求同盟的盟员服从他的秘密组织的“铁的、无条件的纪律”，“自愿地服从它的权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的，巴枯宁“宣扬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来自上面一个匿名的、不可知的委员会的命令，宣称耶稣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战胜国家的可怕的集中制，宣布了比最原始的共产主义更加权威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83页）巴枯宁“反权威主义”、“反集中制”只不过是个借口，是个阴谋，其真正目的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权威，分裂和破坏国际工人运动，以便建立他这个阴谋家的权威，建立他的阴谋组织的独裁。

在罗曼诺夫—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王朝和俄国人民之间，在

鞑靼-德意志族的桎梏和广泛的斯拉夫族的自由之间进行最后一次战斗的时刻必将来临。我们这里春天快要到来，而战斗将在早春时节开始……革命力量已经准备好了，象目前全俄国人民这样存在着深刻、普遍的不满的条件下，这场战斗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

在《告俄国的青年兄弟》这个呼吁书中，我曾经说过，在未来的、如此明显地日益临近的粉碎全俄罗斯帝国的事业中，领导人民群众的斯切尼卡·拉辛，将不是单枪匹马的勇士，而是集体的斯切尼卡·拉辛。任何人，只要不是傻瓜，自然都明白，我在这里指的是秘密的、现在已经存在并且进行活动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强有力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纪律，它的成员都无限忠实于它并且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而且他们个个都无条件地服从一个无所不知但是无人知道的唯一的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完全放弃了自我；这就使得他们有权要求这个组织的一切成员都无条件地放弃自我。他们彻底抛弃了他个人的，构成一切沽名钓誉、贪权慕势的人的主要追求目标的一切，因此，由于永远放弃了个人的财产、官方的或公众的权力和力量以及社会上的任何名誉地位，他们就必然使得自己永远默默无闻，他们把事业的荣誉、表面的豪华和喧嚣让给别人，而只把事业的实质留给自己，同样地也不是留给自己个人，而是集体。

他们象耶稣会教徒一样，每个人甚至放弃了个人的自由，不过目的不是要奴役别人，而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在委员会中，以及在整个组织中，考虑问题、表示愿望、从事活动的不是个人，只是集体。把个人生命、个人思想和个人自由这样置之度外，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令人愤怒的。这确实是困难的，但同时也是必要的。对于那些才开始这样做和刚刚加入组织而还没有抛弃喜欢讲空话、瞎吹牛的恶习的人来说，对于那些玩弄名誉、个人人格和权利，并且总是以想象中的人性的可怜特征（在我们俄国社

会中，在这些特征后面显露出来的是所有的人个个都最彻底地向最龌龊、最卑鄙的现实的条件屈服)来安慰自己的人来说，这就尤其困难。对于那些想在事业中求得自己虚荣心的满足，求得讲空话的借口，喜欢使自己戏剧式的面貌在事业中得到反映而不是热爱事业本身的人来说，这是困难的。

任何新的成员加入我们的组织都是自由的，他们知道，既然加入了这个组织，那他就属于它而不是属于他自己了。加入组织是自由的，但是不能退出组织，因为任何成员退出都必然会使这个组织的存在本身遭到危险，而这个组织不应该取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轻率行为、一意孤行或者他们的谦逊、诚实和力量的程度大小……因此，每个人加入组织时都应该知道，他把自己、把他所有的全部精力、资金、才能和生命都无须偿还地献给了组织……这在它所公布的、委员会委员以及委员会以外的组织的其他一切成员都必须遵守的纲领中已经谈得很清楚、很明确……如果他确实有这种激情，那末组织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对他说来都是容易办到的。大家知道，对于激情来说根本不存在困难，激情不承认有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而且障碍越是难于克服，为激情所鼓舞的人的意志、才能和力量就越显得顽强。谁有这种激情，谁就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存在的余地；他甚至不是放弃这些嗜好，因为在他身上再也不存在这些东西了。本团体的严肃的成员清除了自己本身的任何猎奇心理，并且无情地追击其他一切人的猎奇心理。虽然他也认为自己值得得到任何信任，但是正因为 he 值得信任，即因为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除了他为更好地完成他所担负的事情所必需的东西以外，他不企求也不希望知道任何东西。关于事业，他只是根据命令叫他跟谁谈就跟谁谈，叫他谈什么就谈什么；总之，他无条件地、严格地遵循他从上面得到的一切命令和指示，不询问，甚至也不设法打听他本人在组织中是哪一级；自然他只希望尽可能让

他承担更多的事情,但是,同时他又耐心地等待把事情委托给他。

这种铁的、无条件的纪律可能会使新参加者感到惊讶,甚至感到屈辱;但是,任何正派的成员,任何真正聪明能干的人,只要他具有我前面谈到过的那种融汇一切的人民胜利的热情,这种纪律就不会使他感到惊讶和屈辱,而且相反地会使他高兴,同时会使他安心。严肃的成员会认识到,正是这种纪律才是每个成员相对的无个性的必要保证,才是全面胜利的条件, *sine qua non* [必要的条件], 只有这种纪律才能够团结真正的组织,并且建立集体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依靠自发的人民的威力,将能够战胜和破坏国家组织的巨大力量。

别人会问:我们怎么能够信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委员会的独裁领导呢?但是,这个委员会你们是知道的,因为第一,根据这个委员会公布的纲领你们可以知道它,这个纲领非常明确而清楚并且对每一个新加入组织的人还做了更加详细的解释;第二,通过你们知道和尊敬的那些人对它所抱有的无条件的信任,这个委员会已经对你们作了自我介绍,这种信任使你们只会加入这个组织,而不是别的组织。通过始终符合本组织的纲领和目的的、不倦的、坚决的和深入一切地方的活动,这个委员会很快就会使得本组织的真正成员要更加了解它。大家都将自愿地服从它的权威,因为一方面他们在实践中愈来愈确信委员会的确实令人惊异的预见性、警惕性、理智的毅力和它的命令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愈来愈确信这种纪律的化险为夷的作用和必要性。

有人可能问我:如果委员会的成员对一切人说来都是无法探知的秘密,那末,你用什么办法能够得到有关该委员会的消息,并且确信它是有根据的呢?——我坦白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委员会的人数、甚至它的所在地,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委员会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俄国,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为一个国外的革命委员会对俄国来说是一件荒谬绝伦的事情，这也许只有流亡者中那些沽名钓誉的糊涂虫和夸夸其谈的饶舌家才能想出来，他们用“人民事业”这个响亮的名称来掩饰自己徒骛虚名和恶毒阴谋的懒散行为。

在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阴谋以后，伊舒亭和他的同志们做了成立郑重组织的第一次尝试。本组织是第一个彻底成功的、整个俄国的革命力量的组织。它利用了一切准备和试验。任何反动派都不能迫使它解散，它的寿命将比一切政府都长。只要它的全部纲领还没有成为俄国的日常生活，成为全世界的生活，它就不会停止活动。

大约一年以前，委员会认为把关于它存在的事实告诉我是有益的，于是给我寄来了它的纲领，同时还说明了俄国革命行动的总计划。我赞同了纲领和计划，确信这一事业以及从事这一事业的人都是严肃的，因此我做了我确信是在国外的任何一个正直的流亡者都应该做的事：无条件地服从了作为俄国革命事业的唯一代表和领导者的这个委员会的权力。我现在对你们讲话，也只是服从委员会本身的要求。此外我什么也不能对你们说。关于这个组织，我只补充一句话。我很了解整个组织的计划，所以我完全确信，现在任何力量也不能破坏这个组织。即使在行将来临的斗争中人民党遭到新的失败——我们谁也不害怕这种失败，我们相信人民事业即将胜利，——即使我们的希望没有实现，在那种情况下，在人民起义的最悲惨的毁灭中，在最野蛮的反动中，这个组织仍将完整无损……

这个纲领的基础是最广泛的、最人道的，这就是以社会财产和一切人都同样必须从事的共同劳动为基础的，一切人的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平等，当然，应该把那些宁愿饿死也不肯工作的人除外。

世界各国的无知大众的纲领目前就是这样，这个纲领完全符合我国人民世代代的要求和本能……我们组织的成员向下层人民提出这个纲领的时候，感到敬佩不已的是，他们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地理解了它，并且如此热切地接受了它。就是说，纲领已经具备。它是不可改变的。谁赞同它，谁就应当跟着我们走。谁反对我们，谁就是一切人民敌人的朋友，就是沙皇的宪兵、沙皇的刽子手——我们的敌人……

我对你们说过，我们的组织建立得十分巩固，现在我再补充说一句，它在人民之中已经扎下了深远的根，即使我们现在遭到了失败，我们的反动派也无法破坏它……

一些奴仆成性的报纸和杂志遵从第三厅的主使，竭力要公众相信，政府已经把阴谋一网打尽了。政府什么也没有抓着，这个委员会和组织现在和将来都完整无损，政府本身很快就会确信这一点的，因为人民大爆发已经迫近。人民大爆发已经如此迫近，每个人现在就应该决定，他是想做我们的朋友，人民的朋友呢，还是做我们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对于一切朋友，不管他属于哪一个阶层，不管他的地位如何，我们的队伍都是欢迎的。但是你们会问：怎样找到你们呢？谁抱着为人民事业服务的真诚愿望和坚定意志去寻找这个组织，在你们周围到处存在、在你们的同志中已经有了许多成员的这个组织本身就会去寻找他。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任您选择吧。

写于1870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8卷第477—481页。

致阿·里沙尔(摘录)

· 编者按语 ·

国际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之后,巴枯宁的阴谋活动日益猖獗。巴枯宁及其党徒夺取了国际在瑞士的机关报《平等报》,并利用该报来攻击总委员会。为了反击巴枯宁分子的进攻,马克思为总委员会起草了一封《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的通告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逐点驳斥了巴枯宁分子对总委员会的指责和攻击。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拥护马克思的通告信,改组了《平等报》,把巴枯宁分子清除出编辑部。1870年3月马克思又写了《机密通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进一步揭露了巴枯宁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巴枯宁的阴谋一次又一次被击败,他便指使他在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法国南部的党徒们在国际内部制造分裂。他首先选定在1870年4月4日举行的国际罗曼语区拉绍德封代表大会上发动进攻。在这次大会上,巴枯宁分子倚恃他们伪造的虚假多数,把罗曼语区联合会分裂为两半。这里选录的就是巴枯宁在拉绍德封代表大会前夕给他的党徒写的一封信。信中说:在拉绍德封进行的斗争,“将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将是我们在未来的国际代表大会上要进行的战斗的榜样和先声”。巴枯宁派在罗曼语区联合会制造分裂是分裂整个国际的一个严重步骤。马克思谴责了巴枯宁集团罪

恶的分裂活动，指出：“这个可恶的俄国佬就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一场公开的大争吵，他把自己的名字当作一面旗帜，用宗派主义的毒药毒害我们的工人协会，并以密谋来遏制我们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7页）

为了制造分裂，巴枯宁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进行了卑鄙下流的人身攻击，无中生有地肆意谩骂诬蔑，他还咬牙切齿地狂呼“我要叫他们完蛋”。所有这一切都雄辩地说明，巴枯宁是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

此外，在这封密信中，巴枯宁还指示他的党徒要建立“看不见的专政”、“没有权力的外观”的“唯一的专政”，这再次说明，反对一切权威和一切政权的巴枯宁，是一个贪求权力的大野心家；而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只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府，所要的却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1870年4月1日

.....

在拉绍德封进行的斗争，除了地方意义外，将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将是我们在未来的国际代表大会上要进行的战斗的榜样和先声。

我们希望实行的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大政策呢，还是从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观点加以修改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小政策呢？

我们是否希望消灭资产阶级祖国和政治国家并且建立社会主义的和统一的世界国家呢？

我们希望把工人完全解放出来呢，还是希望仅仅改善他们的命运？我们是希望建立新世界呢，还是希望革新旧世界？

这就是我们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以前应当研究和准备的问题。

你们里昂支部可向伦敦提出这些问题。支持我们的将有西班牙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瑞士山区的各支部，我想还可能有大多数法国人。反对我们的将不是工人群众，而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联合和联盟，这些德国领袖大部分是犹太人，即剥削者和资产者，马克思的学派也不例外。在这些德国领袖的影响下，反对我们的还会有英国和美国的代表。把我们的队列联合起来，准备进行战斗，因为这是关系到国际和革命的胜利的问题。

李卜克内西对我和所有的俄国革命者继续采取背信弃义的态度。不错，他转载了我的《致俄国青年的呼吁书》和涅恰也夫的信，但同时他发表了一篇反对我们的既愚蠢又卑鄙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由一个叫做波克罕的狡猾的人写的，他是个小犹太人，马克思的工具。需要指出，我们的这些敌人，这些狗崽，全都是犹太人：马克思、赫斯、波克罕、李卜克内西、雅科比、魏斯、柯恩、吴亭及其他许多人，都是犹太人。他们都属于这个按传统和本能来说是精明强干的、搞阴谋的、剥削的和资产阶级的民族。马克思是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人，他智力超人，但同时应当承认，他是个非常乖僻的人，性格非常令人讨厌，爱好虚荣、容易动怒、嫉妒、多疑、隐讳、奸诈，而且他象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什么都干得出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家。我已开始写一系列信件答复所有这些犹太的和德国的狗崽。我要叫他们完蛋。第一封信已经写完，将译成德文在李卜克内西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此后我将把它用法文在《马赛曲报》和洛克尔的《进步报》上登出来。请你让朋友们注意这些信件。

……你一再强调：在主要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啊，我的朋友，我担心，正是在主要点上我们连一致的影子也没有。根据你最近的一些信和有关你的消息，我看到，你比任何时候都更成为集中制和革命国家的拥护者了。而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是它的敌人。我认

为拯救之法仅仅在于造成一种受完全看不见的集体力量指导的革命的无政府状态，在于这种我可以接受的唯一的专政，因为只有它才是同革命运动的自由的和完整的进程相适应的。

你的革命计划可以表述如下：倘若在巴黎爆发革命，巴黎就暂时组织革命公社。里昂、马赛、卢昂和其他大城市马上就会起来，立刻把自己的革命代表派往巴黎，在那里他们将一起为整个法国建立一个国民公会或者人民拯救委员会之类的组织。这个委员会下令实行革命，下令消灭旧国家，取消过去的社会关系，建立集体所有制，并组织相当强有力的、足以镇压内外反动派的革命国家。这就是你的思想，是这样吗？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计划同这直接对立。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说明革命运动一定恰恰在巴黎爆发。它在外省开始，并不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权且假定，根据传统，巴黎将是首创者。照我们的意见，巴黎只应当承担否定的即公开革命的首创性，即破坏和清算的首创性，而决不是组织的首创性。如果巴黎举行起义并取得了胜利，它的权利和责任将是宣布完全清算政治的、法律的、财政的和行政的国家，宣布国家的和私人的破产，消灭国家的任何力量、职能和权力，焚毁一切文书，官方的和私人的证件。当然，巴黎应当尽速组织成统一的、多少是革命的整体。在联合起来的工人协作社占有了一切劳动工具、一切形式的资本和建筑物之后，在它们刚刚武装起来并按街道和区组织起来之后，将建立巴黎各区的革命联邦，即联邦公社。这个公社有权声明：它不认为自己有权领导和指挥法国，它号召法国以及以前称作“外国”的人民和一切联盟效法巴黎，在自己那里就地也实行那样的根本的革命，即破坏国家、法律的权利和私有制的特权的革命，然后联合成联邦。公社将建议法国的以及外国的联盟在完成了这个革命后，在巴黎或者在其他某个地方同公社结成联邦，让一切法国的和外国的革命联盟派

出自己的代表来共同组织生产交换关系，这是为创造平等的宪章（任何自由的基石）、纯粹否定性质的宪章所必需的，平等的宪章将极为准确地确定，什么应当完全消灭，而这是肯定的地方生活形式所做不到的，因为这种生活形式是仅仅依靠地方实际经验制定出来的。同时，将组织反对革命敌人的联合防御，作为革命的武器，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并同所有国家的所有朋友实行实际的革命团结，反对一切国家的敌人。

总而言之，革命到处都应当不以中心为转移，中心只应当是革命的表现和产物，而不是源泉，不是领导，不是始因。

必须使无政府状态，一切地方的热情的高涨、自主的生活的觉醒，到处都达到顶点，以便使革命始终是生动的、真正的和强大的。

革命政客、专政信徒，想使热情在获得了最初胜利后就安定下来，他们想建立秩序，想取得群众的信任，想服从在革命的道路上建立的政权。这样他们就是宣布建立新的国家。与此相反，我们助长、激励和放纵热情，号召使无政府状态进入生活，我们将作为看不见的舵手在人民的风暴中领导生活，但不是由具体的、看得见的权力，而是由一切同盟盟员的集体专政来领导。没有头衔和区别标志、没有正式权利的专政，是更强有力的专政，因为它将没有权力的外观。这是我能接受的唯一的专政。但是，为了使它发生作用，它应当存在。而为做到这点，就应当对它进行准备，提前组织，因为它不是从辩论、意见分歧和原则的争论中，也不是从人民的集会中自然产生的。

哪怕同盟的盟员为数不多，但他们应当是坚定的、积极的、刚毅的、忠诚的，而且首先是没有虚荣心和个人名利心的强有力的人，是非常严肃的和心灵高尚的人，他们宁愿要真正的权势，而不要虚假的权势的标志。你们要是建立起这种集体的和看不见的专

政，你们就胜利在握。革命有好的舵手，就会取得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胜利！如果你们受了人民拯救委员会的把戏、看得见的专政的迷惑，你们就会遭到你们自己造成的反动势力的打击。

亲爱的朋友，我敬仰法国工人的高尚的本能和那样热情的理智，但是，我很担心他们对舞台效果、对戏剧性的、英雄的和激昂慷慨的场面的偏爱。

我们的很多朋友（我把你也包括在内），准备在未来的革命中扮演伟大的角色，扮演革命的国家活动家的角色。他们发誓要当革命社会主义的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在事先准备漂亮的演说和使世界惊异的出色手段。当然，要人民群众充当他们的民主主义虚荣心的台座、柱脚！为了拯救所有的人，他们将建立专政、政府。这是可笑的、可悲的迷误！他们的目的将仅仅是自己的虚荣，他们只会为反动势力服务。他们自己将成为反动势力。

我的朋友和兄弟，请你牢牢记住，现在的社会主义运动，同仅仅追求个别人的统治和使个别人飞黄腾达的一切政治运动是直接对立的，现在的解放运动同少数人的胜利和专政是不相容的。如果少数人取得胜利，那将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事业，社会主义运动将遭到失败。如果社会主义运动将不被粉碎，那末个别利欲薰心的人追求虚荣的阴谋和他们的追求专政的意向将遭到彻底的破产。

只存在一种唯一的政权，唯一的专政，只有组织这样的专政才是崇高的和可能的，——这就是维护我们原则的同盟盟员的集体的看不见的专政；它之所以特别有益和强大，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正式的、看得见的权力。但是，为了建立这种专政，就需要有真正强有力的人，他们的心灵超脱了渺小的虚荣心，他们追求自己思想的胜利，但不追求自己个人的胜利，他们宁愿要真正的权力而不要权力的外表，他们清楚，我们的时代是集体力量的时代，而不是个人

力量的时代，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集体，集体就会把它消灭。

.....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264—269页。

致一个法国人(摘录)

· 编者按语 ·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后,巴枯宁以《致一个法国人》为题写了一本书,叙述了他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并建议法国人举行“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野蛮的自发起义”来拯救法国。《致一个法国人》约有十几万字,这里只摘录了其中有关“自发起义”的片断。

1870年8月30日

.....

五、巴黎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国防利益上,所考虑的仅仅是如何保卫自己,它将根本无力组织和领导法国的人民运动。如果巴黎提出这种荒谬可笑的要求,那它就会毁灭运动。因此,为了拯救国家的最高利益,法国的职责、各省的职责,就是不服从巴黎。为了拯救自己,巴黎所能做的唯一的和最好的事情,就是宣布和号召各省运动的绝对独立。如果巴黎忘记了或者由于任何原因而不努力这样做,爱国主义就要求各省不依靠巴黎而独立地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以便拯救法国和巴黎本身。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法国还可以得到拯救的话,那只能靠各省的自发起义。

这种起义还有可能吗?可能,如果外省的大城市如里昂、马赛、圣亚田、卢昂及其他许多城市的工人的血管中的血在流,如果他们的头里有脑子,心里有毅力,肌肉里有力量,——如果他们是

活人、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学理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外省城市里的工人现在才能拯救法国。

不要指望资产阶级。原因我已经详细证明过了。资产者除了国家以外，除了一般国家活动方式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了解。他们的最高理想，最高的奋不顾身精神，最高的英雄主义以及他们能够想象的最高的东西，就是以拯救社会的名义革命地加强国家的实力和活动。但是，我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在目前关头，在现在的情况下（法国外面存在着俾斯麦主义，法国内部存在着波拿巴主义），通过国家是不能拯救法国的，这只能使法国灭亡。

目前，法国处于内外交困的可怕的、致命的危险之中，唯一能拯救法国的，就是整个法国领土上的人民群众的巨大的、充满激情和毅力的、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野蛮的自发起义。请你们相信，除此之外别无拯救你们的国家的办法。如果你们无力做到这点，那末你们就放弃法国，放弃一切自由吧，垂头，屈膝，去当奴隶吧，当普鲁士人的奴隶，波拿巴主义者的奴隶，做普鲁士人的藩属，成为愤怒地反对你们的农民和军队的牺牲品，那末现在就已如此可怜和不幸的你们，就准备迎接充满了你们从来想象不到的痛苦和贫困的未来吧。

.....

译自《巴枯宁选集》彼得堡—莫斯科1920年
俄文版第4卷第168—169页。

法兰西共和国。公社革命联邦

· 编者按语 ·

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率领法国军队在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里昂后，里昂革命群众于9月4日举行了起义。巴枯宁闻讯，急忙赶赴里昂。9月28日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巴枯宁在他的党徒的支持下搬进了市政厅。他立即着手实现他多年来鼓吹的“消灭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想，组织了一个“拯救法兰西委员会”，颁布了这道废除“行政的和政府的国家机器”的命令，并放弃在市政厅周围设置警卫。结果，很快就被政府军队赶出市政厅，从而断送了群众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里昂事件表明，只用一纸废除国家的命令远远不足以实现这一切美妙的诺言。但是，只用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两个连，就足以粉碎这个美妙的幻想并且迫使巴枯宁收起他那创造奇迹的命令赶忙溜往日内瓦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8卷第383页）

国家目前所处的悲惨状况、官方当局的无能为力和特权阶级的漠不关心，使法兰西民族濒于灭亡。

如果革命的有组织的人民不立即行动起来，那末它的未来就会被断送，革命就会遭到失败，一切就会毁灭。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考虑到人民的殊死起义刻不容缓，各联邦拯救法兰西委员会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一起建议立即通过以下决定：

一、废除已变得无能为力的行政的和政府的国家机器。由法兰西人民自己掌握全权。

二、关闭一切刑事和民事法庭，代之以人民审判制。

三、停止缴纳税款和支付抵押借款，以向各联邦公社的纳款代替税收，这些纳款根据拯救法兰西委员会的需要向富有阶级征收。

四、业已解体的国家不能对私人租税的交付再进行干预。

五、解散一切现行的市政机构，由一切联邦公社中的拯救法兰西委员会取代，后者在人民的直接监督下行使一切权力。

六、每个省会的委员会派两名代表，共同组成拯救法兰西革命公会。

七、这个公会将立即在里昂市政府开会，里昂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它比其他城市更为关心保卫国家。

公会将依靠全体人民来拯救法兰西。

拿起武器来!!!

写于 1870 年 9 月。译自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7 年俄文版第 4 卷第 39—40 页。

致尼·普·奥格辽夫(摘录)

·编者按语·

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用暴力推翻了反动政府,创立了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马克思称它“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页)可是,当巴黎无产者为捍卫无产阶级政权而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一向标榜革命的巴枯宁却阻止他的信徒支持巴黎公社。他在这封给奥格辽夫的信中说,支持巴黎公社是“代人受过”,“是犯罪的,愚蠢的”。巴枯宁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再次说明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凶恶敌人。

1871年4月9日

……我焦急地等待你和奥捷罗夫的来信——对三封信的答复。我不想赘述旧事。我想和你谈一谈我的著作的初版事宜。我的可怜的朋友奥捷罗夫同山区^①的人们一起,为巴黎和法国的事情着急得不得了,因此,尽管有善良的愿望,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来很好地考虑我的生花妙笔写成的这部著作。我自己也曾着急过,但不再着急了。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事情是输定了。——法国

^① 指巴枯宁分子的活动基地瑞士汝拉山区。——编者注

人,甚至工人都没有充分参加。看来,教训是可怕的。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有更多的灾难和最强有力的震动。形势已发展成了这样:将来那种灾难和震动是定然少不了的,到那时也许魔鬼就会苏醒。在魔鬼还没有真正苏醒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代人受过是不好的,是很不愉快的,何况是完全无益的。要准备、组织和推广我们的事业,以便迎接魔鬼苏醒的日子。但是,在这以前,耗费自己的贫乏的资金和为数甚少的人才——我们的唯一财宝,那是犯罪的,愚蠢的。这是我的最后的意见。……

.....

译自《巴枯宁给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书信集》圣彼得堡 1906 年俄文版第 419—420 页。

巴黎公社和国家概念(摘录)

· 编者按语 ·

当巴黎的无产者为公社事业而流血牺牲的时候，巴枯宁不仅不支持巴黎公社，而且诬蔑支持巴黎公社“是犯罪的，愚蠢的”。可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却利用巴黎公社来证明他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他在这篇文章里恬不知耻地说：“我之所以是巴黎公社的拥护者，特别是因为它是对国家的大胆的、明确的否定”。同时，他歪曲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说巴黎公社的失败是由于“有雅各宾党人的许多成见：关于专政的拯救作用等等”，是由于巴黎无产阶级“对政权的迷信……还没有被搞臭和从他们的意识中清除掉”。正如列宁所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他们‘自己的’，认为它能证实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60—261页）

.....

我是巴黎公社的拥护者，它虽然已被君主主义和教权主义反动派刽子手镇压下去，淹没在血泊之中，但是它却因此而在欧洲无

产阶级的思想中和心灵中变得更有生命力和更强大了。我之所以是巴黎公社的拥护者，特别是因为它是对国家的大胆的、明确的否定。

这种对国家的实际否定，正好发生在至今主要是政治集中化的国家——法国，正好发生在为否定国家奠定了基础的伟大法兰西文明的历史中心——巴黎，这个事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巴黎为了法国、欧洲、全世界的自由和生活而抛弃了自己的桂冠，热情地摒弃了自己的权力！巴黎又成为首倡者了，从而又证实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向一切受奴役的民族（现代民族中究竟哪个民族不处于受奴役地位呢？）指出了解放和得救的唯一道路！巴黎给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政治传统以致命的打击，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巴黎重新受到法国和全世界一切反动派的诅咒！巴黎怀着对猖獗的反动派的深仇大恨，把自己埋葬在烟雾迷漫的废墟之中！巴黎以自己毁灭的代价拯救了法国的荣誉和未来，并向人类证明，如果生活、智慧和道德力量在上等阶级中已经消失，那末它们却集中在无产阶级的身上，并且非常强大和充满了希望！巴黎照亮了新的纪元，人民群众彻底和完全解放的纪元，现在已经撇开国家及其人为边界而完全实现的人民群众团结的纪元！巴黎宣布自己是人文主义的和无神论的，它用社会的生活的伟大现实和对科学的信仰代替了神学的虚构，这种科学已经用自由、正义、平等和博爱的原则这些一切人类道德的永恒基础，代替了宗教的、政治的和法律的道德的谎言和假话！英勇的、富有理性和信仰的巴黎，用自己壮烈的倾覆和自己的灭亡证实了它对人类命运的坚强信念，并把这种更坚强和更有生命力的信念遗留给了后代！被淹没在自己最高尚的儿女的鲜血中的巴黎，——就是被联合起来的欧洲国际反动势力在一切基督教堂和谎言的大祭司——教皇——的祷告声中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类！将来各族人民的国际

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就是巴黎的复活。

这就是巴黎公社的两个月存在和它的使人永志不忘的倾覆的真正意义和伟大的崇高的后果。

.....

巴黎人民的一切实际倾向是非常社会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传统观念却大大低于这个水平。不管是法国各大城市的无产阶级，还是巴黎的无产阶级，都有雅各宾党人的许多成见：关于专政的拯救作用等等。对政权的迷信（它是宗教教育的严重后果，是一切历史祸害、人民堕落和被奴役的根源），还没有被搞臭和从他们的意识中清除掉。这是千真万确的，甚至人民的最有学识的儿子、最忠诚的社会主义者都无力彻底摈弃这种成见。你们仔细窥视一下他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心灵，就会在那里发现一个雅各宾党人——国家的维护者，这个雅各宾党人虽然悄悄地藏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但终究还没有完全死亡。由于这些原因，参加了公社的为数不多的忠诚的社会主义者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

我知道，许多在自己的理论上始终一贯的社会主义者责难我们的巴黎朋友们，说他们在自己的革命行动中没有充分表现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报刊的一切饶舌家却相反地谴责他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纲领方面表现出“犯罪的彻底性”。把这些报刊的卑鄙的告密者暂且放在一边不谈，对那些严格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我应当指出，他们对我们巴黎同志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因为理论，甚至是最严密的理论，同它们的实际实现之间还隔着一段无限远的距离，这段距离要在几天内走完是不可能的。

例如，谁如果有幸知道瓦尔兰（不幸的是，他的死去现在已是毫无疑问的了），那末只要向他提一下这个名字，他就会知道，瓦尔兰和他的朋友们具有多么热烈、深刻和坚决的社会主义信念。熟

知他们的人都了解,他们的热情、自我牺牲精神和真诚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正因为他们是些诚实的、没有自负心理和骄傲情绪的人,他们对于自己为之献出了灵魂和生命的宏伟事业的意识使他们的行动能力受到了束缚!此外,根据他们对于同政治革命完全直接对立的社会革命的事业的深刻信念,个别人的行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群众的自发行为应当就是一切。研究、阐述和宣传符合人民本能的思想,并且孜孜不倦地努力使革命组织具有人民运动的自发力量,——这就是个别人所能做的一切,如此而已;其余的事情应当而且只能由人民自己来做。如果不这样考虑,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建立政治专政,即恢复国家、特权、不平等,他们就必然会以相反的然而却是合乎逻辑的方式恢复对人民群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奴隶制度。

瓦尔兰和他的朋友们以及一切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和一切在人民当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劳动者,都对个别人的首创行动存有非常深刻、完全正确的戒心,即对一些上等人作威作福存有戒心,因为他们很坚定,所以他们对自己同对别人一样也存有戒心和不信任。

权威主义的集体主义者认为社会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自然结果,可以根据命令来进行,可以依靠专政或立宪会议来组织,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同这种信念相反,我们的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朋友们认为,社会革命可以由群众、团体和协作社的自发行动来实行和领导。

我们的巴黎同志们是万分正确的。因为实际上,有哪一个智者如此英明,或者如果说的即便是由几百个具有最高的天赋能力的人组成的集体专政的话,有哪一个有识之士的集体能够如此完善,把构成人民集体意志总和的无限繁多和不同的现实利益、信念、愿望和要求包括无遗,并且发明出一种可以满足一切人的社会

组织呢？这样的组织将永远是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板^①，多少得到国家批准的暴力会强迫不幸的社会躺在这张床板上。在此以前情况一直是这样。社会革命正是要消灭这种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旧组织体系，给予群众、团体、公社、协作社以及个人以充分的自由，并且一劳永逸地消灭一切暴力的历史原因——国家的存在本身，随着国家的崩溃，一切不正义的法的权利和各种虚伪的崇拜亦将消失，因为这种权利和这种崇拜从来都是对国家所实行、支持和鼓励的一切精神和肉体的暴力的服服贴贴的认可。

显而易见，只有当国家不再存在的时候，人类才会得到自由，社会的真正利益、构成社会的一切团体、一切地方组织以及一切个人的真正利益，才能得到完全实现。显而易见，国家的一切所谓的社会职能，实际上无非是对从属于国家的各个部门、公社、协作社和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的坚决和不断的否定。这些社会职能是某种抽象的东西，是虚构，是谎言，而国家整个说来是一个大屠宰场或者大坟墓，在那里，国内一切美好的意向、一切活生生的力量，都在假慈悲的面孔下、在这种抽象的东西、抽象的概念的掩盖下被不知不觉地偷偷用作牺牲品和埋葬掉。因为任何抽象的东西，如果没有脚走路，没有手进行创造，没有胃消化提供给它吞食的牺牲品，本身不能自在而自为地存在，那末，很明显，作为宗教的或天上的抽象物的上帝，实际上所代表的仅仅是一个特权等级即教士等级的极其肯定的、极其现实的利益，而天上的抽象物的地上的补充，即政治的抽象物——国家，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同样肯定的和现实的利益，这个阶级，包括其他上等阶级在内，如果不完全是也基本上是剥削阶级。

消灭教会和国家应当是社会真正解放的首要的和必需的条

^① 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迫所有过路的人躺在他所设置的一张床上，若比床长则砍足，短则拉长。——编者注

件。只有在这之后,社会才能而且应当按另外的方式来安排;但这绝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不是按照一些智者和学者制定的空想的计划来进行,也不是根据某个独裁者或者甚至是由普遍投票选出的国民议会发布的命令来进行。我不止一次地说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建立新的国家,从而导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即一个同人民群众没有任何共同点的整个阶级;当然,这个阶级会在普遍幸福和拯救国家的借口下重新开始剥削和奴役群众。

将来的社会组织必须按照自下而上的方针、借助于工人自由协作社或联盟来建立,从联合会、公社、地区、民族开始,最后建立伟大的国际联邦。只有到那时候,一种合理的、富有生命力的制度才能实现,在那个制度中,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才不再同社会利益相矛盾。有人说,个人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和失调的,由于它们的根本对立性,它们的和谐永远是不能实际实现的。我对这种异议回答如下:如果说迄今为止,这些利益不管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相互协调过,那是因为国家为了少数特权者的利益而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所有这种所谓的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的不相容以及这种虚假的斗争,无非是政治的欺骗和来源于神学谎言的谎言,神学谎言臆想出了原罪的教义来丑化人和消灭人对自己的价值的认识。这种虚伪的关于两种利益不相容的思想,也被形而上学所掌握了,众所周知,形而上学同神学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形而上学否认人的天赋的社会本能,把社会看成是机械的、由人工造成的个人的集合体,个人偶然地由于某种形式上的或默许的、自由地或者在最高力量的影响之下缔结的契约而联合在一起。据推测,这些据说附有不死的灵魂的个人,在联合成社会之前,是享有完全的自由。

形而上学家认为:人,特别是那些相信灵魂不死的人,在社会

之外可以成为自由的生物；如果说这种武断正确的话，那末由此必然得出结论：人只有在否认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天赋的独立性的条件下，在事先放弃自己的一切个人的和集团的利益之后，才能联合成为社会。社会越是人数众多，它的组织越是复杂，这种自我放弃和自我牺牲就应当越大。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是个人的一切牺牲的表现。既然国家的起源是这样抽象和暴力的，国家自然至今仍在为了一个谎言而排挤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这个谎言名义上叫做“普遍幸福”，实质上无非是统治阶级的福利。结果，国家便成为对任何自由、一切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全盘否定，成为它们的坟墓。……

.....

写于1871年6月。译自《巴枯宁选集》彼得堡—莫斯科1920年俄文版第4卷第252—254、255、256—260页。

附录：桑维耳耶代表大会 给国际工人协会各 联合会的通告^①

· 编者按语 ·

巴黎公社失败后，各国反动派掀起了一个反对国际的大合唱，疯狂地迫害国际会员，国际的处境十分困难。巴枯宁派利用这个时机向总委员会和马克思展开猛烈的进攻。他们同各国反动派里应外合，加紧分裂和破坏国际。1871年9月国际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召开了伦敦代表会议，给巴枯宁的阴谋活动以沉重打击。巴枯宁派愤怒若狂，拚命攻击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极力否定伦敦代表会议的合法性。他们于1871年11月在瑞士的桑维耳耶城召开了所谓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通过了给第一国际各联合会的臭名昭彰的桑维耳耶通告。这个通告恶毒攻击总委员会，要求在国际内部实行无政府主义原则，妄图从内部来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按照巴枯宁分子自己的说法，这次大会使得“国际内部正在爆发一场公开的战争”。这个通告发表后不久，恩格斯就写了《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一文，给了巴枯宁派的进攻以有力的反击。

桑维耳耶通告不是出自巴枯宁的手笔，而是他的门徒们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通告完全反映了巴枯宁的观

^① 通称桑维耳耶通告。——编者注

点,同时巴枯宁在给他的门徒罗伦佐的信中表明,他完全同意这个通告。为便于了解这个时期巴枯宁的阴谋活动,我们把它作为附录收集在这里。

下面签名的代表是组成汝拉联合会的一批国际支部的代表,他们向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联合会发表本通告,请求它们同我们联合起来并要求尽快召开国际的全体代表大会。

我们力求简单扼要地向你们阐明为什么我们要求召开全体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防止国际走上必然使它覆灭的危险道路所必需的。

大家知道,国际一建立,就成立了总委员会,根据章程规定,总委员会是各支部进行书面联系的中央局,但是绝没有授予它任何权力,否则就会完全违背国际的精神本身,国际乃是对权力表示抗议的体现。

总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在基本章程的下列各条和总则中有明确规定……

总委员会第一年设在伦敦是有许多原因的:国际成立大会是在伦敦举行的,此外,总委员会委员们感到在伦敦比在其他欧洲城市更为安全。

在以后的两次国际全体代表大会(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会和1868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总委员会仍旧被留在伦敦。至于总委员会的成员,凡出席这两次代表大会的人都知道,总委员会委员的选举是如何进行的: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总委员会提出的名单;而名单上的大多数人都是代表们素不相识的。信任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以致授权总委员会加聘它认为需要的任何人。因此,全体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总委员会的选举已变成了纯粹虚有其表的行动。事实上,在选举之后,总委员会可以擅自接纳所有可能使总委

员会的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的人。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盲目信任几乎已达到完全听任总委员会摆布的地步。基本章程中明确宣布了每个支部和支部中每个小组的自治，而总委员会却依据行政决定悄悄地对基本章程作了重大修改。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巴塞尔代表大会行政决议的第六号决议中说：“总委员会有权解散国际的任何支部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第七号决议中说：“当支部之间或各国小组之间发生任何争执时，总委员会有权就分歧意见进行裁决，同时给予向应届代表大会上诉的权利，应届代表大会可以就此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通过这种决议，就等于赋予总委员会以危险的权力，而巴塞尔代表大会正是犯了通过这些决议的错误，并且连想都没想，由此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必须承认已为千百次经验所证实的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权力会败坏所有掌握了它的人。一个统治自己同类的人还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总委员会未能逃脱这一必然规律。它五年来一直是由那些经常被连选的人组成的，又由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定赋予掌管各支部的大权，最后，自封为国际的法定首脑。总委员会委员的委任状在某些人手中被当作私人财产，在他们看来，伦敦是永恒不变的国际首都。这些人事实上已成为我们的全权代表，但其中的大多数人不是由哪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他们事实上没有获得任何人赋予的任何权限。我们说，这些人既已习惯于站在运动前列，代表国际说话，久而久之，他们便力图使自己的理论和个人的纲领在国际中占统治地位。总委员会既然变成了一个政府，它便十分自然地把自己个人的学说看作是国际的正式理论。其他集团所提出的同这一理论有分歧或有矛盾的其他一切思想，都被视为异端邪

说。这样，就渐渐地形成了一种以伦敦为中心，以总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代表的正统思想。总委员会负责各国的通讯书记，很快便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不是担任各个联合会之间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联络人，而是变成了正统学说的使徒，他们开始招募这一学说的宣传者，把宗派利益、而不是整个国际的共同利益放在首要地位。

这一切会引起什么结果呢？总委员会势必在这条新的道路上遇到反对派。于是，斗争开始了，而与此同时，个人争吵也出现了。总委员会正在成为阴谋的策源地；人们在诅咒反对派，进行毁谤；国际内部正在爆发一场公开的战争。

从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国际的全体代表大会一直没有召开。两年以来，总委员会一直在自行其是。法德战争成了把代表大会从1870年推迟到下一年的理由；可是，到1871年，这次代表大会又被总委员会召开的秘密代表会议^①所代替，虽然章程中任何一个地方也没有说到允许总委员会这样做。这次秘密代表会议不能真正代表国际，因为许多支部，其中包括我们的支部，都没有被邀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这次无论如何也不具有代表大会权利的代表会议，竟胆敢通过一些对基本章程进行重大修改的决议，力图把国际从自治支部的自由联合变为完全操纵在总委员会手中的教阶制的和权力的组织。有了这些决议，总委员会就可以任意接纳或拒绝任何联合会或小组加入国际，解散支部或停止它的活动。为了使大功告成，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决议，规定总委员会能够自行决定召开下届国际全体代表大会或代替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这样，我们就面临着实际的威胁：全体代表大会可能不会召开，代替全体代表大会的，将是总委员会恩赐举行的类似在伦敦举行的那种秘密代表会议。

① 指1871年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不责备总委员会。组成总委员会的人,力图使自己的个人学说取得胜利,希望把权力原则应用于国际,他们诚心诚意认为这样做比较好。环境促进了这种欲望,这个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理想的学派很自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于最近的事件,必须改变国际的原有组织形式,把它变成为由中央委员会控制的教阶制的组织。

我们虽然设法解释这些事实和欲望,但是我们丝毫不想屈从于这些事实和欲望,相反地,我们认为我们的职责是反对它们,为我们所向往的社会革命而斗争,社会革命的纲领说:“劳动人民的解放应该是劳动人民自己的事情”。这种解放应当撇开任何权力机关,甚至撇开工人自己选出来的权力机关来达到。

我们请求国际的支持,请求各支部起来捍卫在此以前曾经是国际的基础的支部自治。我们要求被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改变了权利和义务的总委员会,能够满足于自己正常的作用,仅仅作为一个简单的通讯局、统计中心;总委员会力求通过集中和专政来达到统一,而我们却愿意借助于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来达到统一。

未来社会应当只是以现在的国际作为典型的那种组织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使这个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能够从权威组织中产生吗?不可能。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它现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们的自由和联邦的原则,并且抛弃任何追求权力和专政的思想。

我们坚持必须尽快地召开国际全体代表大会。

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1871年11月12日于桑维耳耶

译自《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莫斯科
1926年俄文版第108—111页。

上帝与国家(摘录)

· 编者按语 ·

1870年至1871年间，巴枯宁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反神论的断简残札，死后由他的门徒汇集成书，1882年以《上帝与国家》的名称用法文出版。这本书杂乱无章，毫无系统，然而，由于着重论述了巴枯宁的反神论和反权威主义思想，因而历来被称为巴枯宁的主要著作之一。原书约八万字，这里摘录的是有关人性论和反对权威的片断。

巴枯宁不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而胡诌了一套“兽性”和“人性”的对立，胡说“历史正是人的人性的发展对于人的原始的动物性的不断否定”，“创造出一切构成人身上的人性”的是“两种更高级的宝贵能力——思想的能力和反叛的欲望”，而“思想”就是“科学”，“反叛”就是“自由”。根据这种谬论，他宣称“一切权威都是虚假的、专横的和极其有害的”，权威的影响“会直接变成压迫和虚伪”，因此，他叫嚷“我们否认一切立法，一切权威，一切特权的、特许的、官方的和法律的影响”。这些谬论再次证明，巴枯宁的反对权威、否定一切国家的思想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基础的。

谁是正确的，唯心主义者呢，还是唯物主义者？一旦这样提出问题，就不能支吾其词了。毋庸置疑，唯心主义者是错误的，而唯

物主义者是正确的。是的,事实先于观念;是的,正如蒲鲁东说的,理想不过是植根于物质生活条件的花朵。是的,人类的整个历史,无论是知性的和道德的历史,或者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历史,都只不过是人类经济史的反映。

近代科学,真正的和公正的科学的一切部门,都一致宣告这样一个根本的和确定不移的伟大真理:社会的世界,其实就是说人类世界,——简言之,即人类,——无非是动物界的最后的和最高的发展、最高的表现,就我们所知,至少在我们这个行星上是这样。但是,由于任何发展都必然包含着否定,包含着对这种发展的基础或出发点的否定,所以人性同时也是,而且本质上就是对人身上所含的动物性成分的缓慢逐渐的否定;显然,这种合理而又自然的、正因为是自然的所以才是合理的否定,既是历史的,同时又是合乎逻辑的,正如世界上一切自然规律的发展和实现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否定构成和创造理想、知性的和道德的信念世界、观念。

是的,我们最初的祖先,我们的亚当和夏娃们,如果不是大猩猩的话,也是大猩猩即有知性而又凶猛的杂食野兽的近亲,他们比其他任何动物具备两种更高级的宝贵能力——思想的能力和反叛的欲望。

这些能力及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一个根本的要素,是人的动物性的肯定发展中的否定的力量,结果创造出一切构成人身上的人性的东西。

.....

……人解放了自己;他使自己脱离了动物界而成其为人;他通过叛逆和科学的行动——就是说,通过反叛,通过思想——开始了他的显然是人类的历史和发展。

有三种要素,或者说三个基本原则,构成历史上整个人

类——集体或个人——发展的根本条件：（一）人的动物性；（二）思想；以及（三）反叛。和第一种要素完全相应的是社会经济和私人经济；和第二种要素完全相应的是科学；和第三种要素完全相应的是自由。

.....

对于我们唯物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历史现象毫无令人惊奇或可怕之处。我们富有意识，我们不惜任何代价热爱真理，对于唯一能成为伟大力量的逻辑充满激情，而离开逻辑就不会有思想；我们对正义充满激情，我们坚信人性会战胜一切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兽性；最后，我们和少数赞同我们信念的人们彼此之间坚决互相信任和支持，——所以我们服从这种历史现象的一切结果，我们认为这种历史现象是一种和其他一切支配世界的规律同样自然、必然和不变的社会规律的表现。

这种规律是人类社会的兽性根源的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面对今天积累的一切科学的、生理的、心理的和历史的证明，同样面对现在表现得如此触目惊心的日耳曼人征服法兰西的业绩，再也不可能对这种根源真正表示怀疑了。但是，自从承认人类的这种兽性根源时起，一切就都得到了解释。于是，历史在我们看来是一种时而缓慢、冷淡、迟钝，时而热烈和有利的对于过去的革命否定。历史正是人的人性的发展对于人的原始的动物性的不断否定。人，一种野兽，大猩猩的表兄弟，从兽性本能的深沉的黑暗达到了心智的光明，这就完全自然地说明了他过去的一切迷误，而且使我们对他现在的谬误可以得到某种安慰。人类脱离了动物性的奴隶状态，经过神性的奴隶状态这种人的动物性和人性之间的暂时的状态，现在正在向获得和实现人类的自由进军。由此可见，一种信念、一个观念古已有之，决不能证明它就是对的，相反地，却应该使我们对它表示怀疑。因为在我们后面的是我们的

动物性,在我们前面的是我们的人性;人性之光是唯一能够使我们温暖和明亮的东西,是唯一能够解放我们,给我们以尊严、自由和快乐,使博爱得以在我们之间实现的东西,它决不是出现在历史的开头,而和我们生活的时代相比,总是出现在历史的末尾。因此,我们决不要向后看,我们要永远向前看;因为前面是我们的阳光,前面是对我们的拯救。如果回过头去研究我们的过去是正当的,甚至是有用的和必需的,那也只是为了确定我们曾经是什么,我们必须不再是什么,我们曾经相信和想过什么,我们必须不再相信或者想些什么,我们曾经做过什么和我们必须不再做什么。

.....

一切宗教和它们的神、它们的半神半人、它们的预言者、它们的救世主、它们的圣者,都是那些没有充分发展和没有充分掌握自己能力的人们轻信的空想所创造出来的。因此,宗教的天国不过是一种幻想,被无知和信仰弄得飘飘然的人们从这种幻想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影像,不过这是放大和颠倒即神化了的影像罢了。因此,宗教的历史,相继获得人类信仰的诸神诞生和兴衰的历史,不过是人类的集体智力和意识的发展而已。在他们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一发现他们身上或者外部自然界中有一种力量,一种特性,或者甚至任何重大的缺陷,他们就依靠自己的宗教幻想,象儿童那样把它们无限地夸张和扩大而归因于他们的神。由于抱有信仰和轻信的人们的这种谦逊和虔诚的慷慨态度,天国靠掠夺世间变得富足了,而结果必然是,天国愈富足,人类和世间就愈不幸。上帝一旦被设置,自然就被宣布是一切事物的原因、理由、裁判者和绝对的主宰;从此世界就什么也不是,上帝便是一切;而真正创造了上帝的人,在不知不觉地从虚无中引出了上帝之后,却向他鞠躬致敬,俯首崇拜,自称是他的创造物和奴隶。

基督教的确是最出色的宗教,因为它充分暴露和揭示每一种

宗教体系的性质和本质，这就是为了神性的利益而削弱、蹂躏和消灭人性。

上帝无所不是，现实的世界和人却什么也不是。上帝便是真理、正义、善良、美好、权力和生命，人则是谬误、罪孽、邪恶、丑恶、无能和死亡。上帝是主人，人则是奴隶。人靠自己的力量是找不到正义、真理和永生的，只有通过神的启示才能得到。但是，无论谁谈到启示，也就要谈到上帝亲自授与神意的启示者、救世主、预言者、牧师和立法者；而这些人一旦被承认是神在世上的代表，是上帝自己为了指引人类走上得救的道路而挑选出来的人类的神圣导师，他们就必然要行使绝对的权力。人人都得对他们谦卑恭顺，无限服从；因为没有一种人的理性能够反对神的理性，任何人世的正义都不能同上帝的正义相抗衡。作为上帝的奴隶的人，也应该做教会和国家的奴隶——在国家被教会奉为神圣的情况下。基督教比现在存在着的或曾经存在过的其他一切宗教都更清楚这个真理，甚至古老的东方宗教也不例外，那些宗教仅仅包括一些与众不同和享有特权的民族，基督教则渴望包罗全人类；而在基督教的一切教派中，只有罗马天主教以严格的逻辑宣布并实现了这个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是绝对的宗教，是最后的宗教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教皇的和罗马的教会是唯一适宜、合法和神圣的教会的缘故。

因此，尽管形而上学者、宗教理想主义者、哲学家、政治家或诗人们应该备受尊敬，上帝的观念却意味着人类的理性和正义被抛弃；它是对人类自由的最坚决的否定，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结果都必然使人类沦为奴隶。

因此，除非我们象耶稣会教徒，象莫米哀派、虔信派或新教美以美派那样希望人类沦为奴隶和堕落下去，我们不可，切不可对神学的上帝或形而上学的上帝作丝毫让步。在这个神秘的字母表

上,谁以 A 开始,谁就必然以 Z 告终;凡是希望崇拜上帝的,除了鼓起勇气丢开他的自由和人性以外,决不可对事情抱任何幼稚的幻想。

如果有上帝的话,那末人就是奴隶;可是,人能够而且必定是自由的;所以,上帝并不存在。

我使任何人都逃不脱这种循环的论证;因此,现在让大家来选择吧。

宗教以何种方式使人们堕落和腐化到了何种程度,这还用得着说吗?宗教破坏人们的理性——人类解放的主要工具,而使他们退化到低能状态——他们受奴役的根本条件。宗教污辱人类的劳动,把它当作受奴役的标志和根源。宗教扼杀人类正义的观念和情感,总是使天平倾向那班扬扬得意的恶棍,那些蒙受神恩的特权人物一边。宗教扼杀人类的骄傲和尊严,而只保护畏缩和恭顺。宗教窒息各国人民心中所有一切人类博爱,而使他们心中充满神的残忍。

一切宗教都是残酷的,都是建立在鲜血上面的;因为在原则上它们都建立在牺牲的观念上,就是说,建立在让人性永久殉祭于神性的贪婪报复。在这种血腥的圣餐礼中,人总是牺牲品,而牧师——也是人,不过是蒙恩享有特权的人——则是神的刽子手。这就说明为什么一切宗教的即使最善良、最厚道、最温和的牧师,在他们的心坎里——如果不在他们心里的话,就在他们的想象中,在他们的精神上(我们知道这两者对人们的心灵有着可怕的影响)——也几乎总是有着几分残酷和杀机。

.....

这种矛盾在于:他们想要上帝,他们也想要人性。他们硬要把两个一旦分开之后,再合在一起只会互相排除的条件联结起来。他们一口气说出:“要上帝,也要人类自由”,“要上帝,也要人类的

尊严、正义、平等、博爱、繁荣”，却没有注意到，由于致命的逻辑，如果存在上帝的话，这一切全得被宣告不存在。因为，如果有上帝的话，他必然是永恒的、至上的、绝对的主人，而如果存在这样一个主人，人就是奴隶；而如果人是奴隶。那末对他们说来，无论正义、平等、博爱、繁荣，都是不可能的。唯心主义者公然违背良知和一切历史教训，竟把他们的上帝描绘得活灵活现，说是极其亲切地热爱人类自由，这是徒然的；一个主人，无论他是谁，也无论他让自己显得如何开明，同样总还是主人。他的存在必然意味着他下面的一切生灵沦为奴隶。因此，如果存在上帝的话，他只有用一个办法——停止存在——才能造福于人类自由。

我作为人类自由的热心爱护者，由于把人类自由看作人性之中我们所赞美和尊重的那一切的绝对条件，要把伏尔泰的话倒过来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就必需废除他。

.....

什么是权威？是表现在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各种现象必然连接和相继承续中的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吗？的确，要反抗这些规律，不但是不允许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也许会误解它们，或者对它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不能不服从它们；因为它们构成我们生存的基础和根本条件；它们包围着我们，浸透我们，调节我们的一切运动、思想和行为；即使当我们以为我们不服从它们的时候，我们也只是显示出它们的万能而已。

是的，我们完全是这种规律的奴隶。不过这种奴隶状态并不是什么羞耻，或者不如说这根本不是沦为奴隶。因为沦为奴隶是假定有一个外在的主人，一个在被指挥者之外的立法者，而这些规律却并非处在我们身外；它们附在我们身上；它们构成我们的存在，在肉体上、智力上和道德上构成我们的整个存在；只是通过这些规律，我们才生活、呼吸、行动、思想、希望。离开它们，我们就什

么也不是，我们就~~不存在~~。因此，我们从什么地方能够获得反抗它们的力量和希望呢？

人在对自然规律的关系中，只可能有一种自由，就是按照他所追求的集体的和个人的解放或人性化的目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认识和应用这些规律的自由。这些规律一旦被认识了，就行使一种人们决不会争议的权威。例如，一个人要么真是傻瓜，要么是神学家或者至少是形而上学者、法学家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会反对二二得四的规律。的确，一个人除非求助于也是以别的某种自然规律为基础的某种遁词，才会有信心去想象火烧不焦，水淹不死。不过这种反抗，或者宁可说对这种不可能的反抗的尝试或愚蠢的空想，肯定是例外的情况；因为，一般说来，可以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几乎是绝对的方式承认常识即所有公认的自然规律的支配。

非常不幸的是，由于就我们所知仅仅是为了造福于人民而存在的这种保护性的支配作用防范严密，大量已经由科学界确定的自然规律仍然没有被群众所了解。还有另外一个困难，这就是，大部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没有被科学界本身充分地确定和认识，而这些规律是和支配物理世界的规律完全一样必然的、不可改变的、命中注定的。

一旦这些规律被科学界所认识，然后通过广泛的普及教育和教授制度，从科学界传到一切人们的意识中，自由的问题就会完全得到解决。最顽固的当局也必须承认，那时，既不需要政治组织，也不需要指导，也不需要立法，这三件事情，无论来自君主的意志或者来自普选产生的议会的表决，甚至符合自然规律的体系，——这种情况是从未有过，将来也决不会有，——它们对群众的自由总是同样致命的和敌对的，因为事实上它们把一套外在的，因而是专横的规律强加于他们。

人的自由唯一在于：他服从自然规律，是因为他自己认识了这种规律本身，而不是因为任何神的或人的，集体的或单个的外来意志从外界把这些规律强加于他。

假定有一个博学的科学院，由科学界最优秀的代表组成；假定这个科学院负责社会的立法和组织，并且假定它仅仅是在对真理的最纯洁的喜爱的鼓舞下，拟定出来的法律都是和最新科学发现绝对和谐一致的。可是，在我说来，我坚持认为这种立法和这种组织会是个怪物，原因有二：第一，人文科学总是而且必然是不完全的，把已经被它发现的东西和尚待发现的东西相比，我们可以说它仍然处在它的摇篮时期。所以，如果我们试图迫使人们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实际生活严格地和绝对地同科学上的最新成就一致起来，我们就是宣判社会和个人在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遭受折磨，结果不久就会把他们肢解和闷死，因为生活永远是比科学无限伟大的东西。

第二个原因是：一个社会服从来自一个科学院的立法，如果不是因为社会本身了解这种立法的合理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院的存在就会是没有用处的），而是因为这种来自科学院的立法，是以社会并不理解而表示尊重的科学的名义强加于人的，这样一个社会就不会是人类的社会，而会是野兽的社会。它就会成为那些在巴拉圭如此长期地屈从耶稣会教徒统治的传道会的再版。它就一定会很快地落到最低级的白痴状态。

但是，还有第三个原因使这种统治成为不可能，这就是，一个被授与可以说是绝对主权的科学院，即使由最优秀的人士组成，它也必然不久就终于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腐化堕落。即使在今天，尽管享有的特权不多，一切科学院的历史也都是如此。最伟大的科学天才，从他成为一个科学院院士，一个经官方认可的学者的时刻起，必然要陷于麻木不仁。他将丧失他的自动精神，他的革命

勇气,以及作为最伟大天才的特征的,总是号召摧毁摇摇欲坠的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基础的那种令人心烦的、野性的精力。他在斯文方面,在功利的和实用的智慧方面无疑有所得,但是在思考力方面则有所失。一句话,他腐化堕落了。

特权和一切特权地位的特征,就是扼杀人们的精神和心灵。无论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享有特权的人,就是在精神上和心灵上堕落了的人。这是一个毫无例外的社会规律,既适用于全民族,也适用于各阶级、各团体和个人。这是平等的规律,是自由和人性的最高条件。本文的主要目的正是在于透过人类生活的各种表现来论证这一真理。

一个被委托治理社会的科学团体,结果很快就会根本不再献身科学,而去从事完全另外的事情;正如一切建立了的权力的情况那样,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科学团体使委托给它照管的社会更加愚昧,因而更加需要它的治理和指导,从而使它自己永世长存。

对于科学院来说情形真是这样,对于一切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甚至那些由普选产生的议会来说,情形也真是这样。诚然,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议会可以更新它们的组成,但是这并不能防止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形成一个虽然不在法律上,但却在事实上享有特权的政客集团,他们专门从事国家公共事务的指导,最后形成某种政治贵族或寡头。美利坚合众国和瑞士就是证明。

因此,不要外来的立法,也不要权威,这两者在这方面是彼此分不开的,两者都要奴役社会并使立法者自己堕落下去。

由此就说我拒绝一切权威吗?我远不是这个意思。关于靴子的事,我参照靴匠的权威;关于房屋、运河或铁路,我请教建筑师或工程师的权威。对于某种专门知识,我向某某学者求教。但是我既不允许靴匠,不允许建筑师,也不允许学者把他的权威强加于我。我自由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智力、性格、知识怀着应有

的充分尊重，但总是保留我的无可争论的批评和责难的权利。我不满足于向任何专业部门的单独一个权威请教；我向若干权威请教；我把他们的意见加以比较，而选择我觉得最正确的意见。但是即使在专业问题上，我也不承认会有永无谬误的权威；所以，无论我对某人的诚实和真诚如何尊重，我对任何人都绝不信任。这种信任对我的理性，对我的自由，甚至对我的事业的成功来说都会是致命的；这会使我立刻变成一个愚昧的奴隶，变成他人意志和利益的工具。

如果我在专家的权威面前低头，表示愿意在某种程度上和我认为必要时听从他们的指点甚至他们的指导，那是因为他们的权威并不是由任何人——既不是由人们，也不是由上帝——强加于我的。否则，我就会怀着厌恶的心情予以拒绝，让他们的忠告、指导和帮助见鬼去，因为肯定地他们会迫使我为了他们可能提供给我的那些用大量谎言包着的少许真理，而付出丧失自由和自尊的代价。

我在专业人员的权威面前低头，因为这是由我自己的理性加之于我的。我自知不能掌握人类知识每一大部门的细微末节和实在发展。最大的智慧也不能理解一切。因此，无论科学还是工业，都有分工合作的必要。我既接受，我也给予——这就是人生。每人都在指导，反过来也在被指导。所以并无一成不变的权威，而只有互相的、暂时的、首先是自愿的权威和服从的不断更换。

因此，同样的原因不许我承认一个一成不变而万能的权威，因为没有万能的人，没有人能够掌握一切科学、一切社会生活部门的细微末节的丰富内容，而把科学应用到生活上是缺此不可的。如果在单独一个人身上竟然实现了这种万能，如果他想要利用这点把他的权威强加于我们，那就必须把这个人赶出社会，因为他的权威不可避免地要使所有其他的人沦为奴隶和低能。我并不认为社

会应该象迄今做过的那样虐待天才；但是我也不认为社会应该过于纵容他们，更不认为应该给他们任何特权或者无论什么样的专有权。这是因为三个原因：第一，因为社会往往会把招摇撞骗者错当作天才人物；第二，因为通过这样一套特权制度，社会就可能使一个甚至真正的天才人物变成招摇撞骗者，使他道德败坏，使他堕落下去；最后，因为社会就会树立一个凌驾于自己之上的主人。

总起来说：我们承认科学的绝对权威，因为科学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周到地、系统地使事实上仅仅构成同一个自然世界的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这两个世界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内在的自然规律在精神上再现出来。除了这个唯一合法的权威——其所以是合法的，因为是合理的并与人类自由和谐一致——之外，我们宣告其他一切权威都是虚假的、专横的和极其有害的。

我们承认科学的绝对权威，但是我们否认学者是永无谬误和万能的。在我们的教会中，——如果我可以暂且使用一下我如此深恶痛绝的这个名词的话，因为教会和国家是我所厌恶的两样东西，——在我们的教会中，正如在新教徒的教会中一样，有一个首脑，一个看不见的基督，即科学；而和新教徒一样，甚至比新教徒更有道理，我们既不愿容忍教皇，也不愿容忍宗教会议、永无谬误的红衣主教会议、主教，甚至不愿容忍牧师。我们的基督和新教徒的、基督教的基督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是人格化的存在，我们的基督却是非人格化的存在；在永恒过去中已经圆满的基督教的基督表现为完美的存在，而我们的基督即科学的圆满和完美却总是在于未来：这等于说永远不会实现。因此，我们承认绝对的科学是唯一的绝对权威，这决不会损害我们的自由。

我用“绝对的科学”这种词，意思是指那种真正万能的科学，它

将极其充分地 and 无限详细入微地使宇宙，使世界的不断发展所显示的一切自然规律的体系或协调关系在观念上再现出来。显然，这样一种科学，人类精神全力以赴的这个最高目标，是永远不会充分地 and 绝对地实现的。所以我们的基督将永远不会功德圆满，这就必然大大有损于他在我们中间的特派代表的骄傲。他们以圣子的名义把他们的横蛮而迂腐的权威强加于我们，我们反对圣子而诉诸圣父，圣父乃是现实的世界、现实的生活，他（圣子）只是这种生活的极不完全的表现，而我们这些生活着、工作着、奋斗着、热爱着、渴望着、欢乐着、痛苦着的真正的芸芸众生，则是这种生活的直接代表。

但是，我们虽然否认科学人士的绝对的、万能的和永无谬误的权威，却甘愿在各门专门科学的代表们的可敬的权威面前低头，尽管这种权威是相对的、十分短暂的和极其有限的，同时顶多要求轮流请教他们，对他们可能给予我们的宝贵知识十分感谢，但要他们愿意在我们偶尔比他们高明的时候以及在有关我们比他们高明的事情方面也接受我们的指点。一般说来，我们顶多要求看到，具有伟大的知识，伟大的经验，伟大的精神，首先是伟大的胸怀的人们，对我们产生一种自然的和合法的影响，这种影响被自愿地接受，而决不是以天上或世间任何官方权威的名义强加于人的。我们接受一切自然的权威和一切事实的影响，但是不接受任何权利的影响；因为任何由官方强加于人的权威和任何权利的影响，都会直接变成压迫和虚伪，正如我相信我已经充分说明了的那样，它不可避免地会把奴隶性和荒谬性强加于我们。

总之，我们否认一切立法，一切权威，一切特权的、特许的、官方的和法律的影响，即使它是从普选中产生的，我们确信它只会有利于少数占统治地位的剥削者，而损害那屈服于他们之下的极大多数人的利益。

我们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种意思。

.....

把人性中一切伟大、公正、高贵、美丽的东西宣布为神性的东西，就是默认人性本身不能产生它，这就是说，如果人性被置之不理的话，它自身的本性是卑鄙的、败坏的、下贱的、丑恶的。这样我们就回到一切宗教的本质，换句话说，回到为了神性的更大光荣而糟蹋人性。一旦承认人生来就低能，不靠神的启示，他自己根本不能上升到理解正直的和真实的观念，也就必须承认天启宗教的一切神学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后果。一旦完美而至尊的上帝被摆在和人性对立的位置，就有神媒，上帝的选民，受启示者从世上跳出来，用上帝的名义开化、指导和统治人类。

难道我们不可以假定人人都同样受到上帝的启示吗？当然，这样一来就再用不着神媒了。不过这种假设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跟事实冲突得太明显了。它会迫使我们把世界上出现的一切荒谬和迷误，把所造成的一切恐怖、愚蠢、下贱勾当和卑怯行为归因于神的启示。那么，或许只有少数人，只有伟大的历史人物，如杰出的意大利公民和预言家朱泽培·马志尼所称的有德行的天才才受到神的启示。这样的人直接由上帝亲自启示，并得到民众投票所表达的一致赞同的支持（上帝和人民），就该受命来治理人类社会。

不过在这里我们重新又落入教会和国家的桎梏中了。老实说，这种新的组织和一切旧的政治组织一样，也是靠上帝的保佑才存在的，不过这一次——至少就形式上而论，作为对现代精神的一种必要的让步，犹如拿破仑第三诏令的序言那样——是以（虚假的）民意为衬托的，采取这种新的组织，教会就将不再自称为教会；它将自称为学校。这有什么关系呢？在这所学校的长凳上坐着的不仅是儿童，这里可以见到永远蹲班的低班生，被认为永远考不及

格，学不到教师的知识，免不了受教师惩罚的学生——人民。^① 国家将不再自称为君主国，它将自称为共和国；不过它仍然是国家，就是说，是少数有资格的人物，有德行的天才或者说有才干的人物正式地和正规地建立的一种监护机构，那些人将监视和指导这一大群不可救药的和令人害怕的孩童即人民的行动。学校的教授和国家的官吏自称为共和主义者；不过他们仍然是导师，是牧人，

① ……………

那么，难道我们必须消灭社会中的一切教育，取消一切学校吗？远非如此！必须在群众中间无限制地推广教育，同时把一切教会，把所有那些托上帝保佑和靠奴役人们而存在的庙宇改成同样多的解放人类的学校。但是，第一，让我们理解彼此的意思：在正常的社会中以平等和尊重人类自由为基础而建立的学校，其实仅仅是为儿童，而不是为成人设立的；为了使这些学校能够成为解放的学校，而不是奴役的学校，首先必须消除关于上帝这个永恒的和绝对的奴役者的虚构。对儿童们的整个教育和教诲，必须以科学地发展理性，而不是以发展信仰为基础；必须以发展个人的尊严和独立，而不是以发展虔诚和服从为基础；必须以不惜任何代价崇拜真理和正义，首先是以尊重人性为基础，无论何时何地，对人性的尊重必须代替对神性的崇拜。在儿童们的教育中，权威原则构成自然的出发点；把它应用于智力本身还没有充分发达的幼年儿童身上，是正当的、必要的。但是，由于任何事物，自然也包括教育的发展，都包含着对出发点的逐渐否定，这种原则必定随着教育和教诲的进步而削弱，让位于日益增长的自由。一切合理的教育实质上无非就是这样为了自由而不断牺牲权威，教育的最终目的必然是造就充分尊重和热爱他人自由的自由人。因此，如果学校收的是些几乎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学生们第一天的生活就应该是接受最大权威和几乎没有自由的生活；但是学生们最后一天的生活则应该是享有最大自由和绝对消除兽性或神性的权威原则的任何痕迹的生活。

权威原则应用到老人和成人身上，就变成一种怪物，变成否认人性的罪孽，变成奴役和精神堕落与道德败坏的源泉。不幸的是，家长式的统治使群众深深地陷入愚昧无知之中，以致不仅需要为人民的儿童，而且需要为人民本身开办学校。这些学校要绝对排除权威原则的任何应用和表现。它们将不再是学校；它们将是大众化的科学院，其中分不出学生和教师，人民需要的话，就可以自由入学，自由受教，教授们把人民所缺乏的知识传授给人民，人民本身经验丰富，他们反过来又可以教给教授们许多事情。因此，这将是具有教养的青年和人民之间的一种互相的受教，是一种精神友爱的行动。

对人民和一切成人来说，真正的学校就是生活。唯一伟大而万能，自然而合理的权威，唯一值得我们尊重的权威，就是一个以所有成员平等、团结和互

而人民则从古至今仍然是羊群。当心那剪羊毛的啊，因为凡是有羊群的地方，必然会有剪羊毛和吞吃羊的牧人。

在这种制度下，人民将永远是弟子和学生。纵然他们有那完全是虚假的主权，他们将继续充当并非本人的思想、意志从而利益的工具。这种状况和我们所称的自由即唯一真正的自由之间，横着一道鸿沟。这将是新形式下的旧的压迫和旧的奴役；而凡是有

相尊重人性为基础的社会的集体精神和公共精神的权威。是的，这是一种绝非神性的而完全是人性的权威，但是我们心甘情愿地在它面前低头，我们确信，这种权威永远不会奴役人们，而是会解放他们的。它一定会比你们所有那些由教会和国家树立的神性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权威，比你们的刑法、狱吏和刽子手强有力一千倍。

即使在现在，集体情绪或公共精神的力量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动辄犯罪的人们也极少敢于蔑视它，公然触犯它。他们会设法欺骗它，但是除非他们感到多多少少有少数人的支持，他们是会小心翼翼地不去得罪它的。无论一个人相信自己如何强而有力，也决没有力量忍受社会一致的蔑视；如果不是感觉自己至少受到社会上某一部分人的赞同和尊重，任何人都无法生活下去。一个人必须受到某种巨大而非常真诚的信念的鼓舞，才会有勇气违反众人的意见说话和行事，而自私、堕落和怯懦的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勇气的。

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正如我们每人每天都能够用他自己和他所认识的一切人们来证实的那样，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休戚相关——这种社会性的规律——把所有的人们联结在一起。但是，如果存在着这种社会的力量，为什么它至今不足以使人们道德化、人性化呢？那纯然是因为这种力量本身至今还没有人性化；它之所以没有人性化，则是因为它所永远确切表现的社会生活，正如我们所知，不是以尊重人性，而是以崇拜神性为基础；不是以自由，而是以权威为基础；不是以平等，而是以特权为基础；不是以人们情同手足，而是以剥削为基础；不是以公平和诚实，而是以不公和虚伪为基础。因此，它的实际作用总是和它所宣告的博爱理论相抵触，曾经不断地产生悲惨的和恶劣的影响。它并不抑制，而是造成恶习和罪孽。因此，它的权威是一种神性的、违反人性的权威；它的影响是有害的和造孽的。你们愿意使它的权威和影响变得有益而合乎人性吗？那就去完成社会革命吧。使一切需要成为真正是共同一致的，使每人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同每人的合乎人性的义务相一致。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手段：破坏一切不平等的制度；确立人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平等，在这个基础上将出现人人的自由、道德、共同一致的人性。

我将回过头来再谈这一点，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作者注

奴役的地方,在特权阶级中间和在群众中间,就都会有不幸,有兽欲,有真正社会性的实利主义。

唯心主义者要把人类的事物神圣化,却总是以兽性实利主义的胜利而告终。原因很简单:神圣的东西都升腾到自己的故乡即天国去了,只有兽性的东西才真正留在世上。

.....

我说过,任何发展都包含着对它的出发点的否定。按照唯物主义学派的观点,基础或出发点既然是物质的,否定就必定是观念的。从现实世界的总和出发,或者说从抽象地称作物质的东西出发,就会合乎逻辑地达到社会的真正的理想化,就是说,达到社会的人性化,达到充分而完全的社会解放。相反地,由于同样的原因,唯心主义学派的基础和出发点是观念的,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实利化,导致组成一种残酷的专制制度和卑鄙的、罪恶的剥削制度,其形式便是教会和国家。按照唯物主义学派的观点,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不断的上升;在唯心主义体系看来,这种发展则只能是不断的堕落。

无论我们想要考虑人类的哪个问题,总会碰到这两个学派之间的这种相同的实质性的冲突。这样,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唯物主义从兽性出发以确立人性,唯心主义则从神性出发以确立奴役而使群众陷入无止境的兽性。唯物主义否认自由意志而归结于确立自由;唯心主义则以人类尊严的名义宣告自由意志,而在一切自由的废墟上树立权威。唯物主义否认权威原则,因为它正确地把这个原则看作是兽性的结果,因为,反过来说,人性的胜利——历史的和主要意义,只有通过自由才能实现。总之,你们始终会发现唯心主义者在进行地地道道求实的实利主义的行动,同时会看到唯物主义者在追求着和实现着非常理想的愿望和思想。

.....

资产阶级在宗教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反抗中，在抗议和革命中获得了它的一切光荣头衔之后，终于成了统治的阶级，从而甚至成了国家的保卫者和保持者，从那时起，国家就是这个阶级独占权力的正规的机构。国家是暴力，而对资产阶级说来，首先是使用暴力的权利，是使用撞针枪、来复枪的得意论据。但是人类的性格特别这一论据看起来虽然头头是道，归根到底却是不够的。为了迫使人们表示尊重，某种道德的制裁是绝对必需的。此外，这种制裁必须既简单又明白，以使群众信服，群众既然已被国家权力所贬低，也一定被贬低到在道义上承认国家的权利。

要使群众相信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好处，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唯一实际的方法，但也是最难采用的方法，——因为它包含废除国家，或者换句话说，包含废除任何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有组织的政治剥削，——就是直接而完全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和愿望，这等于是完全消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存在，或者说，还是等于废除国家。这种方法对群众是有利的，但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却是有害的；所以谈论这种方法是无用的。

相反地，仅仅对人民有害处，但对于拯救资产阶级的特权有价值的唯一方法，无非就是宗教。那是永恒的幻想，它引诱群众去寻找神的宝藏，而统治阶级却克制得多，它满足于在它的所有成员之间分配——分得很不平均，而且总是让财产最多的人分得最多——世上少得可怜的财物和从人民手中夺来的赃品，包括人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自由。

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无宗教的国家。拿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譬如美利坚合众国或瑞士联邦——来说，可以看出，那神圣的上帝，一切国家的最高制裁，在一切官方的说教中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首脑，无论皮鞭日耳曼帝国的皇帝威廉一

世,或者伟大的共和国的总统格兰特,每当讲到上帝的时候,一定是准备再剪一次他的人民这群羊的毛。

.....

写于1870—1871年间。译自《上帝与国家》纽约大地出版社1916年英文版第9—10、12、20—21、23—26、27—28、28—35、37—40、40—43、48—49、83—84页。

我和马克思的私人关系(摘录)

· 编者按语 ·

巴枯宁的这篇反动文章写于1871年底,是他为攻击马克思而写的下流作品的典型。

1871年9月第一国际召开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和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关于公开宣布不承认涅恰也夫的言行等重要决议,坚决捍卫了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沉重打击了巴枯宁的阴谋破坏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同盟正确地把这看做是宣战,并且立即展开了军事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95页)这篇反动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

在这篇文章中,巴枯宁无耻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极尽攻击、诬蔑、造谣之能事,充分暴露了穷凶极恶的政治流氓的丑恶面目。**“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巴枯宁对马克思的无耻攻击,丝毫无损于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而只能证明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斗争卓有成效,只能说明巴枯宁已经**“黔驴技穷”**,只好求助于诬蔑和谩骂。巴枯宁在对马克思进行诬蔑和谩骂的同时,还假惺惺地承认马克思的功绩,这是一种恶毒的阴谋家手法,其目的是要给自己戴上**“公正”**的假面具,以便欺骗和愚弄国际会员。这篇文章清楚地说明,巴枯宁是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

凶恶敌人。

.....

不过，你们不要害怕。这次冲突不仅没有损害国际的发展和扩大，而且相反，促进了它的巩固，因为国际的原则和目的更加准确地确定下来了。这次冲突，就象在意大利民主派中那次使你们现在同马志尼分子分开的冲突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你们深信（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的决裂，意大利民主派的绝大多数人同马志尼的少数或宗派的决裂，不仅没有损害这个派，相反地，结果迫使它更加朝着人民的、自由的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决裂加强了它的精神力量和行动能力，从而增加了严肃的和忠于它的成员。

我们同样深信，现在在国际内掀起的对我们自己的马志尼分子的空前抗议，对于国际的更加强有力的和直线的发展将是有利的。因为在我们这里也有自己的马志尼主义集团妨碍着我们的进步；这个马志尼主义集团并不是宗教方面的，而是就其权威主义倾向来说的，因为他们象我们一样，是无神论者。

这是常见的事情：权力甚至可以败坏最聪明和最忠实的人。象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现在在伦敦总委员会内居统治地位的那些人，无疑是聪明的和忠实于事业的。他们对国际做出了极伟大的贡献——但并不是作为总委员会的委员做出了贡献，这是由于总委员会的作用受到我们的共同章程的很大限制（这是国际的自由发展所需要的），而它的强大手段只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使它直到现在都不能开始履行章程和各次代表大会规定它必须履行的义务。国际在最近几年来这样蓬勃发展和强大起来，并不是由于总委员会的微不足道的活动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协会原则的正义性和重要性，而国际的原则无非是各国无产阶级

的最亲切、最深刻和最热情的愿望的经过严密构思的正确反映。因此，上述各人对国际的贡献并不是以软弱无力的（不论按自己的权力还是在实际上）总委员会的成员的身分作出的，而是个人的宣传和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此外，他还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是一个有根底的国民经济学家，马志尼的经济学知识是极其表面的，同他相比，未必能称得上一个学生。其次，马克思热情地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在这方面谁也无权怀疑，他坚毅忠诚地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这个事业。马志尼服用不义的谥骂和任意捏造的神话和诽谤的毒药为自己现在的软弱无力寻找可悲的安慰，他断言，鼓舞马克思的仅仅是仇恨，而不是爱。让我们来讲清楚：对人类的深刻的、严肃的、热烈的爱始终是与恨同时发生的。没有对非正义的恨，就不能有对正义的爱；没有对权威的恨，就不能有对自由的爱；没有对一切专制制度的心理和道义根源、对天国的专制者即上帝的不道德的虚构的恨，就不能有对人类的爱。要爱被压迫者，就不能不仇恨压迫者，所以要爱无产阶级，同时就不能不仇恨资产阶级。马克思爱无产阶级，所以他仇恨资产者。如果他不爱无产阶级，他就不能在三十年中那样热情忠诚地为它服务；只有怀着可恶的诽谤成见的人才敢于否认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爱。

除了这些巨大的、不可争辩的功绩以外，还应当补充一点：马克思是建立国际的倡议者和主要鼓舞者。

这就是他的功绩。但是，任何奖章都有背面，任何光都有自己的阴影，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所以，永远不能把支配伟大人民群众的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个天才，具有一切美德。同样，也不能把这种权力委托给哪怕是最聪明、最真诚的少数人。按照同权力本身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规律，任何权力必然要产生滥用权力的现象，任何政府，甚至是普选产生的政府，都不可避免

地倾向于专制。

因此，马克思有自己的缺点。他的缺点如下：

一、首先他具有一切学者固有的缺点，他是个学理主义者。他无条件相信自己的理论，并从这些理论的高度来鄙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学者和聪明人，他当然有自己的党，有一个由盲目忠实于他的朋友们组成的核心，这些朋友们仅仅向他宣誓，仅仅用他的思想来思考，仅仅以他的意志为意志，——简言之，热爱他崇拜他，用自己的崇拜来败坏他，而且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很不坏的成就。其结果是使他十分认真地把自己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更正确些说）共产主义的教皇，因为，按照他的全部理论来看，他是个具有权威主义意向的共产主义者，象马志尼一样，想依靠集中化的国家政权来解放无产阶级，不过他是以别的思想为指导，用比马志尼现实得多的、尘世的方法来行动。

二、对他的绝对的和专制的理论自我崇拜，还有一个自然的后果——仇恨；马克思不仅仇恨资产阶级，而且仇恨一切敢于反对他和遵循同他的理论不同的思想方式的人，甚至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在马克思这样聪明和这样忠实的人身上有一个奇怪的特征，这个特征只能用他作为一个德国学者和著作家所受的教育和特别是他作为犹太人的神经过敏来解释。马克思非常爱好虚荣，爱好虚荣到了卑劣和疯狂的程度。如果谁不幸哪怕是无意中触动了他的病态的、始终是气量狭小的和容易动怒的虚荣心，马克思就成为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从这时起，为了在社会舆论中贬低自己的对手，他认为使用一切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他的确在使用最卑鄙、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手段。他撒谎、捏造并散布最肮脏的诬蔑。——从这方面来看，马志尼说他有恶劣可怕的性格是正确的；不过，亲爱的朋友，我请你们注意，马志尼自己的灵魂尽管是自然伟

大的，但是在自己日益软弱无力的意识的驱策下，他最近在同自己的敌人进行的论战中，表现得完全同马克思一样。

马志尼和马克思尽管在其他方面多么不同，——这种不同远不是始终对马克思有利的，——但是，他们都受着同一种欲望的推动：政治野心，按照自己的思想管理、教育和组织群众的野心，这种野心在前者那里是宗教性的，在后者那里是科学的和学理主义的。马志尼的人格无私、灵魂纯洁和思想方式高尚，是人所共知的，他寻求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党和自己的使徒们的胜利。马克思的本能远不是无私的，他热切希望看到自己的思想、无产阶级以及自己个人的胜利。因此，前者的野心是高尚的，首先是无私的，而后者的野心则具有较多的个人性质。但是野心使他们两人采取同一种行动方式。祸害包藏在追求权力的意图中、对统治的偏爱中、对权威的热望中，而马克思深受这种祸害之毒。

三、他的理论为这点创造了很好的基础。作为德国共产党的一个首领和鼓舞者，即使不是主要组织者（一般地说，他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组织者，与其说他具有联合的天才，不如说他具有搞阴谋闹分裂的天才），他是个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和通过国家即自上而下地、依靠有文化的少数人的智慧和知识来解放和改组无产阶级的拥护者，而这些有文化的少数人自然诉诸社会主义，为了给没有文化和愚昧的群众谋利益以自己的合法权威影响这些群众。

这种政治体系几乎和马志尼的体系是相同的，只是纲领不同。他们互相仇视，双方不能互相给以公正的评价，部分地可以由此得到说明。不仅思想和纲领条文把他们隔开；他们还是夺取同一种权力的斗争中的竞争者。因为他们两个人，一个为了自己的思想和使徒，另一个为了自己的思想和自己个人，都不满足于有希望在某个时候统治自己的国家，他们都幻想建立世界政权、世界国家。马志尼是想通过意大利，先使意大利按照他的思想组织起来，然后

使意大利成为统治世界的女王；马克思是想通过德国，德意志种族，使德意志种族按照他的方法重建世界。马志尼是个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而马克思是个彻头彻尾的泛日耳曼主义者。

他们之间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对马志尼来说是光荣的。马志尼爱自己忠实的朋友，自己的使徒，胜过爱他自己；他对他们十分宽厚、有时甚至过分地宽厚和非常宽宏大量，从内心的深处原谅自己朋友在对待他个人关系上所做的不义事情、所犯的 error 和过错。但是，他不饶恕对他的宗教、他的神的思想的背叛。

马克思对自己个人的爱比对自己的朋友和使徒的爱要强烈得多，任何友谊都不能抵消他的虚荣心的最微小的侮辱。他很容易宽恕对他的哲学和社会主义体系的背叛，他把这看作是断定他的朋友愚蠢或者起码是智力不足的证据，这使他感到宽慰。当他看到他的朋友不再是可能达到他的高度的竞争者的时候，这个朋友在他看来变得更加可爱。但是，他对于任何人在对待他的关系上的过错从不宽恕。要他爱你们，就要对他象神一样崇拜，把他作为偶像来顶礼膜拜；要他容忍你们，至少也得要怕他。他喜欢微不足道的人、走狗、阿谀奉承者围绕着他。尽管这样，在他的小圈子里仍可以找到一些杰出的人。

但是，总的来看，可以说，在他的小圈子里，我们看到很少有兄弟般的坦白直爽。但是，暗计和手腕却绰绰有余。这里在进行着一种静悄悄的斗争，这里存在着的是各个人的私利之间的妥协，而在私利登上舞台的地方，就再也没有兄弟关系的地位了。任何人都戒备着，任何人都在担心成为他的牺牲品，担心被消灭。整个马克思集团是组成这个集团的自私自利的人之间签订的一种相互条约。马克思在这个集团中要求尊敬，对于他不喜欢的人或者不幸没有象所希望的那样对他表示崇拜的人，他就立刻施展阴谋诡计和进行迫害，而且总是悄悄地和暗地里进行。

只要他下令开始进行迫害，那末任何下流和卑鄙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他本人是犹太人，在伦敦、法国，主要是在德国，他在自己周围联合了一大批渺小的、或多或少乖巧的、搞阴谋的、伶俐的犹太人、投机分子（犹太人不管在哪里都是这样的）、商业或银行的代理人、文学家、政治家、各种色彩的报纸的通讯员，总之是著作界的经纪人，就象是商业中的经纪人，他们一只脚站在银行里，另一只脚站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而屁股坐在德国报刊上，因为他们挤满了所有的报纸，——你们可以想象，结果文学被弄到了怎样令人恶心的地步。

这就是组成掠夺者宗派，产生吸血鬼和贪食的寄生虫的整个犹太人世界，这个世界紧密、坚固地团结在一起，不仅不分国界，而且不管政治见解的一切差别，——这个犹太人世界现在大部分掌握在马克思和路特希尔德的手中。我相信，路特希尔德家族是重视马克思的功绩的，而马克思对路特希尔德家族也怀着本能的羡慕和深刻的敬意。

这看起来是奇怪的。共产主义和大银行家之间会有什么共同点呢？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希望有强有力的国家集中化，而这种集中化在目前没有中央国家银行是不可能的；而哪里有这种银行，那里就有过寄生生活的犹太民族，这个用人民的劳动来投机的民族，永远能找到自己生存的手段。……①

不管怎样，事实是这个犹太人世界的大部分（主要在德国）掌握在马克思的手中。只要他暗示一下，要他们对某个人进行迫害，那末，在所有社会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的和君主主义的报刊上就会涌起一股辱骂、肮脏的诬告、可笑而下流的诽谤的激流，冲向那个不幸者。在意大利，互相讲分寸和对人尊重的感情得

① 虚点是原有的。——编者注

到严格遵守(起码在外表上),所以,关于德国报刊上进行日常论战的卑劣语调和真正卑鄙的方法,是无法恰如其分地想象的。这些犹太文学家在怯懦的、充满仇恨和阴险的诋毁的艺术方面特别有才干。他们很少公开谴责,他们只进行诋毁,“他们听说——据说——人们断定——可能这不符合真相,但毕竟……^①”,然后就直接对你们进行最荒谬的诽谤。

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谈一谈这种情况。我和马克思是老相识。我于1844年在巴黎第一次同他会见。我当时已经是流亡者。我们当时交往相当密切。他当时比我极端得多,就是现在,他即使不比我极端,也比我有学问得多。我当时对国民经济学一无所知,我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而我的社会主义纯粹是本能的。他虽然比我年轻,但是他当时已经是个无神论者,有学问的唯物主义者和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正是在那时候,他在制定他现在的体系的基本原理。我们经常会面,因为我很尊重他的学识和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严肃的、热烈的忠诚,虽然他的这种忠诚始终掺杂着个人野心。我贪婪地寻求同他交谈的机会,如果不夹杂有无谓的敌意(可惜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的交谈总是有教益的和机智的。但是,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亲密无间的关系。我们的气质是互不相容的。他称我是多情善感的唯心主义者,他是正确的;我称他是背信弃义的、阴险的和爱好虚荣的人,我也是正确的。

在1848年,我们发生了意见分歧,应当说,他当时比我正确得多。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建立了德国共产主义者支部,并同法国的和某些英国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在自己的朋友和忠实的同志恩格斯的支持下,在伦敦建立了第一个各国共产主义者的国际同盟。在那里,他和恩格斯一起以这个团体的名义写了一部极为

^① 虚点是原有的。——编者注

卓越的作品，即著名的共产主义宣言。

我自己当时完全醉心于欧洲的革命运动，更多地致力于革命的否定方面，而不是肯定方面，即更多地致力于破坏现存的东西，而很少致力于在破坏之后应当进行的建设和组织工作。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我是正确的。我作为一个斯拉夫人，希望斯拉夫种族以革命的方式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是破坏俄国的、奥地利的、普鲁士的和土耳其的国家，就是在经济和社会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用自我解放的办法而不是用权威的力量（不管它如何自命为革命的权威，不管它实际上多么合理）来自下而上地改组各个民族。

就在那时，我们的体系之间的分歧就已经暴露出来，这些分歧直到现在还把我们分开，从我这方面讲这完全是有意意识的。马克思很不喜欢我的思想和愿望。这首先是因为这不是他的思想，其次是因为这些思想同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信念相抵触，最后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德国的爱国者，过去和现在都不承认斯拉夫人从德国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权利；他现在仍象过去一样，认为德国人负有使斯拉夫人文明的使命，就是说，不管好歹都要使他们德国化。

.....

写于 1871 年底。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 年俄文版第 3 卷第 294—302 页。

国际的组织

· 编者按语 ·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各项马克思主义决议击中了同盟的心脏，给了巴枯宁以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彻底清除了巴枯宁想把关于绝对放弃政治的学说列入国际的纲领来在国际内部制造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95页）。巴枯宁贼心不死，还要继续捣乱，千方百计地用无政府主义来代替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为推翻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夺取国际的领导权制造理论根据。他在《国际的组织》这篇文章中无耻歪曲国际的章程，贩卖无政府主义货色，说什么国际的纲领“是纯粹人道的纲领”，国际的目的是“实现人们之间的博爱”，“破坏一切国家”，“如果国际工人协会不力图消灭国家，那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并扬言要“解放”国际，即用破坏和分裂国际的手段来达到改变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恶目的。

国际工人协会担负的伟大任务就是，使工人和人民的劳动从它的一切剥削者——企业主、原料和生产工具的占有者，一句话，从资本的一切代表的压迫下彻底和完全解放出来。这一任务不是纯粹的经济事业；它同时而且在同样的程度上也是哲学的、社会的和道德的事业；它也还是政治的事业，不过这只是就通过破坏国家来消灭一切政治来讲。

我们认为无需证明：在最文明的国家的现代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和社会的组织下，工人的经济解放是不可能的；因而要达到和完全实现工人的经济解放，必须破坏一切现代的机构——国家、教会、法庭、大学、军队和警察，这些机构不过是特权者为了反对无产阶级而建立的堡垒。只在某一个国家里推翻这些机构是不够的；应当在一切国家里破坏它们，因为从现代国家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建立以来，在所有这些机构和所有国家之间存在着不断加强的国际合作和强大的国际联盟。

因此，国际工人协会所担负的任务，就是完全消灭现存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和世界的世界，代之以新的经济的、哲学的和社会的形式。如果国际不掌握两个同样强大的、相互补充的杠杆，这样伟大的事业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其中一个是一群的需要、痛苦和经济要求的不断增长的力量，另一个是新的社会哲学，即现实主义的和人民的哲学，这种哲学在理论上仅仅以真正的科学，即既是实验的又是合理的科学为基础，它除了人的原则（群众向来的需要的表述）即平等、自由和全世界团结的原则之外，没有其他的基礎。

被这些需要鼓舞的人民、为这些原则而奋斗的人民，一定会获得胜利。他们同这些原则并不是格格不入的，正象我们刚才说过的，他们在自己的心里向来本能地怀有这些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原则对他们说来甚至不是新的。他们向来希望从他们所遭受的一切形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由于他们——工人，即社会的供养者、文明和一切财富的创造者——是最后的奴隶，是奴隶中的奴隶，由于他们如果不同时把整个世界解放出来，他们就不能得到解放，他们向来力求使所有的人都得到解放，即力求达到全世界自由。他们向来热望平等——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他们是不幸的人，他们独自永远得不到胜利因而始终从团结中寻求自己的生路。相互的幸福直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或者无论如何是少见的；要

当幸福的人就得当利己主义者，靠别人的劳动而生活，剥削和奴役别人，因此只有那些不幸的人，即人民群众才懂得博爱和实行博爱。

因此，社会的科学象道德学说那样，只是发展和陈述人民的本能。但是，在这些本能和这种科学之间有一条深渊应当填平。如果只有内部的本能就足以使人民得到解放，那末他们早就解放了。在群众的整个悲伤和惨痛的历史上，这些本能未能阻止群众成为各种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谬论的经常的牺牲品。

当然，群众不得不经历的沉痛考验并非完全白费。这些考验在人民当中留下了某种类似历史意识的东西，似乎创造出了一种实践的、以传说为基础的科学，而且人民常常用这种科学去代替理论的科学。例如，现在可以深信不疑，没有一个西欧的人民会再去迷信某个宗教巫师，某个新的救世主，某个政治骗子。也可以满有把握地说，欧洲人民群众深深地感到经济和社会革命的需要；如果人民的本能在这方面没有这样明显地、深刻地和坚定地表现出来，那末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伟大的天才，也不能唤起群众。

人民是已经作好了准备，他们遭受的痛苦已经够多了，而主要的是，他们开始了解到他们决不当受苦；他们已经厌恶永远乞天求神了，再也不愿意忍受下去了。即使不进行任何宣传，群众也会变成社会主义的；巴黎公社得到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深刻同情，就是证明。但是，群众是一种力量，或者至少是任何力量的重大因素。究竟什么东西阻碍他们去推翻他们所憎恨的社会制度呢？他们缺乏两种东西：组织和科学，这二者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政府的力量。

因此，首先需要组织，可是没有科学的帮助，建立组织是不可能的。由于有军事组织，一千武装人员组成的一个营，能够而且的确使也是武装起来的、但是没有组织起来的百万人群感到恐惧。

由于有官僚组织，国家通过几十万官吏管辖着广阔的地方。因而，要建立能够粉碎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民政力量的人民力量，应当组织无产阶级，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所做的事情。当国际工人协会拥有欧洲无产阶级的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者甚至只有十分之一的那一天，国家，或者确切地说各个国家，就不再存在了。国际的组织的目的不是建立新的国家，而是彻底破坏一切统治，它应当和国家组织有根本的区别。后者是人为的、强制的，是以权力原则为基础的，同人民的利益和本能的自然发展是格格不入的和敌对的，而国际的组织应当是自由的、自然的，在一切方面都是符合这些利益和这些本能的。

但是，什么是群众的自然组织呢？

这就是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以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为基础的组织；换句话说就是按照职业的组织。当国际代表着所有类型的工业，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劳动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组织就将完成。

有人可能反驳我们说，这种由国际影响人民群众的组织的结果，将是用新的政府代替先前的首长。但是，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国际的组织永远不同于一切政府和一切国家的组织；它的基本特点是，它只是通过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任何强制的手段来影响群众。国家和国际的威力之间的差别，正是正式的国务活动与某个俱乐部的普通活动和作用之间存在的那种差别。除了伟大的说服力量，国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其他的力量，它始终要成为一些个人对群众施加自然影响(通过说服方法)的组织。而国家以及所有国家的机构：教会、大学、法庭、官僚机构、财政机构、警察和军队，所念念不忘的是，尽可能地腐蚀国民的意见和意志，要求他们消极地服从，完全不考虑并且常常违反这些意见和意志；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以法律的允许和认可为限度，而这个限度又总

是有很大的伸缩性。

国家只是想方设法统治群众(也不可能是别的),号召群众服从。国际只是希望解放群众,号召群众进行暴动。但是,要使这种暴动强而有力并且能够推翻国家和各特权阶级(国家仅仅是这些阶级的代表)的统治,就应当组织国际。为了这一目的,国际只使用两种手段,虽然这两种手段远不是始终合法的(在世界各国,合法性常常只是在法律上使特权即非正义神圣化),但是,从人权观点来看,二者一样是合法的。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两种手段就是:思想的宣传和国际会员对群众施加自然影响的组织。谁要硬说国际的这种活动是对群众自由的侵犯,我们就回答说,他不是诡辩论者,就是蠢才。更糟糕的是那些人,他们对于人的合作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一窍不通,竟然认为个人和群众彼此之间的绝对相互独立是可能的甚至是合乎理想的。

希望有这种独立就是希望消灭社会,因为一切社会生活只不过是个人和群众的不间断的互相依赖。每一个人,甚至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人,特别是那些聪明能干的人,在自己生活的任何时刻里既是生产者又是产品。每个人的自由本身就是肉体、精神和道德的大量影响的不断更新的结果,每个人从与他接触的人们和他出生、生活和死亡的环境那里受到这些影响。为了某种先验的和神的自由,某种独立自主和绝对自私的自由而想逃避这种影响,就意味着追求虚无;拒绝去影响别的东西,就意味着拒绝一切社会活动,甚至拒绝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也是追求虚无。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所宣扬的这种所谓的独立和这种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只不过是虚无而已。

无论自然界或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无非是同一个自然界)、所有生活着的一切,都只是在对别的东西的生活进行最坚决的干涉的必然条件下生活着。消灭这种相互影响就是死亡。我们要求

群众自由，决不是想消灭他们从个别人和集团那里受到的自然影响。我们想要的一切，就是消灭人为的、法律上规定的影响，消灭影响的特权。

即使教会和国家能够成为私人的机构，毫无疑问，到那时我们也要反对它们。但是，我们之所以反对它们，是因为，尽管它们也是私人的机构，但它们仅仅为特权阶级的私人利益服务，它们会利用为了这一目的而被组织起来的群众的集体力量来强迫群众服从它们的权力。

如果国际可能成为国家，那末我们就会由现在国际的坚定的和热情的信徒变成它的凶狠的敌人。但是，问题在于，国际不可能采取国家形式；仅仅根据它的名称所表明它取消一切国界这一点，就不可能；没有国界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世界上好战的民族和极大的独裁者们曾经幻想的全世界国家，历史已经证明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对于“国家”这个词应当经常理解为一些国家——自己领地内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和对他国多少有些敌对的侵略者。国家本身包含着对人类的否定。因此，全世界国家，或者象德国共产党人所说的那种人民国家，只能有一种意义，即消灭国家。如果国际工人协会不力图消灭国家，那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它组织人民群众只是为了这种破坏。

但是，它怎样组织人民群众呢？它不象国家那样自上而下地组织人民群众，把人为的统一和制度强加给社会的多样化，即多样化的人民劳动的产物；而是自下而上地把群众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意图作为出发点，并且促使和帮助他们根据职业和地位的多样化结合起来。

但是，要使自下而上那样组织起来的国际成为真正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必须使它的支部的每个成员比现在更加深刻地领会它

的原则。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它才真正能够在平静时期执行宣传者和传播者的使命，在斗争时期发挥真正革命者的作用。

我们谈国际的原则时，指的是我们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章程的导言部分所包含的那些原则。条文不多，请读者允许我们在这里转述如下：

一、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二、工人为争取自己解放所作的努力不应导致建立新的特权，而是为所有的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确立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三、工人在经济上受原料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道义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奴役的泉源；

四、因此，工人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简单的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五、工人的解放不是纯粹地方的或民族的任务；这是所有文明国家的任务，因为它的解决不可避免地有赖于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帮助；

六、国际和它的全体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应当是国际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和民族；

七、最后，它认为，它有责任不仅为国际会员，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 . .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如此质朴地表达着无产阶级的最合法的、最人道的要求的、如此简单和正义的纲领本身包含着什么。正是因为它是纯粹人道的纲领，所以其中包含着伟大社会革命的一切萌芽：推翻一切，也就是建立新世界。

这就是现在应当向国际的每个会员说明的而且使他们完全清

楚的东西。

这个纲领提供了新的科学、提供了应当代替一切旧的宗教的新的社会哲学，提供了新的政策，即国际的政策，我们要马上指出，这种国际的政策本身就应当以破坏一切国家为目的。为了使国际会员能够自愿地执行宣传者和革命者的双重义务，需要尽可能地使每一个会员本身领会这种科学、这种哲学、这种政策。光知道和口说他们希望工人获得经济解放、希望每个人能充分享用他的劳动产品、希望消灭阶级和政治奴役、实现全部人权、权利和义务的完全平等，一句话，即实现人们之间的博爱，这是不够的。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国际会员只是接受这些伟大的真理，而没有领会其实质，不去思考它们的深刻的意义，如果他们满足于老是这样一般地重复这些真理，那末这些真理就可能在短时期内变成空洞的、毫无结果的词句，变成一些令人不懂的老生常谈。

但是，有人对我们说，一切工人，甚至当他们是国际会员的时候，也不能都成为学者。在国际内有一批人，在我们时代所能做到的限度内精通科学、哲学和社会主义政治，使多数人即参加国际的群众信赖地服从他们的统治和“兄弟般的教导”（甘必大式的，多半是雅各宾党人独裁者式的），而不会离开应当导致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道路，这难道还不够吗？——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悄声议论，因为要大声说出这种看法，既没有足够的诚意，也没有勇气。这种论调，即维护国际领导的论调引起了对上层分子的伟大智慧和无限权威的各式各样的、程度不等的狡滑解释和蛊惑人心的吹捧。我们始终激烈地反对这种论调，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国际工人协会将来分成两个集团：一个集团包括绝大多数的人，而且是由这样一些成员组成的，他们的整个科学只是盲目相信自己领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智慧，另一个集团则只是由几十个统治者所组成，那

末这个应当解放人类的机构本身就会变成某种寡头政治的国家，比所有国家更坏。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有学识的和精通权术的少数，他们一定会把政府的全部责任和权利抓在手中，而且更加专制，因为它精心地把自己的专制掩藏在一种外壳之下，即似乎它恭恭敬敬地尊重向来是由它自己口授的意志和决定这种所谓的人民的意志；我们说，这些少数人既然服从自己特权地位的必要性和条件，同一切政府有共同的命运，就会逐渐地变得越来越专制、残酷和反动。国际工人协会只有当它自己首先获得解放之后，才能成为解放人类的工具；而国际工人协会只有不分为两个集团：多数盲目的工具和少数有学问的火车司机，只有当每个会员完全领会科学、哲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的时候，它才能获得解放。

写于1872年。译自《巴枯宁选集》彼得堡—莫斯科1920年俄文版第4卷第67—75页。

国际苏黎世斯拉夫支部的纲领

· 编者按语 ·

国际苏黎世斯拉夫支部是巴枯宁背着第一国际成立的伪支部之一。巴枯宁于1872年6月到苏黎世进行活动，在这期间，他纠集了一伙在当地就学的斯拉夫族学生，成立了这个“支部”，其目的是为了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同马克思进行决战时壮大自己的声势，同时也是为分裂国际进行组织上的准备。该“支部”存在时间不长，到1873年夏末，由于巴枯宁集团内部发生争吵，遂告瓦解。这里选录的《纲领》是巴枯宁于1872年8月间起草的。

在这个《纲领》中，巴枯宁继续鼓吹他的无政府主义谬论，叫喊“要消灭一切国家”，“消灭个人继承的财产和以这种财产为基础的法律上的家庭”。除此之外，他还把国际工人协会的使命歪曲为“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的大家庭”，公然宣布斯拉夫支部“接受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纲领”，“不容许在协会内部存在任何最高权力机关”，“不承认由总委员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规定的单一的政治纲领”。这个文件是巴枯宁在第一国际内部搞分裂活动的罪证之一。

一、斯拉夫支部完全接受在第一次代表大会（1866年9月于日内瓦）上通过的国际工人协会基本章程，支部的专门任务是宣传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在斯拉夫土地上组织人民力量。

二、它既坚决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企图和表现，即在俄罗斯帝国的帮助下解放各斯拉夫民族，也坚决反对泛日耳曼主义的企图

和表现，即在力图现在建立庞大的伪人民国家的德国人的资产阶级文明帮助下解放各斯拉夫民族。

三、我们接受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纲领，在我们看来，只有这个纲领才表现了人民群众获得真正和完全解放的一切条件，我们深信，国家的存在，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是同无产阶级的自由不相容的，它不允许各民族结成兄弟的国际联盟，因此我们要消灭一切国家。特别是对于各斯拉夫民族来说，消灭国家是个生死问题，同时也是同各个异族人民（例如土耳其人、马札尔人或德国人）和解的唯一方法。

四、一切所谓的法律的权利、通过立法和政府自上而下建立的任何机构，都应当同国家一起灭亡，这些机构除了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规定对人民劳动进行剥削并使之成为制度以外，从来没有别的目的。

五、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权利的必然结果，就是消灭个人继承的财产和以这种财产为基础的法律上的家庭，因为两者都是完全排斥人类正义的。

六、只有消灭国家、财产权和法律上的家庭，才能自下而上地以集体劳动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来组织人民的生活；由于事物的力量本身，集体劳动和集体所有制成为人人可能和必须遵守的，其实现的途径是个人完全自由地联合为[生产]协作社或自治的公社，或者进而超出公社和任何地区与民族的划分，联合为具有同一的利益和社会愿望的同类的大型协作社，再把公社联合成民族，把民族联合成人类。

七、斯拉夫支部信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它将反对一切形式的祈祷仪式、反对一切官方的宗教信仰，并在言论和行动上最充分地尊重一切人的信仰自由，尊重每一个人宣传自己思想的神圣权利，它将力求消灭神的观念及其在宗教、形而上学、学理主义的政治和

法律方面的一切表现，它深信，这种有害的观念过去和现在都是对一切奴役的尊崇。

八、它最充分地尊重实证科学，它为无产阶级要求不分性别的人人平等的科学教育，但它是一切政府的敌人，它愤怒地否弃学者的政府，认为那是最傲慢和最坏的政府。

九、斯拉夫支部除了要求自由以外，还要求男女权利和义务的平等。

十、斯拉夫支部力求解放各斯拉夫民族，但它绝不打算组织一个在民族感情上敌视他族人民的特殊的斯拉夫世界。相反的，它力求使各斯拉夫民族也加入人类的大家庭，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的大家庭，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使命。

十一、鉴于国际工人协会承担了从任何监护和任何政府下解放人民群众这个伟大的任务，斯拉夫支部不容许在协会内部存在任何最高权力机关或政府，就是说除了各独立支部的自由联合外，它不容许别的组织存在。

十二、斯拉夫支部既不承认官方的真理，也不承认由总委员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规定的单一的政治纲领。它只承认个人、支部和联合会在一切国家的工人反对剥削者的经济斗争中的充分困结。它将特别致力于吸引斯拉夫工人取得这种斗争的一切实际结果。

十三、斯拉夫支部承认所有国家的支部都有：1.哲学和社会宣传的自由；2.政治自由，只要它不破坏别的支部和联合会的自由和权利；成立人民革命组织的自由；同其他国家的支部和联合会联系的自由。

十四、由于汝拉联合会大声宣布了这些原则，由于它真诚地在实践中贯彻这些原则，所以斯拉夫支部加入这个联合会。

写于1872年。译自《巴枯宁选集》彼得堡—莫斯科
1920年俄文版第3卷第70—72页。

秘密信件

· 编者按语 ·

1871年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挫败了巴枯宁分子分裂国际的阴谋。伦敦代表会议之后，巴枯宁指使他控制下的法拉各支部在桑维耳耶召开代表大会，发表臭名远扬的《桑维耳耶通告》，煽动各联合会和支部反对总委员会，为在定于1872年9月召开的海牙代表大会上推翻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夺取国际的领导权做舆论准备。与此同时，巴枯宁还进行了一系列地下活动，四处串连，煽风点火，为实现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阴谋做组织准备。他用密码给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瑞士等国的党徒和密友写了一系列秘密信件，这里选录的是巴枯宁给他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党徒和他企图拉拢的国际委员写的一些密信，这些信件证明马克思对巴枯宁的评价十分中肯：“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巴枯宁在这些秘密信件中采取以假乱真、颠倒黑白、造谣诬蔑、人身攻击的手段，对国际总委员会和马克思进行恶毒攻击，指挥他的党徒进行破坏国际的阴谋活动。为了改变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巴枯宁硬说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疑是国际中所提出的一切体系中最先进的体系”，“无疑是对国际纲领的最后的、最正确的、最彻

底的和最好的表述和说明”，妄图用他的机会主义纲领来偷换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他还打起“反权威主义”的反动旗号，攻击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叫嚣要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简单的通讯统计局”，以达到他通过秘密同盟控制国际的罪恶目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完全明白，同盟想阻挠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共同领导，因为巴枯宁有先见之明，在成立自己的同盟来作为革命的总参谋部的时候，就已经关心到这一点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98页）为了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拚凑虚假多数，巴枯宁在这些秘密信件中指示他的党徒“必须派大批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说出自己的有分量的话”，为破坏国际“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为了使自己的党徒能参加海牙代表大会，他催促那些还没有参加国际的党徒赶快纠集人马，使用两面派的手法打入国际，他要求他们“要用数学家的准确性和学者般的迂腐性来履行”国际的章程和条例所规定的义务，而且“连一天时间也不要丧失”，以便“能够被允许作为具有全权的成员出席代表大会”。然而，巴枯宁的这一系列阴谋活动都是心劳日拙，恩格斯指出：**“巴枯宁的阴谋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此人忘记了一点：工人群众决不可能象一小撮宗派主义空谈家那样跟着他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83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第一国际粉碎了巴枯宁的阴谋活动，巴枯宁阴谋集团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彻底破产。

从这些秘密信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巴枯宁是个大野心家、阴谋家，是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巴枯宁一手建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一个隐藏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中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它“混入了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队伍，企图先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力图破坏这个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1页）。

致路·纳布鲁齐^①

1872年1月3日

亲爱的公民，亲爱的兄弟：

我高兴地接受你们为了我们的共同原则而向我表示的兄弟友谊；我们的共同原则，如果从最坦率、严肃和广泛的意义上理解，那末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一切为了劳动人民和一切通过劳动人民。

自由、文明、幸福、平等、正义、人道，所有这些东西至今对于劳动人民来说，都仅仅是神学、形而上学、政治和法律的一种虚构，让这些东西最终成为现实吧。为了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所有的人，男人和女人，都成为享有平等权利、根据平等条件进行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就必须象巴黎公社在告农民书中所说的那样，使土地归农民所有，每个人只能占有他亲手耕种的土地；就必须使工具和厂房归工人，确切些说，归工人团体所有，使资本成为集体财产，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人。因为，一个人不劳动、不生产任何东西而生活，就不可避免地要靠损害别人的劳动而生活。

^① 路多维科·纳布鲁齐（Lodovico Nabruzzi 约生于1846年），意大利新闻工作者，巴枯宁主义者，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编者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所有诞生到世上的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同等的发展手段和同等的生存手段，以便每一个人都能根据天赋的才能和自由选择，在工业、科学和艺术的一切部门内获得教育和完善自己；另一方面，必须消除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这种可恶的划分，每个人都应当既用脑又用手工作，尽管会仅仅由于各人真正的天赋而有所不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消灭法律上的权利，首先是消灭继承权；因为，只要存在着继承权，就会有一些人生来就富贵，另一些人生来就贫困，就会存在着起点上的不平等，就必然有继承的阶级差别，而阶级差别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富有阶级的统治和无产阶级群众的被奴役。——因此，必须消灭国家，受到教会祝福的国家的使命只能是，使高等阶级的统治合法化，巩固和保护这种统治，并且为富人谋利益而剥削人民的劳动。所以，必须用自下而上地通过自由建立生产、农业、科学和艺术的合作社和联盟的办法来改组社会，以便使工人同时是科学家和艺术家，使艺术家和学者同时是用手劳动的人；这些自由的合作社和联盟的基础是，集体占有土地、资本、原料和劳动工具，即一切与生产有关的有重要价值的东西；只有真正由个人使用的、就其性质而言不可能当作资本去从事新的生产的東西，才能归个人所有，并有权作为遗产转让。

我的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国际的真正纲领的要点。你们的纲领也是这样吗？你们愿意宣传这个纲领吗？如果愿意，我们就互相伸出手来，一起工作。

我非常荣幸，看到你们在组织工人协会的事业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祝你们“工人协会”获得巨大的成果。只有一种情况使我感到不安。

当然，我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在内心里都是国际主义者，但是你们还没有勇气公开宣布自己是国际的支部。那不勒斯人、西西

里人、都灵人就有这种勇气，在米兰，现在正在组织新的国际支部。为什么只有罗曼人落后了呢？难道罗曼人比别人缺少决心、坦率和勇气吗？……

“我们同你们在一起；但是，根据加里波第在曼士亚《火星》杂志发表的给卢卡^①的信中所说的那些理由，我们还不能通过把我们最终联系在一起的决定”。

我没有读过这封信，亲爱的朋友，我请你把这一期《火星》杂志寄给我。但是，尽管我没有读过加里波第的信，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们，关于这位将军对待国际的态度我是怎样想的。我只是坚决请求你们，除了非常郑重的朋友以外，不要把我的信给任何人看，因为我们首先应当避免谣言和个人成见。

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真心诚意地深深崇拜人民英雄加里波第。他向法国的出征，他在那里的一切行为，按其伟大、自我牺牲精神、纯朴、坚毅精神和英雄主义来说，是真正崇高的。他在我的眼中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伟大。他对人民事业有深刻的本能的、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重要场合从来没有背叛过他，现在促使他公开维护巴黎公社和国际，反对马志尼的可恶的、纯粹神学的攻击。但是，请允许我开诚布公地讲，从那时以来加里波第关于国际所写的一切证明，他根本不了解也不知道国际。加里波第……或者正确些说，在涉及到事实的时候，他和我们在一起，在涉及到理论的时候，他反对我们。他的固执思想是专政，可是对于社会革命来说，没有比专政更令人可恶的东西了。他的全部政治思想（他太老、太顽固了，不可能改变这些观点），他的全部政治习惯都把他束缚在我们想破坏的那个旧世界上面。帕拉维奇尼·特里维里齐奥的朋友和拥护者，怎么会在某个时候成为我们的拥护者和朋友呢？而我们同帕拉维

^① 卢卡(Lucca)是奥里索·切列奇的化名，意大利的巴枯宁主义者。——编者注

奇尼·特里维里齐奥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朋友们，请允许我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抱这种态度是我对弟兄们、而首先是对我为之服务的整个事业的责任），如果你们不幸遵循加里波第的政治和社会主义领导，你们就会误入非常矛盾的迷宫，因为他的政治是一种永恒的矛盾，而他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一种虚构的体系），就象马志尼的社会主义一样一文不值。

群众对过去的伟大人物十分感激和尊敬，难道对他们来说一劳永逸地摆脱伟大人物的专政、摆脱一切专政的时候难道还没有到来吗？在政治革命时期，专政是好的、是必要的，政治革命破坏一些国家，是为了建立另外一些国家，推翻一种统治，是为了立即代之以另一种统治。但是，在社会革命中，专政是不可能的，社会革命要一劳永逸地消灭任何统治和任何国家。

兄弟，和过去决裂吧，找到向前看的勇气吧。不要羞羞答答地，不要秘密地而是公开地加入国际吧；请你们相信，这是我们时代一切国家的唯一严肃、真正和生动的创造物。让宗教改革运动的所有英雄中最革命的英雄乌尔利希·冯·胡登的一句崇高的话：“已下定决心！”成为我们的口号吧。如果你们叫做卢比康，那末你们就越过卢比康河，^①向我们伸出你们的手吧，参加到我们中间来，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宣布自己是国际的支部。

请你把这封信交给卢卡和卢波^②（这也是给他们的复信）和一切得到你们郑重信赖的人看。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坚请你们尽量避免提到我，甚至不要公开说出我的名字。我向你们保证，并不是由于我胆小，并不是由于我个人小心谨慎而向你们提出这个请求。我这样做完全是由于别的原因。

① “越过卢比康河”是一句成语，有下定决心，破釜沉舟的意思。——编者注

② 卢波（Lupo）是埃尔米尼奥·佩斯卡托里的化名，意大利的巴枯宁主义者。
——编者注

整个社会革命的工作，特别是国际的工作，并不是一种个人的工作，它本质上是一种集体的工作。个人，一切个别人物在我们这里都溶化在集体中，我们憎恨自命不凡的、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和追求权势的个人主义。我们是任何集体的或个人的统治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所有怀着善意到我们这里来的人，我们都欢迎，如果他们的意图是严肃的，他们在我们这里可以自由地展开自己的活动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只是有一个条件：他们不要想起卓越的作用，不要幻想统治。我们不需要领袖，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容忍有领袖。哪怕是一个人产生的思想，如果它是好的并且得到承认，马上就会成为公共的财产；因为我们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具有个人标签，——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法律。

我请你们也这样对待我。首先从意大利观点来看这是必要的，以便谁也不会说，一个俄国人，野蛮人、卡尔梅克人想在你们国家里建立政党；否则这就会给我们的宣传以沉重的打击。何况马志尼和马志尼分子本来就不放过任何机会使用这种诽谤——这种不正当的然而却是可靠武器。

总之，不言而喻，不要宣布我的名字。请你相信，我是矢志于事业的，对于这个事业，你们在不久的将来会比我做出更多的贡献，因为你们年轻，而我已经老了。我真心诚意地向你们讲了我所想的、感觉到的和希望的一切，讲了我的全部生活的寄托，什么对你们有用，什么无用，由你们自己选择；在你们接受了某种思想的时候，那种思想就不再是我的，而成为你们的了。

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兄弟般的劝告：不要在上面、在你们所信任的少数知名人士中间寻找领导；也不要你们自己中间，在耍笔杆的有教养的青年中间寻找领导。而要在下面、在马志尼卑视地称之为群众，而另一些人更加坦率地称之为混蛋的人中间寻找领导，因为在这些混蛋的本能中蕴藏着未来的一切思想和一切力

量的萌芽。

兄弟般地拥抱你们，并等待你们尽快作出兄弟般的回答。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310—315页。

致卢比康^①及其余所有朋友(摘录)

1872年1月23日

亲爱的兄弟和朋友!

我非常高兴地读到了你们的最近一封来信。可以看出,在一切重要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和完全融洽的。这太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深信,今后我们可以始终肩并肩地行进。只是在涉及国际的实践的最后一个问题上,我们必需商量商量。问题在于如何明确区分国际一切支部必须遵循的和不一定遵循的东西。

我们的思想——你们的、我的和意大利内外的我们的许多亲近朋友们的思想——无疑是国际中所提出的一切体系中最先进的体系,因为我们的思想不满足于渺小的东西,而是要在经济、宗教、形而上学、政治、法律和民事方面彻底地坚决地破坏现代社会世界。破坏的结果必然是用新秩序代替现存的机构,这种新秩序是从实证科学和自治的协作社的自主的、绝对自由的运动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我们全都深信,我们的思想无疑是对国际纲领的最后的、最正确的、最彻底的和最好的表述和说明;但是它们不管是对于国际的各个成员,或者是对于它的支部和联合会,都绝不是必须遵循的。

亲爱的朋友,请你相信,国际没有一种必须遵循的学说,不象马志尼的共和主义同盟那样,在那里,每个成员都应当无条件地赞同它的导师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的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

① 卢比康(Rubicon)是纳布鲁齐的化名。——编者注

纲领。

国际不管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组织方面，都赋予自己一切支部最广泛的自由。……

……………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共同章程和各次代表大会批准的条例赋予总委员会的权利。

根据我们共同章程的精神，总委员会只能是一切国家的联合会和支部的通讯和统计的中央局，而不是政府，不是有权决定什么事情的权力机关。

……………

为了这个目的，1868年10月在日内瓦组织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支部。它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能够同日内瓦资产者的沽名钓誉的阴谋相对抗的建筑工人组织。它的纲领在无产阶级的国际政治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民族的爱国主义的政治之间，掘下了一条鸿沟。根据同一理由，它的条例把国际的代表者、总委员会的权威提得很高，用它的权威来对抗日内瓦联合会内狭隘民族的和反动的倾向。——这些考虑可以解释，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开脱我们的错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总委员会除了维护国际的原则，反对一切狭隘的、民族的和资产阶级的侵害以外，还会利用这个权威来作别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它为了满足自己一些领导人的虚荣心，为了变成一个统治机关，会向日内瓦的反动势力伸出手来。

不出所料，在经过时间不长的事先谈判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新的同盟支部的章程；我们手中有通知我们的信件，其中说，总委员会委员完全承认这个团体提出的原则。但是，受日内瓦人的反动派别领导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无论如何不同意接受这个支部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现在正在纽沙特尔起草的汝拉联合会的

备忘录中将详细叙述这些事实，以便一劳永逸地结束过去和现在一直对我们散播的一切下流言论和诽谤。

这样，在1869年9月，我出席了巴塞尔代表大会，当时我担心受阴谋家和反动分子派别领导的地方联合会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干坏事；我想在总委员会的权威中找到同这相对抗的力量。但是比利时人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持另一种观点；而且，他们对总委员会一些委员，特别是对在这个委员会中占优势的马克思的秘密的、非常权威的意向，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马克思此人是一个很了不起、很聪明和很有学问的人，他对国际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的罪过就在于他企图成为独裁者，他的这种罪过也许比他的朋友们要小一些，他们想把他变成国际的教皇。比利时人坚决否定总委员会的任何权力。他们的代表安斯和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会让我们商谈并提出一个共同的决议案。我们这样做了，决议案被接受了。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行政决定的第四、五、六、七项所表述的就是这个决议案，内容如下：

.....

但是，——我再次强调，——不管是曾提出建议的我，还是批准了上述决定的巴塞尔代表大会，都不可能想象到，在此之前一直非常理智地持克制和小心谨慎态度的总委员会，有朝一日会丧失理智，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统治机关。谁也不担心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在国际中对总委员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它是公仆，而不是老爷和教师，是简单的通讯局而不是政府，所以此后在三年中相继举行的三次代表大会，即洛桑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毫无顾虑地仍然把原来的那些人，原来的那个班子选进了总委员会。

.....

对国际来说幸运的是，在伦敦找到了一批非常忠实于伟大的

协会的人，他们是协会的真正创始人和发起人。我指的是以卡尔·马克思为首的一小批德国人。

这些可敬的人们把我看成敌人，他们竭力随时随地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他们大错而特错了。我根本不是他们的敌人，相反地，当我能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满意。我常常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不管是从智慧和知识方面说，或者是从他们无限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这种忠实已经受了二十年工作的考验）方面说，我认为他们都是真正了不起的和值得尊敬的人。

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我生平遇到过许多学者，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有一个人象他那样有学问和造诣深。现在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书记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学生和朋友，他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有智慧的人物。还在1846年至1848年，他们就一起建立了德国共产党，从那时以来他们就没有停止过在这方面的工作。马克思制定了共同章程的非常深刻和出色的基本原理，在1863年至1864年阐述了国际的思想并建议成立了国际，从而使几乎是欧洲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友好的本能意向得到了具体体现。

亲爱的朋友，你们看，所有这些都是伟大的和卓越的功绩。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些功绩的意义，那末从我们方面来说会是一种忘恩负义行为。

我的朋友和我，我们同马克思和他的朋友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有以下两种原因：

首先，我们的理论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截然对立的。

马克思是一个崇尚权威、主张集中制的共产主义者。他所希望的同我们所希望的一样：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彻底胜利，——但是他想在国家中和依靠国家政权、依靠非常强有力的、可以说是

专制的临时政府的专政，即通过否定自由来实现这种平等。他的经济理想是：国家充当土地和一切形式的资本的唯一占有者，由国家利用农业协作社来耕种土地，而农业协作社得到很好的报酬并受工程师领导，它们给所有的工业协作社和商业协作社提供资金。

我们想通过消灭国家和消灭一切叫做法律权利而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是对人类权利的不断否定的东西，来实现经济的和社会的平等。我们不想自上而下地、通过某种权威、依靠社会主义的官僚、工程师和其他官方的学者的帮助来改造社会和联合人类；我们想自下而上地、通过摆脱了国家压迫的各种工人协作社的自由联合来进行这种改造。

你们看到，很难想象还有比我们的两种理论更加相互对立的了。但是，这一次在我们之间还有一种纯粹个人性质的分歧。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宣传一种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学说，我们对这一点毫不奇怪，毫不懊丧，毫不悲伤。我们是一切专制制度，学理上的和实践中的专制制度的敌人，我们不尊重我们不能认为是真正的理论的理论，但是我们尊重每一个人遵循自己的理论和宣传自己的理论的权利。我们贪婪地阅读马克思发表的一切东西，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在其中找到许多很有教益的东西。

马克思的想法正相反。他在自己的理论中就象他在实践中一样，只要他能够做到的话，总是专制的；他的真正杰出的智慧同两个可恶的缺点交织在一起：他爱好虚荣和忌妒。他仇视蒲鲁东，只是因为这个伟大的名字及其应得的荣誉刺激了他。凡是卑鄙龌龊的话，他没有不用在蒲鲁东身上的。马克思搞自我中心主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说：我的思想，而不想了解，思想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只要好好地看一下，常常会发现，最好的和最伟大的思想正好是一切人本能工作的结果；单个的个人只是表达它们，赋予它

们以形式而已。马克思不想了解,甚至他自己表达的思想,从它被别人理解和接受的时候起,就同样地成为别人的财产了,就象它是他的财产一样。

本来就自尊心很强的马克思,完全被他的学生们的崇拜给败坏了,他们把马克思变成了一个学理主义的教皇似的东西;对于一个甚至是最聪明的人的心理和精神健康来说,没有比把他崇拜和尊奉为一贯正确更为致命的了。——所有这些更加加深了马克思的自我中心主义,因此他开始仇视不想在他面前卑躬屈节的任何人。

这就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仇视我们的主要原因。还要补充一点,他们只要仇视谁,就认为对他采取任何卑鄙下流的行为都是可以允许的。他们在自己的私人谈话中和私人信件中,以及在报刊上,对于他们所仇视的人散布种种卑鄙龌龊的话、种种诽谤和谣言。这就是一切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的犹太人同自己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马克思是一个德国犹太人,就象德国那个党的其他许多主要的和二流的领袖是犹太人一样;顺便指出,马志尼分子在这方面也在开始仿效马克思主义者。我是说,一切权威主义者的做法都是一个样。

我觉得,我上面所说的一切已足以向你们说明我们的分歧的原因了。现在我回过头来谈总委员会。

从总委员会建立之日起,马克思一直是它的真正的领导者。一些德国人、他的学生围绕着他结成了一个小集团;他们都是总委员会的委员。老实说,总委员会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杜邦在总委员会中代表法国,同时担任意大利和西班牙书记的职务,而这两个国家在1869年以前连一个国际会员也没有;其次有一批英国人,他们专门处理英国和美国的事务。

确切些说,在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以前,总委员会仅

仅在这两个国家里有直接的和有效的活动，或许还有一个德国。对于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来说，这种活动等于零。这对于事业一点也没有坏处，相反地，这种充分的自由，即没有任何所谓官方干涉的情况，促进了各个支部、地方团体和民族团体的自主发展、组织和自行联合。从1868年9月起，即仅仅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国际才开始在比利时、法国和瑞士真正广泛地发展；两个意大利人（两个都是日内瓦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支部的成员）在意大利（特别是在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建立了国际的第一批支部。

总委员会被迫无所作为，被迫是双重的，因为，一方面，人们不承认它有权进行更加强有力的干涉，另一方面，它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进行这种干涉，——这种无所作为不仅没有使拉丁民族各支部感到惊奇和悲伤，相反地，它们认为这种状况是理所当然的，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和有益的。总委员会在所有人的观念中，仅仅是使一切支部记住自己的国际性质的一面旗帜，仅仅是字母*i*上面的那一个点。谁也不把它看作是具有某种权力的统治机关。

如果人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权力，那末人们就不会容忍这样一种状况：它从1866年到1869年这三年中由同一些人组成，这些人如果认为需要，就有权更新和补充自己的班子；巴塞尔代表大会也不会允许把这种状况保持到第四年；要知道，这就意味着建立真正的独裁，而独裁比什么都更加与国际的精神相矛盾。但是，由于在所有人的眼中，总委员会并不是一个政府，所以让它把原来的成员再保持一年，谁也不认为这是坏事情或危险的事情。

由于这些原因，我才提出了得到巴塞尔代表大会批准的上面对提到的第四、五、六、七等项。

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总委员会站在一切民族的和地方的差别之上，不插手可能在各地方支部和民族团体中引起分裂的一切问题，在发生任何冲突的时候能很好地捍卫国际正义的伟大原则。

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欺骗了。伦敦的总委员会，或者更正确些说，它的德国人集团、支配它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宗派，热衷于种种沽名钓誉的计划；在这以前在总委员会中占据多数的英国人，一部分是马克思的拥护者，他们主要是（这一点几乎可以绝对肯定）对大陆上的事情的兴趣很淡薄；他们的思想和工作都集中在英国工人运动的范围内。奥哲尔和克里默都是优秀的人物、共产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伟大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慈善家欧文的间接的学生，但是他们没有超越于英国人之上，而且作为英国人，他们很少，几乎是根本不考虑大陆上的革命运动。这样一来，总委员会的全部领导权实际上便落到了马克思的手中。这个领导权现在仍然掌握在他手中，因为，虽有许多法国的公社社员被吸收进了总委员会，但这欺骗不了我们。他们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你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在组成巴黎公社的那一大批人中，有很多是微不足道的；可惜，他们之中大多数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雅各宾党人，而你们知道，所有雅各宾党人（他们是罗伯斯比尔型的纯政治革命家）的幻想，就是建立强有力的政权，迷信权威。在整个这一旧的、如今已受到了谴责的学派中，只有一个可观的人物——甘必大。还有另外一个人——德勒克吕兹这个很好的老人；但是，他在事实的逻辑的启发下，完全站在社会主义少数派方面，这个少数派成员中现在活在人间的为数很少，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无疑是我们的朋友瓦尔兰。

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只允许某些无足轻重的公社社员参加总委员会，而现在的法国书记赛拉叶则是他们中间最无足轻重的人；马克思主义者事先从公社社员那里取得了庄重的保证：他们将在马克思的权威主义的领导下行动。——可能，这里也有两三个独立的法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他们必然会退出总委员会，曾经不止一次地有人退出或者拒绝参加总委员会。

我可以满有把握地向你们保证，尽管他们大力挣扎和大肆叫嚣，他们在法国的影响仍然等于零。

实际影响现在完全操在法国社会主义宣传和行动支部的手中（这个支部是在日内瓦建立的，属于汝拉联合会），以及比利时联合会手中。前者包括整个法国南部；后者包括北部；两者在巴黎兄弟般地汇合在一起。

现在已看得十分清楚，目前仍然统治着总委员会的德国犹太人集团或者马克思主义者集团，始终热衷于一个爱好虚荣的想法：要把国际变成一个特殊的具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和良好的纪律的国家，这个国家服从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全部权力将集中在马克思手中。

如果说这种倾向在 1869 年 9 月以前还没有表现出来，那是由于下面这种状况：在这之前还没有充分的经费来保证它获得胜利。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钱，又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占据多数，因为代表大会上的多数、绝对多数，是由各拉丁民族国家的代表——比利时人、法国人、瑞士罗曼语区人构成的，而这些代表从来不愿屈从德国鞭子的专政。

为数众多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德语区的代表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初次出现，他们组织得非常严密，此外，他们都是爱国主义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统一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

德国的和瑞士德语区的代表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指使下，服从极严格的纪律，向巴塞尔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纲领；如果这个纲领被批准，它就会动摇国际的真正纲领的基础，就会把国际变成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工具。他们的草案得到了总委员会所有德国代表和英国代表的热烈支持。幸而，拉丁民族的代表在这一次仍占据多数，于是德国人的草案被否决了。从此便产生了愤恨。

德国领袖们在这一次遭到了失败，他们约定要向下一次代表大会派出更多的德国代表。但是这次代表大会未能举行。注定要以法国被粉碎而告终的可怕的战争在1870年8月爆发了。

因此，召开代表大会已经不可能了。

必须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战争期间的表现是英勇的。当一切政治色彩的德国资产阶级陶醉于空前的胜利，对本国的无数军队蹂躏法国的兽行鼓掌欢呼的时候，只有他们有勇气提出抗议。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举行起义，不可能做任何别的事情，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做得漂亮，值得尊敬的。他们的许多领袖被关进监牢，但是仍然没有停止在自己的会议上和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反爱国主义的、尤其是合乎人性的抗议。

从他们方面来说，这是很好的；但是他们不太好的一点是，他们利用了这个普遍混乱的时期来为自己谋利益；当我们大家都在全力以赴地想方设法通过伟大的人民起义来拯救法国的时候，他们却利用这种情况为自己谋利益，以便更坚决地搞自己的沽名钓誉的阴谋并且以最卑鄙的手段诽谤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制服和战胜了他们的人。

正是在这时候，总委员会，或者确切些说，操纵它的马克思主义核心，同当时在日内瓦联合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反动集团签订了攻守同盟。总委员会同时还把自己的代理人派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去，也是为了追求同一个目的。总委员会在德国的正式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大声宣称，“在德国军队胜利和法国失败以后，社会主义运动的首倡权应当从法国转到德国”。

他们这样为自己准备好了基础以后，便认为有力量实行决定性的打击了。他们不敢象理应做的那样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因为他们的所有敌人必然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出现，——而他们不无根据地担心，他们完全在阴暗角落里搞的阴谋勾当一定会暴露

在社会舆论的光天化日之下，而社会舆论对于阴谋勾当始终能够起置之死地的作用。因此，他们仅仅把自己的所有的朋友，或者他们认为已经充分培养好了能够接受他们的友谊（恕我说错，应改为他们的权威）的人集合起来，召开了秘密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是不合法的，因此不享有代表会议的合法权利，因而它的结果也是无效的和虚假的。

在1871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这次代表会议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结果怎样呢？这些建议遭到了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代表的一致否决。我认为，那里没有意大利人，起码没有代表意大利的意大利人。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随心所欲地让许多不代表任何人的德国人，以及一个可鄙的阴谋家、俄国的犹太人和一些英国人有可能出席代表会议，他们在代表会议上占据了多数；这个多数派投票赞成他们的全部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赋予总委员会以独裁的权力；除了其他全权以外，还赋予总委员会以下权利：对国际的一切报纸进行最高检查的权利，它可以利用这些报纸来公布自己的指示和命令；向一切国家派遣拥有特殊全权的代表的权利，允许这些代表出席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的一切会议；授予一些人以绝对全权建立国际支部，授予另一些人以绝对全权拒绝接收加入支部，——即拒绝根据共同章程毫无例外地属于一切愿意享有这种权利的人的权利。

最后，代表会议还对一些秘密规定进行了投票表决，这些规定只能向各联合会委员会宣布……^①

总而言之，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要把国际完全变成用划一的纪律来进行统治的国家，是要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专制政府。这是对国际宣判死刑。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编者注

这些难以想象的、真正荒谬的、没有意义的指令，在法国、瑞士部分地区、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引起了愤慨、不满和普遍的抗议。

我们的汝拉联合会中的朋友们是受日内瓦和德国两方面的阴谋直接伤害的人，他们首先起来说话了。你们已经读到了法语区-汝拉代表大会一致提出的坚决抗议书，并对它表示赞同，把它寄给了《工人同盟报》。

紧接着瑞士汝拉人之后，比利时人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在欧洲所有的国际组织中，比利时组织，——我不必去解释——在各方面都是最理智、热情、积极、庄重和卓越的组织。西班牙联合会仅次于它而居于第二位，它的第一个幼芽是由一个意大利朋友于1868年在西班牙培育起来的。比利时联合会完全是独自产生的。

.....

所有这些使得最近一次比利时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具有很大的分量，这些决定对即将召开的全体代表大会的决议将起重大的影响。这些决定你们可能已经读过了，但是我担心你们没有读到，所以我把它们抄录在这里。

比 利 时 工 人 代 表 大 会

“比利时联合会在1871年12月24日和25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

鉴于反动的报刊每天都在散布荒唐的诽谤，力图把国际描绘成一个专制团体，它服从来自上面的、按照教阶制的路线传达于其一切成员的纪律和指令，

注意到，相反的是为反对专制主义和集中化而斗争的国际一贯认为必须使自己的组织同自己的原则协调一致，

它断然声明：国际不外是各个完全自治的联合会的联盟，而且从来就是如此；总委员会是简单的通讯统计局，而且从来就是如此。

比利时联合会邀请所有地方联合会（根据它的术语，这是指全国性的联合会）发表类似的宣言，以便迫使那些认为我们是一些人手中的工具的人沉默。

另一方面，注意到在组织协会时期形成的、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作了一定程度补充的共同章程，对于联合会的权利规定得不够明确，不能充分满足现代实践的需要，——

它声明，迫切需要对章程作认真的修改。

因此，

比利时联合会委托比利时委员会起草新的章程草案并加以公布，以便在各支部中和即将召开的比利时代表大会（它将在6月底召开，因为比利时联合会每年召开两次代表大会，其间相隔六个月）上加以讨论。在取得比利时联合会的赞同后，草案应提交即将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

比利时联合会邀请其他地方的（全国性的）联合会仿效它的榜样，以便即将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能制订出最终的联邦条约。”

.....

鉴于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我想向意大利的一切支部和联合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由于比利时代表大会已经向所有的地方的即全国性的联合会发出了邀请，我觉得，意大利的所有支部和联合会从思想上把汝拉代表大会和比利时代表大会的基本原则完全相同的建议结合为一个整体，并立即向汝拉委员会（其地址是：……）和比利时委员会（其地址是：……）表示完全赞同，这是正确的、有益的和适当的。

二、让它们立即在一切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报纸上

宣布自己完全赞同。

三、让意大利的一切支部和联合会立即开始互相通信，目的是就手段和途径问题进行协商，以便对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讨论进行充分准备，——因为这种讨论应该决定国际未来的整个命运——；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让意大利支部的代表在即将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能充分地了解到，他们在那里应该提出什么见解，应当做什么和说什么。

四、让意大利的所有支部和联合会把比利时委员会根据比利时代表大会的决定即将起草好并加以公布的新的章程草案作为各个支部讨论与修改章程有关问题时的共同基础。

如果意大利的支部和联合会决定这样做，那末在我看来他们的行动是极其明智的。你们的所有支部都是国际中的新手，不知道国际以往的习惯和传统，不知道它的现在处境和状况。如果你们在起草新的章程草案时，把我们的旧章程作为基础，你们就可能向全协会代表大会提出一个同别的联合会的一致意见如此格格不入的修改草案，以致你们的整个工作就会白费，这样一来，你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应起的影响就会缩小。另一方面，根据上面列举的原因，我可以事先大胆地向你们保证，在向代表大会提出的一切草案中，比利时的草案（不过关于它我暂时还一无所知）会是最全面、最合理、最符合目前要求的草案。同时，你们把这一草案作为你们工作的基础，绝不是放弃你们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思想自由。你们只是把一个共同的基准线作为一切意大利支部进行研究的基础，然后，你们让每一个支部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修改比利时的草案：

我深信这种行动方式是有益的，所以建议我们在汝拉山区的朋友以及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也采取这种方式。

五、在各个支部研究了这个草案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后，

它们的代表可以向你们准备在春天举行的全意大利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报告一下所获得的结果；其次，你们自己可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起草一个体现全意大利联合会的共同思想的草案，——总之，你们可以去做比利时人要求作的事情。

亲爱的朋友们，我的建议就是如此。我很希望，在即将举行的国际全体代表大会（它很可能在9月初就召开）上，意大利将充分地、合理地得到代表。为此就必须派大批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并发给他们准确的指示和限权委托书（起码在最主要问题上），要使代表们能够胜任，使他们充分了解我们伟大的国际协会的原则、义务、状况和生活条件。

只有这样，意大利才能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说出自己的有分量的话，才能够对改造国际的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但是，为了使意大利代表能够被允许作为具有全权的成员出席代表大会，他们所代表的各意大利支部务必履行共同章程和条例向任何新的支部或联合会提出的一切条件。

你们应当准确而迅速地履行所有这些要求（一共有五个要求，我在这封信中详细列举过），不仅你们的整个罗曼语区联合会，而且每一个支部都应当履行，否则你们可以充分相信，你们的代表将不被允许出席代表大会。

这是我们的法律，总委员会绝不会忘记利用这个法律来反对你们，你们刚刚加入伟大的国际大家庭，竟敢作为不听话的孩子（你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孩子）来愤慨地反对它的家长权威。

我坚请你们，不要给总委员会提供这个很好的借口；要用数学家的准确性和学者般的迂腐性来履行我们的基本法律为各个新支部所规定的一切义务，连一天时间也不要丧失。尽管难以想象，但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甚至你们认真地履行了一切义务，总委员会由于不满意你们同情汝拉代表大会而提出的抗议，仍然会非

常粗暴和愚蠢地拒绝接纳你们。

但是，这样它就会把武器送到你们手中。毫无疑问，你们已经把你们伟大的罗曼语区工人协会产生的消息通知给在西西里、那不勒斯、罗马、里沃诺、佛罗伦萨、米兰、都灵和热那亚等地的意大利的所有国际协会了，并且已立即同所有这些意大利支部和联合会建立了兄弟般的密切的联系，以便使它们成为迅速组织你们意大利联合会的基础。如果你们听从我的建议，那末你们对于比利时、汝拉和西班牙的联合会，以及对新成立的日内瓦法国人宣传支部（它现在把法国南部的全部工作集中起来）也应这么办。

.....

为了向所有这些外国的联合会声明你们的联合会已经产生，请你们利用机会赞同（要用最审慎、最亲切的词句）它们对伦敦的独断专行行为提出的抗议，同时通知它们，你们完全赞成在汝拉和比利时作出的决议。

你们采取这种方法，就可以在总委员会还没有来得及批准或者拒绝接受你们以前，就在国际内牢牢地站稳脚跟和安顿下来，并且获得自治的地方联合会的一切权利。如果总委员会批准你们（我希望如此），那更好。如果它做蠢事，在你们不论是对自己或对它都履行了我们条例规定的一切义务以后，拒绝接纳你们，那末只要你们把这种愚蠢的和独断专行的拒绝告诉意大利和上述其他国家的一切联合起来了的支部和联合会，就足以从四面八方掀起对总委员会的强烈抗议；那末你们在还没有开始会战以前就赢得了一次战役。

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总委员会不大可能拒绝接受你们。当然，它很不乐意，但终究会被迫接纳你们。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必须同伦敦的总委员会特别是同它的负责意大利事务的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建立经常的联系……。你们必须把一切通知书、贺

信和你们的其他的東西，以及你們寄給總委員會的錢，首先寄給他。

他會給你們寫信，他無疑首先會企圖向你們證明，你們對總委員會的意圖和計劃的理解是錯誤的。正因為這樣，我認為有必要給你們寫這封長信，把所有這些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你們，以便你們能夠內行地回答他，但是我堅請你們，絕對不要提到我。如果你們難以回答他提出的這個或那個問題，我時刻準備為你們效勞。

請你們履行我們的共同章程和條例規定你們對總委員會必須履行的一切義務，以及歷次代表大會所做的補充規定，——如此而已。最近一次代表會議的決議沒有法定效力，它們是無效的。如果根據這些代表會議的決定要求你們做什麼事情，你們可以回答說，你們同比利時、汝拉、法國和西班牙的聯合會都不承認這些決定並反對它們。

例如，如果總委員會把公報寄給你們，並指示在你們的報紙上發表，那末，如果你們滿意它的內容，你們就發表，並附帶說明，你們發表它，僅僅是因為你們對它感到滿意，——如果你們覺得它不合己意，那就不要發表。

如果總委員會派特命全權代表到你們那里去，你們要給他以兄弟的接待，就象你們無疑地要接待國際的任何其他成員一樣，——但是不要把它作為特命代表來接待，因為在國際中是沒有政府的。

根據我們的共同章程和條例，總委員會無權把自己的總督派給和強加給各自治的聯合會和支部；這是獨斷專行的代表會議的獨斷專行的發明。

最後，如果總委員會竟然給你們發什麼指示，那你們向它回答說，對你們說來，它無非是一個通訊和統計中央局，它是國際的仆人而不是老爺。

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有最后一个建议。

——要尽可能地避免在你们的报纸上同总委员会进行公开论战。不应当象最近一号《工人同盟报》那样，说总委员会是受泛日耳曼主义思想支配的。在我们的谈话中，在我们的秘密通信中可以这样谈，但是在这样的通信中所谈的事情，不是全都可以公布的。我们可以仿效比利时人的榜样：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坚决地攻击总委员会的独断专行的措施和行为，特别是攻击在它内部居统治地位的德国集团的这种行为，——但是在代表大会做出的决议和在自己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非常注意，不要实际上把总委员会拖入同自己的论战中，而经常停留在原则的高度范围内。

甚至在你们确实不得不反对总委员会的情况下，你们也应当使自己的言行具有兄弟般的和克制的形式。

我已经说出了我所要说的一切。如果你们愿意花工夫仔细地读完这封信，那末你们对目前状况的了解，对我们伟大的协会现在所关心的内部组织的一切问题的了解，就不会比我少。我认为我必须作这样一次最后的详尽的解释，难道不对吗？我向你们保证，以后不再写这样长的信了，因为，你们很可能没有时间读；而我自己呢，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不得不放下其他非常要紧的事情，挤出时间来写这样的长信。

.....

西里维奥^①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316—347页。

^① 巴枯宁的化名。——编者注

致弗·莫拉^①

1872年4月5日

亲爱的同盟盟员和同志！

我们巴塞罗纳的朋友们要我给你们写信，而我也非常高兴做这件事，因为，据我所知，我本人以及我的朋友们，即汝拉联合会的同盟的同志们，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成了伦敦的总委员会诽谤的对象。真令人痛心，在这个可怕的危机时期，正当要决定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好几十年的命运的时候，正当无产阶级、人类和正义的一切朋友应当兄弟般地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即组织成为国家的特权阶级世界——的时候，我再说一次，令人痛心的是，那些过去为国际出过很多力而现在被权威主义的邪恶欲望推着走的人，不去到处建立那个唯一能够产生力量的自由联盟，却竟然堕落到造谣撒谎、制造分裂。

为了使你们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意愿，我只要说一点就够了。我们的纲领就是你们的纲领，就是在你们去年的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个纲领，如果你们仍然忠实于这个纲领，那末你们是我们的同道者，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你们的同道者。我们跟你们一样蔑视专政、政府权力和权威的原则。我们坚信，任何国家政权都是管辖者腐化堕落的根源，都是被管辖者遭受奴役的原因。国家意味着统治，而人的本性就是要任何统治都变为剥削。我们反对在任何场合下，以任何表现形式出现的国家，我们不能容忍国际怀抱

^① 弗朗西斯科·莫拉（Francisco Mora 1842—1924），第一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成员，国际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解放报》的编辑之一。——编者注

中的国家。我们认为伦敦代表会议和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是一个沽名钓誉的阴谋，是一种国家政变，因此我们表示抗议，并且抗议到底。我不涉及私人问题，遗憾的是，如果最近这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开成了的话，这类问题在会上将会多得不可胜数，不过我很怀疑这次代表大会是否能开成，因为如果事情象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末不久在整个欧洲大陆就将没有一个可供无产阶级的代表们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的地方了。此刻一切视线都紫注于西班牙，关注着你们的代表大会的结局。大会的结果将怎样呢？如果你们能收到这封信的话，那也在代表大会以后。信寄到你们手里的时候是碰上革命的最高潮呢还是碰上反动的最高潮？我们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的所有朋友们都怀着极大的不安等待着关于你们国家的消息。

你们一定知道，在意大利，国际和我们亲爱的同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民都处于非常革命的状态之中，即绝望的经济境况中，群众开始认真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本能开始变成思想。在此以前，意大利所不足的，不是本能，而是组织和思想。现在这两者都在开始形成，这样一来，意大利继西班牙之后并且和西班牙一起，也许是最革命的国家。意大利有其他国家所不足的东西：朝气蓬勃、坚毅奋发的青年，他们完全丧失了阶级性，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在道德和智力上还没有衰竭到象其他各国资产阶级的青年那样。现在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全部纲领，同盟的纲领，不加思索地投身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中来。我们的天才而强大的对手马志尼死去了，马志尼的党完全瓦解了，而加里波第越来越受到这批青年的影响，这批青年自称加里波第派，但是比他走得，或者说跑得远得多。我给巴塞罗纳的朋友们寄去了一个意大利的地址。不久将再给他们寄几个地址去。重要和必要的是，要让在西班牙的同盟盟

员同意大利盟员建立直接的接触。你们能收到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报纸吗？我主要向你们推荐吉尔真提的《平等周报》，西西里岛的《钟声报》；那不勒斯的《工人联合会报》；博洛尼亚的《玫瑰小报》，最好的是米兰的《铁锤报》，可惜《铁锤报》被封闭了，该报的撰稿人全被逮捕了。

在瑞士我向你们介绍两名同盟盟员：詹姆斯·吉约姆（瑞士纽沙特尔，校场街5号）和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通讯书记雕刻匠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瑞士伯尔尼汝拉山区桑维耳耶，雕刻匠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收）。

同盟和兄弟情谊

米·巴枯宁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8卷第370—372页。

致莫拉哥^① (摘录)

—

1872年5月21日于洛迦诺

亲爱的兄弟!

.....

如果你听到了关于我的什么坏话,我就知道,这是马克思的专横的、统治的,简言之,反动的集团说的;马克思享有在伦敦总委员会内的正式地位和经费,而这些并不是给他用来搞反对自己对手的阴谋和夺取他在虚荣心的指使下所追求的独裁的,——我知道,这个集团用最可恶的方式诽谤我和我的朋友,一句话,诽谤凡是不想承认他的体系、他的独裁的人;他不仅在西班牙,而且在其他国家对我们散布最可恶和最可笑的谎言;我知道,马克思的女婿、驻西班牙的特使拉法格先生被派到那里去,是为了制造纠纷和瓦解组织;我知道,他用最黑的颜色向西班牙的同志们描写我。但是,我对你们的健康的人类理智、革命嗅觉和你们个人对我们的伟大原则和我们的伟大事业的忠诚,对你们的正义感,最后对你们的洞察力,是非常了解的,所以相信你们会懂得,被拉法格以及他的保护者与领导者这些先生们所诬蔑的人不可能是坏人。……

.....

我们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强有力的、但始终是看不见的革命团

① 托马斯·莫拉哥—冈萨勒斯(Tomás Morago Gonzales),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的同盟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编者注

体,它应当准备革命和指导革命;但是即使在公开革命时期,它不
管是从整个团体来说或者从单个成员来说,都不应当占据官方的
社会统治地位,因为实际上它除了消灭一切政府并使它的存在到
处和永远成为不可能以外,再没有别的目的;它给予群众的革命运
动和以自愿联合与无条件自由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以充
分的自由,但是它注意到在这样做的时候决不能使政权、政府和国
家重新产生;它通过分散在各国所有同盟盟员的自然的、永远不
采取官方形式的影响,同集体的(象马克思集团)或个人的虚荣心
的一切表现作斗争,我们的同盟盟员是强大有力的,这仅仅是因为
他们中间始终存在着工作的团结一致以及原则和目的的统一。

.....

国际和同盟绝不象马克思的伦敦犹太教会极力向全世界证
明的那样是仇敌。相反地,同盟是对国际的必要补充,如果没有这
种补充,国际就会变成一种处于马克思专政下的可怕的国际性国
家(马克思集团显然现在正在追求这个目的),会变成实行那些
沽名钓誉的、因而同人民群众的真正解放相矛盾的计划的驯服工
具。但是,这两个组织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而最近的目的各不相
同。国际的目的是要把劳动群众、千百万劳动者联合成一个巨大
的、紧密的机体,而不管他们的民族特征和地方特征如何;同盟的
使命是向这些群众指出真正的革命方向。两个组织的纲领,绝不
是互相矛盾的,但在发展程度上有区别。如果认真地研究一下,就
可以看出,国际的纲领包含着同盟的全部纲领的萌芽,但仅仅是萌
芽。同盟的纲领是对国际纲领的最终解释。

.....

二

兄弟们：

.....

总之，国际是进行这种组织的一个巨大的、良好的和必要的场所，但不是组织本身。国际把一切不分政治和宗教信念的正直的工人吸收为自己的会员，其唯一条件是承认劳动者在反对剥削劳动的资产阶级资本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斗争中的团结一致。这是唯一肯定的条件，它足以把劳动者的世界同特权阶级的世界区分开来，但不足以给前者提供革命方向。国际的纲领非常宽广，甚至保皇党人和天主教徒都可以加入。为了使国际能够把千百万劳动者吸收进来（因为只有国际有了这样多的会员，它才能成为一种真实的力量），纲领的这种宽广性是必要的。如果国际为自己制定了较详细的纲领和在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上较确定的纲领，如果它承认一种非遵循不可的所谓正式的学理，如果它要求为了参加国际在宗教方面必须承认无神论原则，或在政治方面必须承认共产主义，它就只能吸收几千名会员，而把千百万工农业工人推开；这些工人按其地位和本能来说是革命者、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还没有摆脱反动思想长期以来造成的影响。如果那样，它就只能组成一个在全欧洲只有几千人的很平平常常的党。这样的党本身必然要分裂为许多不同的派别。因为哪里有正式理论，那里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与它不同的和相对立的理论。那时就会出现希望用改革国家的办法来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平社会主义者、合作社主义者、权威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会产生只期望由消灭国家而获得解放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形形色色的理论目前在国际中都存在

着；但是其中任何一种理论都没有被宣布为正式的学理，迄今为止学说中的这种区别和由这种区别所产生的国际内部的和平的斗争，远不是一种祸害；相反地，其中包含有许多好的东西，因为它们促进每个人的思维和不受拘束的脑力劳动的发展；它们不会破坏把各国劳动者联结在一起的团结，因为这种团结不带有理论性质，而带有纯实际性质。我重复一遍，这是劳动反对资本及其一切实际后果的经济斗争的团结。……

但是，这种团结只能在一种条件下存在，就是，任何政治的、社会主义的或哲学的理论永远都不要成为国际的正式的、非遵循不可的理论。未到相当时期以前，任何正式理论都是无意义的。要获得把正式的理论强加于人的勇气和借口，就需要把它宣布为绝对的理论，可是绝对的东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起码在革命阵营中是如此，而对于自由的拥护者和人类来说，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其次，因为一定的理论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切人的个人思维的产物，因为凡是周密的和完善的理论，从来都是而且将来也是由少数人制订出来的，所以所谓绝对的理论，实际上永远不外是少数几个人的思想，不过是用专制的办法强加给所有人罢了，——理论上的专制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堕落为实践中的专制主义和剥削。

我们看到，在国际中自然发生的正是这种现象。总委员会中的大权独揽的马克思集团利用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被粉碎的机会（他们在这以前一直同马克思集团进行斗争，但是现在他们被杀害、驱逐和流放了，或者被迫沉默，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显然力图把马克思关于用强大的集中的国家政权来解放劳动阶级的政治和社会主义学说作为正式的理论强加给国际。除了这个目的以外，作为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个集团还追求另一个目的，即改造始终由马克思个人领导的总委员会，把它变成一个政府，变成国际的正式领导者和独裁者；现在这个集团大肆进行诽谤，进行

广泛的活动和搞阴谋，以便召开代表大会，把这种学理宣布为国际的所有支部必须遵循的学理，宣布被掩盖起来的马克思的独裁，而把那些不愿接受这种学理和不愿屈服于这种独裁的支部宣布为异端支部。

这就是正式学理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如果国际不想背叛自己的使命，它就不应当接受任何正式的学理。……

……………

同盟的思想和目的就是如此。同盟是在国际内部建立的一个秘密团体，其目的是给国际提供一个革命组织，把国际和一切没有参加国际的人民群众变为一种充分有组织的力量，以便消灭政治的、教权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并破坏一切经济的、法律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国家设施。

最近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宣布把希望在国际内部建立的一切秘密团体革出教门。这个打击显然是针对着我们的。但是操纵这次会议的马克思集团，就象它现在操纵总委员会一样，不敢把它仅仅向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和可信赖的人说的事情告诉给会议的大多数参加者，即它的一切行动都是追求一个目的：判决我们，为自己搞阴谋、为马克思所领导的从1848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秘密团体扫清道路，这个团体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已故的沃尔弗建立的，它无非是一个由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几乎纯粹是德国的团体。

我所说的并不是一种推测，而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是在德国各种政治审判案中数次表现出来的事实。因此，如果抛开那些令人不快的私人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的仇恨深重的、不知疲倦的敌人不惜采用最可鄙、最肮脏的手法），那末应当承认，如今在国际中产生的内部斗争，无非是在原则方面和在组织体系方面完全对立

的两个秘密团体的斗争，其中一个就是如我所说从1848年以来就存在的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另一个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同盟，它虽然在1864年就已产生，但只是从1868年起才加入国际。

我先从必须给我们的敌人以应有的评价这一点说起。马克思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这是一个卓越的智者、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特别是在经济问题方面，此外就我从1845年同他在巴黎第一次见面以来所了解的，他是始终真诚、完全和无保留地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人；他为这个事业做出了不可争辩的贡献，从来没有自觉地背叛过它。但是，现在由于他的极端爱好虚荣，由于他的仇恨一切的、凶恶的性格和甚至想在社会革命政党内搞独裁的意向，他把这个事业败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他的虚荣心、真正的犹太人的虚荣心，真是大得无边无际，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这简直太过分了，虚荣对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人什么也不是，却想显示自己是一切。马克思具有非常肯定和非常高尚的品质，具有很大的智慧力量和毅力，我觉得，这些本来是可以使他不至于劳神费力去采取追求虚荣的卑鄙手段的。这种天生就是很大的虚荣心，在他的朋友和学生的阿谀奉承的影响下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是一个非常自私、好忌妒、爱动气和好报复的人，他俨然就是本国人民的上帝——耶和华，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以外承认别的什么人上帝；此外，他不能容忍，当着他的面给另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或运动的活动家以应有的评价。蒲鲁东虽然不是上帝，但他当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他为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成为马克思敌视的对象。当着马克思的面夸奖蒲鲁东就等于给他以致命的侮辱，必然要招致他的敌视及其一切后果，这些后果就是：最初是仇视，然后是最下流的诽谤。如果马克思认为利用谎言来反对不幸

招致了他的愤恨的人而不会对自己带来什么大危险，那末他从来是不惜使用最可恶和最阴险的谎言的。我说过，马克思是非常自私的。下述事实就是证明：他还相信思想的私有制。拉萨尔是著名的鼓动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的学生，他象马克思一样，是个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预言劳动阶级将通过国家的帮助得到解放，在拉萨尔死后，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到现在为止这是这部巨著的唯一的一卷。在序言中他苦恼地谴责拉萨尔剽窃了他(马克思)的思想，甚至思想的形式。这个责难的不公正性仅仅从下述情况就可以看出：拉萨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同舒尔采-德里奇论战时，在发挥了一些思想后补充说：这些思想和我使用的术语，老实说，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从马克思的一本尚未发表的卓越著作中借用来的。这个说明并没有使马克思感到满意。因此，我们揭露马克思具有私有制的本能，而且是在最难以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思想领域中。他的朋友们非常了解自己老师的这种癖好，例如，他的最亲近的老朋友恩格斯也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他出版自己关于十六世纪德国农民起义的相当有份量的著作时，也没有忘记在导言里声明说，作为这部著作的基础的主要思想不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马克思的。

其次，必须承认，马克思是个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他比蒲鲁东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因为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蒲鲁东尽管竭力摆脱古典个人主义的传统，但仍然毕生是个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正如在他逝世前两个月我对他说过的那样，他时而受到圣经的鼓舞，时而受到罗马法的鼓舞，但始终是个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者。他的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他从来没有研究过自然科学，也没有掌握自然科学的方法。他有天才的本能，常常给他启示正确的道路，但是由于他的迷恋于自己智慧的糟糕的或唯心主义的习惯，他每次都掉到自己的旧错误中去，结

果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体——一方面他是个巨大的天才，革命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他经常同唯心主义的幻影相周旋，而且从来无力战胜它们。

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走的是正确的道路。他提出了一个基本原理：历史上的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都不是原因，而是经济过程的结果。这是一个伟大的、富有成果的思想，发明这一思想的荣誉并不全属于他；其他许多人从远处看见过甚至部分地表达过这一思想；但是对它进行扎扎实实的论证、并把它置于自己的整个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的这一荣誉是属于马克思的。另一方面，蒲鲁东对自由有更好的理解和感觉。蒲鲁东没有陷入学理主义和形而上学，他具有真正的革命者嗅觉，他崇拜撒旦，宣布无政府状态。非常可能，马克思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更合理的自由体系，但是他缺乏蒲鲁东的嗅觉。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从脚跟到头顶都是个权威主义者。

由此便产生了两个相对立的体系：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体系（我们扩大、发展蒲鲁东的体系，清除了它的一切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学理主义的附加物，明确地把科学中的物质和历史中的社会经济作为一切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德国的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学派的首领马克思的体系。

后一个体系的基础如下：象我们一样，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力求消灭私有制。他们和我们的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他们宣扬由国家来实行普遍剥夺，我们则主张通过消灭国家和受国家自然保护的法律的权利来实现普遍剥夺。所以我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上宣布废除继承权，可是他们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反对这点，说什么，既然国家将是唯一的所有者，就不需要这种废除。他们说，国家应当是唯一的土地占有者，同时是唯一的银行家。取代了现行的私人银行的国家银行，有权仅仅给人民的劳动付报酬，

这样一来，所有劳动者——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实际上将成为国家的雇佣工人。这个学派的英国共产主义者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声称，应当在国家工程师的指导下耕种土地。

我们根据两种理由否定这种体系。第一，因为它不削弱国家政权，反而加强它，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诚然，他们说，国家将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和由人民监督的会议和官吏管理的人民国家。这仍然是那一套议会制、代议制、普选制，不过作了两点补充：实行全民公决和由全体人民投票表决一切法律。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代议制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显然，马克思的体系，和马志尼的体系一样，只能导致建立非常强有力的、所谓的人民政权，即建立少数知识分子的统治，因为只有这些少数知识分子才能解决在集中制的条件下必然产生的一切复杂问题，也就是说，这种体系只能导致少数知识分子对群众的奴役和剥削。这就是革命的权威主义者的从上面强加于人的和从上面操纵的自由的体系，这种体系是一种令人愤怒的骗局。

我们否定这种体系的第二个原因是，它会直接导致新的巨大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些国家是独立的，因而不可避免地要互相竞争和互相敌视，就是说，必然会导致对国际主义和人类的否定。因为，即使他们不追求建立统一的世界国家——这是早已受到历史谴责的愚蠢思想——，他们也必然要建立巨大的民族国家，或者很可能建立这样一些巨大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一个最强大和最发达的种族将奴役、压迫和剥削其他种族，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走向泛日耳曼主义，虽然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点。

.....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348—368页。

致《汝拉联合会简报》编辑

· 编者按语 ·

巴黎公社失败后，各国反动派对国际疯狂进行迫害，巴枯宁阴谋集团也加紧从内部来破坏和瓦解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报刊的诬控和国际上的警察的怨恨，甚至在我们协会内部得到了同情的反应。表面上反对总委员会实际上是反对整个协会的阴谋，在协会内部制造出来了。在背后制造这些阴谋的总是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俄国人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产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1页）为了提醒国际会员警惕巴枯宁集团的阴谋，187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揭露了巴枯宁的分裂阴谋活动。同年夏季，鉴于巴枯宁的阴谋活动日益猖獗，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把内部通告公开发表。通告的公开发表有力地打击了巴枯宁的阴谋活动，在巴枯宁集团中引起一片惊慌。巴枯宁本人看了通告则暴跳如雷，“**因为他终于从自己洛迦诺的孤穴中被拖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阴谋诡计再也无济于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98页）。在这种情况下巴枯宁写了这封《致〈汝拉联合会简报〉编辑》的信，进行疯狂反扑，大肆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但是他面对通告中列举的他搞阴谋活动的铁的事实，提不出任何反驳的理由，只能以诬蔑、谩骂、撒谎为武器，反

诬马克思搞阴谋，把自己装扮成团结的维护者，以图遮掩自己阴谋败露的窘态。

1872年6月12日

亲爱的共患难的同志们！

很久以来威胁着我们的达摩克利斯剑^①，终于落到我们的头上。说实在的，不是剑，而是马克思先生的普通武器——一大堆脏东西。

的确，在伦敦总委员会的这个新的非正式的特别通告^②（它标明的日期是1872年3月5日，但只是在最近几天才发表）中无所不有：可笑的捏造、颠倒是非、无耻的谎言、卑鄙的诽谤，简言之，马克思平常在战场上使用的一切军事装备全都用上了。这个通告是一切荒谬和肮脏东西勉勉强强拼凑成的大杂烩，德国和俄国的犹太人、他的朋友、代理人、学生（这些人同时又是他的帮手）不是以机智的、而是以颠倒黑白的恶毒手法捏造和散播这些东西来反对我们，而首先是反对我。差不多在三年中，而主要是从倒霉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以来，他们不断地散布这些东西，其原因是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胆敢和大多数代表一起投票反对马克思的政策。

我还没有忘记一个在这个通告上签了字的人当着我的面所发出的感叹：“马克思会很不满意！”他的确很不满意，我首先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疯狂的犹太教会选择我来做必须抵偿我们的共同罪过的替罪羊。你们记得德国犹太人莫里斯·赫斯^③在《觉醒报》

① 希腊传说，纪元前四世纪叙拉古王于饮宴时让羡慕他的宠臣达摩克利斯坐在他的宝座上并在他的头顶上用一根马鬃悬挂一把宝剑。此后达摩克利斯剑就成为千钧一发、岌岌可危的同义语。——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编者注

③ 应为莫泽斯·赫斯。——编者注

上(1867年秋天)发表的文章吗?这篇文章很快就被波克罕和《人民国家报》的其他德国犹太人加以转载和补充。日内瓦《平等报》的一个俄国犹太人就更不用提了。这是喷在我和我们所有的人身上的一股脏水。

在两年半中我们默默地忍受了这些卑鄙的攻击。我们的诽谤者最初提出了一些含糊的谴责,其中夹杂着一些怯懦的语带双关的词句和恶毒的诋毁,但是这些东西同时又非常愚蠢,如果说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迫使我沉默,那末我的沉默就只能由我所产生的厌恶和鄙视混合在一起的感情来说明和辩解。后来,他们看到我这样长久地忍耐着(他们不了解其真正的原因),便更加放肆了,他们的肮脏的仇恨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叫嚷我是被雇佣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的、拿破仑的、俾斯麦的间谍,甚至是教皇的间谍。

这简直是太愚蠢了,根本用不着回答。但是,我之所以沉默,还有一些比对于玩弄污秽东西的自然厌恶更重要得多的根本原因。

这些可敬的公民们显然在寻找借口,以便把重要的原则性的斗争降低到他们的水平,把它变成可鄙的私人问题,我不想给他们提供这种借口。那样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期待国际工人协会拯救自己,因此,谁要是为了个人的野心而在协会中散播纠纷和瓦解的种子,他就要负可怕的责任,我丝毫不想承担这种责任。我不想把我们内部纠纷的情况摆在资产阶级公众的面前,因为这会使资产阶级公众非常高兴,使我们非常沉痛。

最后,我认为必须放弃攻击这个集团,因为我乐意承认这个集团中有些人对国际做出了不可争辩的功绩。

现在,无疑地,这些人正在败坏自己的名誉,并且给国际造成巨大的危害,他们为了战胜对手,不惜进行诬蔑,显然他们对于用自己的论据的力量来取得胜利已经感到绝望了。毫无疑问,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极大的热心,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最令人厌

恶的方式同他们的狂热的虚荣心和个人野心与种族图谋结合在一起……

但是，毕竟毫无疑义，这种热心是真诚的。起码我完全相信这点，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真诚的，而是说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真诚的；鉴于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所以，我必须放弃进攻一些人，以便宽恕另一些人。

不过，我始终希望以后使所有的诽谤者受到公意审判，行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无疑不会拒绝我的这个要求。如果这个评判委员会能给我提供做出公正的和严肃的判决的一切保证，我可以向它对一切政治性质和个人性质的事实做必要的详细的说明，而不必担心由于不小心的泄露而引起的不便之处和危险。

但是，还有其他许多完全属于社会性质的事实，遭到马克思集团的有意的恶毒歪曲，这一次而且还得到总委员会所有委员的赞同。因此，尽我的力量来恢复这些事实的真相，破坏马克思先生和他的追随者建立的谎言体系，这将是我为准备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出版的著作的目的。

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想提出最后一个看法：没有任何东西会比这个通告能更好地证明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的统治的极大危害了。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在这个通告上签名的四十七个人，那末我们未必能从其中找出七八个在这件事情上稍微知道一些情况，能够提出自己的判断的人。其余的人都是马克思的愤怒和政策的盲目驯服工具，他们从来没有听到和看见我们，就签署了这个侮辱我们的判决，他们没有向我们提出过一个问题，就谴责和判决我们！

请看伦敦的总委员会中的那些人是怎样理解正义、真理和道德的，而根据我们共同章程的基本原理，这些应当是国际工人协会中一切集体和个人关系的基础。

啊，卡尔·马克思先生！把这些原则写入纲领要比实际实行

它们容易得多!

这不由得使人感到,现在,正当比利时联合会怀疑总委员会是否应继续存在的时候,这个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正在竭力证明,现在总委员会的存在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

敬礼和团结!

米哈伊尔·巴枯宁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424—427页。

附录：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关于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的决议

1872年9月15日

· 编者按语 ·

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会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并决定把巴枯宁及其主要同谋者吉约姆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巴枯宁及其死党进行疯狂反扑，他们在瑞士的圣伊米耶城举行了所谓的“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攻击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这里选录的便是这个臭名昭彰的大会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针对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继续宣扬放弃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胡说“破坏一切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义务”，建立临时革命政权“是又一个骗局，对无产阶级来说，这和现存的一切政府同样危险”。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放弃政治”的谬论时指出：“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0页）

鉴于：

企图强使无产阶级接受一模一样的政治策略或政治纲领，以

及强使他们都走同一条能使他们获得彻底的社会解放的道路，是既荒谬又反动的主张；

谁也无权剥夺各自自治的联合会和支部独立制定和采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政治策略这种不容争辩的权利，任何类似的企图都注定会使我们陷入令人深恶痛绝的教条主义；

无产阶级的抱负，除了建立以普遍劳动和平等为基础、绝不依赖任何政治的政府的完全自由的经济组织和联合外，不可能有其他目的，这种组织和这种联合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手工业者同盟和自治公社的自主活动的结果；

任何政治组织都只能是有利于一个阶级而不利于群众的统治机构；无产阶级如果想夺取政权，那末它自己也会变成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

因此，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宣布：

一、破坏一切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义务；

二、为了实现这种破坏而建立似乎是临时的革命政权的一切做法，都不过是又一个骗局，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和现存的一切政府同样危险；

三、全世界无产者为了完成社会革命而反对任何妥协，他们必须摆脱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确立团结一致的革命行动。

译自《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莫斯科
1926年俄文版第113页。

致《自由报》编辑部(摘录)

· 编者按语 ·

这封信是巴枯宁在海牙代表大会后进行疯狂反扑的又一罪证。在这封信里,阴谋家、野心家巴枯宁重施造谣诬蔑的惯技,恶毒攻击海牙代表大会,诽谤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同时,他继续宣扬关于废除国家,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谬论,宣称国家“是战争的永久的最初的根源”,“哪怕在过渡性的革命时代也一样,我们也不能设想国民公会、立宪议会、临时政府、所谓的革命专政等等”。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义》这篇光辉著作中批判巴枯宁反对工人阶级用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时愤怒地指出,他宣扬这种谬论的“目的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0页)。

1872年10月5日

编辑先生们!

你们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所作出的关于开除我的决议,可以预料,你们认为发表我的回答也是公正的。我的回答如下:

公民马克思和他的信徒们获得了完全胜利。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自己占多数(这个多数是早就处心积虑地准备和组织起来的,他们不大尊重道德、真理和正义的原则,虽然他们常常口头上宣布,但事实上很少兑现),便抛弃了假面具,就象贪权的人们所必然要做的那样,在人民的统治的名义下(人民的统治至今是所有妄图统治群众的人的支点),勇敢地宣布了人民对国际的奴隶般的依附。

如果国际不是那样富有生气，如果国际仅仅以组织领导中心为基础，——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而不是以文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真正愿望的现实团结为基础，不是以各个支部和联合会不要任何领导监护而实行自由和自行联合为基础，——这个倒霉的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特别顺从和确切的体现）就会把国际引向灭亡，引向死亡。这些决定会把这个美好的协会变成一种既可笑又可恶的东西，我很乐意指出，马克思先生最积极和最明智地参加了这个协会的创建工作。

国家、政府、全世界专政！这是格雷哥里七世、博尼法齐乌斯八世、查理五世和拿破仑们的幻想以新的形式（但具有同样的野心）在社会民主党营垒中的表现！

难道能想象比这更荒唐、更可恶的事情吗？

断言一批人，哪怕是最理智、具有最良好的意愿的人，能够成为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经济组织的头脑、灵魂、指导和联合的意志，——这是反对健康思想和历史经验的邪说，这不禁使人要问，象马克思先生这样一个有洞察力的人怎么能够落到这样的地步呢？

教皇们起码有一个替自己辩解的根据，即他们手中具有圣灵赐予他们的真理，而他们似乎是信仰这种真理的。马克思先生并没有这种根据，我不想推断说他用科学方法发明了一种类似绝对真理的东西，从而使他感到委屈。但是，既然不存在绝对的东西，那末对于国际说来，既不可能有绝对无误的教条，从而也不可能有什么官方的政治或经济理论，因此，我们的代表大会绝不当妄求起宗教会议的作用，宣布一切教徒必须遵循的原则。

.....

我们认为，政治，无产阶级必须实行的革命政治，应当把破坏国家作为自己的唯一的和直接的目标。我们不了解，如果想要保

存国家，怎么谈得上国际团结呢？难道可以幻想建立世界国家即世界奴役吗？这是大皇帝和教皇们的幻想。因为，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这种团结的敌人，因而也是战争的永久的最初的根源。我们不认为在国家中或者在国家的帮助下，能够谈得上无产阶级的自由和群众的真正解放。国家意味着统治，而任何统治都是以奴役群众，也就是说以剥削群众而为少数统治者谋利益为前提的。

哪怕在过渡性的革命时代也一样，我们也不能设想国民公会、立宪议会、临时政府、所谓的革命专政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在群众中革命才是纯洁的、真诚的和现实的，如果革命集中在几个领导人的手中，那末它必然立即会成为反动。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不准备在这里发挥这些思想。

马克思派完全持另一种观点。就象善良的德国人一样，他们是权力和国家的崇拜者，因此是政治和社会学说的宣扬者，是历来以普选和群众统治的名义从上面建立的秩序的维护者，而群众则命定有幸和有福服从领袖、服从他们的被选出来的老爷。马克思派除了期待他们的所谓人民国家会带来解放外，根本不考虑别的解放。他们很少敌视爱国主义，甚至他们的国际本身也常常涂有泛日耳曼主义的色彩。当然，在俾斯麦的政策和马克思派的政策之间有一条看得出的界限；但是在马克思派和我们之间则有一道深渊。他们是国家主义者，我们毕竟是无政府主义者。

这就是现在把国际分为两个阵营的两种基本倾向。一方面，严格地说，只有德国，另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有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的汝拉山区、法国大部分地区、比利时、荷兰，而在不久之后将有各斯拉夫民族。这两种倾向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冲突，由于马克思先生极端狡猾，由于他的最近这次代表大会是完全人为地组织起来的，德国倾向取得了胜利。

.....

戴王冠的和不戴王冠的独裁者都可能幻想世界统治，这无论如何我是了解的；可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朋友、一个革命者，断言他热烈追求群众的解放，同时却以任何国家发生的一切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最高仲裁者自居，竟敢于幻想使所有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服从他自己头脑中产生的一种唯一的思想，对这样的人该怎么说呢！

我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很严肃的、虽然并非始终是完全真诚的革命者，是一个真正希望群众站起来的人；我不禁问自己，他怎么看不到，建立世界专政，不管是集体专政或个人专政，——这种专政需要一个某种形式的世界革命的总工程师象开机器那样来领导和指挥一切国家的群众的解放运动，——建立这样的专政足以扼杀革命、使一切人民运动瘫痪，偷换一切人民运动呢？

.....

国际代表大会似乎是为了上述革命的利益，建议整个文明世界的无产阶级接受一个享有专政权力的政府，这个政府具有宗教裁判所的、祭司长的权利，它可以开除地方联合会，为了一种似乎是官方的而实际上是马克思先生自己发明的原则，强迫整个整个的民族接受教皇禁令，而马克思发明的原则被用人为多数的表决变成了绝对真理，对于这个代表大会该怎么说呢？

.....

实际上，这绝不是国际的代表大会，而是总委员会的代表大会；总委员会的马克思派和布朗基派大约占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拉着由德国人组成的受过严格训练的队伍和一些受骗的法国人来到了海牙，其目的不是为了严肃地讨论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而是为了确立自己在国际中的独占统治。

马克思先生比他的盟友布朗基派更机灵、更狡猾，他利用他们取得了胜利，同在他之前俾斯麦利用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外交

家取得了胜利完全一样。

显而易见，布朗基派参加代表大会时抱着这样一种希望（可以设想，这是被马克思先生自己鼓舞起来的），即他们在总委员会的帮助下可以保证自己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他们不怀疑他们仍将在委员会内保持有影响的地位。马克思先生是不愿意和别人分享权力的，但很可能的是，他不惜向法国同事们许了一些肯定的愿，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他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就不可能获得多数。

.....

如果说马克思连头发根都充满了在俾斯麦胜利后德国非常盛行的泛日耳曼主义情绪，那末布朗基主义者首先是法国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就象真正的法国人理所当然地那样不了解和鄙视德国，他们可以轻易地让马克思先生把操纵德国党事务的无限权力抓在自己手里，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同意把法国的领导权让给马克思，不言而喻，他们要保留自己在法国的权力。而在法国实行独裁——这是马克思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最迫切追求的东西，甚至比追求在德国实行独裁还要迫切。

.....

马克思先生并不满足于他的无疑是非常严肃的和深刻的经济学识，以及不可辩驳的和出色的搞政治阴谋的才能。为了高踞于自己的同胞之上并且驾驭他们，他在自己的弓上经常装有两根弦，——一根是法国的，另一根是英国的。第一根弦是他对法国精神的效果不佳的摹拟，第二根弦是他对英国的实际理智的较成功的模仿。.....

.....

在马克思先生和英国委员之间似乎有一个默契，根据这种默契，马克思先生不应当干涉英国本身的事务，或者更确切些说，对

它的干涉不应多于英国人所允许的程度；英国人则把对于国际在大陆上的活动的领导完全交给马克思照管，他们很少过问。应当指出，这些公民是值得赞扬的，他们深信马克思先生的忠实和公正。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先生滥用这种信任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知道，国际的一切事务，更正确些说，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在我们伟大协会内散布和培植的一切阴谋，是由一个几乎全由德国人组成的狭隘的马克思集团制造和领导的，这个集团起着一种执行委员会的职能：它了解一切、决定一切、执行一切。而构成总委员会的大多数的其他成员则反而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集团对他们是那样关心，甚至不烦劳他们去签署总委员会的通告，而由这个集团的成员代他们签字，因此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对于应由他们负责的一切卑鄙事情一无所知。

很容易想象，马克思先生和他的朋友这样一些人怎样顺利地利用了良好形势；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政治家，能够毫无良心地采取行动。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叙述这个大阴谋的目的。这个阴谋的目的就是依靠国际的帮助在欧洲确立马克思先生的革命独裁。

.....

马克思先生从1869年，特别是从1871年开始进行公开的斗争。在巴塞爾代表大会（1869年9月）以前，他把自己的计划隐蔽起来了。

但是，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激起了他的仇恨和恐惧，于是他命令自己的走狗们对于他从此以后极端仇视的人展开疯狂的总进攻，把他们看作是同他的原则和他的独裁势不两立的敌人。首先在巴黎，然后在莱比锡和纽约，最后在日内瓦，对我和我的朋友（首先是对我）开了火。马克思的炮手们打过来的不是炮弹，而是污秽的东西。这是接连不断的卑鄙的和肮脏的诽谤。……

.....

但是,我们之间的决定性的公开斗争是从1871年9月即从著名的伦敦代表会议开始的,斗争是在马克思先生及其信徒这些极富政府精神和小心谨慎的人所可能做到的程度上公开进行的。

法国的崩溃显然在马克思先生的心中激起了热烈的希望,同时俾斯麦先生(在我面前放着的一封半官方的信中,马克思先生的“第二个我”和密友恩格斯先生把俾斯麦称作社会革命的很有益的仆人)的胜利,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强烈的嫉妒心。当然,作为一个德国人,马克思以俾斯麦的胜利而自豪,而作为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和恩格斯一起却以这样一种希望而自慰,即归根到底,普鲁士王朝的这种胜利早晚会变成以他为首的伟大的共和主义人民国家的胜利。马克思本人则感到非常泄气,因为那个大出风头和显赫一时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

.....

马克思先生在社会主义世界,在欧洲无产阶级中间尽力做的,正是俾斯麦先生在政治界和资产阶级世界中做过的事情,这就是:用德国的主动性和统治来代替法国的主动性,因为照他和他的学生们的意见,他自己的思想是最先进的德国思想,于是他决定,他的思想在国际内的理论和实践上胜利的时刻已经到来。这就是他在1871年9月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的唯一目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出版和公布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的臭名昭彰的宣言中,对马克思派的这种思想作了清楚的叙述。这就是无产阶级解放和国家组织劳动的理论。

.....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374、375、376—377、
379、380、381、382、384、385—386、387、
391—392、393页。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摘录)

(国际工人协会内的两派斗争)

· 编者按语 ·

海牙代表大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粉碎了巴枯宁阴谋集团，但是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在海牙大会后仍在激烈地进行着。1873年初，巴枯宁又抛出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竭力歪曲国际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咒骂“革命专政和国家政权”“都是反动的”，胡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因此他们便想这个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巴枯宁的这本书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就作了摘要，写了许多批注，在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反动观点的同时，深刻阐述并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等重要原理。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

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4页）。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9页）。为了便于批判巴枯宁的谬论，我们把马克思的批注以脚注的形式用黑体字排出。马克思的《摘要》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

此外，巴枯宁在这本书中还积极为沙皇建立泛斯拉夫主义霸权国家出谋献策，建议沙皇占领海岸线和征服东方。他为老沙皇侵略中国制造反动理论根据，叫嚷中国人“好战”，“人口众多”，要向外侵略，这充分暴露了巴枯宁的反革命面貌，说明他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吹鼓手。

.....

现代资本生产和银行投机事业，为了自己进一步的和充分的发展，要求建立巨大的国家集中组织，因为只有后者才能迫使千百万普通人民群众遭受它们的剥削。工人协作社、小组、公社、乡、最后是区域和各族人民的自下而上的联合组织，这个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自由的唯一条件，是和现代资本生产和银行投机事业的本质相对立的，正如任何经济自治都是和它们不相容的一样。可是，它们却同所谓的代议制民主和睦共处；因为这种现代的国家形式，建立在由虚假的人民代表在虚假的人民议会中表现出来的虚假民意的虚假统治基础上，结合了它们成功所必需的两个主要条件；

国家集中制以及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真正服从那些管理他们、似乎代表他们并且不断剥削他们的少数劳心者。

当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和一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政治纲领的时候，我们会有机会详细研究和阐明这个实际的真理。现在我们注意一下问题的另一方面。

对人民劳动的任何剥削，不管用什么样的虚假的人民统治和虚假的人民自由的政治形式装饰起来，对人民都是痛苦的。就是说，任何人民，不管它的天性多么温顺，不管它对政权唯命是从已成为一种习惯，它也是不想甘愿服从的；要让它服从，就必须有经常的强制和暴力，即必须有警察监视和军事力量。

现代国家，按其实质和目的来说，必然是军事国家，而军事国家也必然会成为侵略的国家；如果它自己不侵略，那它就要被侵略，原因很简单，哪里有力量，那里就必然要表现和运用这种力量。由此又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国家必然要成为巨大的和强大的国家；这是维持它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就象资本生产和最后甚至要吞没这种生产本身的银行投机事业一样，就象它们由于害怕破产而必然要靠损害被它们吞食的小的投机事业和生产来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规模，必然要力求成为唯一万能的世界性生产和投机事业一样，现代国家必然是军事的国家，它本身也包含有成为世界国家的不可遏止的意向；但是世界国家（它自然是不能实现的）无论如何只可能有一个；两个这样的国家，一个与另一个并存，是根本不可能的。

.....

反对凡尔赛国民议会和反对祖国的救星梯也尔的巴黎公社起义，是由巴黎工人在德国军队还包围着巴黎的情况下发动的，它充分显示和说明了目前推动法国无产阶级前进的唯一的、对于法国无产阶级说来，今后除了社会革命的事业、目的和战争以外，

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事业、目的和战争。

这从另一方面充分说明，为什么凡尔赛的执政者和代表者怒火中烧，也充分说明，为什么在他们的直接指挥和赞许下，对被击败的公社社员干出了前所未闻的暴行。的确，从国家爱国主义的观点看来，巴黎工人犯了弥天大罪：在德国军队仍然包围着巴黎、刚刚摧毁了祖国、粉碎了祖国的民族势力和威严、致命地损害了民族荣誉的情况下，巴黎工人在粗野的、世界主义的、社会革命的热情的促使下，宣布彻底破坏法兰西国家、废除与法兰西各公社的自治不相容的法国的国家统一。德国人仅仅缩小了他们政治祖国的疆界和力量，而他们却想把它彻底消灭，而且似乎是为了显示这个叛逆性的目的，他们把法国往日荣誉的雄伟纪念碑旺多姆圆柱毁为废墟！

从政治和爱国主义观点来看，有什么罪行能同这种前所未闻的亵渎神圣的行动相比！请记住，巴黎无产阶级采取这种行动，并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任何蛊惑家的影响，也不是由于一种暂时的狂热的迷恋，虽然这些情况在每一个民族，特别是在法兰西民族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不，这一次巴黎工人的行动是沉着的、有意识的。这种对国家爱国主义的实际否认，自然是强有力的人民激情的表现，但这并不是一种瞬息即逝的激情，而是深刻的，可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已经变成人民意识的、在惊恐的世界面前突然展现出的激情，它就象无底的深渊一样，准备吞没社会的整个现行制度及其所有机构、设备、特权以及整个文明……

这里极其明显地、毋庸置疑地表明，粗野的、饥饿的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的热情的促使下，一往直前地力求在人类真理、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在上流社会中也许只有作为历史学作业的幼稚习题才能容忍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另一个世界，而各特权阶级这个开明的、有教养的世界则拼命地维护国家的、法律

的、形而上学的、神学的和军事警察的制度，把它看作是现在保护经济剥削的宝贵特权的最后一个堡垒，在它们之间，我说，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在干粗活的人们和众所周知集一切优点、美德与善行于己身的有教养的社会之间，从今以后任何调和都是不可能的了。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法国一国，在整个欧洲也是如此；而且这场战争只能以交战双方一方获得决定性胜利，另一方遭到彻底失败而告终。

要么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世界会扑灭和制服起来暴动的人民自发势力，以使用当然是由某位上帝恩赐的，并由科学作了合理解释的刺刀、皮鞭或棍棒的力量，去迫使干粗活的群众象以往一样地劳动，这将直接导致完全恢复国家在目前唯一可能的最露骨的形式，即军事独裁或皇权形式的国家；要么是工人群众将彻底抛弃可恶的、许多世纪以来的桎梏，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和破坏建立在这种剥削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文明，而这便意味着社会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一切称为国家的东西的毁灭。

总之，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社会革命，这就是两极，它们的对抗构成整个欧洲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真正实质，而在法国这种对抗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表现得更为明显。拥有整个资产阶级，当然也包括沦为小市民的贵族的政界，在凡尔赛找到了它的集结点，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防守地。社会革命在巴黎遭到了惨败，但是决没有被消灭，甚至没有被征服，它现在和往常一样拥有城市和工厂的整个无产阶级，并且已经以孜孜不倦的宣传开始把农村居民也争取过来了，至少在法国南方是如此，在那里，这种宣传以极其广泛的规模在进行着和扩展着。所以说今后两个不可调和的世界的敌对对立，是使法国决不可能重新成为首屈一指的、占优势的国家的第二个原因。

.....

在现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时期，强大的国家只能有一个巩固的基础——军事和官僚的集中制。在君主制度和最民主的共和国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在君主制度中，官僚世界以君主的名义压迫和掠夺人民，以满足各特权阶级、有产阶级的更大的利益，并且中饱自己的私囊；在共和国中，官僚世界同样为了那些人的私囊和那些阶级而压迫和掠夺人民，只不过用的是人民意志的名义。在共和国中，似乎是由国家代表的虚假的、合法的人民在窒息并且将来还要窒息活生生的和真正的人民。但是，即使把用来打人民的那根棍子叫作人民的棍子，人民也绝不会更好受些。

社会问题、社会革命的热情现在掌握了法国无产阶级。要么是满足这种热情，要么是遏止和压制它；但是，只有当国家暴力——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后堡垒崩溃以后，它才能得到满足。就是说，任何国家，不管它的形式是多么民主，即使是仅仅虚有人民之名的、称为人民代议制的最红色的政治共和国，都不能给人民以它所需要的东西，即没有任何自上而来的干预、监护、暴力的，符合自身利益的自下而上的、自由的组织，因为任何国家，甚至最共和的和最民主的国家，甚至马克思先生想出来的所谓的人民国家，实质上都无非是通过似乎比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少数知识分子因而也是特权分子自上而下地对群众进行管理。

总之，有产阶级和管理阶级决不能满足人民的热情和人民的要求，因此只有一种手段，即国家暴力，一句话，就是国家，因为国家也就是暴力，就是凭借在可能的情况下是伪装起来的、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肆无忌惮和公开露骨的暴力的统治。但是，甘必大先生和梯也尔先生本人一样，也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他和梯也尔先生一样，想要中产阶级——也许再加上在法国只占整个无产阶级很少一部分的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的强大国家

和绝对统治。甘必大先生和梯也尔先生的全部区别就在于，后者惑于旧日的成见和偏见，只从极其富有的资产阶级中间寻找支持和拯救，却以不信任的目光打量着数以万计，甚或数以十万计的希望进行管理的新人，这些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上述追求资产阶级地位的工人等级；而甘必大先生，由于遭到迄今为止唯一统治法国的上等阶级的排斥，恰恰力求以那些迄今为止处在国家管理的利益和荣誉之外、人员众多和纯粹资产阶级的多数为基础，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民主共和专政。

.....

人民起义就其本性来说是自发的、混乱的和残酷的，它始终是以损失和牺牲大量的财产（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为前提的。人民群众随时准备作出这种牺牲：因此他们构成一种粗暴的、野蛮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建树功勋和实现看来是不可能的目的，因为他们的财产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财产，因而他们没有财产所败坏。只要为了防御和为了胜利需要作出这种牺牲，他们会不惜毁掉自己的村庄和城市，因为大部分财产是别人的，所以在人民群众中间常常表现出积极的破坏热情。为了提高到革命事业的高度，光有这种否定的热情是不够的；但是没有它，革命事业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广泛的和热情的破坏，没有起拯救作用和富有成效的破坏，就不可能有革命，因为正是从破坏中，只有通过破坏，才能孕育和产生新的世界。

.....

但是，最可怕的贫困，甚至当它伤害到数以百万计的无产阶级时，也还不是发生革命的充分保证。人天生具有惊人的、老实说有时是令人绝望的耐心，当他遭受注定使他陷于空前的困苦和慢慢饿死的贫困，同时还头脑不灵，感觉迟钝，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抱着东印第安人和德国人在各民族中特具的无动于衷的耐心

和惟命是从的态度的时候，天晓得他有什么事情忍受不了。这种人永远不会振作起来，死也不会起来暴动。

但是当人被弄得陷于绝望的时候，他就较有可能起来暴动。绝望是一种强烈的、激烈的感情。它把人从愚钝的、半睡不醒的苦难状态中唤醒，他就是不指望改善状况，也一定会使他或多或少明确地意识到改善状况是可能的。

最后，谁也不能在绝望中长久地呆下去；它迅速地或者把人引向死亡，或者把人引向事业。引向什么事业呢？自然是引向解放和争取好的生活条件的事业。甚至德国人在绝望中也将不再是滔滔不绝的说教者了；不过要使他们陷于绝望，就需要有许多的、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屈辱、压迫、苦难和祸害。

但是，为了激起社会革命，仅仅有贫困和绝望还是不够的。贫困和绝望都只能产生个人的、最多是地方性的暴动，而不足以唤起整批整批的人民群众。为此就必须有一个永远是历史地从人民的本能（它是在许多重大的事件、沉痛的经验中培养、扩大和明确起来的）深处产生出来的全民理想；必须有一种对自己权利的普遍观念以及对这种权利的深刻的、热情的，可以说是宗教的信仰。当人民中的这种理想和这种信仰同把人民弄到绝望状态的贫困相遇的时候，社会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就迫近了，就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了。

.....

这种理想在人民看来，自然首先意味着贫穷和困苦的终结，以及通过一切人必须参加的和对一切人是平等的集体劳动来充分满足一切人的物质需要；其次意味着老爷们和任何统治的完蛋，意味着根据人民的需要，不是象在国家中那样自上而下地，而是自下而上地，撇开一切政府和议会，由人民自己来自由地组织人民的生活，意味着农业和工业工人协作社、公社、区域和各民族的自由联

盟；最后，意味着在较遥远的将来，在一切国家的废墟上将胜利地实现全人类的博爱。

绝妙的是，马克思的国家共产主义的纲领，在意大利也和在西班牙一样，一点也不走运，相反地，在那里人们广泛而热情地接受了尽人皆知的同盟或社会革命者联盟的纲领，对一切统治、政府监护、上司和权威无情宣战的纲领。

在这种条件下，人民能够获得解放，按照一切人和每个人的最广泛的意志建立自己的生活，但丝毫不会威胁其他各族人民的自由；因此，无论西班牙或者意大利，都决不会执行侵略政策，相反地，倒是应该期待它们在近期内发生社会革命。

各个小国，如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和瑞典，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但主要地是由于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它们也并不威胁任何人，相反地，却有许多理由要担心受新德意志帝国的侵略。

剩下的是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德国。举出奥地利，难道不是意味着说到一个迅速濒于死亡的不可救药的病夫吗？这个帝国靠王朝关系和武力建立起来，而且包括四个对立的和彼此嫌恶的种族，占优势的是受到其他三个种族一致痛恨的德意志种族，其人数几乎不到全体居民的四分之一，而斯拉夫人则占半数，他们要求自治；这个帝国最近分为两个国家：马扎尔—斯拉夫国家和德意志—斯拉夫国家，——我们说，这样一个帝国，当军事警察专制在它那里占居优势的时候，还能够维持下去。近二十五年来，它遭到了三次致命的打击。第一次失败是1848年革命带给它的，这次革命结束了梅特涅公爵的旧制度和统治。从此，它就采用大胆的手段和各种各样的替换办法苟延残喘。1849年，被尼古拉皇帝救了命的奥地利帝国，在傲慢的寡头执政者施瓦尔岑堡公爵和成为斯拉夫主义者的耶稣会教徒、契约的订立者图恩伯爵的操纵下，急忙在教权和政权方面实行穷凶极恶的反动，在所有各个省份不顾一切民

族区别地建立毫无限制和毫不留情的集权制，从中寻找生路。但是，拿破仑第三在 1859 年使它遭到了第二次失败，这表明，军事官僚集权制救不了它。

从此，帝国沉溺于自由主义。它把俾斯麦公爵（当时还是伯爵）的无能而又倒霉的对手博伊斯特男爵从萨克森召来，拚命使各族人民获得自由；但是，它一面使各族人民获得自由，同时又想挽救国家的统一，就是说，想要解决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

必须使居住在帝国境内的四个主要的部族即斯拉夫人、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和瓦拉几亚人同时得到满足，他们不仅在天性、语言以及各种各样的性格和文化程度方面极不相同，而且甚至大都互相敌对；所以，过去和今后都只有采用政府强制的手段，才能把他们约束在国家关系内。

必须使德意志人得到满足，他们大多数人力图争取最具自由民主色彩的宪法，同时又吵吵嚷嚷地坚持要求保留他们自古以来在奥地利帝制中在国务方面进行控制的权利，虽然他们连犹太人一起仅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难道不是再次证明我们坚持不懈地维护的真理吗？我们确信，只有普遍了解这个真理，才能使各种社会问题尽速得到解决，这就是：国家，任何国家，哪怕用最自由最民主的形式装饰起来，都必然建立在控制、统治、暴力即专制的基础上，专制可以是隐蔽的，但那却更加危险。

德国人可以说是天生的国家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历史权利，即以侵略和历史悠久的权利，另一方面以自己虚假的文化优势作为他们的奢望的依据。我们在这篇导言的末尾还会有机会说明，他们的奢望扩展得多远。现在我们则仅限于谈到奥地利的德意志人，虽然要区分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奢望和一般德意志人的奢望是很困难的。

.....

对斯拉夫人会有什么好处呢？建立伟大的斯拉夫国家对斯拉夫人民群众会有什么好处呢？在这样的国家中好处无疑是有的，不过并不是千百万无产者的，而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即由神甫、贵族、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构成的少数人的，这些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享有专利权的学问和自己的虚假的智慧的优越性，认为自己负有支配群众的使命；好处是无产阶级的几千个压迫者、刽子手和剥削者的。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干粗活的群众来说，国家越大，锁链就越沉重，监狱就越拥挤。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并且证明过，社会如果不变为侵略的国家，就不会是，就不会仍然是国家。经济战场上的竞争，在消灭和吞没不大的、甚至是中等的资本、工厂、地产和商店，以利于巨大的资本、工厂、地产和商店；这种竞争也在消灭和吞没中小国家，以利于帝国。现在任何国家，如果它想不仅仅在纸上存在，不依靠邻国的恩典存在（邻国只是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才容忍它存在），而是确确实实地、自主地、独立地存在，它就必然要成为侵略的国家。

但是，成为侵略的国家就意味着要被迫用暴力使千百万异族人民屈服。为此就需要发展巨大的军事力量。而哪里军事力量取得胜利，那里就没有自由！特别是没有工人的意志和幸福。由此可见，建立伟大的斯拉夫国家无非是建立巨大的斯拉夫人民的奴役制。

.....

德国人在国家中谋求他们的生命和自由；而对于斯拉夫人说来，国家就是坟墓。斯拉夫人必须在国家之外，即不仅通过反对德意志国家的斗争，而且通过反对一切国家的全民暴动，通过社会革命来谋求自己的解放。

斯拉夫人可以解放自己，可以破坏他们所仇视的德意志国家，但不是通过徒劳地力图使德国人屈服于自己的优势，把他们变为斯拉夫国家的奴隶的方法，而只是通过号召他们追求在一切现存国家的废墟上实现普遍自由和普遍的人类博爱。但是，国家是不会自行垮台的，只有全民性的和全部族性的、国际的社会革命才能够推翻它。

.....

十八世纪末著名的大革命，使法国再次占了首要的、首屈一指的地位。这次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全人类的利益、最充分的人类自由的理想，然而仅仅是在纯政治方面；这个理想包含了无法解决的矛盾，因而是不能实现的；没有经济平等的政治自由，一般的政治自由即在国家中的自由，这是骗人的话。

因此，法国革命照样地也产生了两个主要的趋向，这两个趋向互相对立，彼此不断地斗争，同时又是不可分割的，甚至可以说必然要会合起来同样追求同一的目标：不断剥削干粗活的无产阶级，以利于有财产的、人数不断减少而同时又日益发财致富的少数人。

在这样剥削人民劳动的基础上，一种趋向想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另一种更加彻底的趋向则力图在此基础上建立君主制的、即露骨的国家主义的专制，也就是集中制的、官僚主义的、警察的国家，用天真的制宪形式勉强伪装起来的军事独裁。

第一种趋向在甘必大先生的引导下，如今力图在法国夺取政权。第二种趋向在俾斯麦公爵的引导下，已经在普鲁士德国主宰一切。

很难说，这两种趋向哪一种对人民更有利，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哪一种对人民、对干粗活的群众、对无产阶级祸害最少；这两者都同样顽固地拚命要建立或巩固强大的国家，就是说，要充分地

奴役无产阶级。

同这些由 1789 年和 1793 年资产阶级大革命产生的国家主义的、共和制的和新君主制的压迫人民的趋向相对立，起初从法国和奥地利的，后来也从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本身深处终于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趋向，其目的正在于消灭一切剥削和一切政治的或法律的以及政府的行政的压迫，也就是通过在经济上平均一切财产的办法消灭一切阶级，并废除财产的最后支柱即国家。

这就是社会革命的纲领。

总之，对于文明世界的一切国家说来，现在只有一个全世界性的问题，只有一种世界利益——使无产阶级从经济剥削和国家压迫下完全地和彻底地解放出来。显而易见，不经过流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任何一个民族的真正的状况、权利和意义都要取决于它参加这一斗争的方向、性质和程度。

因此，斯拉夫人只应当也只能通过社会革命的途径，来寻求和争得自己在历史上和在各族人民的兄弟联盟中的权利和地位，这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吗？

但是，社会革命不可能是一个民族单枪匹马的革命；社会革命按其实质来说是国际的革命，就是说，寻求自由的斯拉夫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应该把他们民族力量的意向和组织同所有其他各国民族力量的意向和组织联接起来；斯拉夫无产阶级应该大批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我们已经有机会提到，维也纳工人在 1868 年庄严声明国际友爱，他们不顾奥地利和士瓦本爱国者的一切劝说，拒绝举起泛日耳曼主义的旗帜，并坚决声明，全世界的工人们都是他们的兄弟，除了全世界国际团结的无产阶级阵营以外，他们不承认别的阵营；同时，他们非常公正地认定和表示，作为奥地利工人，他们恰好不能举起任何民族的旗帜，因为奥地利无产阶级是由马扎尔人、意大利

人、罗马尼亚人，主要是由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这许多不同的种族组成的；因此，他们应该到所谓的民族国家之外去寻求对他们的问题的实际解决。

奥地利工人朝这个方向再迈进几步，他们就会懂得，无产阶级要在任何国家中得到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就是破坏任何国家；而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齐心协力行动的情况下，这种破坏才是可能的，无产阶级首先在经济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正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

奥地利的德意志工人了解到这点，就会不仅成为自己解放的首倡者，而且同时成为奥地利帝国内的非德意志人民群众（自然包括所有的斯拉夫人）的解放的首倡者；我们会首先劝说所有的斯拉夫人同他们结成联盟，以便破坏国家即人民的监狱，并在最充分平等和自由的原则上建立新的国际性的工人世界。

但是，奥地利工人没有实现这些必要的最初步骤，其所以没有实现这些步骤，就是因为在迈第一步时就被李卜克内西先生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宣传阻挡住了，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大概在 1868 年 7 月到了维也纳，其目的正是要引诱奥地利工人的正确的社会本能离开国际革命的道路，并把它导向政治宣传，以利于建立他们称作人·民·国·家的统一的国家，当然是泛日耳曼主义的国家，一句话，就是为了实现俾斯麦公爵的爱国主义理想，只不过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并且通过所谓合法的人民宣传来实现罢了。

不仅斯拉夫人不应当走这条路，甚至德国工人也不应当走这条路，原因很简单，国家，哪怕说十遍它是人民的国家，哪怕它装饰着最民主的形式，对无产阶级都必然是个监狱，——斯拉夫工人更不可能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这就意味着甘愿忍受德国的压迫，而这是违背一切斯拉夫人的心愿的。因此，我们不仅不打算劝说

斯拉夫兄弟加入受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跟着他们跑的倍尔先生、李卜克内西先生和几个舞文弄墨的犹太人的独裁专权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相反地,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防止斯拉夫无产阶级自取灭亡地同这个党结成同盟,因为这个党根本不是人民的政党,按其方向、目的和手段来说,它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并且完全是德意志的即残害斯拉夫人的政党。

但是,斯拉夫无产阶级为了拯救自己,就应该坚决地不仅不在这个政党结成同盟,而且不和它接近(我们不是说不在这个政党中的工人接近,而是说不和它的组织接近,主要是不和它的首领们接近,因为它的首领们到处和始终是资产阶级的),愈是这样,同样为了拯救自己,就应该愈紧密地靠拢和联系国际工人协会。绝不应该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混为一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爱国主义纲领不仅同国际的纲领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点,而且甚至是同它完全对立的。不错,在耍尽花招的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把他们的纲领强加于整个国际。但是这种企图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部分地区、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部分地区,引起了广泛的抗议,结果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除了德国人自己以外,谁也不想要德国人的纲领。德国无产阶级一旦更清楚地了解到,他们本身的利益和其他一切国家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这个强加于他们、而远不是由他们制定的纲领的方向是有害的,他们自己也会抛弃这个纲领,而让他们的资产阶级领导人,让这班首领们去抱住它不放。毋庸置疑,这个时刻是一定会到来的。

.....

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原理,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广阔的海疆,以保证它和全世界直接联系,并且使它能够在物质方面,也在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直接参加世界运动,它就不能置身于头

等强国之列。这个道理如此明显，以致用不着加以证明。我们假定，一个国家非常强大，教育程度很高而且十分幸福，——象在国家中一般可能的那样幸福，——又假设，某些情况使它与世隔绝。可以肯定，经过五十年来，两代人的时间，这个国家中的一切就会发生停滞：力量会削弱，教育程度会濒于愚蠢的状态，幸福呢，也会散发出林堡乾酪的气味。

请看中国，它过去似乎既有智慧，又有学问，而且大概自有它的幸福；它变得那样萎靡不振，欧洲的海上强国毫不费力，便足以使它屈从于这些强国的智能，如果不是屈从于它们的统治的话，至少也是屈从于它们的意志，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处于停滞之中，而它所以在这许多世纪处于停滞之中，一部分是由于它内部的机构所致，一部分则是由于世界生活的潮流离它太远，长期触及不到它。

有许多不同的条件，使关闭在国家里的人民能够参加世界运动；属于这些条件之列的有天生智慧和天赋毅力、教育程度、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以及对于国家中的群众可以说是根本不能设想的最广泛的内在自由。但是，航海、海上贸易也肯定属于这些条件之列，因为海上交通，按其运价的相对低廉、速度和自由（即谁也不能把海洋攫为己有）来说，比其他一切交通、当然也包括铁路在内的人们较为熟悉的交通都要优越。也许，航空有朝一日会在各方面都更加便利，并且将会特别重要，以致会使各国的发展条件和生活条件彻底均等化。但是目前不能把航空说成是重要的手段，所以航海仍然是各族人民繁荣昌盛的主要手段。

当将来不再有国家，——社会革命党将竭尽全力在欧洲破坏国家，——在政治国家的废墟上，完全自由地、按照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毫无区别地（因为是自由地）包括操一切语言和属于一切民族的人们的自由生产协作社、公社和区域联合会的自由兄

弟同盟的时候,那时通向海洋的道路将对一切都同等地开放;沿海居民可以直接出海,远离海洋的居民则可以通过彻底摆脱一切国家的保护、横征暴敛、关税、限制、挑剔、禁止、许可和征用的铁路出海。但是,即使到那时,沿海居民也将有许多自然的优越性,不仅有物质方面的,而且也有智力和精神方面的。同世界市场和一般世界生活运动的直接接触将大为发展;无论人们怎样使关系均等化,缺少这些优越性的内陆居民仍将比沿海居民生活和发展得迟钝些和缓慢些。

这就是航空为什么将会如此重要的缘故。天空乃是渗透各地的海洋,它无边无涯,所以对它说来,所有的人们,甚至居住在最边远的穷乡僻壤的人们,毫无例外地都是沿海居民。但是,在航空尚未代替航海以前,沿海居民在一切方面都将保持先进,并成为人类的某种贵族。

整个历史,而主要的是历史上大部分的进步都是沿海民族创造的。作为全部文明的创造者的第一个民族是希腊人;的确可以说,整个希腊全是海岸。古罗马只是从它成为海洋国家时起,才成了强大的、世界性的国家。而在现代史上,政治自由、社会生活、贸易、艺术、科学、自由思想的复兴,一句话,人类的复兴,应该归功于谁呢?应该归功于意大利,它几乎和希腊一样全是海岸。在意大利之后,是谁继承了世界运动中的先进位置呢?是荷兰、英国、法国,最后是美国。

.....

我们也不打算来谈开辟通往印度的新的贸易之路。通商政策是英国的政策,它从来不是俄国的政策。俄罗斯国家主要是,而且可以说纯粹是军事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一切都服从于暴政权力的唯一利益。国君,国家,这是主要的;其他的一切——人民,甚至于等级利益,工商业和所谓文明的繁荣,都只是达到这个唯一目标

的手段。任何国家，尤其是现代国家，没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没有工商业，便无法生存下去，因为所谓民族的财富远非人民的财富，而特权等级的财富则是一种力量。在俄国，民族的财富全被国家所吞没，国家本身则成为军事、世俗和宗教势力的庞大国家阶级的供养人。官场盗窃成风，盗窃国库，掠夺人民，这便是俄罗斯国家文明的最真实的表现。

因此，促使俄国政府动手进军希瓦的，除了其他的和更主要的原因以外，还有所谓贸易方面的原因，这是毫不奇怪的；必须为日益增多的官方人员（我们把商界也包括在内）开辟新的活动场所，给他们提供新的进行掠夺的领域。但是，不能期望这方面会使国家的财富和力量显著增长。相反地，可以肯定，在财政方面，这件事情将大大得不偿失。

为什么进军希瓦呢？难道是为了使军队有事可做吗？好几年来，高加索曾是一所军事学校，但是如今高加索平定下来了，所以应该开辟新学校；这样就想出了希瓦战役。即使我们假定，俄国政府极其无能而又愚蠢透顶，这种解释也是经不住批评的。我们的军队在希瓦荒漠中取得的经验，在一场反对西方的战争中将毫无用处，另一方面，这些经验代价太高，以致远远得不偿失。

但是，也许俄国政府当真打算征服印度吧？我们并不错误地过于相信我们的彼得堡执政者的智谋，但是我们终究不能设想，俄国政府竟会抱定这样愚蠢的目的。征服印度！为了谁呢？为什么呢？用什么办法呢？要知道，为了做到这点，就必须把俄国居民如果不是足足一半的话，至少也是四分之一调往东方；而且，除了先征服好战而又人数众多的阿富汗部族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到达印度，为什么恰好要去征服印度呢？而要征服由英国人武装起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受过他们训练的阿富汗，则比控制希瓦至少要困难三四倍。

既然要进行征服，为什么不从中国下手呢？中国十分富庶，而且在各方面都比印度更加便于我们插足，因为在中国和俄国之间，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如果行的话，就去拿下来吧。

的确，利用已成为中国的慢性病的混乱和内战，就能在这个地区远远推进征服的事业，看来，俄国政府也正在进行这种策划；它显然力图使蒙古和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会听到俄国军队入侵中国西部边境的。这番事业风险极大，令我们心惊胆战地想起古罗马人对日耳曼民族的名声狼藉的胜利，人所共知，这些胜利以罗马帝国被日耳曼蛮族掠夺和征服而告终。

一些人认为，中国一国就有四亿居民，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有将近六亿居民，这些居民在这个帝国境内显然住得太拥挤了，于是现在便象一股阻挡不住的潮水一样，人数日益增多地一群群迁徙，有的去澳大利亚，有些横渡太平洋去加利福尼亚，最后，还有大批的人可能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动。那时会怎么样呢？那时，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里海的整个西伯利亚边区转眼之间就将不再是俄国的了。

请想一想，在这个面积（一千二百二十二万平方公里）比法国面积（五十二万八千六百平方公里）大二十倍以上的地区现有居民不到六百万人，其中俄罗斯人只有二百六十万左右，其余都是鞑靼或芬兰血统的土著，而军队人数则微乎其微。一群群中国人不仅会充斥整个西伯利亚，包括我们在中亚细亚的新领地在内，而且还会越过乌拉尔，一直前进到伏尔加河边，将来怎么可能遏制他们的入侵呢！

这就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从东方威胁我们的危险。蔑视这一群群的中国人是不对的。他们人口众多，仅此一点，就已经令人可怕了，令人可怕，因为人口的过度繁殖使得中国人几乎无法在中国境内继续生存下去了；中国人之所以令人可怕，还因为，不应该按照

欧洲商人在上海、广州或买卖城^①做生意接触的中国商人的情况去评论他们。在中国内地居住的是一些受中国文明的摧残少得多，无可比拟地更加刚毅而且必然好战的人，他们由于连续不断的、毁灭掉数以万计和十万计的人们的内战而养成了战争的习惯。还必须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开始熟悉了现代武器的使用和欧式的训练——欧洲国家文明的精华和官方的最新成就。只要把这种训练和掌握新式武器、新式战术同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同他们身上缺乏任何人类抗议的概念、缺乏任何自由的本能的状态，同极端奴隶般地服从的习惯结合起来，——而在1860年最近这次英法进攻中国以后充斥这个国家的许许多多美洲和欧洲的军事冒险家的影响下，这些方面恰好目前正在结合起来，——如果再考虑到这些不得不为自己寻找出路的居民多得惊人，那末就会懂得从东方威胁我们的危险有多大了。

我们的俄国政府天真得象小孩一样，却拿这种危险当作儿戏。俄国政府受扩大疆土的荒唐意图所驱使，并不考虑俄国人口这样稀少，这样贫穷，这样无能为力，以致它至今还不能够，而且永远也不能够使新近获得的阿穆尔边区住满居民。在这二百一十万平方米（几乎等于法国的四倍）的地区内连陆海军一起总共只有六万五千名居民。尽管如此软弱无力，尽管整个说来全体俄国人民普遍贫穷，他们被严父般的行政当局弄得在各方面都陷于如此绝望的境地，以致除了举行破坏性极大的暴动以外，别无出路和生路，——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俄国政府却希望在整个亚洲东部确立自己的势力。

为了继续挺进，哪怕成功的机会极少，俄国政府不仅应该背向欧洲，放弃对欧洲事务的任何干涉，——这是俾斯麦公爵目前求之不得的，——它应该坚决地把自己全部的军事力量调往西伯利亚

^① 现称乌兰巴托。——编者注

和中亚细亚，并象塔梅尔兰一样，带领自己的全体人民去征服东方。但是，塔梅尔兰有他的人民跟着他走，而俄国政府却不会有俄国人民跟着它走。

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印度。俄国政府无论怎样荒唐，也不能希望征服印度和巩固自己在印度的势力。英国首先是靠自己的贸易公司征服印度的，我们却没有这种公司，就是在什么地方有这种公司的话，那也只是袖珍的，是装装样子的。英国从海上，靠庞大的商船队和军事舰队对印度进行大量的剥削，或者说强行同它通商，我们却没有这些船队舰队，把我们同印度隔开的不是海洋，而是一望无边的荒漠，这就是说，根本谈不上征服印度。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能征服的话，我们却能破坏，或者至少能够通过鼓动当地居民举行暴动来反对英国，通过帮助这些暴动，必要时甚至进行军事干涉给予支持，来大大动摇英国在那里的统治。

的确，我们能够做到这点，虽然这将耗费我们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我们的财力和人力却并不充裕。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耗费这些力量呢？难道只是为了徒劳无益地惊扰英国人，反而使自己蒙受巨大损失，让自己获得天真的乐趣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英国人妨碍我们。他们在哪里妨碍我们呢？在君士坦丁堡。只要英国保存着自己的力量，无论把世界上的什么东西给它，它也永远不会同意让君士坦丁堡在我们手中重新成为不仅是全俄罗斯帝国，甚至不仅是斯拉夫帝国，而是东方帝国的首都。

这就是为什么俄国政府在希瓦开战的缘故，就是为什么它一般说来早就力图逼近印度的缘故。俄国政府在寻找一个能加害于英国的地方，找不到别的地方，它就在印度威胁英国。因此，它希望英国人容忍这样一种想法，即君士坦丁堡应该成为俄国的城市，它希望迫使英国人同意这种征服，这种征服对国家主义的俄罗斯说来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

我们是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全民教育、社会生活的解放和广阔发展的拥护者，因此是国家和任何带有国家色彩的东西的敌人，同一切形而上学者、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之神的一切有学问的和无学问的崇奉者相反，我们认为，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始终先于思想，后者只是前者的机能之一，而从来不是前者的结果；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是从自己取之不尽的深处，依靠许多不同的事实发展的，而不是依靠抽象的反射发展的；抽象的反射始终是由生活产生的，从来也不产生生活，它们仅仅作为里程碑指出生活的方向及其独立的和自然的发展的不同阶段。

根据这种信念，我们不仅不企图和丝毫不想把我们从书本上读到的或者自己臆想出来的任何社会制度的理想强加给我国人民或别国人民，而且深信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多少被历史发展的本能中，在自己的迫切要求中，以及在自己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企望中，具有自己的未来正常组织的一切因素，所以我们在人民本身中寻找这个理想；而由于任何国家权力和任何政府按其实质和地位说来，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因此它必然要力图使人民服从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制度和目的，所以我们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敌人，并且认为，只有当人民自下而上地通过独立的和完全自由的联合，没有任何官方的监护，但不是没有某些个人和政党的各种不同的、同等自由的影响而组织起来，由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人民才能够是幸福和自由的。

这就是社会革命者的信念，为此人们称我们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并不反对这个名称，因为我们的确是任何政权的敌人，因为我们知道，政权，不管是对掌握政权的人来说，或者是对于被迫向政权屈服的人来说，都同样起着败坏作用。在政权的有害影响下，一

些人变成好功贪利的专制者、追求个人私利或阶层利益的社会剥削者,另一些人成为奴隶。

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实证主义者、拥护科学支配生活的人、学理主义的革命者,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论据,但是都以同样的热情捍卫国家和国家权力的思想,认为国家和国家权力是拯救社会的唯一方法,对于他们说来,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完全合乎逻辑,这是因为既然他们把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原理当作根据,认为思想先于生活,抽象理论先于社会实践,因此社会科学应当是社会变革和社会改造的出发点,所以他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由于思想、理论、科学至少在现在是为数很少的人的财富,所以这些为数很少的人就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者,不仅是一切人民运动的鼓舞者,而且是这些运动的指挥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的社会组织就应当建立起来,但不是按照人民的需要和本能通过把人民的合作社、公社、乡、区域自下而上地自由联合的办法来建立,而只是由这些似乎代表全民意志的有学问的少数人的独裁政权来建立。

这是一种所谓人民代议制的虚构,实际上是由为数不多的一小撮特权人物来管理人民群众,这些特权人物是由被赶去进行选举的人群选举的或者甚至不是由他们选举的,而这些被赶去选举的人群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选举和选的是什么人;这是想象中的全民思想和意志的虚假的和抽象的表现,富有生气的和真正的人民对这种思想和意志根本一无所知;不管是国家的理论,或者是所谓的革命专政的理论,都是以上述一切为基础的。

革命专政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是表面上的。实质上,它们两者都是由少数人管理多数人,这种管理的借口是多数人的所谓愚蠢和少数人的所谓聪明。因此,它们都是反动的:两者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都是巩固进行管理的少数人的政治和经

济特权，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奴役。

现在已经清楚，为什么以推翻现存政权和制度为目的，以便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专政的学理主义的革命者，从来不是而且将来也不是国家的敌人，相反地，他们过去一直是而且将来也仍然是国家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他们仅仅是现存政权的敌人，因为他们希望占据这些政权的位置；他们仅仅是现存政治机构的敌人，因为这些机构排除他们建立专政的可能，但同时他们是国家政权的热情的朋友，因为如果他们不保持国家政权，革命在真正解放了人民群众后，就会打破这些假革命的少数人重新驾驭人民群众和用自己的政府措施来为人民群众造福的任何希望。

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当反动派在整个欧洲飞扬跋扈的时候，当各国政府在要实现自我保存和对付人民逼迫的这种最凶恶情绪支配下，从头到脚用军事的、警察的和财政的三层铠甲武装起来，准备在俾斯麦公爵的率领下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现在，当似乎一切真诚的革命者都应当联合起来给国际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以反击的时候，我们却反而看见学理主义的革命者在马克思先生的率领下到处站在国家制度和国家主义者方面反对人民革命。

在法国，从1870年起，他们拥护国家主义的共和派反动分子甘必大，反对革命的南方同盟，可是只有南方同盟才能够把法国不仅从德国的奴役下，而且从教权派、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这股更加危险、目前正在得势的联合势力手中拯救出来。在意大利，他们向加里波第和马志尼党的残余讨好；在西班牙，他们公开站在卡斯特拉尔、皮-伊-马尔加耳和马德里制宪会议那一边；最后，在德国和德国周围，在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他们都在为俾斯麦公爵效劳，据他们自己招认，他们把俾斯麦看作是大有用处的革命活动家，并帮助他使所有这些国家泛日耳曼主义化。

现在已经清楚，为什么黑格尔学派的哲学博士先生们，尽管在抽象观念的世界中具有热情的革命主义，在现实中，在1848年和1849年却都不是革命者，而大多数人是反动分子；为什么现在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成了俾斯麦公爵的臭名昭彰的拥护者。

.....

当时^①，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至少大部分还几乎完全没有受到马克思宣传的影响，还没有参加他的共产党的组织。这个组织主要散布在普鲁士莱茵的各工业城市，特别是科伦。在柏林、布勒斯劳，最后还有维也纳，也都有它的分支，但是都很薄弱。不言而喻，在德国无产阶级中，正如在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中一样，一切社会主义的意向已经作为本能的需要处于萌芽状态之中了，在以往的一切革命中，不仅在政治革命中，而且甚至在宗教革命中，人民群众已经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意向。但是，这种本能的表露和对社会变革或社会改良的自觉的、明确的要求是大不相同的。在德国，无论在1848年或1849年，都没有这样的要求，虽然由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起草的著名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宣言在1848年3月就已经发表。这个宣言在德国人民身边瞬息即逝，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德国一切城市中革命的无产阶级还处在政治激进派政党或者极端民主派的直接影响之下，这就给那个党增添了巨大的力量；而资产阶级民主派被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纲领及其首领们的碌碌无能弄得晕头转向，它自己也欺骗了人民。

最后，在德国当时还有一种现在已经没有了的因素，这就是革命的或者至少是能够变得革命的农民。……最初他们准备冒一切危险，甚至准备举行全体暴动。

在1848年和在1830年一样，德国自由派和激进派最怕这种暴动；甚至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不喜欢这种暴动。大家知

^① 指1848年革命期间。——编者注

道，斐迪南·拉萨尔自己承认是这位德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亲授的学生，可是这并不妨碍这位老师在拉萨尔死后对卓越的学生表示忌妒的和羡慕的不满，因为学生在实际方面使老师望尘莫及；大家知道，我们说，拉萨尔好几次谈到过一个思想：十六世纪农民起义的失败以及继之而来的官僚国家在德国的加强和昌盛，是革命的真正胜利。

在德国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农民，一切农民，都是反动派；而国家，一切国家，甚至俾斯麦的国家都是革命。请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是诬蔑他们。为了证明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指出他们的演说、小册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他们的通信，这一切在适当的时候将介绍给俄国公众。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有别的想法；无论如何他们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必然要咒骂一切人民革命，特别是农民的、按本性来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直接导致消灭国家的革命。作为想吞并一切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他们仅仅由于农民革命是实质上的斯拉夫族的革命这一原因，就必然要否定这个革命了。

.....

我们已经屡次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即使不把这看作最终的理想，至少也是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

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①。

^① 马克思批注：“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编者注

例如，大家都知道，贱农是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而且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他们大概要受城市的和工厂的无产阶级的管理^①；或者，如果从民族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假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正如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②。

① 马克思批注：“这就是说，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象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象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象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因为私有者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在从他们的状况来看他们已属于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属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尤其不能象巴枯宁的革命进军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转交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编者注

② 马克思批注：“小学生式的胡说！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能够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至少要象法国资产阶级在自己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事情那样多。想得真妙，工人的统治竟包括对农业劳动的奴役！但是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宁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不论雇佣工人、农民等等）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社会革命要根据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种水平，虽然他也看到，航海造成了兄弟之间的差别。但只不过是航海而已，因为这是一切政治家都知道的差别！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编者注

如果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因而也就有奴役；没有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

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① 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将成为统治者吗？^② 德国人大约有四千万，难道四千万人全都将成为政府成员吗？^③ 全民都将成为管理者，而被管理者也就没有了。^④ 如果那样，就将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如果有国家，就会有被管理者和奴隶。^⑤

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所理解的人民的管理，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代表来实行管理^⑥。由全民选举所谓人民代表和国家

-
- ① 马克思批注：“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个别的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组织性，能够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采取这样一些经济手段，这些手段将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编者注
- ② 马克思批注：“举例来说，难道在工会中，它的执行委员会是由整个工会组成的吗？难道在工厂中一切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职能都将消失吗？难道在巴枯宁的‘自下而上’的结构中，就一切都在‘上面’吗？如果那样，岂不是就没有什么‘下面’了。难道公社的全体社员将同等地管理一个‘区域’的共同利益吗？如果那样，公社和‘区域’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差别了。”——编者注
- ③ 马克思批注：“当然啦，因为事情是从公社自治做起的。”——编者注
- ④ 马克思批注：“如果有人自己管理自己，那末按照这个原则，他就不是管理自己；因为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编者注
- ⑤ 马克思批注：“这只是说，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编者注
- ⑥ 马克思批注：“蠢驴！这是民主的胡说，政治的空谈！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即使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也是这样。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编者注

统治者的普遍的、人人享有的权利^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都是谎言，它掩盖着少数管理者的专制，更危险的是，它好象是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②。

因此，不管从什么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都得到一个最可悲的结果：少数特权者管理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③。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④，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们将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想管理人民的野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⑤。

但是，这些当选人将是具有坚定信仰的，而且还是博学社会主义者。在拉萨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演说中常常遇到的“博学社会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⑥ 这些名词本身就证明，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学问的，这就是说，他们将完全从管理的操劳中解放出来，

① 马克思批注：“和目前意义上的全民是一样的东西，都是幻想。”——编者注

② 马克思批注：“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就会消失，而让位于合作社的真正意志。”——编者注

③ 马克思批注：“在哪里说的？”——编者注

④ 马克思批注：“就象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编者注

⑤ 马克思批注：“如果巴枯宁先生哪怕是对工人合作工厂的管理者的地位有所了解，他关于统治权的一切狂想就彻底破灭了。他会不得不问自己：在这种工人国家（如果他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的基础上，管理职能能够采取什么形式。”——编者注

⑥ 马克思批注：“‘博学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从来没有使用过，‘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把新的呓语和幻想强加于人民，而不把自己的认识领域局限于研究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参看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编者注

将完全被当作被管理的畜群。多么美好的解放呵！

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到了这个矛盾，由于意识到学者的管理^①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因此他们便想这个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②。他们说，这个专政的唯一的心愿和目的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教育人民，提高人民，使人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任何管理很快都将变得不需要，而国家在丧失了全部政治的即统治的性质以后，将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经济利益的和公社的完全自由的组织。

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是人民的国家，那末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废除国家，那末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的国家呢？^③我们以自己反对他们的论战使他们意识到，自由或无政府状态，即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任何国家，他们的人民国家也不例外，都是一种羁绊，就是说，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

① 马克思批注：“简直是胡说！”——编者注

② 马克思批注：“不，我的亲爱的！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编者注

③ 马克思批注：“撇开想在李卜克内西的人民国家（那完全是用来反对《共产主义宣言》等等的一种胡说）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企图不谈，这里只有一个意思：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因此还使自己的运动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失去意义的手段；由此巴枯宁先生便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最好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通过同他们的论战（这场论战显然早在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和《共产主义宣言》问世以前，甚至早在圣西门以前，就已经进行了；按一个逆序法！）我们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或者无政府状态’（巴枯宁先生仅仅是把蒲鲁东和斯蒂纳的无政府状态翻译成野蛮的鞑靼方言罢了），即‘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胡说八道！）。”——编者注

他们说,这种国家羁绊、专政是为了达到人民的彻底解放所必要的过渡手段:无政府状态或者自由——是目的,国家或者专政——是手段。可见为了解放人民群众,首先必须奴役他们。

我们的论战一直纠缠在这个矛盾上。他们断言,只有专政,当然是他们的专政,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我们回答说:任何专政除了使自己永世长存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它能够在忍受这种专政的人民身上产生和培养的,只是奴役;自由只能由自由即全民暴动和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来创造。

后面我们还要更详细和更切近地分析这个问题,因为现代历史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问题上。现在,我们请读者注意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和不断重复的事实。

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社会理论,坚决地、直接地引导他们同一切政府、同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行彻底的决裂,认为除了社会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出路^①,而相反的理论,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和科学权威的理论,则在政治策略的借口下,同样坚决地把自己的信徒拉到和牵连到同各国政府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断勾结中去,也就是把他们直接推向反动。

拉萨尔就是最好的证明。谁不知道他和俾斯麦的交往和谈判?自由派和民主派(拉萨尔曾进行无情的而且非常成功的论战来反对他们)利用这一点指责他卖身投靠。马克思先生在德国的私人信徒也在互相间交头接耳地说着同样的话,虽然说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前者和后者都是撒谎。拉萨尔很富有,他不需要出卖自己;他非常聪明,非常骄傲,不会认为政府代理人或任何代理人的不体面的地位会比独立的鼓动家的角色好。

^① 马克思批注:“除了空洞词句以外,没有任何社会革命的东西。”——编者注

我们说过，拉萨尔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因为他是一个十分讲究穿戴的花花公子，除了在群众大会上总是以他的机智而出色的演说把无产阶级陶醉得昏昏欲睡之外，他不和无产阶级交往；他被他的财富和非常优越而刁钻古怪的生活习惯弄得过分地娇生惯养，同人民一起他是得不到乐趣的；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他在人民当中总是感到不自然；最后，他的聪明才智的优越感太强，他对没有学问的普通工人群众总是有点轻视，对待普通工人群众，与其说是象兄弟对待兄弟，不如说象是医生对待病人。在这个范围内，他严肃地忠于人民事业，就象正直的医生忠实地医治自己的病人一样，不过医生与其说把病人当作一个人，不如说当作一个主体。我们深信，拉萨尔是非常正直的和骄傲的，无论把世界上的任何东西给他，都不能使他背叛人民的事业。

根本不需要采用下流的推测来说明拉萨尔同普鲁士大臣的交往和勾结。我们已经说过，拉萨尔曾经对一切色彩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公开作战，极端鄙视这些天真的唱高调者，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这些人束手无策和软弱无力；俾斯麦也与他们为敌，虽然是由于其他原因，——这就是他们接近的第一个理由。主要基础在于拉萨尔的政治社会纲领，在于马克思先生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

这个纲领的基本点是：通过仅仅国家这一个手段使无产阶级获得（虚假的）解放。但是为此就要使国家同意成为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资本的桎梏的解放者。怎样使国家具有这种意志呢？只可能有两种手段。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革命以便掌握国家——英勇的手段。根据我们的意见，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国家，就应当立即把它当作人民群众的永久的监狱加以破坏；按照马克思先生的理论，人民不仅不应当破坏国家，相反地，应当巩固和加强国家，并把这种形式的国家交给自己的恩人、保护者、老师——共产党的首长们，一句话，完全交给马克思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支配，他们将

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解放人民。他们将把权柄集中在强有力的手中，因为无知的人民要求非常强有力的保护；他们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银行，集中掌握全部工商业的、农业的甚至科学的生产，并且把人民群众分成为两支军队：工业军和农业军，由国家工程师们直接指挥，这些工程师将构成新的政治和科学的特权阶层。

请看，德国共产主义者学派向人民提出的是多么光辉的目标！但是，为了得到所有这些恩典，首先需要迈出微小的、无罪的一步——革命！好吧，就请你们等着德国人进行革命吧！无休止地谈论革命倒是可能的，而进行革命……①

德国人自己并不相信德国革命。需要别国人民开始革命，或者某种外在的力量吸引或推动他们。他们决不会自动地从高谈阔论向前迈进一步。因此，必须寻找别的手段来掌握国家。必须赢得正在领导或者能够领导国家的人们的同情……②

在拉萨尔时代，同现在完全一样，领导国家的是俾斯麦。谁能取他而代之呢？自由党和民主进步党被战胜了；剩下的只是纯粹的民主党，后来取名为“人民党”。但是在北方它微不足道，在南方人数稍多，可是它直接追求奥地利帝国的领导权。最近一些事件证明，在这个纯资产阶级的政党中，没有任何内在的独立性和力量。1870年它便彻底垮台了。

拉萨尔的天才主要地在于他具有马克思先生及其追随者所没有的实际的本能和智力。正如一切理论家那样，马克思在实践上是始终不渝的、不可救药的幻想家。他在国际协会中进行的不幸的运动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在国际中建立他的专政，而通过国际又建立对整个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专政。只

① 虚点是原有的。——编者注

② 同上。

有疯子或者完全脱离实际的学者才会抱定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先生今年遭到了彻底的、也是应得的失败，但是失败未必能使他摆脱沽名钓誉的幻想。

由于这种幻想，并且也由于想在资产阶级当中罗致一批崇拜者和信徒，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经常推动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勾结。按所受教育和本性来说，他是个雅各宾党人，他所喜爱的幻想是政治专政。甘必大和卡斯特拉尔就是他真正的理想。他的心灵、他的整个思想都趋向他们，如果在最近他不得不摒弃他们，那仅仅是因为他们不会佯装成社会主义者。

这种近年来在马克思身上暴露得更加厉害的、想同激进资产阶级勾结的意图，包含着两方面的幻想：第一，激进资产阶级如果能够掌握国家政权，就会愿意或有可能愿意利用这个政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第二，激进党掌握国家以后总有一天能够对抗其根源埋藏在它自己内部的反动势力。

.....

激进党是个特别的政党；他在人民之外生活和活动。它同干粗活的人结成联盟的意向表明什么呢？恰恰是意识到软弱无力，意识到必须依靠人民帮助来掌握国家政权，当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要它一掌握国家政权，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人民的敌人；它一变成人民的敌人，就会失去支点即以前的人民力量；为了哪怕是暂时维持政权，它就不得不同各个被战胜的反动党派结成联盟和实行勾结，寻找反对人民的新的力量源泉。这样一来，让步再让步，背叛再背叛，它便会把自己和人民都出卖给反动派。请听听激烈的共和主义者卡斯特拉尔在现在成了独裁者以后所说的话吧：“搞政治就是要实行让步和讨价还价，所以我打算让温和的保皇党的将军们来领导共和军队”。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任何人都是一目了然的。

作为一个讲实际的人，拉萨尔懂得这一点；此外，他非常鄙视整个德国资产阶级，因此他不能建议工人同任何资产阶级政党联系。

那末只有革命了；但是拉萨尔非常了解自己的同胞，对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不抱希望。那他怎么办呢？出路只有一条：同俾斯麦联系。

联合点是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提供给他的，这就是统一的、巨大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拉萨尔希望有这样的国家，而俾斯麦已经干起来了。他们怎么会不联合起来呢？

从进入内阁的时候起，或者更早，从1848年普鲁士议会时期起，俾斯麦就表明，他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他鄙视资产阶级；他目前的活动表明，他既不是贵族封建政党的狂热信徒，也不是这个政党的奴隶，按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属于贵族封建政党的，但他在被击溃、被制服、对他奴隶般地惟命是听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派、共和派甚至社会主义者的政党的帮助之下，把贵族封建政党搞得威风扫地，他力求彻底地把它纳入国家这个公分母的范围之内。

他的主要目的，同拉萨尔和马克思的一样，是国家。因此拉萨尔要比马克思合逻辑得多和实际得多，因为马克思一方面承认俾斯麦是革命者，当然是按自己的观点，同时却又幻想推翻俾斯麦，大概是因为俾斯麦在国家中占据着在马克思先生看来应当属于他本人的首要地位。

看来，拉萨尔没有这样高的自尊心，因而不嫌弃同俾斯麦结盟。拉萨尔完全是遵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所阐明的政治纲领，只是向俾斯麦提出了一个要求：对工人生产合作社发放国家贷款。但是同时——他对俾斯麦的信任程度证明这点——根据这个纲领，他在工人中间发动了拥护争取选举权

的和平合法的鼓动，至于另一个幻想，我们已经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拉萨尔突然的过早的逝世使他不仅未能把自己的计划贯彻到底，而且甚至未能对自己的计划哪怕是稍加发挥。

拉萨尔死后，在马克思先生的朋友们和追随者的直接影响下，在德国成立了工人教育协会的自由同盟和拉萨尔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之间的第三个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这个党的是两个很有才干的人，一个是半工人，另一个是作家、马克思先生亲授的学生和代理人：倍倍尔先生和李卜克内西先生。

我们已经谈过了李卜克内西先生 1868 年到维也纳去活动的可悲后果。这次活动的结果是召开了纽伦堡代表大会（1868 年 8 月），在这次大会上社会民主党最终组成了。

按照在马克思的直接领导下活动的这个党的创始人的意图，这个党应当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泛日耳曼分支。但是这种联合违反德国的法律、特别是普鲁士的法律。因此，只是用下述词句间接地宣布了这种联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只是在德国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同国际工人协会发生联系。”

毫无疑问，在德国建立这个新的政党，有一个秘密的希望和一个隐蔽的企图，就是通过它把被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 年）所摒弃了的马克思的全部纲领搬到国际中去。

马克思的纲领成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纲领的开头复述了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国际纲领中的一些主要条文；可是后来忽然来了个急转弯，主张“夺取政权”，建议德国工人把它作为新政党“最近的和直接的目的”，并补充了下面一句值得注意的话：“争取政治权利（普选权、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是工人经济解放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进行社会革命以前，工人应当完成政治

革命，或者说得更合乎德国人的本性，就是通过和平鼓动来争取，或者更简单地取得政治权利。由于在社会运动以前，或者在社会运动之外——这完全是一回事，——任何政治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所以这个纲领建议德国工人首先接受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的，并且为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利益去进行政治运动，而激进资产阶级以后为了表示感激，将不是解放人民，而是使人民屈服于新的权力之下，遭受新的剥削。

.....

首先，德国人很少参加国际的代表大会。在国际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法国、比利时、瑞士的工人以及一部分英国工人。现在，德国人与其说是根据人民的社会纲领，不如说是根据上述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组成了政党，于是他们出席了巴塞尔代表大会，他们在自己的一个首领李卜克内西先生的严格监视之下，象一个训练有素的连队一样，全体一致地投了票。

不言而喻，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自己的纲领，建议把政治问题摆在其他一切问题之前。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德国人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巴塞尔代表大会保持了国际纲领的纯洁性，没有容许德国人用把资产阶级政策加进去的办法来歪曲这个纲领。

于是在国际内部开始发生分裂，这个分裂的原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德国人。他们竟然胆敢向这个主要是国际的协会提出自己的狭隘资产阶级的、民族政治的、纯粹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纲领，并且企图几乎是粗暴地强加于它。

他们被彻底击溃了。属于“社会革命党人同盟”的人，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在不小的程度上促成了他们的失败。因此，德国人对“同盟”切齿痛恨。1869年年底和1870年的上半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同盟”的人物进行恶毒的谩骂和更加恶毒的、常常是

卑鄙的造谣中伤。

但是这一切都在行将在德国发生而在法国已经发生的军事政治危机面前消失了。战争的结局是众所周知的，法国倾覆了，变成了帝国的德国占据了它的位置。

.....

整个德意志民族，德国社会的一切阶层毫无例外地，在得到德国军队取得许多辉煌胜利和最后占领巴黎的消息后，都欣喜若狂，对这件事情如何作别的解释呢？在德国，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胜利的直接结果，将是在这以前就已十分嚣张的军国主义因素的完全得势；这样一来，最粗暴的反动势力也将在国内生活中取得胜利。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没有一个或者说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感到害怕，相反地，大家都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起来了。整个士瓦本反对派在新帝国的阳光照耀下，象冰雪一样地溶化了。人民党消失不见了，市民、贵族、农民、教授、艺术家、著作家和大学生齐声歌唱泛日耳曼主义的胜利。在外国的一切德国的协会和社团都开始举行庆祝活动，高呼“皇帝万岁”！即为那个在1848年绞杀过民主派的人喝采。所有的自由派、民主派、共和派都成了俾斯麦派；甚至在美国，在那个似乎可以学会和习惯于自由的地方，数百万兴高采烈的德国侨民都庆祝泛日耳曼专制制度的胜利。

这种俯拾即是的事实不可能是暂时的现象。它表现出了存在于每一个德国人心中的深刻的热情，这种热情包含着命令和服从、统治和奴役这两种似乎是不可分割的因素。

而德国工人呢？德国工人什么也没有做，连一个声援和同情法国工人的声明都没有发表。只举行过很少几次群众大会，在会上讲了一些话，在讲话中，胜利的民族自豪感在国际团结的声明面前似乎有所收敛。但除了讲空话以外，谁也没有再前进一步，而在完全没有驻军的德国，当时本来是能够开始并做出一些事情来的。

诚然，大多数工人都被征召入伍了，在军队中，他们出色地履行了士兵的义务，就是说按照长官的命令打人，绞死人，杀人，枪毙人，同时还进行掠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这样履行士兵义务的同时，还给《人民国家报》写了一些悲惨的信件，生动地描写了德军在法国干下的野蛮罪行。

可是，也有几个比较坚决地进行反对的例子，如英勇的老头子雅科比提过抗议，他因此而被关进要塞；再如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先生也提过抗议，他们至今仍关在要塞中。不过这是个别的，而且是十分罕见的例子。我们忘不了1870年9月《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明显地表露出泛日耳曼主义的欢庆胜利的心情。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由于德军获得的胜利，历史主动性已从法国彻底转到了德国；我们德国人云云”。

一句话，可以毫无例外地说，对本民族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心情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支配着全体德国人。这就是泛日耳曼帝国和它的大首相俾斯麦公爵的威力的主要支柱。

.....

在德国人民那里，革命的趋向怎么可能同构成他们主要本质特点的传统的俯首听命和唯我独尊的意向（这一特点我已再三说过）结合在一起呢？你们知道不知道，目前支配着每个德国人的意识或本能的是什么意图？是辽阔地、遥远地扩张德意志帝国疆界的意图。

.....

任何一个德国人都认为，建立伟大的德意志帝国的事业刚刚开始，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应该把除了匈牙利之外的整个奥地利、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的一部分、法国的另一部分、以及直到阿尔卑斯山脉为止的整个瑞士合并于德意志帝国。这就是他的热情，

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热情压倒其余的一切。这种热情现在也支配着社会民主党的一切行动。

你们不要以为，俾斯麦真象他假装的那样，是这个党的凶恶敌人。他非常聪明，不会看不见社会民主党在奥地利、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传播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是为他当先锋。传播这种德意志观念现在是马克思先生的主要意图，我们已经指出，他企图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国际中恢复俾斯麦公爵的功绩和胜利。

俾斯麦控制着所有的党派，未必会把它们交给马克思先生；他如今比教皇和教权主义的法国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充当着欧洲的、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反动势力的首脑。

.....

这个帝国通过自己的大首相宣布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战。俾斯麦公爵以拥护他和给他撑腰的四千万德国人的名义宣布了对社会革命的死刑判决书。他的竞争者和忌妒者马克思，而继他之后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体头目，好象是为了证实俾斯麦似的，也宣布对社会革命进行同样的决死战争。我们在下一部分将详细地阐述这一切。

我们看到，目前一方面，在日耳曼帝国、在征服和压制即统治的热情普遍沸腾的德国人民中间，反动势力在猖獗，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即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的千百万普通工人解放的唯一捍卫者，正在抬起头来。目前它只是在欧洲南部即意大利、西班牙、法国集结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希望，西北部的各国人民即比利时、荷兰而主要是英国，而最后是一切斯拉夫部族，不久都将站到社会革命的旗帜下来。

在泛日耳曼主义的旗帜上写着：无论如何要保持和加强国家；相反地，在社会革命的旗帜上，在我们的旗帜上则用火和血的字写

道：破坏一切国家，消灭资产阶级文明，通过自由联盟自下而上地建立自由的组织——无所约束的普通劳动人民的、解放了的全人类的组织，建立新的全人类的世界。

写于1873年。译自《巴枯宁选集》彼得堡1919年俄文版第1卷第68—70、77—80、83—85、90、94—95、96—99、109、113—114、117—121、174—176、186—191、237—241、252—254、293—300、301—305、309—310、310—312、315、316、319—320页。

致《日内瓦》杂志编辑

· 编者按语 ·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在马克思亲自领导下粉碎了巴枯宁集团的阴谋分裂活动，并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这次大会是“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进行的……审判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1页）。为了彻底摧毁这个阴谋集团和肃清其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海牙代表大会专案委员会的委托，收集和整理了巴枯宁集团进行阴谋活动的材料和文件，并决定予以公布。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1873年4月至7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拉法格的协助下，写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一书，公布了巴枯宁集团的罪证，根据大量实际材料揭穿了巴枯宁集团为了操纵国际，篡夺国际的领导权而施展的种种阴谋诡计和诈骗伎俩，总结了国际在理论上和组织上反对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斗争。这部著作象投入巴枯宁反革命阵营的一枚炸弹，彻底摧毁了巴枯宁集团的阵地，剥下了巴枯宁的革命伪装，揭露出他的反革命面貌，使他名声扫地，再也不能在工人运动中进行任何实际活动。

但是，巴枯宁仍不甘心失败，又玩弄了一套金蝉脱壳的诡计，企图继续欺骗工人群众。这里选录的三封信就是巴枯宁玩弄这种诡计的证据。《同盟和国际》刚一发表，巴枯宁就在9月和10月写信给《日内瓦》杂志编辑和汝拉联合会，以年老体衰为理由，宣布脱离任何政治活动，“退出斗争舞台”，说什么“从此以后，我不去破坏任何人的宁静；让别人也不要扰乱我的宁静”。实际上，这不过是巴枯宁装死躺下的阴谋策略。巴枯宁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吐露了这种假引退的险恶用心，供认为了“更好地秘密进行工作”，“除了在各方面都戴上和平的和具有非常实利主义的意向的资产者的假面具以外，没有别的更好的手段。根据这种新的体制，我们决定，我作为团体的固定中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扮演一个疲倦的和灰心丧气的革命者的角色”。巴枯宁这种以退为进的韬晦策略并没有逃过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犀利目光。就在巴枯宁发表了那两封“引退”信之后，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就指出：“巴枯宁给《日内瓦报》编辑部和汝拉人寄去了关于退出政界的声明，作为对小册子的答复，声明说：我要退出了。今后我不再打扰任何人，只是请别人也不要打扰我。他是大错特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12页）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斗争，巴枯宁的阴谋并没能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的阴谋集团不久就彻底瓦解了。

1873年9月

先生们，我没有回答报纸上的诬蔑和诽谤的习惯。事实上，如果我要回答从1869年以来报刊对我散布的一切胡说八道，那我的

事情就太多了。

在我的最残酷的诽谤者中，除了俄国政府的代理人以外，当然还有德国共产主义者的首领马克思先生。他由于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德国人和犹太人的三重性格，无疑对我怀有仇恨。他说他仇视俄国政府，却又总是同俄国政府完全和谐一致地行动，起码在涉及我的时候如此。为了在公众的眼中把我抹黑，马克思先生不仅利用热心效劳的报刊，而且还利用自己的通讯员、委员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甚至国际本身，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个美好的和伟大的协会（他曾促进了它的建立）变成自己个人复仇的工具。

恰好今天有人告诉我关于《国际和同盟》^①这个小册子出版的消息。有人对我说，这个小册子是海牙代表大会任命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现在谁不知道，这次代表大会无非是马克思的伪造，而这个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两个密探：德特勒格和盖得代格）自己的声明说，它无法论证它通过的决议，因此它没有说明理由而要求代表大会对它投信任票；这个委员会中的唯一体面的委员发言坚决反对这些既可恶又可笑的结论。

马克思先生不满意自己走狗们的笨拙，便不惜精力来自己起草新的报告，这个报告现在由他自己和他的几个亲近的朋友署名发表了。

人们告诉我，这个新的小册子是对一个称为“同盟”的团体进行真正的告密、宪兵式的告密。马克思先生被一种狂暴的仇恨弄得昏头昏脑，竟不怕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公然扮演起告密者、诽谤者和警察暗探的角色来了。这是他的事情，如果他喜欢这种行当，就让他去干吧。而我放弃我过去决意遵守的沉默的原则，并不是为了反驳他……

^①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编者注

但是今天，先生们，我想我有权来一次例外，反驳一下谎言，或者用议会的语言来说，纠正一下你们报上所出现的一些错误。

有人告诉我，9月14日在你们的报纸上（我不能得到这一号报纸），刊载了一家巴黎报纸（《自由报》或者《辩论报》）的一篇通讯，这个通讯的匿名作者无耻地断言，他曾听到过我承认，——我说了什么呢？——我吹嘘说，震撼了西班牙的一切革命动乱都是我掀起的。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按照这种说法，同样可以认为，震翻了海洋、荡平了大地的一切风暴都是我呼唤出来的。

这些先生们这样诬蔑我，把我变成了上帝。

难道需要我向你们保证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吗？我甚至相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先生，我要求他说出自己的姓名并且指出我们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见过面。

但是，先生们，你们自己也在你们的19日报纸上把我根本没有参与发表的那些作品归到了我的名下。因此，我向你们提出一个请求，我想你们是主持公道的，是不会拒绝的。如果你们想再一次使我有荣幸遭受攻击的话，那末就请根据我署了名的那些作品来谴责我。

我向你们承认，所有这些使我深深厌恶社会生活。这对我已经够了，我终生都在斗争中度过，我已经累了。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我的心脏病一年比一年恶化，这使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让别的更年轻的人来干吧；至于我，我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力量，可能也没有必要的信心，来继续推息息法斯的石头^①，反对到处猖獗的反动势力。所以我退出斗争舞台，我只向我敬爱的同时代人提出一个要求——忘记。

① 息息法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因欺骗众神，被罚推一巨石上山，每当推到山顶，巨石就自动滚下山，他就这样永远不停地推滚巨石。“推息息法斯的石头”意即徒劳无益的工作。——编者注

从此以后,我不去破坏任何人的宁静;让别人也不要扰乱我的宁静。

先生们,如果我希望你们不拒绝刊登这封信,难道这算是我对你们的公正性的过多的要求吗?

米哈伊尔·巴枯宁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8卷第432—434页。

致汝拉联合会

1873年10月

亲爱的同志们！

在没有向你们表示最后的谢意和同情之前，我不能也无权离开社会生活。

我同你们认识已经近四年半了，尽管我们的共同敌人制造一切阴谋诡计，对我进行卑鄙的诽谤，你们仍然对我保持尊敬、友谊和信任。你们甚至不怕他们给你们戴上“巴枯宁分子”的帽子，因为你们认为在表面上做不独立的人，要比有意识地做不正义的人好。

不过，你们始终高度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意向和行动的独立性和充分自主性，而我们敌人的奸诈意图是那样明显，所以你们能够以极大的鄙视态度来对待他们的诽谤性和侮辱性的诋毁。

你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正是由于你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你们现在取得了对马克思派的野心阴谋的完全胜利，这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自由和整个前途的。

在你们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兄弟的强有力的支持下，你们又使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走上了由于马克思妄想取得独裁而几乎使它离开了的那条道路。

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两次代表大会，是你们事业的正义性和巩固性的辉煌的、有决定意义的证明。

除了德国，欧洲的一切主要的联合会的代表都出席了你们的代表大会、自由的代表大会。你们的代表大会大声宣布了和充分

论证了，或者更正确些说，证实了各国劳动者的自治和兄弟团结。纯粹由德国和瑞士工人组成的权威主义的或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显然是讨厌自由的，它徒劳地企图把已被摧毁的、现在已变得可笑的马克思的独裁粘合起来。

他们肆意进行侮辱，是为了证明，似乎他们代表日内瓦和德国的大多数工人，他们通过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决议，这个决议已不是马克思那样喜欢的充分的权威了，更不是自由，他们灰心丧气，怀着对自己和别人不满的情绪各奔东西。这个代表大会是坟墓。

因此，你们的胜利，自由和国际对权威主义阴谋的胜利是充分的。如果说在昨天，当这个胜利看起来还不确定的时候（虽然我自己对它从不怀疑），谁也无权离开你们的行列，那末现在，当这个胜利已变为既成事实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收回按他的个人状况的要求而行动的自由。

亲爱的同志们，我利用这个机会请求你们同意我退出汝拉联合会和国际。

我采取这种行动是有许多原因的。你们不要认为我这样做是由于我个人在最近这些年受了侮辱。这并不是说，我对这些侮辱漠然视之。如果我认为，我继续参加你们的工作，参加你们为争取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而进行的斗争，能够带来益处，那末我是能够找到足够的力量来予以反击的。但是我持有另外一种意见。

按照出身和个人地位来说（当然不是按同情和趋向），我仅仅是资产者，而作为资产者，我在你们中间只能从事宣传工作。现在我深信，发表大篇理论演说（不管是在报上还是口头上）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如果仅仅思想就可以拯救世界，最近九年来在国际内发展起来的思想已经超过了拯救世界的需要，要是谁断言他可以发明出更新的理论，我就准备同他进行争论。

现在已经不是思想的时代，而是行动和事实的时代了。现在

最重要的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但这种组织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如果我还年轻，我会到工人中间去，参加自己兄弟的劳动生活，同时和他们一起来从事伟大的劳动来进行这种必要的组织。

但是，我的年龄和我的健康不允许我这样做；相反地，它们迫使我保持幽静和安宁。任何的紧张，过多的奔波，对我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精神方面，我感到自己还相当有力，但是在体力方面我会很快感到疲倦，意识到再也没有力量进行斗争了。所以，在无产阶级阵营中我只会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而不是助手。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看，一切情况都迫使我同你们告别。当我远远离开你们和整个世界时，我能对整个国际，特别是对汝拉联合会带来什么益处呢？你们的巨大的、美好的协会，从今以后将纯粹是战斗的、实践的协会，它不能容忍在自己中间有尸位素餐的人。

因此，亲爱的同志们，我在离开你们的时候，对你们深表感谢，并且对你们的伟大的和神圣的事业——整个人类的事业，满怀同情。我今后也将以兄弟般的关心注视着你们的步伐，并高兴地欢迎你们的每一个新的胜利。

我至死都是属于你们的。

但是，在临别前，请允许我向你们提出最后一个兄弟的建议。朋友们，国际反动势力的中心如今并不在以可笑的方式崇奉耶稣的不幸的法国，而是在德国、在柏林，它被马克思先生的社会主义和俾斯麦先生的外交很好地代表着，这种反动势力的最终目标是要使欧洲泛日耳曼化，它现在有吞没一切和毁灭一切的危险。它现在向仅仅由各个自治的和自由的联合会代表着的国际宣布了殊死的战争。虽然你们还属于自由的共和国，但是你们也同其余一切国家的无产者一样，被迫同这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因为这种反动势力横在你们和你们的最终目标——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

之间。

你们面临的是一场可怕的斗争。但是你们不要灰心丧气，要知道，尽管你们的敌人具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如果你们能忠实地实现以下两个条件，那末你们的最终胜利是有保证的：

一、坚持巨大的和广泛的人民自由的原则，没有这种自由，甚至平等和团结都不过是谎言。

二、更多地组织一切职业和一切国家的工人的实际的、战斗的国际团结，并记住，尽管你们在个别情况下，在各个单独的城市或国家中多么软弱，你们将在这种全世界的集体中吸取无限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再见吧。

你们的兄弟 米哈伊尔·巴枯宁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435—438页。

致巴枯宁娜^①（摘录）

1874年7月

.....

那时他^②第一次更加激烈地提出了一种想法，在从俄国回来以前，他一直固执地忠于这种想法。他说，我从今以后应当远离任何革命发动，让年轻人去做这些事情，而我自己则充当长期的国际密谋的始终是积极的和始终是秘密的，并且荫蔽得很好的中心。当时我坚决反对这种想法，不是在细节上，——对于它的细节我是同意的，——而是在原则本身上，因为，如果我接受这个原则，那末我就不可避免地要扮演达赖喇嘛那样一个不令人羡慕的、而主要是毫无用处的角色：人们似乎是为了全世界的幸福花费很大的代价把他喂得肥肥的。我向卡菲埃罗说，我的健康状况，我的体重，心脏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我的四肢和行动的不便，使我不适于从事冒险事业，这些事业首先要求体力和行动的充分灵活与敏捷。但是，我曾始终坚持自己的义务和投入多少具有普遍、稳定和严肃性质的每一个革命运动的权利，我始终感到并且希望，对我说来最值得赞扬的结局，是在强烈的革命冲击时期牺牲。

不过，当时这在我们之间是纯粹学院式的争论，因为当时的状况不允许考虑革命事业。西班牙革命刚刚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因为领袖和群众都缺乏毅力和革命热情；而其余整个世界都处在最黑暗的反动之中。只有在意大利可以看出一些革命觉醒的迹象，但是为了在那里建立人民国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因此，

① 巴枯宁的妻子。——编者注

② 指巴枯宁的门徒卡菲埃罗。——编者注

我在这样一点上同意卡菲埃罗的意见，即不仅我，而且我们所有的人在一定时期内都应当尽可能……^①，以便更好地秘密进行工作，而为了这点，除了在各方面都戴上和平的和具有非常实利主义的意向的资产者的假面具以外，没有别的更好的手段。

根据这种新的体制，我们决定，我作为团体的固定中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扮演一个疲倦的和灰心丧气的革命者的角色，这个革命者由于一切幻想破灭后而意志消沉，已完全沉溺于财产和家庭的物质利益之中。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团体不仅是各国政府迫害和监视的目标，而且是其他党派的程度不等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的恶毒攻击的靶子，而主要是我已成为马克思学派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告密和卑鄙诽谤的对象。

因此，我应当装成是完全醉心于家庭利益的很富裕的资产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麻烦问题，我们并没有忽视。大家都知道，到那时为止我一直穷困潦倒，赤贫如洗。我们怎么向世界解释我的物质状况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突然改变呢？我和卡菲埃罗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很久，并得出结论：我没有必要向我们仇恨和鄙视的资产阶级世界报告这件事情；要知道，我可以获得遗产或者从俄国得到我的一部分财产，当然为了避免俄国政府的追究和没收，获得的方法应当保守秘密；其次，……^②如果人们继续利用这个借口，也不会使我们不安；相反地，我们大可因此而高兴，因为这只能帮助我们隐蔽我们的计谋。

因此，根据这个决定，有朝一日我将变成即使不是富有的、那末无论如何也是相当殷实的资产者。除了自己最亲近的朋友以外，我将不向任何人解释这是怎样发生的。在洛迦诺这里，只有三个人是例外：艾米利奥·别列里奥、扎依采夫和列米日奥·克叶

^① 原稿辨认不清。——原书编者注

^② 同上。

札，——扎依采夫是我个人非常忠实的秘密的朋友，克叶札在许多方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他给我们的确帮了很大的忙，到现在为止一次都没有辜负过我们的信任。此外，在这里知道此事的，还有我们的朋友雅科比博士和他的妻子以及同盟的老盟员奥斯特罗加等人。我对可尊敬的鲍洛·加维拉齐怀有深刻的敬意，他经常向我证明自己的忠实的友谊，可是甚至他也不了解我们的秘密，原因是：曾经决定，我要尽一切力量在帖幸州取得瑞士公民的权利，而在这方面加维拉齐对我的帮助可以而且应当比任何人都大，可是如果他怀疑我照旧积极从事政治活动，那末由于害怕败坏他的亲爱的瑞士，特别是帖幸州，他就不会给我帮忙了。我还要指出，尽管关于我的谣言非常多，加维拉齐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一个不体面的问题，从来没有丝毫不信任，他经常、到处和在各方面帮助我。

由于共同通过了这些决定，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发表了那两封信，声明由于疾病和年龄的关系，我将脱离任何政治活动，而仅仅注意私人生活。

译自《巴枯宁传记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428—431页。

米哈伊尔·巴枯宁年表

(1814—1876)

- 1814年5月8日 生于俄国特维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
- 1833年 毕业于圣彼得堡炮兵学校。
- 1835年 辞去军官职务。
- 1836—1840年 在莫斯科参加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启蒙运动者斯坦凯维奇领导的哲学小组的活动。这时,巴枯宁热中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
- 1838年4月 发表第一篇文章《〈黑格尔中学讲演录〉译者序言》,鼓吹在一切方面同现实调和。
- 1840年 在赫尔岑等人的帮助下出国,前往柏林。开始同阿·卢格等青年黑格尔派接触。
- 1842年10月 在卢格主编的《德国年鉴》上发表《德国的反动》一文,主张“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
- 1843年1月 前往瑞士。同魏特林等人时有来往。
- 6月 发表《论共产主义》一文,把共产主义说成是“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产物。
- 1844—1847年 流寓巴黎。在巴黎期间同马克思相识,并同蒲鲁东结为朋友。
- 1848年 参加一八四八年革命。
- 6月 参加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并发表了《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础》,大肆鼓吹泛斯拉夫主义。
- 12月 以“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的名义,发表了《告斯拉夫人书》,鼓吹泛斯拉夫主义。
- 1849年5月 参加德累斯顿起义。
- 10日 被萨克森政府逮捕。
- 1851年 被引渡给沙皇政府。
- 7—8月 向沙皇尼古拉写了长达十万言的《忏悔书》,成为可耻叛徒。
- 1857年2月14日 又给新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写信请求减刑。

- 28日 被减刑,改判流放西伯利亚。
- 1860年11—12月 给赫尔岑写信,为沙皇的扩张主义辩护,替沙皇侵略中国的干将穆拉维约夫歌功颂德。
- 1861年6月 趁机脱逃,取道日本和美国,转赴伦敦。参加赫尔岑主编的《钟声》的工作。
- 1862年 在《钟声》发表《罗曼诺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节里》一文,颂扬和美化沙皇。
- 1863年 抱着冒险主义的态度参加波兰起义,失败。
- 1864年11月 在伦敦会见了马克思,加入了第一国际。
- 1864年底 前住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的变种——巴枯宁主义形成。
- 1865—1867年 先后在佛罗伦萨和在那不勒斯建立无政府主义的国际团体国际革命协会。
- 1867年9月 前住日内瓦。参加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国际团体和平和自由同盟。
- 1867—1868年 写《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主义》一书。
- 1868年7月 参加第一国际日内瓦支部。
- 9月 在和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第二次大会上向资产阶级分子建议实现各阶级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平等,消灭一切国家,建立集体主义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一提案被否决,于是巴枯宁退出同盟。
- 10月 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兄弟同盟。
- 11月 将国际兄弟同盟的公开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提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批准,企图使同盟打入第一国际,作为他篡夺国际领导权的工具。
- 12月22日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通过马克思起草的决议,拒绝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 1869年2月 同盟中央局又写信给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表示愿意解散自己的组织,但希望能够保留自己的“理论纲领”。
- 3月9日 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致国际社会主义同盟中央局》的一封回信,明确指出,如果同盟要求加入国际,必须做到两点:(1)放弃同盟纲领中“各阶级平等”的错误观点;(2)解散同盟,并把每一新支部的地点和人数通知总委员会。巴枯宁耍了两面派手法,表面上解散了同盟,实际上把它秘密保存下来,使它打

- 入了第一国际。
- 8月 写《国际的政策》一文,大肆歪曲第一国际的章程。
- 夏 写《革命问答》一文。
- 9月 参加第一国际在巴塞尔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妄图改变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篡夺国际的领导权,未遂。
- 1870年1月 发表《告俄国军官书》。
- 4月 在瑞士拉绍德封召开的第一国际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倚恃他们伪造的虚假多数,公开进行分裂活动,造成这个联合会的分裂。
- 8月 写《致一个法国人》一书。
- 9月 参加里昂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往日内瓦。
- 1871年6月 写《巴黎公社和国家概念》一文。
- 1870—1871年 在这期间写下一些手稿,后来汇编成为《上帝与国家》一书,宣扬人性论和反权威主义。
- 1871年8月 写《一个国际会员对马志尼的答复》一文。
- 11月 为了对抗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分裂国际,巴枯宁指挥他的党徒在瑞士桑维耳耶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各支部自治为原则的章程。大会还向第一国际所有支部发出了所谓《桑维耳耶通告》,恶毒地攻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和马克思。
- 1871年底 写《我和马克思的私人关系》一文,对马克思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 1872年6月 给《汝拉联合会简报》编辑部写信,对马克思横加攻击和诬蔑。
- 9月上旬 被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开除出国际。
- 15日 巴枯宁分子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了所谓的“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攻击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
- 1871—1873年 写《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 1873年9月 写信给《日内瓦》杂志编辑,声明退出政治舞台,但在幕后继续指挥他的党徒搞阴谋活动。
- 1874年7月 纠集极少数巴枯宁主义者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暴动,未遂,逃回瑞士。
- 1876年7月1日 病死于瑞士伯尔尼。

本书中使用的著作索引

- М.А.Бакунин.«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том I, Москва, 1934.
- М.А.Бакунин.«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том II, Москва, 1935.
- М.А.Бакунин.«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том IV, Москва, 1935.
- М.А.Бакунин.«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 Петербург, 1919.
- М.А.Бакунин.«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II, Петербург—Москва, 1920.
- М.А.Бакунин.«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V, Петербург—Москва, 1920.
-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М.Бакунина», том III,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28.
- Г.В.Плеханов.«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V, Москва 1923.
- «Базельский конгресс Перв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1869)», Ленинград, 1934.
- Ю.Стеклов,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 его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том IV,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27.
-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стории I и II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в», «Новая, Москва», 1926.
- Michael Bakunin.«God and the state», New York, 1916.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黑格尔中学讲演录》译者序言（摘录）（1838年4月11日）
德国的反动（摘录）（1842年10月17—21日）
论共产主义（摘录）（1843年6月13日）
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础（1848年6月初）
致格·海尔维格（摘录）（1848年8月上半月、12月8日）
告斯拉夫人书（摘录）（1848年12月）
忏悔书（摘录）（1851年7—8月初）
向亚历山大二世请求减刑书（1857年2月14日）
致亚·伊·赫尔岑（摘录）（1860年11月7日）
答《钟声》（摘录）（1860年12月1日）
致亚·伊·赫尔岑（摘录）（1860年12月8日）
罗曼诺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节里。人民事业（摘录）（1862年）
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摘录）（1866年）
国际革命协会的纲领（摘录）
在和平和自由同盟1867年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主义（给和平和自由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说明理由的建议）（摘录）（1867—1868年）
在和平和自由同盟1868年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致《民主报》（摘录）（1868年4月）
国际兄弟同盟的章程和纲领（1868年9月）
致卡·马克思（摘录）（1868年12月22日）
国际的政策（摘录）（1869年8月）
革命问答（1869年夏）
致阿·里沙尔（摘录）（1869年7月29日）
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1869年9月10日）
附录：巴塞尔代表大会废除继承权问题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致亚·伊·赫尔岑（摘录）（1869年10月28日）
告俄国军官书（摘录）（1870年1月）
致阿·里沙尔（摘录）（1870年4月1日）
致一个法国人（摘录）（1870年8月30日）
法兰西共和国。公社革命联邦（1870年9月）
致尼·普·奥格辽夫（摘录）（1871年4月9日）
巴黎公社和国家概念（摘录）（1871年6月）
附录：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给国际工人协会各联合会的通告（
1871年11月12日）
上帝与国家（摘录）（1870—1871年）
我和马克思的私人关系（摘录）（1871年底）
国际的组织（1872年）
国际苏黎世斯拉夫支部的纲领（1872年）
秘密信件
致路·纳布鲁齐（1872年1月3日）
致卢比康及其余所有朋友（摘录）（1872年1月23日）
致弗·莫拉（1872年4月5日）
致莫拉哥（摘录）（1872年5月21日）
致《汝拉联合会简报》编辑（1872年6月12日）
附录：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关于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的决议（1872年
9月15日）
致《自由报》编辑部（摘录）（1872年10月5日）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国际工人协会内的两派斗争）（摘录）
（1873年）
致《日内瓦》杂志编辑（1873年9月）
致汝拉联合会（1873年10月）
致巴枯宁娜（摘录）（1874年7月）
米哈伊尔·巴枯宁年表